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徐崇温 主编

(法)亨利·列菲弗尔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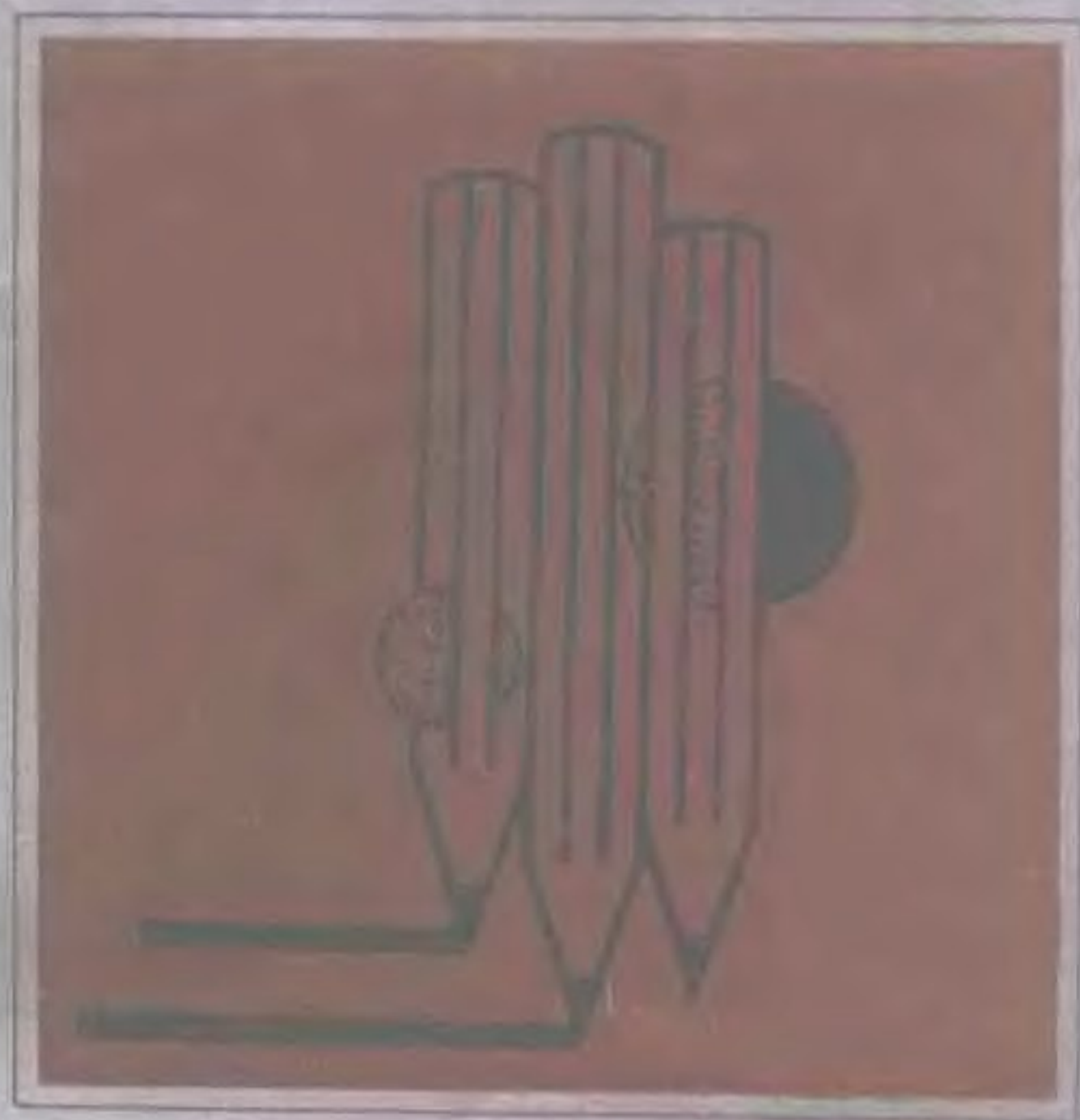
李青宜等 译



论国家

——从黑格尔到斯大林和毛泽东

YANJIUCONGSHU



重庆出版社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 重庆出版社

论国家

——从黑格尔到斯大林和毛泽东

YANJIUCONGSHU
YANJIUCONGSHU
YANJIUCONGSHU



Henri Lefebvre

DE L'ETAT

DE HEGEL À MAO PAR STALINE

(La Théorie "Marxiste" de L'Etat)

Union Générale D'éditions

根据法国出版总联合会 1976 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 邹光海

封面设计 王晓珊

技术设计 刘忠凤

[法]列菲弗尔著 李青宜等译

论国家——从黑格尔到斯大林和毛泽东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375 插页4 字数223千
1988年12月第一版 1988年1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400

ISBN 7-5366-0896-9/D·24

定价：3.50元



在研究当代各种思潮中 发展马克思主义

——为《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的出版而作

徐崇温

党的十三大指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学说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从建设到改革的发展，“都是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扩展和深化，都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各国实践和时代发展的结合”；指出“马克思主义需要有新的大发展，这是现时代的大趋势”。

要适应这样的大趋势，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就必须在研究实践的同时，研究当代各种思潮。就是说，必须在积极探索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中的新问题，探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规律的同时，研究当代世界的新变化，研究当代各种思潮，批判地吸取和概括各门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

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必须在研究实践的同时，还要研究当代各种思潮？

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在过去，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赢得世界历史性的意义，就是

2629.12905

因为它是在吸取和改造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中形成起来的；在今天，在世界发生着巨大变化，人类对自然、社会历史和人的思维本身的认识日益深化，并且在新的探索中，提出种种新的学说、新的思想、新的理论、新的观念的时候，研究当代各种思潮，吸取和改造其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就显然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即使是资产阶级思潮，尽管它们大多以现代唯心主义的歪曲形式出现，却毕竟在这种形式下，提出了一系列真正由实践产生的问题，一些实际的、迫切的科学问题。把这些问题当作正面考察的对象，纳入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从中引出应有的结论，可以使马克思主义紧紧把握时代和实践的脉搏，从新的实践中吸取思想营养。

在一场新的技术革命正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现时代，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研究当代各种思潮尤其具有迫切的重要意义，这是因为新的技术革命使得全球问题日益尖锐化，把人类生存的利益提到极其突出的地位，要求人们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以正确对待和解决这些问题。十分明显，必须深入研究围绕这些问题而展开的当代各种思潮，我们才能跟上时代和实践的足迹，开拓新视野，发展新观念，进入新境界。

而在当代各种思潮的研究中，对于那些研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潮、流派的考察，对于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宏伟事业来说，又具有特殊的意义，一是因为这些思潮、流派都以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为研究对象，二是因为它们又是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文化背景之下，以不同的哲学世界观为指导去进行这种研究的，课题的同一性和观点的多样性相统一，这就使这种考察可以更加直接地有助于我们在与当代各种思潮的交流和撞击中，全面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

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错误观点，并结合亿万人民的实践，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

以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为例，长时期以来，人们对这个问题一直进行着热烈的讨论：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把世界看成是一个只按自己的规律运转，而同人的实践没有干系的体系，认为马克思在哲学领域中实现的革命变革是把实践引进了认识论，把人对客观世界的改变，看成是认识的基础；而“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思潮各流派则认为，世界是通过主体而得到中介的，因而，在马克思那里，不是物质的抽象，而是社会实践的具体性，才是唯物主义理论的真正对象和基础。

在这些不同思潮的撞击中去研究和把握马克思著作的精神，我们便不难发现：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具有两个基本点：一方面，是把实践引进了本体论，强调也要从主观方面去理解事物，即把事物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强调人类连续不断的感性活动，是现存感性世界的深刻基础；另一方面，则是始终坚持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始终坚持劳动实践在多种层次上所受的自然制约性。

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联结、不可分割的。然而，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强调了它的第二个基本点，即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却忽略了它的第一个基本点，即从主观方面把事物当作实践去理解，这就很难同旧唯物主义完全划清界限，这种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充其量只是一种片面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反之，“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思潮各流派虽然突出了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第一个基本点，却又忽略乃至否定了它的第二个基本点，所以，尽管它们再三声称要纠正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缺陷，但在实际上，却只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一个和苏联模式方向相反的歪曲，这样那样地陷入了唯心主义。

所以,从当代各种思潮的交流和撞击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思潮各派的哲学,它们都没有从上述两个基本点的联结上去把握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因而在不同程度上成为对马克思主义的附加成分,我们必须从中引出应有的经验教训,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恢复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本来面貌,并且根据当代人类的实践去理解其深刻含意,把它推向前进。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就是根据这样的指导思想,在重庆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编辑出版的。

就这套丛书的覆盖面来说,它既包括东方的,又包括西方的,但鉴于长期以来,我们对于西方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研究,了解得较少,所以,在选材方面将以西方的研究为主。邓小平同志说过:“资本主义国家中一切要求社会进步的政治力量也在努力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努力为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不公道、不合理现象直至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我们要向人民特别是青年介绍资本主义国家中进步和有益的东西,批判资本主义国家中反动和腐朽的东西。”(《邓小平文选》第154页)

就这套丛书的品种来说,既有对国外学者原著的翻译,又有我国学者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潮、流派的研究和评述。但长期以来,我国读者接触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的原始材料太少,因此,这套丛书将以翻译国外原著为主,随着我国学者在这方面研究的广泛展开和逐步深入,而逐渐增加我国学者研究专著的比重。

这套丛书的编选,力求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将根据这套丛书的指导思想,挑选一定的翻译和写作书目,组织合适的译者和作者去完成以后分期分批出版。另一方面,我们又竭诚欢迎大家向我们推荐有关的书目、选题,包括推荐译者和作者,

还竭诚欢迎大家对丛书中已经出版的作品提出批评和意见。

希望通过这些办法，把这套丛书真正办成一套比较能够反映我国广大读者的需要和要求，在全党全国建设一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在实践中学习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宏伟任务中，发挥一点促进作用的丛书。

中译者序

由于国家的性质、作用、类型以及国家的消亡问题成了当今西方的一些学者热烈讨论和争议的问题；又由于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世界的影响的逐步扩大和深入，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国家的性质、作用和对资产阶级国家、过渡时期的国家及国家的消亡等问题在理论上给予的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也就自然成了一些西方学者结合当今世界国家形式与作用的变化，探讨国家问题所追溯和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目标。

在西方学者中，就有法国著名哲学家与社会学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H·列菲弗尔。他的《论国家——从黑格尔到斯大林和毛泽东》一书则是他围绕国家的生产方式问题来探讨国家所作的重要努力。

《论国家——从黑格尔到斯大林和毛泽东》一书，主要讲的是国家的起源、演变、特点和关于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由于这本书中所讲的内容不仅仅是国家问题，而且涉及到列菲弗尔的几乎全部的社会政治观点，

因此,为便于读者更好地理解这部著作,首先有必要将他的生平与著作以及包括国家理论在内的主要社会政治观点作一概述,然后,对这本书中各个部分的内容作一梗概介绍,最后,对列菲弗尔的社会政治观点作一个总体的评价。

一、列菲弗尔的生平及著作

亨利·列菲弗尔(Henri Lefebvre)是法国当代最著名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和社会政治理论家之一,但他并非是“正统的”、“官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代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同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所开创的把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人道主义化的传统相呼应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法国首推列菲弗尔。他代表了当代西方从马克思主义走向存在主义的那股思潮,他的思想与法国当代另一位著名哲学家萨特从存在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一起,并列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两种主要表现形式。

列菲弗尔,1901年出生于法国加斯科尼的一个官员家庭,他毕业于巴黎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从1930年起,29岁的列菲弗尔开始任大学教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法国被纳粹德国占领,他的教授职务也在此期间即1940年到1943年被解除。1944年以后,列菲弗尔历任杜卢兹广播电台主任、杜卢兹高等学校教授、国立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巴黎大学社会学教授等职,1973年退休,退休后仍活跃于学术界。

列菲弗尔是在20年代中期,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世界上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进入法国知识界的。那时,在学院派中占统治地位的是柏格森哲学、布隆代尔的唯一

灵论、布伦什维格的理智主义哲学。当时，一个包括列菲弗尔在内的哲学小组试图另行组织新的哲学研究组织，并创办了《哲学》杂志，成为反对法国官方哲学的偏狭性与贫乏性而对马克思主义感兴趣的哲学集团。列菲弗尔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我们，战后的青年哲学家拒绝接受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无论是实证主义，还是巴黎大学的理智主义，或是控制着法兰西学院的柏格森主义。哲学家小组在寻求出路。我们的原则是寻找一条不同的道路。”这些青年哲学家重视实际情况和经验，他们坚持非理智主义，不注重大脑思考，而注意身体的感觉；他们把各种学说如存在主义、现象学、精神分析学和本体论等都混杂在一起。

到了1928年，列菲弗尔等人又创办了法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刊物《马克思主义杂志》。同年，他同原属于《哲学》杂志这个团体的一部分哲学家如尼桑、波利札尔、古特曼和弗里德曼等作为法国第一批对马克思主义感兴趣的年轻知识分子加入法国共产党。他认为，那时只有法共是代表尚未制度化的、而且由于有许多矛盾还没有建立组织机构和工作机构的革命运动。列菲弗尔说，“那时，政党和革命运动还是一些生活方式。”向往一种有生命力的思想，探索一种能发挥智力能动性的实际的政治媒介，这些，都显示出列菲弗尔已经开始成熟，甚至有了唯物主义的见解。但他的唯物主义见解同当时正处于发展阶段的斯大林的正统观念毫无共同之处，他的见解是对马克思独创思想的不同理解的产物。

其后不久，适逢共产国际“第三时期”，列菲弗尔所称之为的斯大林的“教条主义”波及法共。因此，几乎从一开始，他们的理论工作就受到严格的限制，后来，当斯大林与希特勒签定了苏德和约时，他们持反对态度。结果，尼桑被开除出党，波利杜尔被害，弗里德曼脱离法共，创立了一套工业社会学，唯有列菲弗尔继续留在法共党内。列菲弗尔在30年代的主要作品是哲学性的，抽象的内容

也正好能摆脱党纪的限制。但他一直同该党的路线有分歧，并保持相当的距离。

列菲弗尔在30年代和40年代的著作中，一方面反对希特勒的现代独裁的非理性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又反对共产党人把马克思的教导说成是一种狭义地设想的经济主义理论，或者扩大成一种“科学的意识形态”的实证世界观和自然科学的抽象的方法论，以后又特别致力于反对所谓的“斯大林主义”。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间，列菲弗尔曾经被一些人称作在“斯大林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正式占统治地位时期，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人道主义性质的少数马克思主义者之一。”

在法国，列菲弗尔最早知道马克思的《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部早期著作，并负责把这部手稿从德文翻译成法文。他写于1934—1935年的第一本重要的理论著作《辩证唯物主义》就是依据这部手稿对整个马克思思想的重新“解释”，即把马克思的思想作人道主义和存在主义的解释。

50年代中期，由于受苏共“二十大”和匈牙利事件的影响和启发，列菲弗尔想创造出一种适合于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他与其他人一起创办了《论证》杂志，这个杂志从使马克思主义向新思潮和社会新现象开放为标榜，给自己规定了既要继续马克思主义，又要超越马克思主义的任务，并且提出了有关俄国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工人阶级为何没有实现其历史使命等问题，1962年停刊。

1958年，列菲弗尔终于因更加积极地反对法共路线而被法共开除出党。此后，他就致力于按照“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去研究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状况，提出一整套论述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日常生活批判的理论，并运用这一理论说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增长、阶级、国家、革命和意识形态等问

题。他的这一理论对于1968年法国爆发的学生造反事件、即“五月风暴”有一定的影响。

列菲弗尔主要著作有《辩证唯物主义》(1939年发表)、《日常生活批判》(1946年)、《马克思主义的现实问题》(1958年)、《总结和其它》(1959年)、《马克思·哲学》(1964年)、《元哲学》(1956年)、《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1968年)、《论国家》(1976年)等。

列菲弗尔的著作,在50年代之前,侧重于哲学方面的探讨,他把人作为哲学研究的基本课题,强调人类主体的能动作用,他把各种哲学流派对能动性的态度作为判断这些学派的标准,其目的是反对教条主义,特别是反对“斯大林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其结果不是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看作两种不同的世界观,而是看作两种可能的演绎体系和公设,把马克思主义“多元化”;在50年代以后,侧重于以他本人的哲学为基础,针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变化,进行社会政治理论方面的探讨,提出了一系列有代表性的、与众不同的、值得研究的理论观点。

二、列菲弗尔的主要社会政治观点

(一)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

列菲弗尔认为,马克思主义应该是一种生气勃勃的思想,一种不断发展、不断深化的思想,而不是一种停滞、僵化和已经完全系统化了的、综合得十全十美的思想。

列菲弗尔着力批评“教条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僵化了的做。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属于已经离开我们的世界,但它给我们指出了一个在迎接着我们的世界。我们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它的历史、它所遇到的困难和存在的问题来了解这个世界。”因此,在他看

来，教条主义地引用马克思的词句是最大的错误，这样做就意味着要清除这种思想，意味着把它视为僵死的思想。他认为，正是这种做法才产生了制度化的马克思主义，战后，在50年代，这种制度化的马克思主义导致了“斯大林主义”，它彻底损害了马克思主义。

列菲弗尔认为，作为教义、作为体制的马克思主义是没有的。他说：“马克思思想是一种科学，而且是超过某种科学的东西。它在现代世界中是作为酵母而发挥作用的。”因此，“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马克思的思想，更不是系统化的马克思思想；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者，这个词代表一种广泛的思潮，这种思潮的出现并发挥作用已经有一个多世纪了。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排除这种思潮中的任何一个人。我认为，卢森堡、考茨基和列宁都是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尽管他们互相斗争过。我不同意在这些思想家中选择这个人或那个人，而排除另一些人，这也是一种教条主义。我认为，卢森堡提出了列宁没有很好理解的问题，伯恩斯坦也提出了一些列宁同样没有很好理解的问题。列宁、考茨基、伯恩斯坦和卢森堡这四个人代表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思想的一个时期。同样，数十年以前，马克思与之斗争的拉萨尔和巴枯宁这两个人，也代表了大变化中的一个特定时期。”

基于这种分析，列菲弗尔认为不存在单一的马克思主义，而是有多种多样的马克思主义，他甚至把拉萨尔主义也称作一种并非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他指出：“因此，我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中，有左的和右的倾向，有左的和右的流派。现在应该重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存在着许多马克思主义的流派，有德国流派、俄国流派、中国流派、意大利流派，也许还有法国流派。此外，还存在着一些相互对立、并且在进行较量的倾向。这些流派和倾向是丰富多彩的，应该把它们都称为马克思主义，而不单是称这种或那种是马克思主义。”

为了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多元性”和“开放性”，列菲弗尔甚至提出了五彩缤纷的马克思主义这种说法，他想利用这种说法来“消除希望马克思主义成为铁板一块的一切幻想”，而且有意要刺激一下教条主义思想。从这个角度出发，他根据目前对马克思主义两种有代表性的、截然相反的解释而进行论战。

他把一种解释称为必胜主义的，另一种解释是失败主义的。按照必胜主义的解释，一切都会越来越好，工人阶级必胜，马克思思想不断发展，甚至认为，现在已经不存在非马克思思想，不存在资产阶级思想，不存在右派思想，尽管会发生一些突然事件；与此相反，按照失败主义的解释，认为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历史是一部失败史，当今世界上既没有共产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已经瓦解，并且处于社会边缘，它将一事无成。

列菲弗尔对这两种解释都进行了批驳。他说：

“马克思思想的重要性，不是因为它吸引了成千上万人的思想，而是因为它符合世界的情况，适合于全球问题——尽管它还不能充分研究这些问题，更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如果说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麻痹人民的鸦片的话，那么，马克思思想则要唤醒教条主义。”

在批判对马克思主义简单化和批判教条主义方面，列菲弗尔与结构主义流派进行过长时间的尖锐的较量。这主要涉及到法国另一位著名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路易·阿尔都塞。他认为，阿尔都塞把马克思的思想区分为意识形态和科学两个部分，并且把科学部分确立为体制，这种看法实质上是教条主义；阿尔都塞在解释马克思的思想发展时，把前期的哲学问题归为意识形态问题，因而使马克思主义失去了哲学意义，这是一种实证主义的简化，这种情况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已经有过可悲的先例。

列菲弗尔在他的《一种世界性的思想》这本著作中，概括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看法和观点：“马克思的特点和独到之处在于，他重点研究的是潜在的和新产生的问题，而不是重点研究完美的和事实上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前景恰恰在于它是向可能性开放的。”

（二）关于工人阶级的革命性与“工人自治的社会主义”问题

关于工人阶级的革命性问题，是当代西方不少理论家探讨和争论的问题。列菲弗尔也是其中的一个。

列菲弗尔不赞成把工人阶级等同于革命，把工人阶级等同于无产者；更不赞成把工人阶级当作持续不断的革命的承担者，要求工人阶级不断地发动革命。

在列菲弗尔看来，要准确理解“工人阶级”这个定义，必须区分它的不同部分和不同层次，必须更加仔细地考察具有无产者要求的工人阶级的经常表现的身份。

他首先从马克思和列宁对工人阶级的性质和作用的想法分析起。

列菲弗尔认为，青年马克思的出发点是工人阶级与否定性之间的同一和这种否定性与建造一个全新社会整体的实际能力之间的同一。这就是说，工人阶级既具有否定性，即具有彻底摧毁现存一切的能力，又具有肯定性，即具有建设一个全新世界的的能力。一句话，工人阶级是多才多艺的。

但青年马克思的这种看法在实践中很快遇到了困难，正是在实践中和所遇到的困难中，马克思对工人阶级的观点得到了深化，看法有所改变。

首先，马克思面临着社会转变问题，而这个转变是旷日持久、愈发困难、甚至是难以想象的。他原先企图把工人阶级作为历史主体来掌握转变的全部局势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困难。他开始发

现实现这一转变的政治条件，必须是工人阶级和其它社会阶级和阶层的联盟；他还发现，社会转变的条件是全国性的；最后，他发现必须制定一个纲领，并且发现工人阶级是哲学的继承，但并不必然是全部知识的继承人。

列菲弗尔接着指出，当马克思在理论上发现转变时期的困难时，工人运动也在实践中发现了转变的矛盾。“反国家的社会主义（巴黎公社）和国家社会主义（德国的拉萨尔和社会民主党）几乎同时出现，这标志着工人运动中的矛盾。”

列菲弗尔还指出，在理论和实践的接合处这个层次，“马克思发现工人阶级需要学问，知识不是工人阶级所固有的：例如，作为一个阶级，它对社会的普遍职能一无所知。”“社会并不等同于阶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不懂得社会的普遍职能和治理社会的办法：这就是说，它不懂得怎样管理自身之外的社会剩余产品。”因此，马克思重新认识到，必须以此教育工人阶级。

在谈到列宁对工人阶级的看法时，列菲弗尔说，列宁认为工人阶级是被剥削的，承担着积累资本、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这一沉重负担，因此，工人阶级是革命活动的基础。但是，作为一个阶级，它有某些有限性，它不能上升为社会总体的概念。自发性是必不可少的：这种自发性有其高潮，也有其低潮，也有其有限性。工人阶级有接受能力，但这种接受能力同样是有限的。如果工人阶级能够正视与整个社会有关的目标，那么，政治思想是必不可少的；必须进行全面的分析，制定相应的战略，也就是说必须有总体的概念，但是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说毕竟不是社会的全体。列宁主义特别反对工会狭隘的经济倾向。

基于上述分析，列菲弗尔的结论是，革命只能在危机的时刻发生，即在某些阶级关系中，在农民和知识分子参加进来的关系的总体中发生。工人阶级自身不是革命的，不是靠自身革命的，也不是

为自身革命的：工人阶级不具有革命的本质。“工人阶级需要政治思想，需要‘恰如其分的首创精神。’必须有一个目标，一个战略：任何东西都不能取代政治思想，或有教养的自发性。”“至于工人阶级的‘随机的（非结构性的）革命能力’这一表述，使我们想起了列宁的观点：只有当存在着一定的力量平衡的时候，在那些足以左右平衡的首创精神和政治思想的地方，工人阶级才起革命的作用。”在列菲弗尔看来，“这就是列宁主义留给我们的遗产。”

但是，列菲弗尔在否定工人阶级本身所具有的革命性的同时，到60年代中期，他为了反对教条主义和集权制，又特别强调工人阶级的民主，提出了“工人自治的社会主义”这一思想。

列菲弗尔的这一思想集中地表现在他发表于1966年的“工人自治的管理问题”一文中，其主要的观点与原则是：

第一，他首先把工人自治的社会主义与国家领导的社会主义作为相对立的两个概念提出来。他批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把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由国家来主宰和支配整个社会。他认为，苏联模式是一种关系的颠倒，即不是社会的结构在支撑着国家，而是相反，倒是国家在支撑着经济和社会的结构，这就贬低了社会的主人，特别是工人的地位和他们能动的首创性。

列菲弗尔的这一看法是与他自治的理解分不开的。在他看来，自治的对立面主要是国家，自治实际是对国家提出了挑战；他倾向于把自治与国家、把经济社会与政治社会、把生产者与统治者对立起来。他认为，国家统治的加强必然削弱自治，统治者作用的加强必然导致生产者作用的削弱；而当自治发展起来时，就可以使一切矛盾在国家心脏内部发展起来，最后超越国家，使国家灭亡。他认为，苏联模式着重强调国家力量的加强，而忽视了人民群众的作用，他主张实行工人自治，把工人自治放在主导地位。

第二，他认为工人自治的社会主义也是针对中央集权的社会

主义的。他在《工人自治的理论问题》一文中写道：“国家不论其是否是资产阶级的，按照其本质都要用一个集中的原则来同自治的原则相对立，而自治原则是分权的，从下到上、从要素到总体地活动的。中央集权原则按其本质来说就倾向于限制自治原则、缩减对它的应用。”所以，他认为自治的发展必然与中央集权相对立、相冲突，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限制地方与局部的作用。

第三，他认为自治的社会主义也是针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提出的。自治的社会主义与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在经济方面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承认价值规律问题，与集中化的中央集权制的计划经济相反，自治必然会遇到市场的组织问题，自治的原则和实践都不否认价值规律，它恢复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而倾向于把优先性给予使用价值。总之，他主张社会主义要存在和发展商品生产和运用价值规律，这是对主张社会主义没有商品生产的集权制思想的一种挑战。而且在他看来，这种商品生产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不是把生产变成绝对的东西，要求首先要考虑使用价值和社会需要，而不能把剩余的价值生产放在首位。列菲弗尔表示他并不否认计划经济，但要赋予计划经济以民主化，使得有可能把社会需要提到前列。

概括起来，列菲弗尔的工人自治的社会主义的主导思想是把自治与国家对立起来，把自治与中央集权对立起来，反对纯粹的计划经济，主张发展商品生产和使用价值规律。他的这一思想在1968年5月西方国家、特别是法国发生的学生造反运动中比较流行。

（三）关于国家问题

国家问题是列菲弗尔社会政治理论的一个重要主题。他的著作《论国家》就是他围绕这个主题所作的重要努力与探索。

列菲弗尔在《论国家》一书和在其它的一些著作中，都详细地或附带地论述了这个问题。他曾说过：“我要按照两条主导线索来谈



复马克思思想的整体性，这两条主导线就是异化理论和国家理论。”

列菲弗尔把国家问题作为他进行理论研究的中心问题有三个基本原因：

第一，是因为他在研究和解释马克思的著作。从一开始阅读马克思的著作起，特别是在阅读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论犹太人问题》这两本著作以后，列菲弗尔就认为，马克思是一位国家评论家。马克思对国家基本上持批判态度，表现在他的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到《哥达纲领批判》——列菲弗尔把它视为政治遗嘱——的所有著作中。马克思所希望的实际上是国家的消亡，尽管这不是巴枯宁所要求的那种立即消亡。然而，列菲弗尔告诉人们，马克思的被认为是对国家进行批判的国家理论，直到他最后的著作中也没有得以确定和完善，甚至还有某些矛盾。例如，马克思谈到了阶级的国家，谈到了作为统治阶级的工具的国家，尤其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这种国家，总之马克思的著作中有许多种关于国家的概念。他说：“我要根据国家的概念来重新研究马克思主义，恢复马克思思想，重新研究异化、神秘、经常性和差异这些主题。”显然，列菲弗尔是根据马克思的著作指出必须深化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的。一些政治评论家和哲学家曾经指出，没有根据现代经验制定一种国家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主要缺陷。列菲弗尔的4卷本著作《论国家》显然是他企图制定一种现代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方面所进行的一种尝试。

第二，当代世界上所出现的国家控制的日益加强的趋势是促使列菲弗尔研究国家问题的第二个原因。这导致他重新研究马克思著作，并且重新分析他过去所作的解释。列菲弗尔曾经说过：“国家，由于它的神圣、它的权力和权力的神秘性，这是一个大量从事欺骗活动的场所。不仅法西斯国家是这样，普通的国家也是这样。

它在不断地从事欺骗和揭穿欺骗的活动。”国家的生产方式这个问题是《论国家》一书的主题。列菲弗尔是根据理论上的假设和当今世界上各种类型的国家中所盛行的政治支配权来论述这个问题的。通过对这种支配权的分析，他总结说，现在“国家已具有世界性，并且形成了一种全球性的国家体制。”这种形式正在承担起它的责任，并且组织国家的一切内外职能。”现代国家要同时确保一切形式的生产和再生产。首先是保证整个社会的人口（生物学的）繁殖……同时要保证劳动力的繁殖……其次是保证生产资料（能源、工具、自然资源和原料）的再生产。最后是保证产生新的社会生产关系，也就是新的依赖关系……国家还有另一个重要职能，使国内和国际上的各种市场协调一致，也就是使劳动力协调一致，使原料和能源、农产品、食品或者说商品协调一致，使技术与智力协调一致，使资本协调一致，当调节器运转失调时，国家就要干预。”

第三，促使列菲弗尔研究国家问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认为现代社会主义社会在解决取消政治异化这个重大的历史问题方面没有取得进展。不仅如此，而且已经建立的并按照国家控制的条件加以完善的社会主义倒导致了一些政治异化的极端形式。列菲弗尔认为：“国家干涉主义同马克思原来所说的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把国家干涉主义说成是一种全体人民的国家是没有道理的。”不能生硬地在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中去为国家干涉主义寻找根据。他说：“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认为，只能把社会主义视为过渡阶段，也就是国家消亡阶段，”因此，国家社会主义是背离和否定了马克思思想。对于社会主义来说，国家问题是中心问题，不懂得这一点的人，也就不懂得斯大林主义在社会主义变革时期的恶劣影响，所以不能从个人崇拜的角度理解斯大林主义，这样理解纯粹是受蒙骗。列菲弗尔说：“在受蒙骗的基础上，希望超越斯大林主义是一种幻想。”他指出：“斯大林主义，意味着巩固国家和国

家机器，而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曾经预言国家和政治机器要消亡。国家问题是中心问题。我反复地说，而且要永远反复地说，斯大林逝世以后，特别是二十大以后，有人在演个人崇拜的喜剧，也有人在演废除个人崇拜的喜剧。十足的骗局！因为中心的问题不是领导人的问题，而是国家本身的问题。个人崇拜的论点掩盖了而且仍在掩盖着中心问题。”

(四) 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问题

异化理论是列菲弗尔哲学理论与社会政治理论的一个关键性主题，可以说它是他的其它理论问题的出发点。他认为，异化问题是“马克思思想中的酵素”，是现代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最重要的问题，在阐述这个问题时，列菲弗尔特别强调马克思早期著作中有关异化问题的意义。

他正是站在这个立场上来批评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的。他认为，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贫乏、之所以简单化为教条主义和公式主义，就是因为取消了马克思青年时期的异化概念的缘故。

随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所出现的政治、经济和人的异化日趋严重的状况，列菲弗尔又运用异化这个主题，全面批判资本主义。

列菲弗尔对异化的关注反映在他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主要作品（如《骗人的觉悟》和《辩证唯物主义》）中，并一直延续到战后，只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有所不同。两次大战期间的研究一般是围绕人类学中的哲学问题进行的，大战后的研究则扩大到社会学的广阔领域中，它标志着列菲弗尔在深入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具体的异化形式。他的《日常生活批判》一书就是明显的标志。

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问题，列菲弗尔在该书中是这样论述的：

在现代世界，一方面，马克思所注意到的某些趋向在继续着，如社会的社会化，财富的集中等等；但是，在另一方面，在发达的资

本主义社会里又出现了一系列新现象，如随着垄断资本主义取代了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相互渗透而失却它们的不同外形轮廓；旧的社会阶级被改变了，产生了新的意识形态和异化方式；技术异化是为资本主义国家所共有的；旧的无产阶级，不再在任何意义上是直接革命的，而是逐渐地非政治化了，它的经济要求失却了政治性；工人被自动化所威胁，首先要求雇佣的稳定性，他们的需要越来越成为小资产阶级的需要；随着物质性货物的新的丰富，产生了新的匮乏——空间的和欲望的，“兴趣中心”已经从劳动转向闲暇和家庭；产生了带有新的异化形式的新集团——白领工人、女人、青年人——他们可能变成一股新的激进力量的一部分，虽然他们并未构成社会阶级。

科技的发展、生产的社会化，使得人们完全听命于技术和工具的奴役，这一种统治比阶级统治更厉害，它使人失去了自由和主动性。使生产、生活和业余活动都单一化、标准化、规范化，这就使人失去了个性和创造力。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虽然满足了人的物质上的需要，但却压抑人的本能。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与阶级统治并存的有一个在心理上和精神上对人压抑的体系。通过这种压抑，使人的心灵结构适应资本主义统治的结构，使现存的阶级关系得以巩固。这种心理和精神上的压抑，表现在家庭、婚姻、民族和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

针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列菲弗尔还着重提出了有关“政治异化”问题。

他说，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拥有非人性的势力而支配着全部社会生活；它把这种势力巩固和确定下来。政治上的异化（连同着政治迷信；正是这种迷信把凌驾于社会生活的一种生活归之于国家）在某种意义上是最严重的异化。”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它也决定着一个范围，在这个范围内，对异化（“摆脱异化”）和它的辅助手段

的斗争和根本的批判是最有效的、最必要的、最为直接地可能的。以后，列菲弗尔又以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生活为例来分析“政治异化”，说这是“在国家中和在国家帮助下的异化”。他认为，“政治异化”的前提是“社会的人二重化为个人的方面和社会的方面，二重化为个人和公民”、“私人”和“公民”。

列菲弗尔通过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异化”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谈论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危机是神话。“如果说是有危机的话，那么，它也不是国家的危机，而是公民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上的危机”，他说这是“公民的危机（即个人和国家之间关系上的危机）”，而这种危机的实质在于“公民不再把自己和国家分开，”“在自己思想意识上不再区分私人的东西和社会的东西”。这就是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政治生活中也像在经济生活中那样，使自由资本主义的残余受自己的支配；所以，这种危机的实质其次也意味着公民“不再想监督国家及其机关”，而且“私人”“把自己同国家视为一体，即力图利用国家达到自己的私人利益”，也就是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正日益广泛地把非垄断趋势纳入自己的轨道。他认为这一切意味着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公民正在消亡，与此同时，民主也在消亡。”

总之，在列菲弗尔看来，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全面异化的社会。而人的异化的现实要比马克思当时所说的更严重，因为社会的各个领域，包括日常生活中都包含着异化之网，使人精神上感到更加苦闷。而日常生活中的异化离群众最近，对群众的本能的压抑、对他们的创造性与革命性的窒息最严重。

那么又如何结束这种异化现象呢？列菲弗尔提出了通过日常生活批判的方法来实现。

(五)关于日常生活的批判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革命实践的中心问题

列菲弗尔之所以提出日常生活批判应成为社会变革的主要特征和方法,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往往被日常生活所掩盖,这种日常生活表现为两个特点:一方面通过现代化的宣传媒介和文化教育机构(教会、学校、各种文化设施),对工人阶级及整个市民社会进行潜移默化,迫使他们接受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从而达到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异化”;另一方面通过一种“现代性”,即宣传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和各种福利分散人们的注意力,窒息人们的创造性与革命性,掩盖剥削阶级强加在被剥削阶级身上的强制性,使这种剥削和压迫披上一层理性的外表。

因此,列菲弗尔认为,反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宏观革命应该同日常生活领域的微观革命,即日常生活批判结合起来。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剥削、压迫制度大量表现在日常生活中,例如劳动、娱乐、家庭、邻里关系、两性关系之中,在这些日常生活中,都能体会到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经济、政治、思想异化和对人的异化,都能体会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压抑性。所以,只有通过日常生活的批评,通过微观革命,才能使群众认识到日常生活的压抑性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这就使他们能够起来在这个领域为自己的主观利益而斗争,为经济与政治革命作准备。

第二,他认为苏联模式的革命只重视宏观世界的革命,即重视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重视社会解放,而忽视了微观世界的革命,即忽视对日常生活的批判,忽视个人的解放。他以及其他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应该成为总体性革命、真正的革命,而要这样做,就应该克服忽视微观世界的革命,即忽视日常

生活的批判,忽视个人的解放这样一些偏向,把微观世界的革命、把日常生活的批判放到应有的高度,使之成为社会变革的中心。

列菲弗尔认为,只有通过日常生活的批判,才能沟通阶级解放和个人解放之间的断裂,在革命前为宏观的经济和政治革命作准备,在革命后,把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落实到每一个人的身上,从而从根本上改变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的状况,达到社会主义制度与个人的统一。

那么,列菲弗尔反复使用的“日常生活批判”一词又有什么具体的含义呢?

简言之,列菲弗尔所谓的“日常生活批判”,是通过创造一种日常生活中异化形式的现象学,通过对这些异化形式作精巧、丰富的描写来进行的,即通过对诸如家庭、婚姻、两性关系、劳动场所、文化娱乐活动、消费方式、社会交往等问题的研究,对日常生活领域中的异化现象进行批判而进行的。

列菲弗尔根据他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问题和日常生活的状况的分析,提出了他所认为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战略。

在列菲弗尔看来,马克思制定了诸如“社会阶级”、“生产力”、“生产关系”等概念,而企图确定这些概念在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具体内容的马克思主义者还应加上新的范畴:消费、旅游、广告、城市社会等,这样他们就可能制定出由这些范畴所产生的、更适合于现代社会的新的概念。在这些概念中,列菲弗尔认为最基本的概念就是“日常性”和“现代性”。

他认为,作为以“消费支配的官僚主义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从根本上来说,仍然保持着资本主义的剥削性质,无产阶级仍然像19世纪一样被大资产阶级统治,但统治的战略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资产阶级过去采取纯粹的暴力,而现在所采取的是一种称之为“现代性”的带有弥漫性的可怕手段。他们用生产手段的现代化、生活

水平的普遍提高和物质利益的“趋同化”来极力模糊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企图使无产阶级异化到能相信自己已不再被异化的程度。而且这种“现代性”还表现在由统治阶级所控制的整个意识形态工作方面，他们使用结构主义、控制论、技术性、科学性等各种具有“现代性”的形式主义，给这种建立在非理性基础上的由消费支配的官僚主义的社会提供了理性的外表。在列菲弗尔看来，这种“现代性”掩盖着强加在被剥削阶级身上的强制性，这种强制性是存在的，现代性并不贯穿着整个“日常性”，日常性是由对“所有的范围、所有的时候、所有的方面实行的压力与压制所形成的。”这种日常性是通过广告和计划人为地规定着，它分散了人的创造力，把人的注意力转移到生活方式、汽车、旅游、必要的又受领导阶级支配的文化的消费与享用上。列菲弗尔认为，这是资产阶级逐步向无产阶级提供的一种诱人的福利，这种福利逐步使无产阶级被征服。

但是，在列菲弗尔看来，这样一种征服从本质上来看是不可能维持很久的。

这是因为，当代资产阶级的统治在社会中又增加了新的矛盾。一方面，尽管资产阶级把日常生活变成了异化的首要的地方，资本主义还是不能够达到征服所有的人，物质的饱和只能促使人产生其它的想往；另一方面，由于疲于同化工人阶级，资产阶级不再有可能同化青年、外籍劳工、妇女和知识分子。没有被同化的少数派中的一部分人发动一场“持续的文化革命”，以便向产生异化的土壤——日常生活发起批判。这些在地方上制造分裂的少数派能够引起整个革命的爆发，实际上，他们掌握着能够导致那些在文化革命的影响下揭露他们的日常生活矛盾和“不再能继续生活下去”的人们的反抗。

列菲弗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把日常生活看着是革命实践的

心。

在他看来,正是日常生活中的人,能最直接地认识他本身的处境,正是通过日常生活的批判,人们才能恢复一种能摆脱无形的压抑的能力和得以自我表现的能力;其次,也正是通过日常生活的批判,人们的行动能够动摇整个社会,这是因为日常生活从本质上看能同时触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列菲弗尔企图把日常生活孤立地看作资本主义制度能够让步的“环节”之一。在1968年5月的法国的学生造反运动中,列菲弗尔关于日常生活批判的有关论述曾经被“新左派”用来批判资本主义制度。

三、《论国家——从黑格尔到 斯大林和毛泽东》一书的主要内容

在《论国家——从黑格尔到斯大林和毛泽东》一书中,列菲弗尔回顾了从封建军事国家到现代民族国家的演变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情况以后,探讨了研究国家问题的方法,论述了黑格尔有关国家问题的理论,重点放在论述有关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上。一个明显的特点是,他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国家理论与实践同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机会主义派别的代表人物,如巴枯宁、拉萨尔、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等人对待国家的态度,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但见解独特并引起过争议的著名人物,如罗莎·卢森堡和葛兰西对国家的分析,置于一起进行分析、对照和比较。列菲弗尔把这些内容统称为“关于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下面概略地介绍这本书各部分的内容:

在谈到从封建军事国家到民族国家的过渡时，列菲弗尔认为，现代国家、民族国家产生于欧洲，更确切地说，产生于法国和英国。现代国家通过一个很长的孕育过程，通过法国革命出生到人间，并由黑格尔命了名，然后它向外扩散，蔓延到了全世界……

在他看来，尽管欧洲，特别是法国接收了古罗马体制和罗马法这样一笔历史遗产，并使它们成为后来被称之为民法典的拿破仑法典的公理基础，但人们并不可以把现代国家追溯到罗马帝国，这中间还经过了蛮族的入侵，王权的产生和发展，经过了从宗教国家到世俗国家的演变，经过了封建军事国家的兴衰变迁和最后的危机。

现代国家的合理性开始是以含糊的方式产生并传播到社会实践中的，这个实践就是17世纪充分向上发展的商品世界的实践。市场和商业在法国起了重要作用，但不如在英国。在法国，资产阶级与国家的关系代替了在英国阶级与世界市场的关系。现代国家的使命从它一开始就“客观地”出现在法国和欧洲大陆。现代的民族国家有利于积累，因为它有利于市场。

列菲弗尔接着说，在旧国家保护之下得到增强的资产阶级不久就向旧国家本身发动了进攻。资产阶级的行动计划成功了。他们使劳动者热爱(抽象的)劳动。雇佣劳动，通过对游手好闲者的(贵族的和流浪汉的)贬值、通过对劳动的增值、也就是通过伦理(道德)被社会间接地接受了。但如果没有道德的陪伴，资产阶级的这个行动计划就不会被理解和获得成功。

在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回顾中，列菲弗尔指出，资产阶级为了它能够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得以上升而利用了旧的封建军事国家，当这个旧的政治工具对它的上升形成障碍时，资产阶级就必然会把它们粉碎以便建立自己的国家。

资产阶级为了实现所有制的转移，也就是说通过革命进行农

业改革,资产阶级为了要上升,就必然要反对封建阶级和他们的支柱,这就产生了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人们把它看作为是一个矛盾的炸药包的爆炸。开始时,“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的,但不久,这个主要矛盾就变得模糊不清,而让位给“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在革命的混乱中出现了新的秩序,雅各宾式的国家秩序,后来拿破仑又杰出地建立了他的国家秩序。拿破仑按照他的概念实现了国家,颁布了拿破仑的民法典,黑格尔正是在他的身上看到了世界的精神。国家,这个具体的抽象,除了在哲学里存在,不能在它身上和通过它本身存在。国家需要政治家。在列菲弗尔看来,作为一个政治家,拿破仑达到了一个超人的精神境界的高度,他使国家这个概念存在和延续下去。

在方法和概念的接近中,列菲弗尔认为马克思所使用的方法是演绎和归纳、概念和证明、逻辑推理和辩证法。而这些方法后来引起了无休止的评论。在这些评论中,其中一些是关于分开地被采用的方法(辩证法);而另一些是关于孤立地被采用的理论,这种理论更客观对一个过程的审查。审查和过程没有进入“马克思主义”,可是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所指出的对象的话,审查和过程就不能进行。这是唯一的整理方式。把国家的世界性放在首位,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发展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完成了的事实,这个过程可以通过一些被称之为“方法论的”原则,确定其等级和水平。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的力量确切地说是在劳动的理论中抓住了设想和实际之间的关系。而西方的思想、哲学和科学总是处于设想之中。西方的语言为了支撑实际创立了一种“无意识”。实际和设想之间结合的实现,既不是在哲学或精神分析里,也不是在认识论里;既不是在一种专业化的科学里,也不是在一种美学里;而是在政治的等级上,在国家的水平上。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马克思最关心的是劳动和通过劳动时间所转化成的商品和交换价

值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这些问题上所造成的后果。他正是从这个基点上来分析现代国家的。

而黑格尔则是通过他的现象学,通过绝对精神,从概念到概念概括出他的国家理论的。

在谈到黑格尔的国家理论时,列菲弗尔首先介绍了异化,认为异化是显影剂和催化剂,使人们产生清醒的力量,知道为什么而斗争,应该反对什么,反对谁,依靠什么,依靠谁。黑格尔所提出的一种形而上学的理论,将马克思提出的政治异化弃之不顾,因而把国家偶像化,认为是“神赐能力,”产生了被偶像化了的国家论。黑格尔把哲学设想为国家的体系,来自国家,并与之一同形成,同时又把国家设想为行动的哲学,认为国家是众多体系中的一个,众环节中的一个。在黑格尔的国家理论中包括两个片面的体系:需要体系和生产活动体系。黑格尔认为国家应该不时地通过战争来震动整体和精神,打乱已成为习惯的秩序,践踏它们的自治权;认为国家包含着殊死斗争的原则,没有军队就没有国家,战争决定着现实;认为国家和民族以战争为考验,表现了其哲学上的顽强残酷;他的国家源自革命和拿破仑,不能摆脱暴力,要反对敌人,反对消亡。列菲弗尔指出,黑格尔的国家是作为现代国家的原型和范例出现的,认为黑格尔抓住了国家的多职能性、多功能性和超功能性。

在谈到从黑格尔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过渡时,列菲弗尔指出,马克思猛烈地抨击了黑格尔关于“实现了的哲学”的论断,认为哲学非但没有实现,而且是进入了一个深刻的危机之中,因为它分裂成为实证主义和唯意志论。他还指出了一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们”陷入了无谓的教条主义之争、派别之争。因此他得出结论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从来都没有一些固定的立场,他们只是在力图解决他们两个时代的矛盾。列菲弗尔还重新肯定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指出了马克思从黑格尔主义最强的方面——国家理论

方面——向它发起了攻击。马克思保留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方法和异化理论，他研究了工人阶级的状况，赋予工人阶级一个决定性的历史使命：继续完成历史，实现哲学，完成一个改变世界和社会生活的全面革命。最后，列菲弗尔指出，马克思就国家、哲学和历史，同黑格尔自1842——1843年起就决裂了。马克思不仅是对黑格尔的国家和法的理论进行了批判，而且是批判了整个黑格主义及其全部哲学。

在谈到马克思著作中的国家理论时，列菲弗尔认为并不存在一种连贯的和完全的国家学说体系，尽管国家是马克思经常关注的问题并且已经确定了的方向，只是马克思生前未能使国家问题理论化和系统化。他列举了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有关国家问题所包含的三种理论（第一种理论：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第二种理论：国家从表面上看独立于各个阶级，但实际上它既表现出寄生性，又表现出掠夺性；第三种理论：国家负担着整个社会。）在列菲弗尔看来，这三种理论，实际上是三种草图，是三种有时互相混杂的轮廓。他特别强调了一点，就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国家的消亡处于中心地位，而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论题在国家消亡中占有它应有的位置，但列菲弗尔认为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论题“还不足以构成一种积极的国家理论”，而且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是什么，马克思、恩格斯乃至列宁都没有说清楚，这就导致了斯大林后来滥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给国家的消亡罩上了一层阴影。

在谈到在马克思主义形成初期工人运动内容所出现的左、右倾分裂时，列菲弗尔认为这种分裂主要表现在经济主义和政治主义的对立上。在他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在一些根本问题上，特别是在国家问题上，还没有一种强有力的和已经明确的系统观点，被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们”说成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正统理论，当时只构成一种经济主义，这种经济主义很快就表现出它的不可

足。而当时以巴枯宁为代表的左翼和以拉萨尔为代表的右翼则代表了一种政治上的思考,前者主张“废除一切国家”,后者主张“国家崇拜”。由于左翼和右翼既有他们的理论,又有他们的信徒,这就使马克思受到两面攻击之苦。特别是拉萨尔主义在思想上是有影响的,它对现代国家的发展和世界化起了很大的作用。

关于修正主义和正统观念,列菲弗尔认为,“修正主义”这个词起源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的分裂和多样化,起源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本身。它有一个明确的内涵,即存在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这个“真理”就是作为知识轴心的正统观念,而在这个“真理”周围的则被认为是充斥着谬误、偏向和谎言的“修正主义”,而在他看来,这种划分往往是经验主义的,“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们自己的各种理论概念,尤其是在关于国家这一中心问题上也进行过多次‘修正’和重新考察,而且还在同样重要的经济决定论、即经济主义这个问题上也进行过多次‘修正’和考察。”

关于列宁的国家理论,列菲弗尔认为:列宁主义标志着“政治断裂”介入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本身。在列宁之前,这种思想游荡和消失在经济主义之中。而列宁从一开始就是以一位政治人物的身份来思考理论问题的,在列宁看来,在他面前的是一个需要打倒的国家,在俄国,从开始起,经济问题和科学分析就应服从于政治问题,也就是说服从于国家问题,列宁的回答是一种政治回答,而这种回答的本质在于激发起行动主义,摧毁旧的封建军事国家,而用“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来代替之。在列宁看来,如果说无产阶级需要国家,那么需要的是一种正在消亡的国家。

在列菲弗尔看来,对待国家的态度已经变成列宁的一个政治标准,他正是用这个标准严格的评价社会民主党人和第二国际的人物。

但是,按照列菲弗尔的看法,在列宁关于国家的理论中存在一个矛盾,即列宁设想了一个正在消亡的国家,但同时又设想了注定要变成国家机构和工具的政党,“由于政党也充当了国家机器,因而也就大大地加强了国家,国家又怎么能消亡呢?”他由此把苏联后来所出现的强大的国家以及国家的加强与世界化与列宁理论与实践中的这个矛盾联系起来。

关于卢森堡,列菲弗尔主要围绕他的《资本的积累》一书,从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角度分析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国家必然崩溃的趋势。

他指出了卢森堡的经济理论与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的异同之处,在卢森堡看来,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和扩大积累的实现,并非是在资本主义“内部”(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实现的,而是在“外部”,以输出为前提,通过侵蚀和破坏资本主义中心地带的外围“非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而实现的。但这样做的结果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外围地区逐步遭到破坏。而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发展,恰恰是因为有在资本主义中心地带之外的非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可供剥削。当所有这些社会形态都已纳入资本主义积累过程时,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国家就会自动崩溃。

列菲弗尔还指出了卢森堡关于帝国主义的分析与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分析的区别。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也包括了某些同他的分析相类似的观点,但是列宁避免明确断定资本主义瓦解的“不可避免性”,而比较强调无产阶级革命在促使资本主义制度和国家崩溃中的作用。卢森堡则强调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同时代性和资本主义自动崩溃的不可避免性。

关于葛兰西,列菲弗尔首先回顾了20世纪初资本主义国家的加强和实现“领导权”的过程。他认为,资产阶级为了夺取“领导权,”在“文化方面”所作的努力和在制度方面所作的努力同样巨

大，它没有“只是按照专政的粗野的形象，借助于枪炮和子弹”，而是通过政治斗争和各种各样的理论斗争，逐步实现“领导权”的。并且紧接着又利用建立起来的国家巩固和扩大了“领导权”。这样就导致了工人阶级被分裂，马克思主义被分裂，以至产生于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里，被看作为是一种“文化行为”。

他由此得出结论，掌握葛兰西所创造的“领导权”概念，对于分析 20 世纪资产阶级国家权力是十分重要的。在葛兰西的著作中，尽管没有关于国家问题的详尽的原始分析，但是他的一系列概念，特别是领导权概念都是以国家为出发点的。

在谈到“斯大林主义”时，列菲弗尔认为，在国家问题上，“斯大林主义”的主要特征和表现是：抹杀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两个重要原则：国家的消亡和社会主义概念是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思想，而以国家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思想取代它们。他认为，斯大林不只是以无产阶级的名义行使专政的权力，而且“把国家建成一个政治专制体”，斯大林是第一个掌握国家逻辑学的人，他懂得国家权力的根本条件：平衡性和同质性，把国家和政党视为统一，使苏联社会的一部分矛盾消失，把社会的各个集团、个人同国家完全一致，以国家利益为理由实施统治，创造了一个与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的思想不能并立的国家方式，开辟了现代国家所走的道路，成为现代国家的模式。

对于“托洛茨基主义”，列菲弗尔主要是把这个问题作为“斯大林主义”的对立面来加以阐述的。

关于毛泽东，列菲弗尔认为毛泽东要建立一种系统的国家理论有很多困难，这是因为“条件和形势往往改变了他对所提出的问题的政治解决办法，这就产生了对条件和形势的分析比对目标的分析更加重要的倾向”。在他看来，这就是毛泽东没有能够制定出

和发表一种关于国家的独创性的系统理论的原因。

但他又认为毛泽东的实践具有一种不可否认的特殊效能，毛泽东有关国家的分析典型地表现在下列几个论题上：

1. 社会阶级和生产的社会关系既是作为革命运动的条件（尤其在农民那里），也是作为国家的条件，这样一种国家在革命的进程中开始孕育，在武装斗争结束时产生。

2. 这种国家不能把自己固定在社会之上、各个阶级之上，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这样，国家既不能把社会僵化和固定起来，也不能把社会的所有成员都置于同自己非一致、甚至对立的地步。

3. 要处理好城市和农村的关系。在革命中，以农村包围城市，在革命后，城市应该领导和改造农村。

在这一部分内容中，列菲弗尔还对中国历史上国家制度的演变、毛泽东所发动的“文化革命”、人民公社化运动直至我们1975年所制定的那部宪法，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进行了分析，在这些看法和分析中，既有比较客观的分析，也有一些错误和模糊的观点。

最后，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的总结，列菲弗尔力图结合当今世界的现实，从总体上来评价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

在他看来，从当今世界的现实来看，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断言和预见包含着空想，和当今的现实并不相符合。但如果从总体上来看现代世界，从总体运动中来看马克思主义，那么，马克思主义的论点没有一个不起着一种酵素和构成因素的作用。

他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尽管存在着“右翼——左翼”的分裂，存在着各种矛盾和冲突，但马克思主义正是按照它自己的规律，经过各种矛盾和冲突发展的，而这些矛盾和冲突可以被看作为马克思主义在运动中存在和发展的一种征兆，一种标志。因此，只有从马克思主义的运动着的总体性上来认识，才能超越各种

分裂和倾向，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是由一种世界性的经验来丰富的理论。

按照列菲弗尔的看法，在当今工艺学的革命中，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的概念、再生产的概念已被动摇，传统的生产劳动已经贬值，工人阶级已趋于保守的趋势。这主要是由于科学的介入，特别是由于国家和政治干预作用越来越大的结果，这就导致马克思主义原来的经济体系运转失调。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受到挫折的主要原因。

关于国家，他认为，在当今世界上，国家的形成、发展和世界化是违反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逐步消亡的理论的，但同时又得到“马克思主义者们”积极的或消极的协助，使马克思主义最终也被列入到国家的意识形态的行列，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国家意识形态，就是一个说明。在列菲弗尔看来，这是一种奇特现象。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他认为，既不应放弃无产阶级专政，也不能强化无产阶级专政，而应恢复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中的一个根本性的论点：无产阶级专政应该伴随着国家的消亡，民主才是主要目标。

四、对列菲弗尔社会政治观点的评价

列菲弗尔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既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马克思学”家的观点，也不同于一般共产党人的观点。

他以马克思主义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又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从这方面来看，他不同于西方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马克思学”家。

但列菲弗尔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又不同于一般的共产党人的

观点。一般的共产党人从总体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认为马克思主义要与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也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也要修改一些过时了的论点，在坚持中发展，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而列菲弗尔认为马克思主义已过时、已僵化，需要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原理进行革新与创造，主张马克思主义的“多元性”与“开放性”。这就决定了他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轨道。

列菲弗尔认为，马克思主义应当摆脱教条主义的影响，无疑，这对于我们来说具有启迪作用的积极意义。因为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来看，确实存在把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化、凝固化的倾向，马克思主义也确实需要丰富和发展。特别是在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阶级关系和思想文化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科技革命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社会主义国家也面临着突破旧的僵化模式、进行改革的迫切任务。所有这些变化都要求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的前提下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但是摆脱教条主义的影响，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是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与实践性，恢复和发扬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而不是站在唯心主义的立场上，抽去人的阶级性，甚至用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个人主义、异化观点来“补充”马克思主义。这就是我们与列菲弗尔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的根本分歧所在。

列菲弗尔指出了不能把工人阶级等同于革命，工人阶级的革命性不是自发性所能达到的，而需要政治思想的教育，需要知识；指出了工人阶级革命性的时机性以及需要在其他革命因素共同参加的关系总体中才能出现。他的这些看法，对于我们深入认识与研究工人阶级这个概念以及工人阶级与革命、与其它阶级的关系，

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但是，他从根本上否定工人阶级自身的革命性，我们是不能同意的。事实上，即使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关系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工人阶级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但从根本上来说，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没有变；尽管出现了其它一些革命因素，但工人阶级作为革命的主要力量的地位没有变。

列菲弗尔提出的“工人自治的社会主义”，从积极的意义方面来看有两点：对苏联的高度集中、集权的社会主义模式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对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重视；对民主原则，对工人基层的自治原则的重视。这一思想对于我们社会主义阶段中进行政治与经济体制改革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但是，这一思想有很大的片面性。主要表现在：把国家与自治对立起来，把集中与自治对立起来。应该说，否定集中与过分分权，也会产生与高度集中、集权完全相反的另外一个极端。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把国家与地方、政治与经济、自治与集中恰当地结合起来。另外，列菲弗尔对“工人自治的社会主义”的憧憬带有乌托邦的性质。

列菲弗尔揭露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仍然是畸形的社会，是充满了经济异化、政治异化的社会，并且明确表明必须对它实行革命的变革，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就使他的学说具有激进的革命的一面。

至于他的关于日常生活的批判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革命战略的设想，尽管深刻揭露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为了缓和阶级矛盾而采取的非镇压性的现代性和日常性的战略，提醒人们要重视微观革命，即重视日常生活问题，重视意识革命，但由于他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即忽视了经济革命和政治革命的主导作用，否定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和革命动力的作用，把革命的希望放在“文

化革命”上，寄托在无产阶级（主要是工人阶级）之外的青年学生、外籍劳工、妇女和一些知识分子对日常生活的批判上，是注定行不通的，因为这从根本上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

关于国家问题，列菲弗尔企图根据当代世界的情况，制定现代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他分析了各种类型的国家的生产方式，指出了当代世界国家控制与国家干涉主义日益加强的趋势。他的这种尝试和分析，对于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深入研究国家问题，不无借鉴意义。

但是，列菲弗尔未能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上去分析国家与国家性质和作用，忽视了当代世界的政治现实，不加区分地笼统强调国家的消亡。他针对苏联出现过的某种情况，对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需要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形式提出了异议，他实际上主张取消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

李青宜

1988年4月于北京大学燕东园

目 录

在研究当代各种思潮中发展马克思主义 ——为《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 研究》丛书的出版而作 ……徐崇温(1)	
中译者序	(1)
一、回顾：从封建军事国家到民族国家	(1)
二、回顾(续)：法国革命	(24)
三、方法	(32)
四、概念的接近	(53)
五、黑格尔的国家理论	(66)
六、从黑格尔主义到马克思主义	(94)
七、马克思著作中的国家理论	(122)
八、右翼分子和左翼分子	(150)
九、马克思主义与国家(续)	(157)
十、十九世纪末期的修正主义与正统派	(169)
十一、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	(176)
十二、列宁和列宁主义	(191)
十三、从二十世纪初到葛兰西	(216)

十四、托洛茨基,斯大林	(231)
十五、毛,毛主义	(237)
十六、清点和总结——“马克思主义的” 问题系	(249)
译后记	(257)

一、回顾：从封建军事 国家到民族国家

我以前著作中的论述提出了一个问题，同时也留下了一个空白需要回答。这个空白和需要回答的问题就是：“无论是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总是有剥削、压迫和屈辱。被牵连和被涉及者，即‘群众’，是怎么接受这种处境的呢？为什么他们忍受了这种处境？他们又是怎样经历了这种处境的呢？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产生于一种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今天看起来可能是天真的）的各种宣言表明：只要人民一巨人、劳动的巨人站立起来，就能用他那强有力的臂膀把压在他身上的那些寄生虫抛弃。难道这是妄想、这是空话吗？难道无产阶级革命除了马克思主义的计划、令人失望的计划和包含为这种计划辩解的言论之外，就没有别的更可靠的办法吗？不是的，因为总罢工不只是一个幻想，它确实发生了。那么，为什么人民、被统治阶级、工人阶级仍然遭受剥削和镇压呢？是国家，说得更确切些，就是军队，警察！这是肯定的，但是不管什么时候和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军队和警察都不会主动干预的，

暴力干预的时间是取决于政治上的选择的。那么，又由谁来选择呢？控制处于恐惧和怨恨之中的人民的最好办法难道不是间接的（例如，通过一种道德，甚至——为什么不是——一种逻辑）吗？”

我们谈及的问题涉及到实际和构想之间的差别。历史学家构想历史的时期，用产生于他自己时期的概念、用产生于他日常和政治经验的概念，来重新构想历史的时期。然而，历史的时期，像个人的生理时期和心理时期一样，是在一种与真理——它的真理——理论上不相符合的意识之中盲目地产生的。而这个真理则是姗姗来迟。在我以前的著作中对实际、表现、概念之间所进行的区分，提供了思考的起点和基础，并且得出了一个带有临时性的结论，这个结论是：“马克思通过表现和意识形态的范畴，为工人阶级设想了从模糊的实际经验到决定论和社会机械论的明确概念的过渡。然而，这个设想过程只是通过转弯抹角和扭曲的方式来表现的。马克思主义预言的失败原因就在这里。这就使理论价值成了问题，并迫使人们重新反思过去，没有实现的过去……”

谁想要探查服从和怨恨的渊源，谁就不得不重新考虑起因。渐渐地，他的思路就会进到了“没有国家的社会”，就会进到了没有文字、没有法律、没有任何像我们社会一样的社会里去。但是，是哪里产生的政治权力和它的对立面——服从呢？在向前回顾的时候总应该要停下来，但是在哪里停下来呢？为什么在这里而不在别处停下来？一切可预见的或不可预见的都已经被包含在字母表或音节文字里边了吗？包含在从农村到城市的过渡里边了吗？包含在如此的技术发明里边了吗？……

西方的逻各斯产生于一个双重结合：罗马法律的思想 and 希腊逻辑思想的结合；犹太教的“价值观念”和基督教那些价值观念的结合，即伦理和宗教价值观念的结合。在这些蕴含着逻各斯非常丰富的结合中，人们先前就承认了积累的、遥远的、但却是有效的

条件(各种知识、技术和财富等)。

关于政治权力问题,最初涉及的并非是积累这些原始条件,而无可争议地涉及到教会的国家和作为国家的教会。罗马体制的继承人们,那些教皇们发明了一个无边界的国家,在这个国家所拥有的每个城市和村庄里都有一个权威官员:占有一块圣地的主教或神甫。在罗马帝国体制解体和封建社会(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它的特殊的政治形式)建立期间,教会、教皇们、主教们控制了国家的职能:执掌司法权以及征税和招募军队权。然而,历史问题并不是要理解教会怎样变成政治的,而是要解释天主教、教廷和罗马计划的失败:结果是非宗教化国家的延续和复兴。尽管教会宽容地对待一只“世俗的臂膀”,它的下等工作的执行者,但这个执行者最终还是转过来反对教会。

一些引人注目的作者把服从的关系追溯到教会国家^①。人们试图通过回顾来理解旨在“让人喜爱上服从”的那些虚构、旨在“让臣民们保持着信仰”的那些虚构。对于西方来说,对制度的错综复杂性的澄清还没有结束,P·勒让德尔就曾这样表示过(对于这项澄清工作,P·勒让德尔对精神分析学抱有信心)。拉丁西方自中世纪起可能就调整了“服从技术”,并且,制度的遗传学可能就被记入宗教的历史里了。在西方,教会把它的“基本的神化库”转移到了等级制度上,转移到首领身上,转移到社会等级上。以致于西方的宗教和军事的经验可能会——据作者所说,政治问题是完美地宗教性的——解决群众训练这个谜。在P·勒让德尔看来,“人们应该按照基督教士和国王的最高教义——被耶稣会士们有效地说

^① 见P·勒让德尔:《监察官之爱——关于教义的畸形的评论》,法国入门出版社出版。

明了的——来确定在高处和在低处之间的巨大差别，来论述政权的那种科学隐秘性与像柏拉图绝妙地表示过那种区分牧羊人和羊群不可逾越的界限是在什么地方同时被想象出来的。”首领们以一种超常的自我崇拜方式自感是值得崇拜并且是受到尊敬的，这就使得一种思想或幼稚的表现——至高无上的权力的欲望得以滋长。

P·勒让德尔的论文到这里开始同历史的分析相衔接。因为历史的分析引导他的论文考察那些“知识的领路人”、那些按照不同国家而具有典型性的文人阶层——在法国是那些法学家和律师家，即类似于中国古代的官员或伊斯兰教的学者——他们担负开除别人的职务。这样就在西方引起了法律的世俗化和对一个社会、民族中的非宗教的行为从教皇所采取的形式到告诫形式的转变。这种转变也就把专制神甫的无所不知的那些符号放到了索引或附录中去了。信仰的作用会是巨大的；现代社会是以为维持一种纯粹而简单的信仰（信任政府）而被动员起来的各种工具（行政管理、法律、警察和国家）为其特征。写出的文书——死的文字——会构成这种信仰的寄存物，它们表现出制度的不间断性。组织者会接替法学家的班。这样，观察家和历史时期的分析家就会看见和知道服从是怎样传播并且变成了服从的愿望以及权力怎样让人喜爱。又是怎样做的呢？通过在每个人的脸上放上一个面具，这个面具似乎不像是强加的，它使每个个体变成一个重复的角色，直到改变他们的愿望并达到某一种已经被确定了的愿望。“没有人能够逃脱这样一种训练……”

在这位作者看来，这样就会存在着从宗教首领到政治首领的权力（权威、威信、指挥权）的移动和转移。这就意味着超越历史的、从远古到我们时代的权力的连续性。依据弗洛伊德的那些分析，人们强调法律与父亲、教士——高级神职人员、博士的关系——

他们是主人和永久的首领。

这篇论文清楚地假设了性爱的主要构成部分、教义知识的研究和权力意志之间的关系。如同弗洛伊德以来很多人一样，这本书的作者轻视权力的研究而偏重于性爱和它的表现。作者只有把权力意志缩减到与另外两个内容有牵连的地步才重视权力意志。这篇论文同样还通过偏离经济、法律、最后还有政治本身来简化历史。这正是那些“犹太人区的意识形态”所形成的论点。

通过总结经验，人们可以肯定，现代国家、民族国家产生于欧洲，更确切地说产生于法国和英国。现代国家通过一个很长的孕育过程，通过法国革命出生到人间，并且由编写了身份卡片的黑格尔命了名。然后，它向外扩散，蔓延到了全世界……

欧洲，特别是法国，接收了一笔“历史的”遗产，所谓“历史的”，也就是说其中有罗马体制、罗马法（被称作为民法典的拿破仑法典的公理基础）。那么，人们是否可以说现代国家可以追溯到罗马帝国呢？

不，那些军事首领和古罗马皇帝们建立他们的政权是从罗马开始的，并扩展到意大利、欧洲、东方，领土由城市控制着。罗马历史的秘密，首先是共和国的秘密，然后是帝国的秘密，就在于土地所有权的历史（马克思）。帝国从来也没有脱离开土地，一方面从来没有脱离开从属于城市的农业生产，另一方面从来没有脱离开被称皇帝的人。皇帝的统治，同时表现在作为军队的首领和对帝国一部分的个人占有上（埃及，罗马的天然粮仓）。从来，帝国也没有与城市分开，这就使得城市被罗马和庞大帝国的皇帝掠夺并最终导致帝国走向崩溃。帝国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而不是相反。罗马国家正是由此得以在政治权力的各种封建形式下延续下去。政治国家的基础从古代国家到民族国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民族国家是建立在流动财产（金钱，接着是资本）的基础上，而不再

是建立在土地和地租的基础上。从那时起，统治就建立在抽象权力基础上，这种抽象权力又被一种实际权力——军队——变得具体化了。

这是从罗马体制延续下来的吗？首先是由一群勇敢的人建立军事和好胜国家的代表制。从这里就有一个好战、男子支配、成为组织者和立法者的人民代表制，这个人民相当地强大，使得更高但仍比较弱的文化（高卢）归于结束。然后，从这里就产生了建立在帝国（即教会，其影响延续和加强了政权的神圣性）废墟之上的多民族的国家。最后是法律。但同样也存在着对国家的偶像崇拜，这种对国家的偶像崇拜掩盖了法典和法规的合理性（有限的，但是实际的）与直接同土地、传统和种族相联系的民族性之间的矛盾。

为了探查服从的渊源，难道应该回到弗洛伊德^①的论文《图腾和禁忌》中去吗？这篇文章试图重建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下意识”得以建立和结成。弗洛伊德企图从下意识中找到起源和组织，而不是使它充当一种神秘的物质。父亲的形象会在这种起初的过程中起一个决定性的作用。活着的父亲有力量有计谋，他占有财富和女人；死去的父亲继续在他的儿子们的情感之中生活。他还在纠缠着他们。儿子们通过放弃父亲禁止他们的事情（财富和女人，正是为了这些，他们把他杀了）来自我惩罚。通过回顾，他们对父亲形象的服从结成了下意识。儿子们否认他们自己的行为与可能性，不承认他们的能力。在把他处死的窘境中，他们只得把父亲的象征（代用品）图腾神圣化。这样就同时产生了过去和忍受的象

^① 弗洛伊德(S·Freud, 1856—1939年)，奥地利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医生，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他把人的心理分为意识和潜意识两个对立部分，认为存在于潜意识中的所谓性本能是人们心理的基本动力，是摆布人的命运、决定社会发展的永恒力量。把本能归结为生和死两个基本范畴，前者是性欲、恋爱、建设的动力，后者是杀伤、虐待和破坏的动力。著作有《释梦》、《精神分析论》、《精神分析论新编》等。——译者注

征主义、内心有罪感和作为外部法律形象乱伦的禁止。从这里就有了异族通婚和女人的交换以及她们的流通。

这篇论文中被人们认为成功的一面是对一个基本关系进行了抽象：这就是孩子与母亲和与大地的关系。与母亲的关系既在与大地——母亲关系之中，又在与母亲（父亲只是在晚些时候，以一种上帝的形象，才持有繁殖的垄断权的）的被繁殖关系之中表现与实现着的。然而，一个三人（孩子——母亲——父亲）关系不同于两人（孩子——父亲）关系，它朝着日常敞开就像朝着“自然”敞开一样。同样地，当马克思重视三段式（“土地——资本——劳动”或“地租——利息——工资”）、而不是只抓住两元的对立（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或资本——劳动）的时候，马克思思想也发生了变化。一个社会的成员与占有（或失去的）土地的关系不能离开与首领的关系。“祖国汇集了母亲——大地和父亲——首领”之间的关系。此外，父亲——首领的形象也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变化，老板与人民的父亲或教皇很少有相同之处，尽管在语言上有相似之处。

在从教会的国家向世俗的国家过渡中，尽管有权力的移动、转移和集中，尽管这个广泛的行动有“法律家”们和教士们作为支柱，人们还是可以接受。应该怎样设想这种并不要求商品、市场和交换价值发展的境界降临呢？“贸易”、人的贸易（人之间）和东西的贸易（财产和产品）是无视宗教的。从本质上来看，它们是非宗教和世俗，甚至是、尤其是当它们在由宗教制度建立起来的各种网络中流行时更是这样。通过回顾感到，物资交换和交换价值是作为等价、合同、法律、司法、道德、城市生活、通讯、逻辑及产业的发生器所出现，也就是说作为非宗教的发生器出现。应该回到非宗教和世俗化上来。

罗马法在教士们和博士们的手中好像曾经起过多种用途的工

具的作用。它取代了教会法。它反复使用私人所有制反对扩展到整个基督教国家的宗教封建主义和教皇国家窃取的政治权力。这同样的罗马法还被用来反对世俗封建主义。

法律家和教士们之所以给世俗国家充当“模子”，并非是要把宗教国家的模式传送到它自身之外，而是要从根本上破坏它。

关于权力的各种表现还有很多东西需要探讨，这个内容以口头或笔头声明的形式是如此稀少地被谈起和表明过。权力(政治的)可以被看作只存在于它的表现(它的行动)之中的强力，它可以现实化或者非现实化。潜在的权力具有威胁性或者还不具有威胁性；作为完成的行动，它撤退到自身之中，它不再是行动；潜伏的暴力是准备行动并且同寻求对策相混合。行动的结果，它的损坏或它的产品只是行动的痕迹。

朱庇特(罗马神话中的主神)，只要闪电留在“小道具仓库”里，就不表现他的权势。当雷声响起，当闪电击起时，每个人都得弯下腰来表示崇敬。正是在这个时候，朱庇特才施展它的权势，并且才能战胜泰坦(希腊神话中的巨神族)。在此时此刻，他的威严表现了出来，他的戏剧性才得到证实。对于权势，显现和表象是同一的。在这个时刻，狂热的崇拜者，在雷电的闪光下，有时敢于抬起眼睛，钦佩和尊敬地从下边、从远处辨认出他表现出的权势，并在衡量自己的矮小和意识到自己的低贱的同时，部分地被权势同化了。

父亲的身份难道只是一个形象、一个象征和一种权势的隐喻吗？如果权势只表现在行动上，那么正是这个行动应该考察。它是在哪里出现和表现的，又是在什么时候出现和表现的呢？在人类与动物的关系之中，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之中和在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关系之中。到处人们都会发现权势的行动和力量施展的时候。

为了探讨和表达世俗化的过程，难道不应该求助于“米勒曼效应”吗？在米勒曼的著作《第三世界革命的救世主降临说》^①中，关于制度化的假设是这样论述的：“制度产生于某一种预言的失败，正是由于这种失败它得以产生和发展……”事实上，基督教冒充好消息的预报者和携带者，它许诺人另一种生活，这种生活或者是由于基督法官和国王的降临而在地上，或者当人世结束之后到耶路撒冷天国里。坏的消息，预言的失败从中世纪起就开始流传，这就引起抗议和争论，也就是说异端邪说。这些异端邪说最著名者重新采用新生活的预告，但也没有能拯救世界。

难道人们不会把世俗化和世俗国家看作是一个双重失败的结果吗？一方面是公认的教义失败，另一方面也是异端邪说的失败，这两者都没有能够改变世界。世俗化成了唯一敞开着的道路。无论在什么样的“制度化”中，人们都能发现这种“效应”。人们对法国革命和波拿巴主义能指出这种“效应”，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斯大林主义——如同对回到大自然、对理论和对精神分析的实践等一样，指出这种“效应”。这种“效应”能更好地阐述那些过程，它带来拜物教理论、异化理论、自治理论和物化理论的一种现代化说法。

虽然被精神分析和被制度分析所精练，连续主义的假设还是使至圣和世俗之间、罗马政权的瓦解和封建军事国家的断裂变得模糊了。这个假设把另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断裂（蛮族的入侵）也置之不提。

那些大的入侵没有仅仅瓦解古罗马体制。它们实施一项巨大的土地改革。大庄园大部分地消失了，一些村庄代替了罗马城市；各种各样的原因——城市市场的变小，业主的消失，土地被移民和被固定在土地上的侵略者占有——趋于同一个方向。因而产生了

^① 法国加利马出版社，1968年出版。

对已经被古罗马体制打发到偏僻的角落的一种生活方式(农民共同体连同他们的习俗)的革新。

这种共同体的现实和它所包含的实际经验——在经历了一个长久衰落之后它们的复兴过程中——在西方变成了伦理、美学和政治的价值。这些价值时而不断地变模糊，时而也会突然的重新涌现。以至于到了20世纪，意识形态的令人不安的转变出现了。为什么建立在土地、血缘和家庭基础上的宣传在西方的一部分中(决定性的部分：德国，最“先进的”国家)比“无产阶级的”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更强有力？为什么民族思想比阶级思想更强有力？

通过商品拜物教的解释不可能阐明这些现象的总体。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和意识形态化的马克思主义(缩减到经济学上)难道没有忽视自然和社会活动的生物学基础吗？除了广意的营养(食品需要、安全、起居设备)和生产劳动的辩解词外，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仍然是抽象的，它在占统治地位的经济主义内部，保留了很多与生物学相区别的工艺学的因素。民族主义的武库中的那些“价值”，作为价值已经被确切地表达了出来，即土地、家庭、血缘(因而是无条件的自发性和无意识)的连续性，正直和忠诚，服从命令，过去和历史的权力，侵略性和服从性，也就是说与生物学相联系的整个一个复杂体，代表了一种基本力量。建立在共同体(血缘的)基础上的这些价值和象征，乍一看没有比建立在阶级和劳动基础上的价值和象征更具有一种强力。它们之所以获得优势，是由于它们把家庭和种族融合在语言和代表制里，把服从政权纳入命运之中；是由于它们以压倒的优势胜过作为世界语、自由爱情和自然主义的改良主义的斯大林化的国际主义。

连续主义无论在方法逻辑上、还是在理论上都不能替自己辩护。那么，在那里和怎样确定哪些政治断裂呢？封建军事国家是通过利用已存在的生产关系、尤其是通过利用农业生产和土地所

有权的首要性而产生。然而，封建军事国家只有通过各种力量（其中一些力量历史地处于严格意义上的封建关系之内，即农民共同体之内；而另一些力量则处于这些关系之外，即市场、商业、交换、城市和在城市范围里的社会关系）才能被建立并代替宗教国家。这个国家不得不通过冒双倍的危险开辟它的权势的道路。一方面它准备解体成各种直接的关系，解体成局部领土的联盟（封地、特许权、地方政府）；另一方面，这个国家准备破坏它自身的条件和准备使中世纪的社会背景爆裂，以便朝着商业和市场的扩张、朝着人与人直接关系的断裂、朝着着重关心经济问题的一种行政机构，一句话，朝着资本主义和在民族国家里资产阶级的领导权的方向发展。通过使用它们的实践和意识形态的工具——罗马法——既反对农民共同体，也反对领主和城市的同业公会，法学家们朝着文字法令和法律、朝着从封建制度的习惯的奴役地位解放出来的合同制度方向努力。

当封建军事国家在封建生产方式的内部一形成，这个国家就显示出它的原始的二重性——多重性，显示出它的两面性和两个本领：法制（导致合法性）和暴力（警察和军事）。国家这两个方面开始表现的一种复杂关系：结果是越具有合法性，暴力就越少。法律的含义标志着国内和平时期的特点；反之则走向国内战争或对外发动战争。国家统治权把法制（合法化）和潜伏的暴力（威胁性的）联系起来。

在每个西方国家里，都必须遵从“法人”（法律家——律师们）的各种活动，自从中世纪以来就是如此。在治理方式上，“法人”们一直谨慎地对待中世纪的各种风俗习惯：使这些风俗习惯服从成文的法律，服从私人所有制，服从合同条款。在法国，这种对“法人”活动的遵从是比较容易的。某些时代具有一种特殊的重要性，而时代又是由一些时期构成的。在18世纪，法学家们和他们在哲

学和法律理论方面的继承者们在使社会文明化方面是有其功绩的；在把社会宣布为由区别于教会法、习惯法、所谓自然法和刑法的一部民法支配的市民社会方面，是有其功绩的。思想家们和实践家们对文明社会作出了贡献，也就是说对接近于文雅的有理性行为的产生作出了贡献。其中成果是，那些法律概念（并非阻止国家的强制性的和镇压性的活动，但能限制它的专横）从正在实施的刑法实践中抓住了“问题”——把所获得的供词作为证据，根据简单揭发就进行逮捕以及司法手段和违法的训斥等。

在另一个危机时期过程中，同样的或类似的社会集团也行使了这种程序，直到产生它的合乎逻辑的结果：颁布了独立于政权、且高于政权的、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法律。这就是法国革命的伟大收获。法制从此就像一个定理的结论一样变得合理，既是必要的，又是充分的。在宣布所有权是一种（人的）权力的同时，针对权势而产生的既抽象、又合理的法律就保护了所有权，并把所有权和同样是抽象的和普遍的自由联系起来。

在封建军事国家兴衰变迁和最后危机的过程中，法学家这个社会集团难道不能被看作是民族国家的“模子”吗？“模子”并不意味着原因、理由和完全的产品。“模子”表明一种形式，并由此表明这种形式与一种历史内容的关系。还剩下内容有待于阐述。在形式上，一种相对的连续性不妨碍来自内容变化着的非连续性。由于司法形式是一种行动工具，而不是一种“纯粹”的抽象，它与内容的关系就表现为一种冲突的，因而也是辩证的状态。由法学家们所起草的司法形式与习惯法发生冲突，与封建特权发生冲突。冲突在学派和倾向之间产生对抗，而这些学派和倾向又有政治上的牵连。那些罗马法学家们在几个世纪中（直到19世纪）都反对日耳曼法学家们。后者肯定那些蛮族（它们当中有法兰克人）曾给法国带来各种公共团体（农村共同体，城市同业公会）所保

护的那些风俗习惯、自由和“坦率”。而罗马法学家们则通过继续制定和执行罗马法（也就是说成文法律、“私人”所有权的法律）来反对习惯法。

法国历史和社会的一种传统表现是把法学家们分开的这种对抗相适应。人们可以把“民族”看作为是由两个种族、两个部族（高卢—罗曼人和法兰克人）所组成的，而每个部族都自认为是权利和（坦诚的）自由的携带者和保证人。

这种对抗只有通过罗马法和它的支柱——第三等级的辉煌胜利才能得到革命性的解决。在理论上，圣西门^①是通过考察关于阶级和它们的斗争（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而不是通过考察关于种族和社会等级来解决这种冲突的。

前面的考察特别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在国家问题上的应用勾划出了雏形。这种方法主要是在下述两个时候实施：

a)、分析的——倒退式的时候，它从目前开始追溯时代，同时在最广泛意义上寻找这种现实性变成可能性条件；

b)、遗传的——进化的时候，它试图从它或多或少遥远的条件出发，通过各种事件波折、各种决定论连贯（原因和理由）、各种偶然事件和意志（政治的选择和决定），关注着现在生产的历史运动。

封建军事国家与经济关系是通过军队发生。在关于李维^②的十卷本中第一卷讲话中，马基雅维里^③直截了当地说：“战争的动力不是金子，而是好的士兵。金子不会使人找到好的军队，而好的军队会使人找到金子”。而当柯尔柏在1666年写给一个总督（他的表兄）的信中说“商业是财政的源泉，而财政是战争的动力”时，他又开创了一个新的纪元。

^① 见《圣西门著作》，法国昂托波出版社出版，第2卷第120—128页。

^② 李维（公元前59年—公元17年），罗马最杰出的史学家，著有《罗马史》。

^③ 马基雅维里，意大利政治家，主张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译者注。

18世纪,路易十四的那个世纪或古典主义的世纪,标志着欧洲和世界历史中的一个转折。这难道是因为“古典理性”的形成吗?不仅仅如此!国家的形成并包含着和利用着古典理性。

这种理性同时表现出下面几个方面,但它们之间不是没有冲突的:

a)、作为哲学和科学理性。认识把自己当作合理性和哲学基础。因为认识考虑到数学、几何学、代数学、物理学(笛卡尔,然后是斯宾诺莎等);

b)、作为批评和自治的理性,不承认任何权威(从蒙泰涅^①到笛卡尔主义者);

c)、作为国家理性。

最早提及国家理性的是17世纪初的塞万提斯^②。他在其著名的《狗的对话》中谈到,从耶稣会人的学校里被赶出来的狗贝尔冈扎把它的被排挤归因于国家理性本身,“这种国家理性当它被人承认时,就废黜了很多别的理性,”“尽管它叫做国家理性,但它总是无理性,并且总是把野心勃勃的计划淹没在泪水里”。

合理性以含糊方式产生并传播到社会实践中。什么样的实践呢?在19世纪充分向上发展的商品世界的实践,连同它的蕴涵: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联系和交流的增长,产品的流通、交换的增加。商品尤其是通过水路进行流通。17世纪法国布满了运河网,巴黎、奥尔良、图尔都是大的港口,迅速增加的内河船舶、小船或用人或马拉的驳船,来来往往。如果说商人,这种商品世界的搬运夫(是与手工业生产者分开的,但又不总是分开的)被贵族阶级所蔑视的

① 蒙泰涅(1533—1592年),文艺复兴时期法国著名的人文主义者、作家、政治活动家。

② 塞万提斯(1547—1616年),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著名文学家,是长篇小说《堂吉珂德》的作者。——译者注

话，然而，“商业”并不表现出一种与美学同等重要的伦理价值。人们在交换物品时也交流思想，并且这种“人之间的交流”也训练了年轻人，成了他们实习的一部分；甚至对于贵族们，为了进入“上流社会有教养的人”的行列，也应该了解世界。

人们已经知道，市场和商业在法国起到了一种重要的作用，但这种作用还不如在英国重要。在欧洲大陆上，上升阶级（资产阶级）与国家关系代替了在英国阶级与世界市场关系。由于经商或由于在城市或乡镇里的社会最低层所起作用而变富了的显要人物（市镇长官、执政官、代表国王或领主执法的大法官、法官等），时而是从国王事务所、时而是从土地上获得报酬，经常是两者兼而有之。各种官职捐税交纳的正式化结束了一个时代，并开始了另一个时代。穿袍的官族构成了资产阶级一部分。

事情从来不简单地运行。在法国，没落阶级和上升阶级这两者都紧紧地依靠国家，依靠国王，依靠宫廷。土地贵族阶级逐渐地失去优势，但它通过保持武装和战争教育垄断来自卫，国王派出他优秀的贵族在战场上拚杀，因而贵族们控制着军队，并通过这种方法维持他们的重要地位。至于资产阶级，它艰难地往上爬，通过各种合法的和半合法的手段，通过商业和高利贷、敲诈和行政以及司法任务一丝不苟地完成，爬向顶峰。

在17世纪，没落阶级和上升阶级的平衡以及君主政体的国家巧妙地利用这种形势，并通过玩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或者相反的方法来建立它的几乎是专政性的政权，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以至于这个君主政体的国家是从阶级斗争和阶级之间的对抗（不可调和的）矛盾中产生，但是是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产生：它不是利用其中一个阶级，而是凌驾于这些阶级和整个社会之上。两个阶级之所以“不可调和地”对抗，而不是像在英国那样实行一种“历史性的妥协”，这是因为它们在国家的场地上相遇。与其同时，在英国，

这两个阶级关心联合,以便在世界市场上进行海洋贸易;而在法国却表现出一种罕见的现象,人们尽自己的可能来增加国家的财富,但财富却是有限的,而土地和爵位则是可以转让的,由此也就产生了竞争。

机械论的术语“平衡”掩饰了矛盾的活力。资产阶级从各个方面吞食或攻击变成了阿谀逢迎的贵族阶级和变得寄生了的土地贵族们;资产阶级在经济方面、同时也在政治方面进行它的斗争(阶级的)。

至于国家,它被建立,因为它一方面具有(国家的)理性,而另一方面具有暴力。国王是作为统治整体的光辉形象出现的,他把神权、最高的合理性、高尚的公正、威望和力量集中到他一人身上。是慈父般的吗?不,是太阳般的,他驱散他的敌人像天体之王驱散黑暗一样。胜利之后人们这样说。但他需要战斗,他的军队既在内部战场上又在外战场上为他战斗。在同一时间里,他需要降服异端、咄咄逼人而又特别富有的荷兰人,然后再毁坏莱茵伯爵领地,接着,他需要制服造反的各省——贝亚恩、布列塔尼、塞文纳。军队实施税制,而税制养活军队。

中央政权、军队、总监经常不断压制有一个明确目的,但是那个时代的人们——不排除那些负责人如柯尔柏^①和他的合作者们——不能明确地对此加以表述。因为这涉及到地租的提取和分配,地租的提取和分配仍然是国家和统治阶级的主要财富;还涉及到向各省的领土以及城市(农业的市场)的资产阶级显要人物争取一部分地租。而地租又可以转变成货币税、劳务(劳役)税(进行修筑堤坝、港口、道路以及开通运河等大的工程)。

^① 柯尔柏(1619—1683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忠实仆臣。任财政总监,是宫廷内外的实际决策人。

在这个时代里，税收压迫具有一种首要的政治作用。只是到了18世纪，路易十五的那些大臣们才试图通过建立“人头税”和“二十分之一税”来建立一种更加现代化的、又更加公正的税收制度。过去，在路易十四政权下，没有什么能威胁那些特权阶级的，他们是免税的。由于土地所有者几乎是免税的，动产财富也逃避了税收，那么，又有谁来纳税呢？被迫以金钱交纳国王税收的农民不得不努力增加他们的生产，并卖掉产品，或者在市场上卖、或者卖给地方的磨坊主，或者卖给进行大宗交易走私商的狡猾的中间人和证券推销员。他们放弃了所谓的自然经济。如果还不能适应需要，破产的农民就堕入流浪汉的行列。

原始积累是按照下面两种方法来实现的：或者是在世界市场的范围里实现，或者是靠牺牲农民的利益来实现。正是这些不同的条件蕴含了国家各式各样的演变。第一种演变的典型是英国，它通过降低国家作用的重要性，很早就走向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历史性的妥协。国家，在英国主要是用它的海军力量和它的外交政策来保护商业发展和正在产生的工业生产。经济（商品世界）的发展在英国几乎是自治的。第二种演变的典型是法国，在那里，国家对农村不断施加经济压力（税收、间接税收如盐税等）或超经济的压力（负担军队的武装、惩罚性的远征）。至于盐税，这种垄断性质的税收，是压在一种普遍使用的食品——盐上，从旧制度起就成了既定的方针。

在法国，原始积累是通过国王的特许进行的，而他并不了解其中任何事情，甚至是一无所知。而压制和压迫在同一个历史方向进行，充满着无意识；国家市场的形成，一个显贵、商人、官僚和唯利是图的工商业者的阶级建立起来了，即一个包括城市和农村的资产阶级建立起来了。在国家内部，经济和政治相互衔接；这个国家蕴含着一些社会关系，而这些社会关系又反作用于国家，这个国

家既是社会关系的生产者,又是它们的产品。国家市场既由于公路网和水路航线网的扩展(尽管维持着内部通行税)、又由于国家对土地税的征收而形成。至于国家,它隐藏在国王和周围人员之间的关系的辉煌的光辉的深处。国家与宫廷混同了吗?不完全是这样,国家单独地运行,但是朝臣们的阴谋每时每刻都干预着国家制度的运行。

按照规章条例和正规化的制度运行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延长了封建军事国家的寿命,但是已经对它进行了改造。这种中央集权的国家显示了它的某些合理性,即不但确立了“国家理性”,而且还占有了科学的理性(拥有科学院和皇家学会)。通过国王的权威,它把合理性的统一(即意识形态的统一)与民族的统一结合在一起。

但神话和骗局的一部分继续存在着,甚至在一种创造性的(生产性的)实践控制意识形态的那些时期。实践要求意识形态的帮助,17世纪也不排除在外。当路易十四宣布说:“朕就是国家”的时候,这已经不再是真实了。当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一个官僚阶级(大臣、顾问、警察总监、财政官员和在外省维持秩序的军队)已经占有了对事务的管理,尽管国王自认为具有超验性和他与国家具有同一性,自认为他是神圣的和具有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其实,他已经只是一个民族统一的象征。他在仲裁统治阶级内部的冲突、没落阶级和土升阶级之间的冲突吗?甚至都不是,他只是仲裁和平衡的象征并通过在一切领域和阶层所盛行的偶像崇拜来维持着政权的海市蜃楼:尊敬、仰慕、崇拜和畏惧。太阳的光辉正好掩盖了黑暗,而在黑暗中,则发生着各种涉及国家的事件和交易。

直到三个世纪以后,这个国家的“历史的真实”终于得到了澄清。那些大臣们、国王的顾问们、总监们当时似乎在为君王服务或者自认为在为君王服务。今天,在革命和资本主义经验之后,在马克思

分析之后，人们才知道柯尔柏式的这些高级官员在为另外的事情服务。为什么事情服务呢？在为资产阶级的上升、国内市场和民族国家的统一服务。他们保证了马克思主义者们所称的“原始积累”等的“起动”。这种“起动”过程具有这样一种双重意义：经济的（对地租的提取、原始积累、国内市场的形成）和政治的（官僚主义的集中化）。从一开始起，但并没有意识到，国家就同发展相联系。这种联系将得到加强，这是由于国家（法国的）不得不进行干预，以便使大陆避免变成英国的殖民地；这是由于封建势力将会抵抗和巩固它的阵地（封建的反动派反对为君主制国家服务的改革者）；最后还由于农业生产将会长时间地占统治地位以及从不动产财富到动产财富的过渡将是长时间和困难的。

现代国家的使命和影响从它一开始就“客观地”出现在法国和欧洲大陆上，尽管还是不明晰，但却是存在。它不同于封建国家，更不同于古代的城市—国家，虽然首都的作用并没有停止增长。古代的国家（罗马）掠夺人民，使人民破产，这是因为它以实物形式（麦子）征收土地上的产品。而现代民族国家有利于积累，因为它促进了市场的发展，并因此获得了它所需要的货币。

三段式的过程：偶像崇拜——神秘——骗局，一眼就能看出，而并不需要借助于那些放大镜。

对国家的偶像崇拜仍然是法国“文化”的根据、基础、本质和中心的内容。是直接的吗？公开的吗？不。意识形态和故弄玄虚一旦被揭露就会崩溃。对国家的偶像崇拜在古典主义和理性主义里变得神秘化。法国革命被认为是摧毁了专制国家，但在革命后，在所出现的恺撒——教皇主义（波拿巴主义）加剧的同时，这个革命的结果是又把专制国家发展了。通过贬低还较野蛮的16世纪和堕落的18世纪，共和制政体的国家能够合法地倚仗古典主义。人们不会过分地强调越过政治非连续性（也就是说革命）的这种内容的

连续性,从总监到省长都是这样。如果说存在着政治断裂的话,那么并不存在着意识形态的断裂和历史的中断。

在法国的画片中,描绘着太阳王(国王)在一个忙碌着高贵事务的宫廷上空放射光芒。可是他那里知道人们隐瞒了一系列事件的真相,隐瞒了资产阶级正在背地里所策划的阴谋。正是在国家的保护之下得到发展的资产阶级不就要向国家本身发动进攻。而与其同时,国家也开始隐藏着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内含以及它的意识形态“价值”。这就使得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能够利用这一点来达到他们的目的。

被马克思主义和尼采哲学批评所复苏了的现代哲学试图通过把实证的历史性改变成批评的历史来更新历史本身。在这个方面,最杰出的著作带有米歇尔·富科的署名。米歇尔·富科从现在的经验和国家所具有的镇压性,回顾性地阐明了历史的、过去的一个片断,这是一种很有价值的尝试。这种阐述表明了西方资本主义形成的特点,这个特点表现为不是关闭自守,而是要投入劳动之中。以前社会的生产成员,通过直接接触土地,通过使用牲畜(牛、马)、工具、材料、产品,按其本性随其自然地劳动。节日或者停工休息日很多,流浪汉和朝圣者不停地拥向公路。人民中的一部分过着半流浪的生活。而从十七世纪开始,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把那些失去了生产资料的生产者投向抽象(难以理解)劳动之中。这种抽象劳动是以工具和机器为媒介,是在一些抽象场所(车间、作坊 企业)中进行的,是为了一种遥远市场进行的。对于他们来说,生产活动发生了多么深刻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既具有经济方面、又具有政治方面的重要性,并且由此划分了历史的时期,产生了历史的鸿沟:第一个时期是从人类在土地上定居和游牧民或半游牧民在土地上定居的时期开始的;第二个时期,即专业化时期,是从农业和手工业劳动向工业劳动的过渡开始的。马克思在

《资本论》中的关于英国原始积累的章节里，描述了工业劳动的起源。向着资本主义转化的社会和国家必然会运用它的所有手段（镇压性、道德和美学、意识形态和欺骗），以便达到把人民和无产阶级投入劳动之中。在英国，相对软弱的国家，是从14世纪就进行干预的；在法国，晚来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干预虽然起步比较晚，但是这种干预更加有效。就内容来说，马克思指出了英国和法国的法律是一致的。

奇妙和令人吃惊的是，资产阶级的行动计划成功了。这个新的统治阶级使劳动者热爱劳动（抽象的）。又是如何达到的呢？是通过对游手好闲者的（贵族和流浪汉）贬值，对劳动者的增值来达到，也就是说，是通过伦理（道德）的运用间接地达到。在过去，宗教和宗教中的一种变化都曾支持游牧民在土地上的定居和他们从事农业生产，而在现代世界竟然通过一种说教就能够达到目的。真是一种“完美无缺的”欺骗！难道把这种伟大的成果归功于道德不比归功于“力比多”（性爱）的挪用更好吗？社会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的那些论点低估了伦理和美学的力量。马克思在揭示异化（被异化和正在异化的）劳动时，深刻地描述了资产阶级的欺骗，与此同时，他又揭露了这种欺骗和资产阶级使人民和无产阶级勤奋劳动的目的。

统治阶级的人们为了获得这种成果，即各种劳动的产品，又是如何回报劳动者的呢？他们排除了劳动者的享乐，或者把享乐变成可耻的事。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资产阶级就曾经受到过被认为是对群众实行道德主义、清教主义和苦行主义的攻击。这种对劳动者的损害，在行动的主要力量中产阶级中似乎已经达到了最大的限度。

资产阶级的这种欺骗性的行动就这样圆满地完成了。通过这个行动，工人在劳动市场上似乎在按照他的劳动价格出卖他们的

劳动力，并被认为是在进行一种等价交换——劳动换取工资——并且就这样被人提取剩余价值。如果不借助于道德的帮助，资产阶级的行动就不会被理解和理会，也就不可能成功。因此，还需要对道德主义和不平等的交换之间的关系加以说明。

古代是在很困难的情况下达到在奴隶制下控制奴隶的，也就是说，是在很困难的情况下维持在这种生产方式中的生产关系的。古代没有实现使人热爱剥削的结果，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它上升的过程中似乎已经取得了这个结果，甚至比通过政治途径行事的“社会主义”还要有效。然而，这个过程也同其它过程一样必然经历下列一些阶段：上升、顶峰、衰退，时而又加以重复。在产生资本主义的大部分的国家里，它后来不是长期处在衰退时期之中吗？只是通过压迫和镇压，才能把劳动者束缚在一个越来越抽象的、分工越来越细的、由机器操纵的劳动上。

在他的《道德的文明》这本著作中，诺贝尔·埃利亚斯微妙地指出了从18世纪起，中产阶级和它们的作用在德国和法国不同。在法国，从17世纪起就孕育着一个中产阶级，从他们当中又产生出一批出类拔萃的人物和一个强大的有产阶级，他们的势力一直延伸到宫廷并与正处于衰退时期的贵族阶级不相上下。而在德国，比较软弱的中产阶级（主要是商人或城市商人）既不能对君主宫廷发生影响，也不能通过文学艺术来影响公众。它除了运用大学中教授的作用以外没有其它表达方法。因此，在德国，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只具有一种“文化的”作用和行动，确切地说，只能通过制定“文化的”概念来产生作用，而这种“文化的”概念是同法国的“文明”概念相对立的。因此，在德国方面，政治上的软弱与在伟大的哲学中将要达到顶点的精神方面的激进主义相汇合。相反，在法国方面，上升的资产阶级——中产阶级进一步得到加强，其中的杰出人物（通过哲学家们、百科全书派等表现了出来）参预各种事

务。资产阶级感到自己有能力领导国家，并且从这种预感到直接的革命行动。而且这种革命行动又导致这些杰出人物走得比中产阶级原来想要达到的目的更远。他们不仅加强了资产阶级的国家，而且还把国家视为己有，表面上遵循的是一种“罗马法的”合理性的要求，而实际内容却是资产阶级的。而在德国，行动口号与上升时期的法国资产阶级的行动口号不同。德国资产阶级的特殊的命运，它长期在政治上的软弱性以及民族统一的迟到，所有这一切都没有停止加强它固有的观念与空想。

二、回顾(续):法国革命

很少的历史片断曾受到过像法国革命那样多地被历史学家们仔细研究。他们每个人都想从这个神奇的怪物身上提取一块肉,以便把它做成自己的猎物。而其中最有名望的那些人发现了整个现象的一个方面:所有制的转移,也就是说通过革命——资产阶级的上升——反对外部(英国,整个大陆)的斗争,即反对那些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已经成为殖民主义者和统治者的封建势力和他们的支柱的斗争——所进行的土地改革。在这些有名望的历史学家中,从时间上来说,离我们最近的一个是阿尔贝·索布尔,尽管他并没有大肆宣扬,但却从一个可悲的经验,即十月革命的经验中得到启发,他指出了那些在军队中的死者和晋升者以及国家官僚主义化在社会上的泛滥是怎样地把革命者的行列变得稀疏的。而法国革命中,运动的蜕变和热月的失败正是由此而产生的。人们正是通过认识这种倒退——进步的过程来揭示过去^①的。

通过已经达到的对现象的这个或那个部分的一系列的回顾,

^① 亨利·列菲弗尔,《历史的过去是什么》,载法国《现代》杂志,1959年7月,第161号。

历史学家们已经穷尽了对法国革命的研究了吗?肯定还没有。作为它的全部现象,这样的一种革命具有某种不可穷尽的东西值得研究。

在这里,人们可以对法国革命提出一种解释,以便进一步完善以往所提出的那些解释。资产阶级用自由来反对专制、用理性来反对迷信、用法律来反对朕意和独断专行,这都不是虚假的,而是确实的,因为资产阶级要上升。同样,资产阶级利用封建军事国家,也是为了它在经济方面和社会方面的上升。当这个政治工具要从它的手中脱落(封建主义的反抗,各种改革的失败)时,它就把这个国家粉碎,以便建立它自己的国家。但是要建立它自己的国家不是一下子就能够完成的,而需要时间:资产阶级为了建立它自己的国家用了整个19世纪上半叶甚至还要长的时间。这就是说,国家不可能从一个阶级的优势中自动地产生,它更不是各种政治斗争不具人格(如同一种物体)的产物。人们亦已明确提出这个原则可以通过下列事实来验证:“领导权是通过各种实际斗争来赢得的,进行这些斗争的人们将会冒着各种风险,并且要经过长期的、一系列的战略行动(某一个战略行动有时可能被放弃,以利于另一个战略行动的实施)才能实现。”领导权可以被赢得,但并非最终地被获得,无论是一个阶级的领导权,也无论是某个阶级中的一个派别的领导权、或者一个特权集团的领导权都是这样。革命的历史,其中也包括法国革命的历史都极其丰富地表明了这一点。

在这里,人们可以把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看作是一个矛盾的炸药包的爆炸。这个辩证的观点丝毫也没有什么奇特的地方。然而,有些人习惯地通过简化矛盾来把各种矛盾压缩到最低限度,例如把这些矛盾压缩到过去(君主政体、专制体制、封建制度)、现在(前进中的人民)和未来(在一些人看来是民族,在另一些人看来是资

本主义)之间的冲突。如果按照这种图式,人们是很难理解在被革命所震荡的历史过程中,各种矛盾的变化。在法国革命中,开始时,“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难道不是本质的吗?但很快这种矛盾就变得模糊不清了,并且让位给新的矛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以至于这个矛盾变成了19世纪中叶的中心矛盾。同样地,“民主的—资产阶级的”革命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变成了一个固定的词组,在这里冲突变得模糊不清了。然而,作为革命结果的“民主的”性质和“资产阶级的”性质,从一开始起,冲突就表现出来,并且不断地变得尖锐化。但这并不意味着从此以后资产阶级的性质轻而易举地取胜,而民主的性质不进行某种报复。正是这种矛盾推动着19世纪,甚至20世纪的历史发展。因此,与其说在一个固定和平庸的定义里把这种冲突变得模糊不清,还不如强调这种矛盾更恰当。另一方面,一部分分析家选择了一种矛盾或者一种矛盾的一个方面,以便把这种矛盾从整体中提取出来并加以强调,这是一种方法论上和理论上的错误。相反地,人们应该抓住整体,以便指出各种冲突和它们在时代的进程中所发生的各种变化,即中心的矛盾将会变成从属性的矛盾,本质的矛盾将会变成次要的矛盾。

根据它与封建军事国家力量的对比,法国资产阶级在政治方面开始下了赌注。在法国,政治的意识、作用和理论相对而言比较先进,而经济相对而言要比英国落后,已经控制了英国经济的资本主义为了巩固市场正企图统治欧洲大陆。作为社会,法国社会在18世纪经历了一个分解过程。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无意识的”经济目标没能引起一个特别的、或者是拥护它、或者是反对它的运动。农业生产和农业生产所提出的各种问题还在支配着经济生活。各种革命的要求在政治(意识形态)方面被提了出来。以至于鸿沟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之间被掘开。通过对法国这段历史的回顾,可

以发现一个重要现象:政治超脱了经济和社会,它走到了经济和社会的前面。当时那些最具有现实主义的政治家们应该首先使经济摆脱它的落后状态,再按照新的基础重建社会。政治的这种“超前”又与什么有关呢?不可否认地是同一种理论思想的出现和它的影响相联系,这个理论思想就是哲学家们的思想、百科全书派们的思想和卢梭的思想;同样也能够传送、扩散理论并能把理论变成政治实践的一个社会阶层(法学家的继承者们、知识分子)的存在相联系。

一个类似但又有所区别的形势在历史上曾再次发生过:19世纪初的德国。那时,德国的哲学家们对于经济基础和社会关系来说也是“超前”的。又是如何“超前”的呢?是通过理解和解释各种事件——革命和帝国——也就是说通过把这些事件提到概念的高度,而这样做的结果并非没有按照空想主义的含意和严格的国家的观点曲解了这些事件。马克思使人注意到这些类似的特征在工人阶级中也能发现;在英国,工人阶级在经济方面既强大又组织得很好——在法国,工人阶级在政治方面比较先进——在德国,工人阶级对各种思潮比较敏感。

人们可以把法国革命中的各种矛盾列一个(临时性的)图表,以便突出各种冲突。一方面,列出需要增值的内容(试图进入一个或多或少与价值紧密结合的整体里);另一方面列出试图制度化的内容:

价值	制度
个人	民族
自由	国家
人的权利 (生活、受教育、得到幸福)	公民的权利(所有权)
个人主动性	法律

见解(个人的)	理性
意志(个人的)	权利(普遍的意志)
民主(共和制的)	政府(中央的)
“主体”(意识)	法典
思想(反对权力)	义务(强制的)
和平	战争
第三等级(连同它的斗争)	统一(合理的和国家的)
自然	观念(上帝)

毫无疑问，这些相对立的概念或术语并非总是面对面的和静止的，而是一个和另一个针锋相对或者说处于“确切地对抗”之中。在法国革命中，人们是生活在革命的动荡之中，生活在广义的生产之中，而不是生活在把知识偶像化的一个学者或知识分子的杰出的头脑之中。在称之为历史的时期的过程中，这些术语并非是一些象征性的含意，而是包含着一系列的创造性的行动。

在法国革命的各种冲突与对抗中，人们互相交战。在这些动荡的日子和激烈的生活气氛中，现实性和理想性还没有被区分出来。雅各宾党人处决了民族团结的敌人——英国人的走狗吉伦特派的人。为什么人们互相交战？为了谁？肯定不是为了概念，然而那些冲突性的对抗、那些取胜的党派和被战胜的党派之间的对抗，正是通过这些概念表现了出来。概念总是处于潜在的状态，应该把它们解放出来，也应该把它们解放出来。在每一个时期，在每一种“确切的对抗”中，各种概念中的一个，通过那些被涉及到的“演员”的作用，压倒另一个概念，并且持续一个时期。然后，另一个概念就会进行报复。这样，矛盾就开始变化，从原来中心的、本质的变成次要的。而反过来也是如此。例如，在共和制和帝国战争期间，国家这个概念使个人这个概念沉默不语。但个人和个人主义将会按照地区、个人运用浪漫主义进行它们的报复，这样就又酝酿着未

来的动荡。然而,到19世纪中叶,民族和国家的概念在法国已经占了优势并且跨越了莱茵河,就要为反对德国的民主本身而服务。

有利害关系的人拼死斗争;他们为了那些模糊的实体、为了那些概念被解放出来而战斗。当那些概念被解放出来时,拼死的斗争也就结束了,或者为了另外的目的(目标和赌注)重新开始。在行动中,现时性掩盖和隐藏着遥远的目的,策略掩盖着战略。

未来的世纪将会发现合理性的极限,这种合理性将成为实践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在实践中得到验证。民法法典的合理性不但对于它的编辑者们,而且对于当时采用它的世界的一个很大部分都未引起任何怀疑。因为这个法典的合理性摧毁了来自那些共同体的习惯和传统的“不合理性”,例如遗产的共有等。这种合理性是与私有制显而易见地联系在一起。

在民法法典的面前,会出现自然的、或历史的差别,即个人的、家庭的、地区和省、国家和人民的差别。因此,这种法典仍需进一步完善,但是作为一种清一色的有效工具、作为等价原剂,它仍然发挥着作用,在世界范围内都是这样。

这是一种普遍主义?那是另外一回事。普遍性的公设——被黑格尔阐述,但首先是被康德和费希特阐述——它奇怪地与对民族和国家的崇拜结成联盟。尽管存在着矛盾和差别,但是这种普遍性将取代其本身属于思想意识的宗教的那种普遍性。哲学家们和政治家们承认,如果没有批评的形式,一个有特长的民族——法国民族、德国民族、英国民族、然后是俄国民族等——就带有一种普遍性,并能给全世界带来影响。这种普遍性首先来自上升的阶级——资产阶级——它建立自己的领导权,把它的目的视作价值和真理。一个奇特的变化又使得资产阶级把“局部性”变成了“全体性”,然后影响到整个世界。但是,工人阶级和它的代表(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将反驳来自资产阶级的这种抽象的普遍性。然

而,在一种拼死斗争的过程中,在整个 20 世纪期间,他们将输掉一局;国家的和民族的原则(而不是阶级的原则)将被普及,并且保存着普遍性的外表。

另一种思想意识(资产阶级的),即“政治的自由”,与欺骗相似。在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批判中,马克思曾经指出过这种说法的内在矛盾。不可能有政治的自由,因为任何政治自由都是建立在统治和强迫的基础之上的,因而也是建立在某些自由被取消的基础之上的。不应该把自由和具体的权利与抽象的和形式的自由相混淆,这种抽象的、形式的自由是永远不可能达到的,它只代表了各种可能性的自由的一种理想性。

当然,在充满活力的刚出现的新型的资产阶级国家中,各种矛盾与冲突并非像后来那样明显地表现出来。一致性的问题甚至也未被提出。因为,民族国家很快就表现了出来,它承担着它的巨大的负载。突破和上升以一种无所谓的大胆方式实现,在这种无所谓的大胆方式中,内部的差别和冲突还没有表现出来。这是由于国家开始受到苦刑的折磨:战争连着战争。就在国家的波拿巴主义的完善之前,这种活力也就已经被扼杀。

在法国革命中,通过以叛国罪砍掉了国王的头。革命者使这个国家脱离国王个人。他们粗暴地把国家和自然分开,把抽象和现实分开。不可能有人再说:朕就是国家,国家连同与它相关的东西——祖国和爱国主义、民族精神、统一和不可分割性——在不具人格和抽象中宣告自己的成立,但是在一个强有力的、还不被理解的、对实际的抽象中宣告成立的。当然,这个抽象联系着国家。概念和观念在与直觉的对抗中得到肯定。法律特别明显地把国王个人与普通的个人相区别。

在法国革命的混乱之后,从这个混乱中出现了新的秩序,雅各宾派国家的秩序,拿破仑杰出地建立了的国家秩序,一个有能力的

官僚主义秩序。拿破仑在他的概念里实现了国家。国家，这个具体的抽象，除了在哲学里存在，不可能在它自身和通过它自身存在。国家需要政治家。政治家如同其他别的人一样，有他的弱点也有他的优点，对于他的侍者来说往往看不到什么伟大之处。而拿破仑，作为一个政治家，他达到了一个超人的境界。他使国家这个概念存在和延续下去。1789年到1793年的革命只有很少的天才，而拿破仑正是作为天才的演员突然出现在法国革命中的。

三、方 法

方法(所谓方法论的一个特殊分支对象)及其在社会科学中的作用,比较含糊。方法论的论述起着巨大的作用,正式列入经院式的门类:论文、研究、计划工程。本文通过方法论正常开始,可一个丰富的方法论,其结果却很可怜。除了方法论一知的庇护所——是知的补充和替代而外,还能怎么看呢?当然,方法论有认识论的支持,它只要求由方法证实的真实,真实,再真实。

回顾马克思的从容态度,是饶有兴趣的:他利用随手拈来的工具,诸如演绎和归纳、概念和证明、逻辑和辩证。他的观点引起了无休止的评论,这是不无道理的,因为辩证法、逻辑,及其相互关系,都成了问题。至于黑格尔,指出他的辩证法(矛盾的理论)向逻辑(严密性的理论)的持续转移是再容易不过的了,因为后者特别是在决定性的水平——国家理论——上,占了优势。

这些方法的论述,是经过漫长的道路才来到这里的。为什么?因为任何步骤,特别是在本文中所采取的步骤,应该首先对准它的“对象”。步骤由对象安排和指挥,通过一点点地摸索,在向前进。方法不能脱离理论。它与理论一起形成。方法是对理论的试验和验

证。这两个阶段——先方法(不管它将抓住或接受什么),后理论——的分离,导致了这两部分的毁灭:方法成了空架子,而理论则解体了。

方法论的一个悖理之处(已经指出了),贯穿了对现代国家的这一研究的第一部分。往昔并不通过因果关系来阐明和解释现今。未来不能通过目的论(总是有点神学味的一种目的论)使人理解现实和过去。潜在性之所以能使人抓住现实和往昔,正是因为它是从中而来,而且,从动力学观点上考虑,可能性是真实性的一部分。因此,结果展示了先例所包含的东西,条件是按照人们称作遗传学的程序,假如人们观察全部运动的话,或者按照人们称作系谱的程序,假如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突发事件的产生上的话。此外,还证实了,除归纳法和演绎法之外,另一种脑力活动——转导——能在现实和可能之间的一个不停的往复运动中,建立一些潜在物。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建树”。

马克思对这个方法的阐述,比这个方法本身的假设和发展了的辩证法和逻辑要清楚得多。在它已经被概括和应用了之后(参见《从农村到城市》,昂托波斯出版社出版),还经过了许许多年,它才从围绕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莫衷一是的讨论中,脱颖而出(参见让-保罗·萨特和L·阿尔都塞的作品:《对辩证的理性的批评》中的《方法问题》及《保卫马克思》)。

在本书介绍整体的前一部分里,国家的世界化阐明了它的形成。研究不是从把一般的国家或一个孤立的国家看作“对象”开始的,即使这是在它的形成过程之中。研究发现一些情况和说明,但不形成一个模式。国家的世界性延伸,既表明国家形式的多样性,又反映其一致性;研究使人能够对一些经典的理论,诸如民族产生国家,经济基础产生政治的上层建筑,进行修正,但并不完全抛弃。世界的进程需要做一些非常不同的分析。它颠倒了马克思主义或非

马克思主义的习惯观点。国家造就民族,这是其政治和思想效果。政治的“头”产生社会的“躯体”;政治的(国家的)上层建筑改变,有时还激发经济基础。存在一些“自上而下的革命”,从而造成了一些奇特的问题。总之,在这个世界的进程之中,现代国家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它的现实中:在世界市场的范围内的发展。但这与国家的其它属性——神圣化、死亡力量、戏剧性、“不朽性”等——并非没有冲突。

进程是双重的。一方面,分析在继续国家的概念。首先必须指出国家和概念本身,或者说是概念之概念间的一个关系,指出在现代世界里,它们同时和相关的出现;知(哲学的)和能力(政治的)间的关系。道路被扫清了,但研究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人们不喜欢那些对被分别采取的方法(辩证法),或对单独采取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作为哲学,作为政治计划)的讨论,而喜欢对一个过程进行研究,该过程和研究不进入“马克思主义”,但舍此就不能进行。这是把主题和疑问、证明和展望、概念和理论的连贯恢复原貌的唯一方式。

把国家的世界化,也就是说,把一个进行中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完成的事实放在首位,必须有几个可被称作“方法论”的原则:

a) 分析应该或尽量被确定在一个全球的水平上。这个原则今天好像是明显得不言而喻了。不管是谁,不管是什么样的普及文章,如果不考虑经济、历史等这个“等级”的话,都会损害作者的声誉。事实上,在大部分研究中,世界等级是“理想性的”。要费很大的劲儿才能达到这个水平的描述,因为它通常被确定在包含在成层的等级形态学里,也就是说,“低级”的水平上。只有通过使用来自其它水平描述的素材,才能尝试对世界等级的分析,这始终是个很微妙的活动。为了达到这个水平,光罗列“世界的”、“全球的”和“地球的”,这样的形容词是不够的。

b) 等级和水平问题涉及等级和水平的繁复性,也就是说,涉及一个成层的等级形态学(其中,“宏观”包含“微观”以及中间的那些水平);它迫使人们事先选择被研究的等级。描述用假设把它孤立起来(例如,词、分子、器官、化学物质等)。分析针对这个对象,它虽不从一个结构中得到,但却假设一种选择。在成层的形态学里把选好的等级的过分复杂的关系简化之后,分析确定对象,然后又恢复那些关系。这个形态学被称之为“辩证的简化”,以区别简化主义,因为后者孤立对象,把对象保持在孤立状态,使之变得贫乏,从而以为掌握了它,甚至把它变得透明和不可理解。

等级的选择对我们来说有特殊的重要性:地方、地区、国家、世界,各种水平和类型的国家一样,包含在普通形态学里。

c) 因此,今天,等级问题便处于阅读文章和说明事实的起始阶段(或称基础阶段)。结果取决于被选择作为最初的或主要的那个等级,例如,地区水平——或从属于世界体系内部的一个国家的水平。为了摆脱这一描述和分析水平(或者为了考虑那些低水平,或者为了过渡到高水平),必须有所谨慎。尤其是应该通知读者。因一个恢复的水平而重述就有关另一个水平而已经说过的事的可能性,是不能避免的。利用借自其它等级的描述和分析资料的转导,有一些危险性。明显的是,难道不应该“建立”秘密机构,所谓跨国公司及其相对于国家和相对于世界市场的地位吗?还有一个与上述情况紧密相连的明显之处:从国家等级,即民族国家等级,向世界等级的过渡,有时是跳跃。这种等级变化的问题,对所有在成层等级形态学上进行的研究来说,好像是普遍的和共同的。

d) 互相牵连着的等级及其完整的研究,在所有等级上,瞄准三重条件的认识:它们的形成条件(起源和(或)系谱)、它们的稳定条件(平衡)以及它们的断裂条件(勒内·托姆称之为灾祸场所)。很明显,对断裂条件的研究,在这里是首要的。

e) 等级及其选择的重要性, 与这个选择支配这样的或那样的历史真实性一样。很清楚, 人民、民族、民族国家, 属于一种历史真实性。可以说, 一个民族国家, 在其机构之中, 如同在它的准则(价值)里一样, 概括或凝聚了其历史。每个事件、每个历史人物(军事的或政治的)都留下了痕迹, 而国家在某种程度上, 是由这些在每一代人和在每一个严重时刻都被复查和修改的“痕迹”所组成。一个地区几乎全部被容纳在它的历史里, 因为这个历史包括了这个地区同周围地区以及同那些威胁它的国家的所有纷争。对于世界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这里所指出的论点, 首先包括对历史真实性的肯定和异议。从国家到世界, 有飞跃、政治鸿沟、断裂。世界不再属于经典意义上的历史真实性(因果连续、起源等)。如果想把这些经典术语——历史、历史真实性——用于世界, 就应该改变其含义。为什么? 因为随着世界等级, 战略支配形成历史时代的决定论和偶然性。那些相互对抗的伟大战略, 都考虑了全球空间, 并大量占有这个空间的几乎全部要素的信息。历史呢? 正如马克思所说, 人类在写他们的历史时, 并不太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是盲目的。效果既不同于原因, 又不同于预料, 经典历史的最新形式——革命的现代史指明了这一点。在那些伟大的战略中, 出现了一种新的理性, 充满了危险, 但却是合理的, 宛若一枚火箭, 一颗原子弹、一个激光器。这便与经典理性的乐观主义决裂了。实际与设想的关系变了。

长期以来, 人们就知道(但有时却又否认), 对社会的认识, 也就是说, 对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认识, 大致是合成一个实体, 遵循的是一个双重的道路。有实践: 摸索的、目光短浅的、自发的和经常有创造性的实践。这也是实际的水平; 是盲目的、丰富的和模糊的, 因为它了解“躯体”、感情、非文字记录的回忆、愿望和渴求。联合在一起的实际和实践在精神上, 并非消极被动; 这个没有明确认

识地生活着、没有理论而行动着的人，在生活，在受苦，在享乐，在奋斗，或失败，或成功，这个活着的人，他在思考。他既做不到概念清楚，也达不到全部真理；但是，思想和计划的胚芽可能就在在这个水平上产生。当“文化的”财富将属于思想和思想家时，实际和社会实践不会通过定义而缩小到贫乏的地步；它们有，并且是一条道路。

科学呢？这是另一条道路。与第一条平行的道路？不。有时是相邻的、交错的，有时又是离得远远的，甚至是敌对的。设想达到全部，超越实际，但是通过一个中介，达到巨大的结果：抽象化。概念只有通过抽象才上升到一般。一个哲学传统视抽象为幻想和无能为力，对之感到惋惜。这个直觉的和印象主义的哲学传统，把西方思想投入到对逻各斯的一个枯燥无味的批评之中，投入到对合理性的灾难性的否认之中。与此相反，我们应注意抽象的可怕力量：它在扼杀。在思想里，它与手里的工具和武器是一样的。尤有甚者：它能生产工具和武器。技术的，也就是说，运用到自然作用上的数学的力量，就来自抽象。抽象就是分隔、扼杀、解剖。在抽象、真理、死亡之间，有一种精神分析学家用死亡冲动的理论接触过、混淆过的关系。

抽象是社会性的（自有工具和语言时起）；在法律中，在鉴别中，抽象又是政治性的。

因此，人们不能把实际放在一边，而把设想放在另一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力量，正是在劳动理论之中，抓住了设想和实际之间的一个首要关系。

马克思主义思想把设想和实际（相互）连接起来这个事实，没有作为辩证运动的典型被普遍接受。西方的思想——哲学和科学——处于设想之中。人们知道，它把知变成它自身存在以及社会和政治存在的轴心和支柱。或许对这个历史性的选择的承认，将作为主要因素进入国家概念，也就是说，进入对能—有一—知这些

术语间的关系的确定之中！

西方思想对实际不屑一顾：诗歌、戏剧和所谓消遣音乐，都不谈实际。西方的逻各斯四面受敌，在自我批评和自行毁灭之间徘徊，但为了支撑实际而创造了一个很多人认为合适的实体：无意识。如果说实际和设想之间的结合在这里得以实现，那将既不是在哲学或精神分析里，不是在认识论里，不是在美学里，也不是在专门科学里，而是在政治的等级上，在国家的水平上。

人们应该再想一想那些没有国家名称而也就没有概念（除非意外的反常现象）的地方。如果人们用中文Guó—Jia，也就是说，“国—家庭”表示国家，或者用Gòng—He—guó，（贸易—合作—国家）来表示“共和国”的话，那么术语的政治含意不就模糊不清了吗？“出生地”、“家庭的住宅”都与这个概念不相符合。在伊斯兰世界也一样，据已指出的，Sharî'a不能表示“法律”和“尊重法律”，edjema'a不能表示“议会”，ijtihâi不能表示世俗的和宗教的意识。

缺少命名是不是意味着这些地方没有组成国家，因此也就没有国家，而只是停留在部落集合体或无个性的“人民”的水平上？恰恰相反，好像这些地方，如果不是全部，至少有一部分，很久以来或不久之前，就有一个组织完善的国家，即使它并没有接受其身份。某些观察家认为，为避免称之为“无法命名的”，而称其为“尚无名称的”地方，运转得非常之好。还有必要重复那些人们可以从中得出反对语言学和他的分支的异议吗？如果国家概念和词汇（不是事物！）在世界的一部分中不存在，那就应该引起重视。只有西欧可能具有必要的词汇，因为这个词汇适用于一些起源不同的“类型”：英国是一个根据统治阶级之间的议会妥协建立的国家；法国是一个很行政化、很官僚化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德国是一个长期以来一直遵循封建军事、容克集团，但又非常分散的国家。

人们只要稍许大胆些，并随后尽量写出一些辩护文章，就能提

出下面的这些建议：“在欧洲，在法国，政治思想始自国家之初：马基雅维里·奥贝，卢梭等。这个哲学——政治思想和它与之相对应的政治现实，同时发展。哲学和国家快慢不一地，但又是互不分开地一起向前进。如果没有卢梭和18世纪的哲学，怎么设想会有雅各宾派呢？“哲学”这个词，在当时，有很宽广的外延和内涵，以致包括了政治。西方的哲学和逻各斯一般是朝着概念，特别是朝着国家的概念发展的。至于国家，它是在一开始纯属摸索的政治实践的过程中形成的，后作为法律，作为法典，逐渐明确起来。后来，随着拿破仑的上台，当中央集权的和行政化的（官僚化的）国家建立的时候，政治思想在继续发展；但它失去了有效性；人们把它弃置于政治社会之外，弃置到拿破仑给思想意识这个术语下的定义——“无用的思辨”——里。在法国，知识分子多次恢复政治角色，例如在第三共和国时期，那是作为政客，而不是作为政治思想家。在法国之外，先被黑格尔，后被马克思进行的思想 and 政治现实之间的结合，有一些意外的后果。作为计划（一个合理的国家或一个日趋衰败的国家的计划），是失败了。难道人们不能说，在欧洲，有着无思想政治现实的政治思想吗？然而在美州，在美国，甚至其它国家，有着大量的无政治思想的政治现实，因为美国的意识形态学者，除了个别例外（《杰出的政权》的作者不属个别之列），在模糊之中，建设一些他们视为政治分析的社会和机构的模式。

有必要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就如同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这个明显的分离吗？它并非始自20世纪和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时所明显表现出的，不仅仅是政治思想无力领导政治事务，而且是在工业最发达的国家里，工人阶级的软弱无力。工人阶级不能阻止战争，并且将是一个大的失败者，虽然帝国主义冲突的这个赌注只是很晚以后才在战争的目标中显现出来的。政治思想的软弱无力时间久远，而且来自上面：波拿巴主义。后者粉碎了雅各宾的理想主义

(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粉碎得一干二净。除了在它支配政治思想以及像所显示的那样，一意孤行的情况之下，国家是摆脱政治思想的……

在美洲，在美国和其它地方，生活和政治现实极端发展，但是政治思想或属说教，或属天真的意识形态，与所发生的事没有丝毫关系。可以认为，基辛格教授更多地是从马基雅维里、梅戴尔尼赫、俾斯麦或拿破仑的那些文章和行动里，而不是从他的哈佛的同事、那些“政治学”专家们的文章里受到启发的。

意识形态猖獗异常，以致在美国，那些自由党人和新自由党人曾说过，现在仍在说，(联邦)国家几乎不存在。需要有历史学家的新学派来打破这个谎言。其间，在各州以及联邦一级，由于政治事务，产生了无数的由院外活动集团和诈骗集团很好地进行的行动计划。直到国家的众多机构的存在(如中央情报局)不能再被掩饰之前，人们一直否认国家的存在。公共事务和个人私事、普遍利益和个别利益，变得像和平与战争、掠夺与交换一样地难以区别。国家变成了什么？变成跨国公司的一个研究室？变成一个掠夺的组织？变成资本和工人工会的一个联盟？不管是哪种情况，它(几乎)仍在进行着。它在运转着。它在继续发展，而不是土崩瓦解。问题因此也就来了：人们(甚至专家)不知道它是怎样进行的。因为没有·一个·概念。创建一个抽象模型，创建一个通过“系统分析”的组织机构图表，是可以满足那些爱好唯科学主义抽象化的人；这些模型将说不出：“它怎样进行”；政治家们在做什么；在国家内部，军人、专家治国论者、政客、工会工作者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至于说，为了要回答说一切都是通过意识形态进行的，以避免概念的问题，有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者完全是天真地在这么干，要不就是他们的一个政治阴谋。意识形态会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而国家意识形态的机器则能保证它的运转。人们已经驳斥了这个谎言。在它还有某种意

义的情况下,它能更好地解释在东方国家发生的事情(用意识形态化的马克思主义,把生产、生产本位主义、物质劳动、体力劳动者变成了辩解词),而不太能解释资本主义国家里发生的事情(关于这个诡谲的天真性的表述,参见L·阿尔都塞的文章:《关于国家意识形态的机器》。1970年6月,《思想》杂志)。

就方法论和理论,有好几种思想和思想流派在现代世界里竞争。马克思主义就是其中之一,它没有任何优势,而它的或然判断,在严重时刻和紧急情况下,使之不向任何其它派系让步。每一个这样的派系都有它存在的历史的和理论的理由。这样,逻辑经验主义应运而生,它将被看成是实证主义,强调证明和事实,并伴随一个给概念留下很少位置的命题逻辑(连贯逻辑)。在盎格魯—撒克逊国家,逻辑经验主义的力量,既抗御任何形而上学和神学,又反对马克思主义,颇令人钦佩。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很少渗透到这些国家里呢?是由于新教,由于使法律内在化的道德吗?是由于国家本身的(相对)软弱性吗?除了这些假设的理由,必须补充对这一情况作理论表达的逻辑经验主义这一条。

逻辑经验主义的拥护者们认为,在法国名噪一时的“结构主义”这个意识形态,只是他们的观点的一个派生。结构主义者竭力要把事实说得无一遗漏,道个一清二楚;他们从批判研究共同语言出发,把事实用一种确定的语言贯穿起来。这种倾向有它的困难,有它的或然判断。它排除冲突,视其为荒谬的,或不可想象的,或可缩成为建议和结合的一个结构紧密的系列。这难道不会漏掉一部分事实和可能吗?漏掉的难道不是不言之中的最好的那部分吗?……

直观主义没有失去任何影响,尽管当概念哲学上升时,人们认为它已被弃置一旁了。思想和这种倾向一起产生,并停留在现时的水平上。它把非现时看作是谎言或妄想。直观主义者柏格松认为,

通量哲学(参见:德勒兹和加达里的《反对善于解谜的人》)起源于流体哲学;通量并不作反信息通量或能量通量而专门(用起源、路程、使用终端,也就是空间地)研究,而是作为一个普通流动性的个别情况来研究,与柏格松所认为的感知的心理现象不相联系,而与愿望的非正统的精神分析相联系。任何稳定性、任何等同都可能失去,连同病理学病例一起,成为“愿望机器”的遗弃物。从词到国家,一切都被潮水卷走,卷进愿望的海洋里去。这个新例子指出,方法论和概念论不能傲视(心理的、现象学的、精神分析的)直观主义,而是必须从中看到一个聪明、灵巧的下等意识形态。

判断哲学在第三共和国有一个几乎是官方的地位,道德和自由意识形态(掩盖着大资本主义的形成,并认为剩余价值应不予承认)相一致,它几乎已经失去了全部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件遗憾的事。有几十年工夫,它曾有过巨大的重要性:由一种民主制定的唯一的群众教育。它的消失伴随着个人自治的消失。主体活动的命题,把人和物放在主体和法官面前——伦理地、美学地——进行比较,无缘无故地便消失了。什么也没有代替它。意识之间不再有共同标准,思想也没了参考。只有国家除外!

要在这里否认辩证思想的困难是不成的。连接,或者称之为逻辑和辩证法之间的连接,仍旧消失了。用差异的概念,没能完全满足要求。目前,人们只是满足于重新采用公理范围的一些论述。作为行动工具的逻辑,总是和一个战略相关联。在包括概念理论的抽象和形式逻辑之外,有一些具体的逻辑:一些战略。没有结构的紧密性,就没有讲话;没有团结一致,就没有行动。但是,在行程的某个时刻,突然出现的矛盾,随着逻辑而加深。逻辑不能不考虑它。相反,从实际冲突出发,从考虑过的矛盾出发的人,在使用(不管他知道与否)辩证的方法。然而,他的讲话应该结构严密。关于矛盾的讲话不能堕入荒谬。总之,逻辑和辩证法在解释不清的

地点和时间上相遇。

在反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运动中，意识形态学者们想要指出，马克思是自相矛盾的，当他试图弄清一个“事物”或一个时期的矛盾时，他实际上改变了他的表达方法，有时还改变了他的概念。这个意见应该牢记，以便理解马克思和他的继承者们对国家的看法。

逻辑和辩证法的连接（像战略和历史的连接一样），在国家这个层次上，在国家的分析里，而不是在哲学研究中，暴露出来。

直观主义，作为哲学和方法，属于一种彻底的批判，但是，现实的、直观的、实际的地位并不因此而不重要了。从实际到设想的运动（反之亦然）使人们得以抓住心理和社会现实性的各种不同的水平，得以从一个水平过渡到另一个水平。

最后，判断哲学（道德或美学的新康德主义）因不理解世界的冲突和战略而信誉扫地。但是，谁又能逃脱判断、评价、增值或贬黜呢？判断、评价、“价值”和事实（客观的）及实际（主观的）同样受到重视。在辩证的观念里，概念让位于它们。

围绕着概念的争论，自中世纪以来就一直持续着。没有必要再去追本溯源了。在哲学战场上的论战，经历了减弱、增强、到产生各种不同的学派；哲学问题没有得出必须接受的解决方案。如果说方法论和理论问题解决了的话，那是在另一个水平，在另一个场合，而不是在哲学上。难道这不是在和充分发展的政治概念一起确定的水平上，对政治的批判吗？难道这不是在国家的水平上吗，如果有国家的概念，如果国家同时提出和强行规定它的概念和一般性的概念的话？

概念的反对者们，几个世纪以来，都在反对它的抽象性。因为抽象，它就既不能与感情，也不能与特殊性（个人的）相一致。而后者都是存在着的，但又各不相同。概念的拥护者们回答说，概念因

为是抽象的和一般的(甚至是普遍的),集中了个人的和有感情生命的共同特点,使之变成一些品种、种类、等级形态(连同一些蕴涵和解释,包含和排除的关系)。

为了在这个严肃的讨论中,加点幽默,让我们来看一看(斯宾诺莎学说的)著名提法:“狗的概念并没在吠。”在很多人看来,这个提法没有任何意义。另一些人却认为它一目了然、通俗易懂:“概念”没有任何敏感的、实际的、具体的“属性”。不过,让我们考虑一系列否定的提法:

狗的概念并没在吠。

狗的概念不忠实

狗的概念没有尾巴

狗的概念不吃东西

狗的概念没有性别

狗的概念不用四条腿跑

狗的概念不叫梅道尔

等等,等等。

这一系列不确定的否定和独特的提法,赋予了一些“属性”、行动品质和方式、“生物”的一个整体——狗,其一般特点包含有众多的特殊性和独特性。狗叫,狗吃东西,狗有一条尾巴等。我曾经给个体组成的一个种类,以这样的一种方式下过定义,以致于一个(相对的)一致性,在社会实践中,将发生在“狗”这个词的周围。每当我谈起一条狗或这条狗时,我就从一部分(尾巴、吠叫等)想到一个整体(换喻),或者从一个特点(忠实性)想到一个定义(隐喻)。

当其抽象性质跃然纸上的时候,何以概念的实体会既不是感觉方面的,又不是纯理智方面的呢?

19世纪在这方面的伟大发现,就是抽象化的社会(因而也是实际)存在。自然和社会、动物性和人性的分离,有多方面,可概括

为：就精神和社会而言，抽象化起着巨大作用。精神和社会建立在抽象及其能力上（其可怕的特点不断地显现）。概念宛如一把刀，作切割之用。它能变钝，能磨锋利，能被灵巧地使用，能肢解其“对象”……

黑格尔与首批经济学家一起，曾经指出，劳动和需要作为社会关系，是现实和自然、有机活动和欲望很久之前的一些抽象化。后来，马克思指出了，商品是怎样把物质性（作为被产生的物体）和抽象性（作为被交换的物体）统一起来的。而尼采却扩大了问题的范围，使之涉及知的社会地位。语言的问题，从对作为大自然生物的命名移到对社会关系的命名上来，后者既包含在物体里，又包含在词和概念里。我们面对的是许许多多变动的隐喻、换喻、拟人说，一句话，面对的是一个按照诗和修辞法而拔高、颠倒、装饰的人文关系，而且，经过一个长时间的使用之后，这种关系，宛若人民，是坚定的，符合法规的，有约束力的……区别人和动物，取决于：使直观的隐喻分解成一个图表，相对于感性、形象和情感，它是脱了色的、冷色调的，但对建设一个社会秩序，对“建设一个法律的、特权的、服从的和定界的世界”，是不可缺少的（参见《巴赫哲学》，马里蒂出版社出版，第184—185页）。

黑格尔所说的需要和劳动的体系，马克思认为的商品世界，尼采的金字塔的等级，都是一些具体的抽象化。社会认识中的概念的意义，有它的保证；概念的社会运用。

有国家的概念，因为国家联系着概念之概念，既是逻辑的，又是辩证的联系概念。

被这样采用的概念理论，比关于共相，关于从一般到特殊和到个别的关系的哲学的论战，走得更远。

为了给概念一个理论地位，西方哲学（从柏拉图到黑格尔）曾想把它看成是本体论。通过把它奉若神明，西方哲学曾想把它看作

是充分和必要的。

按照本文所依据的方法,人们在寻找知和概念的社会地位。通过与黑格尔决裂,而又保持知识的本质部分,人们就保持了概念,但没有给它一个本体论地位。从那时起,概念的必要性建立起来了,但并没自我满足。每个概念都有一些界限,同样,概念被普遍采用。概念不能自我封闭,即使必须考虑无限的分析。理论运动被这样指出:从一个实践(例如交换),到一个概念——不是从一个内部运动,而是作为迎接实际和收集事实的方法来发展概念。因此,马克思构思了一些概念(范畴),以及构成其理论的这些概念的连贯:从交换价值,经过商品世界、社会劳动(手段)、剩余价值、资本的有机组成等,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理论及组成它的概念的提出,既不在理想性上(形成模式上),也不在以全凭经验的方式可观察到的真实性上。概念的连贯以一个社会的实践——由一个阶级(资产阶级),经营的资本主义的实践——的展示为目的。理论因而有双重内容:历史的和现实的。方法是从现在(商品和资本世界)追溯到产生它的往昔。

人们可以像刚才对狗的概念那样,通过(讽刺地)类比,写出:

国家(的概念)不是国家元首

—政客们的阴谋

—警察(警员们)

—税收制度(税收机器)

—外交

—官僚

—社会安全

—议会

—经济增长

—政治觉悟

- 军队
- 所监狱,不是一个刽子手
- 司法机器
- 专家治国论者集团
- 大学
- 学校
- 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机构)
- 法典(民法典、刑法典,等等)
- 法律
- 商业法
- 外贸
- (私人)资本主义
- 社会
- 知识
- 等等,等等。

这个可以进行无限分析的表格(没有什么能够使分析和表格终止的),包括和包含了一个整体。不再是什么品种,什么种类的“狗”,不再是特征和“性质”的总括。也不是蛇颈龙或恐龙。而是一个具有众多特质、器官、能力的“政治生命”,还可以归入一个逻辑的类别(按种类、品种、类型)和等级形态学(从农村,经过好几个中介——地区、国家——到世界性国家的整体)。

这个概念是以一种合乎逻辑(连同一些蕴涵和解释,包括和排除的关系)的形态学和辩证关系的方式(因为否定被引入概念的构成里,并且在整体的各部分之间,一些冲突因素能够表现出来)确定的,有什么权利禁止使用它呢?

在概念和现实(实际)之间有一个诸关系的或然判断。概念说出、写出、认识、规定和阐明。它们仍旧把某个东西——一个剩余

物——留在了暗处。

“构思”一个关于国家的讲话，“建立”一个“模型”、一个“欧洲制度”，以便与马基雅维里、霍布斯^①、卢梭、黑格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和其他许多人在某个时代写成的东西相抗衡，这是再容易不过的了。怎样从这些无数可能的关于现代国家的讲话之中的一个，过渡到“国家的”讲话呢？这就是——一开始就提出来的理论问题。在清除了障碍之后，在指出国家秘密、政治家、国家理性这些术语的含义之后，在区分了国家的威信和神圣性质之后，在命名了国家的偶像崇拜之后，在揭露了它的理性和蕴涵之后，我们在这里所遵循的道路便引向了概念。上述一切已经成为概念的一部分了！

为了更有力地建立概念理论和国家概念，我们将回忆马克思所说的（社会的）劳动理论和他给它所定的概念。

应该首先回忆一下，劳动概念与很多有关机器和能量的物理研究——能量测量、能量守恒定律、能量减少定律——同时显露出来。我们不能把所谓的经济、社会或政治研究与物理研究分离开来。所考虑的时期，亦即资本主义产生时期，也是社会从自然脱离出来的时期。马克思一再强调劳动（和劳动者）与身体的关系。生产劳动，与创造性活动无法区分，它包括体力的（肌肉的）和智力的（神经的、大脑的）能量消耗。在一段时间内支配劳动者的资本家，就在利用前者的身体。

马克思所认为的（社会的）劳动概念的这个能量和自然方面，经常被人忽视。其它方面倒引人注目。在这一段时期中，随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在英国的诞生，市场（商品世界）扩张、劳动分

① 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年)英国哲学家，在政治思想上，提出“自然状态学说和社会契约论。反对君权神授，认为应当从人（不是从神）的本性中寻找立法和政治原则。——译者注

工发展和互相不被了解的、形成一个紧密结合的整体的一些生产劳动的令人吃惊的事实出现了(黑格尔称之为构成大体系、国家的那些体系中的一个)。这是一个,或者说政治经济的那个中心问题,它作为科学,与工业、工业劳动及其分工、商品世界等,同时产生。

决定性的意见:在这个时期之前,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都有一些人在劳动,但是,政治或宗教领袖,甚至哲学家(除了像亚里士多德那样最伟大的一些哲学家),都没有劳动概念。劳动这一事实被看作是或者是惩罚,或者是惩戒的一个个人事实,被看作是一个部落组织的功用,而不是被看作普通的社会事实或人类同属一类的属性。因此,劳动概念在下述条件下产生:实践事实(劳动)被全部承认,尽管有资产阶级的道德和精神的限制。另外,概念将超出这些条件,并使马克思得以分析在先前那些不承认生产性活动的社会里的社会劳动模式。至于资产阶级,它承认生产性活动,甚至颂扬这个活动(从颂扬中,不无恶意地为劳动者得出一个伦理来)。资产阶级不承认什么呢?马克思后来指出,劳动、劳动者、剩余价值,受资产阶级剥削的机制。

马克思(他发展了英国经济学家的论点——工业化的和资产阶级的表达方式)认为,劳动在于一个使身体和智慧、需要和意志,都运动的一种活动——因而,这是全部活动。它只是创造力比其它活动种类更加强有力地作用于自然的“人类生命”、自然生命的创造能力,这种能力首先由于语言,其次是由于工具而来,能力是在劳动的活动中积蓄的。

劳动生产作为生命能量的使用,通过改变物质的一部分(把它分开、粉碎、变化),生产一些日用品:食物、衣服等。只要价值不被一分为二,劳动就不比空气和水有更多的价值;它生产出一些珍稀——或短暂(食物),或持久(住房)——的物品。劳动同自然一样,作为有使用价值的东西的源泉,同物品本身一起被分成两部

分,因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也是分开的。劳动从奴隶社会起,尔后,又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清晰地,但又不可分地呈现使用价值(产生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互相交换和购销)。

因此,马克思认为,社会劳动不是一个自然事实。应该强迫自然,并使身体屈从劳动的姿势。但是,劳动并不置身于自然之外;它是自然能量的一种社会(人的)使用。在它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中,劳动延伸自然,出自自然,然后,向自然作斗争,向后者夺取“东西”、财富。这就要求纪律、组织,也就是说限制和知识。因此,生产力分为:自然(使用价值,也就是真正财富的源泉)和劳动组织对自然的控制,亦即知识和技术。

劳动造就人和人类世界。因此,劳动处于历史的中心和确定历史意义的地位。劳动在两个方面创造财富:交换和使用,而后者是本质。

能不能说劳动造就的“人”和社会,就是用来劳动的?马克思没有这么说。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抓住了三重性:需要-劳动-享乐。使用和享乐是联系在一起的。劳动产生多种与之相联、而又与之不同的活动,例如,玩耍和所谓的美学创作(艺术)。劳动有一个目的:普遍的享乐。它具有本身之外的意义:社会场所、被陶冶的敏感世界、著作和享乐。实现目的之后,劳动应该在机器之中,并由机器(自动的)结束。因此,马克思的观点不是由对劳动和劳动者的颂扬,不是以教条主义的注释者的方式确定的。它是由随着机器的使用和生产的增长、劳动的衰弱和结束确定的(在资本主义国家,生产有可能强调交换,以致使用也将同时衰弱)。因此,马克思认为,劳动的衰弱和结束,与许多其它衰弱和结束相关联,其中包括国家的结束。马克思肯定了历史时代产生的所有一切的这个历史性真理,他说,劳动就这样开始了,并将结束。历史地产生的劳动,将历史地结束。按照什么样的模式呢?通过衰弱、恶化、爆

发、合理的超越？如果这个最后的参考，这个最高的价值——劳动——消失了，那将会剩下什么呢？在被马克思宣布的所有这些结束之后，从往昔中还有什么将继续存活下去呢？“马克思主义”本身还将留下些什么呢？这还不是我们（在这里和现在）的问题。

很明显，马克思从黑格尔和经济学家们那里接受了一个还是手工业的劳动的观点，这抬高了他的身价。他从这个局限性的观点走了出来。然而，如果说他强调劳动的异化和被异化的一面的话，他仅仅是把它归之于资本主义。劳动的未来问题，特别是向着自动化过渡的问题，他只是（把它们看作是资本的有机组成的巨大发展）而顺便提出来的。诚然，他强调部分劳动的烦恼，和通过自动化回到全部的社会劳动上（在提纲里），但从手工业到自动化的巨大路程并没作更多的探讨。马克思尤其没有预料到，劳动在这个时期的贬值。

马克思首先关心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劳动（这决定了生产方式）。概念由于劳动力、社会劳动手段、社会劳动时间而发展了。的确，谁提出可精确计量的概念，谁就或迟或早地要讲量度。

同狗的概念没有爪子一样，时间量度（用秒、分、小时等计量的钟）也不是时间，劳动量度也不是劳动，劳动定量（社会劳动时间）也不是劳动本身。我们知道，劳动作为能量的消耗，从它具有价值的历史时刻起，只有使用价值。然而，劳动力的使用和由劳动力使用价值的生产，都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通过劳动时间的方法（社会劳动定量）引到一个粗暴的等价之上。劳动这种自然的能量，通过劳动时间的转换，变成了商品。交换价值与自然决裂。交换价值本身是一种抽象，它把劳动又变成了一种抽象；劳动力与产品同时被用钟点计算。抽象变成了社会的力量和形式。这就是概念所表明的。概念没有表明的是：作为这些变化的检验的“实

际”。认为劳动被分成无数的小块的人，“体验”到什么了？认为劳动贬价的人又“体验”了什么？认为看见了社会上升的那些人，从“价值”中，体验到了什么？体验到一点消遣？概念对此未作任何解释。它只表明了，劳动源自并不劳动的自然，除非是指换喻而言。在一个漫长的路程中，抽象（反自然）使一个第二自然出现：自动装置，它取消劳动。这个第二自然的模式和象征在机器上，在城市里，在思想里，在国家里，出现了。在这个戏剧性的路程中，社会人的创造力量通过了一些可怕的考验。它变成了要消失的抽象——商品、资本、死亡劳动（机器、厂房）、资本家的财产（死人抓住活人！）以及国家！——中的最强有力的一个抽象。

四、概念的接近

人们通过一系列步骤，渐渐地终于得到概念之概念。

如果说黑格尔如同人们所看到的和将要看到的，能够肯定概念的自我满足，那不仅只是因为他使抽象实体化或物化。法国革命曾经有下述意义和影响：抽象的巨大升级，即财产（私有财产、动产）——法律和法典——国家和民族，等等。黑格尔是怎样抓住这个苗头的？是通过作为概念之概念，而不是通过唯一的直观、唯一的判断、唯一的经验（经验论）而抓住的。

后来，马克思嘲笑黑格尔及其学说，说黑格尔用树木和果实的观念，来解释树木和果实，这些观念具有一个显著的生产能力，能生出“实际的”树木和“实际的”果实来。马克思的这个有名的抨击打得准吗？也准，也不准。拜物教的理论（商品的、金钱的、资本的）指出了社会的抽象是怎样在社会上存在和起作用的。商品和交换价值以及物质交换，都有一个既是精神的又是实践的存在方式（在社会上）。马克思反对黑格尔的论战使理论模糊了，他认为“抽象的、精神的、蕴涵着一个关系的社会存在方式是什么样的？”这样一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人们可以反驳马克思，说他是用一般的商品

和交换来解释实际的商品(这块糖、这件衣服)。再说,如果说马克思避免了这个错误,可他以后的其他人仍在犯这个错误!

马克思通过进攻,把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哲学,引导到了一个简单的唯物主义以及对他自己的基本论点的一个简化了的解释上去。

如果历史由一个方面来确定,如果历史存在于发展着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自我生产(即理性、“人”的社会存在、自然的实际掌握、国家)之中,黑格尔就不会不从中得出知识——也就是概念,——的自我生产。这虽是临时的,但是不可避免的结论,它造就了客观唯心主义的内容和意义。我们必须明白,黑格尔是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依据的,而不应该嘲笑他。多么大胆!黑格尔在革命中看到是行进着的理性,而不是血腥暴力和历史的偶然事件。朝着什么行进?朝着国家的完善形式。在这个革命的过程中以及在革命之后,民族国家出现了,并显现出,它在“其自身和为其自身”,有着自己的基础、意义、起源和目的。诚然,它包含一个消极的阶段——对条件和前事的破坏、外部和内部的战争——但它克服了。在它身上,“客体”与它自身,与它的原因和道理,与“主体”相吻合。这就通过提出概念之概念而确定了概念。

从现在起,我们可以说,在革命时期,事物发展很快。不多几年,大约从1810年到1840年,欧洲和世界连同存在形式和思想形式都改变了。展望黑格尔的观点已失去意义。如果说,黑格尔为了表示受到各方面反对的革命理性,并把它确定在一个其本身被设想为合理的历史真实性里而得以“实现”观念,但是,在1845年,观念的这个哲学实质已不再能想象得出来了。因此,回过头来看,黑格尔创建客观唯心主义并没有错,但马克思在他的那个时代,把这个设想扬弃掉也是不无道理的。工业作为社会实践,以新的方式提出生产。

不言而喻，黑格尔并不是轻而易举地便收集到法国革命的历史和政治结果的。他是通过矛盾和冲突——德国哲学的矛盾和冲突，才得到的。对法国革命有两种互相对立的想法：抽象的（精神的），也就是形式的和形式主义的看法，即康德和菲歇的看法；自然主义的看法（由卢梭宣布的），即施林格的想法。

伟大的德国哲学与它的时代的关系值得回顾一番。德国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仍然是封建割据，分成若干公国，由一些军事列强——普鲁士、奥匈帝国——所控制。是在英国和法国突然发生了一些事件，并首先表现出创造性能力。在英国，在经济方面（以某种自治面貌出现），工业资本主义以商业资本主义为基础建立起来；资产阶级与贵族阶级实现了一个“历史性的妥协”，由于统治阶级的相对平衡，没有产生一个像法国那样的强大国家；在内部民主和世界市场已经是帝国主义剥削了的背景之下，一个最低限度的政治权力在维持着这个妥协。在法国，在政治方面（也是以某种自治面貌出现），资产阶级攫取了国家；它将在一个还是以农业为主的社会里，建立自己的霸权。在法国，资产阶级霸权先于工业扩张和资本主义，而英国则相反，霸权随后而至。

伟大的德国哲学家们把外界发生的事情用语言和概念进行概括。黑格尔写道，在法国，人民手中掌握的自由的形式主义，变得十分可怕；而在德国，同样的原则是在平静之中确立的。

德国的落后帮了德国思想的忙；同时，这种落后也禁锢了德国的思想。它既反映了德国哲学的伟大，又说明了其思辨特点。毋庸置疑，这不是产生于非常确定的经济“基础”的一个简单的“上层建筑”。这牵涉到一个极其复杂的关系。

矛盾：自然性与合理性处于革命意识形态以及国家的发生实践的中心。革命思想的理论源泉已经包含了百科全书派的唯理论与卢梭和重农主义者的自然主义之间的这一冲突。理论和自然轮

番提供过一些好的理由，来反对君主制。国家似乎在协调这两个方面：一国人民的发祥地；它通过历史获得明显特点的自然特性。但是，民族性解决不好自然性内部的冲突。民族性有时是以机械方式（唯物主义者，如霍尔巴赫），有时是以生气勃勃、创造性和自发主义的方式（如卢梭、重农主义者）设想出来的。“人”这面革命旗帜本身，有时被想象成自然性的，有时又被想象成是理性的。权利有时表现为自然权利，与出生地相关联；有时又表现为理性权利，与历史真实性相关联。法律也提交给源自自然并被视为自然实体的人民（“以法律和人民的名义”）。如果回想血统的神秘表现，野蛮人（法兰克人），连同他们的习惯法规，与自然性相一致；高卢—罗马人，连同其文字法规，则与理性相一致。

黑格尔是通过微分研究，开始他的哲学生涯的；1801年，坚定地走在由他的首批发表的作品所刚刚开辟的道路上的黑格尔，写出了《费希特和谢林的哲学的差异》。一开头，前者的哲学，也就是绝对“主体”（先验）的合理直观，吸引了他。1801年，他倾向于后者的哲学：浪漫和神秘的自然主义。但不久，他就从中摆脱出来，走上自己的道路——概念的道路。

a) 黑格尔抛弃了那个系统——该系统假定自身的意识就像纯粹而真实的本质一样，虽然它的条件正在过渡到一个实际的意识中，也就是不纯粹的、相对的和有限的。因此得出一个不可克服的二重性：纯粹意识（纯粹的统一、空泛的道德、普遍的自由）反对实际意识，反对个人。“这个假设建立了一个体系。根据这个体系，尽管概念和道德主体是分开的，但它们应该是统一的，但是以一种形式的和外部的的方式加以统一。”黑格尔在《自然的权利》里写道，这种关系就叫做“强制”。随着“纯粹”意识的形式化和合法化，纯粹自由变成纯粹强制。个人（“我”）、集体（“我们”）、民族、国家，都不是创造性的主观性的最高机构。在它们之上，有绝对主体存在。

费希特的先验自我，没有一丝一毫以康德的方式被包括在几乎无足轻重的内容上的安定形式。自我从精神激动之中，突然闪现出来；它毫不客气地打乱了他从中获得发表的那些区别；它疯狂地、极端地、过份地向前猛进。它像一种暴力，像意识所固有的——与自身和其它固着——按照意志的逻辑，而不是思想逻辑在发展。精神“暴力”能够和应该为自己确定一些伦理目的，使社会和政治道德化。

因此，费希特抱有一种革命唯灵论（伦理）的看法。它导致了克格泽维齐的全部暴力观念。

b) 与费希特的给予主体特权的条文主义——形式主义相对立的，是谢林的基本同一性的直观：主体和客体的同一性、同物和它物的同一性、相对和绝对的同一性、形式和内容的同一性、无限和有限的同一性。谢林提出自然哲学，其中混有经验论、直观、理性。谢林的自然宛如希腊的物理一样，是一种突然出现，是生产和创造的能力；但是从心灵的深度，而不是从精神高度出现的。差异是从一个隐藏的惰性中产生的，该惰性的生产潜能首先表现在惰性物质中（表面上）和有生命的自然中。生产能力而非纯粹自由，使人们能够想象出绝对（无限）来。道德中的统一性（合法性）形式的原则与掩盖着有限（所有的有限）的绝对一致的无限之间，是不相容的。形式哲学蕴涵着实际和理想的非一致性。19世纪初，黑格尔宣称，赞同大自然中的一致性哲学。经历了自然和抽象间的空间之后，并决定拥护后者之后，他倾向了另一个。

因此，黑格尔接受了反对者们是一致的和永恒生命（自然生命、精神生命）在于永远产生对立和调和对立的这种想法。《哲学历史》在谈到谢林及其把主体和客体统一起来，而不是拥护一个，反对一个的那个实体的知识直观时曾经宣称：“了解对立中的统一和统一中的对立，就是绝对的知。”

但差异是从哪里来的呢?在哪里产生的?产生于谁?或产生于什么?同一性是怎样产生差异的呢?差异减缩为瞬间感觉的差异或被真实抹去的那些意见的差异?不,因为必须有真与假的差别,而且凡是有事物和物体的地方,差别就作为每个事物的极限表现出来;它是这个事物所不是的东西。

怎么能不顺便强调:一个半世纪以后,问题没有完全改变,而且,在哲学还存在的条件下,在抽象和自然之间,哲学提出了一个选择呢?某些人把“自然”和“文化”对立起来,但是,“文化”这个术语,把意识形态、实践(日常实践:衣服、食物、住房)、艺术,还有社会的精神的抽象(从法律到货币)混为一谈,从而把问题给歪曲了。

一个保卫自然的党派,由生态学家、眷念使用和品质者、身体的信徒、自发性和欲望的观念学者等组成了。但抽象党派(由专家治国论者、通讯的狂热者、计划工作者、增长、交换和世界市场的观念学者、三教九流的政客以及符号学家和语言学家等组成)起而反对它。

一方面,思想表现得像是经验论和直观、反思和文牍的一个大杂烩;另一方面,抽象能力、言论的表达能力爆发出来。由法国革命开创的理论问题,没有解决。它能在哲学中幸存吗?它难道不会是朝着无哲学思想过渡的哲学轨迹吗?它招致一个实践的解决。

黑格尔找到了它的答案。他不停地琢磨:“什么是具体?”他发现,哲学和概念都与“具体”密切相关。当哲学关心一般性时,它就退化了。概念不针对一个空泛的抽象,而是针对一个发展的终结,针对经过一些阶段(时期或时刻)的一个运动的结果,也就是针对一连串的开始和结束;在每一个新阶段,在每一个结尾,在每一个开始,一些力在表现,在斗争,在把过程推向前进,但同时又在阐明

它作为潜在性所包含的东西。因此，一个时刻永远也不适合消失在无穷中的一条直线的“纯粹”的抽象，但是，任何时刻都在扭曲，形成一个圆或一个椭圆概念呢？概念把任何发展想象为差异、决定、时刻、也就是概念本身的“内在生产”。

因此，黑格尔的概念把自然（过程连同时刻的连续和说明：产生、发展、成熟、种子的生产、衰落以及植物等等）和抽象（自治或自决、时刻的蕴涵）统一了起来。自由、所有制，或特别还有国家亦然。在概念里，遗传（生产、接续、历史、形势、冲突、进程）和逻辑（内部结构、要素的同时性、一个整体中的连贯）组成了，或者说是同化了。具体的同一性和差别通过冲突时刻，从“起点”开始，以便在“终点”相遇而发生的这个辩证的同一性，既不是在“纯粹的”自然中，也不是在“纯粹的”抽象中，而是在概念中被发现的。

费希特哲学曾试图从自由的主体出发，从实体化的意识出发，去理解客体、非我。这是主观性的一种形而上学（即今天所说的隐喻）。谢林哲学把本体论和逻辑的优先地位给了客体；它试图从实体化的客观出发，在无动于衷的（无所谓的）自发性中，理解主体、自由的我；这只不过是客体的一种形而上学——一种隐喻。黑格尔的概念想要克服“主体—客体”的对立。这个概念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既是确定的，又是自由的（自我满足的）。然而，这个统一和超越，消除不了任何困难。黑格尔不得不更仔细地研究从主体到客体、从客体到主体的过渡。他将不得不从中找到一个异化！

人们已经怀疑到黑格尔的概念与国家有着深刻关系了。只有国家能在历史的时间过程中记录的和在空间中发展的这个意义上，充分地实现概念。只有国家能够抓住概念之概念，因为它也“是”这个最终的重复，这个开始很模糊、而最终才表现出来的事情的反思。

黑格尔从连接和分岔点出发,以便首先超越费希特哲学,然后超越谢林哲学,而它们的对立本身是很明确的:从自然法规的理论和批评开始。费希特哲学是解放的,甚至表面上看是“无政府主义的”,因为把自我(先验的)摆在了所有的决定之上,包括国家之上,但它实际上是通过这个哲学论证的那些约束,把意识淹没在那些决定里。需要状态作为主观性的自发的产物(自我移动),可靠了,被固定了,并在自然法则上理想化了。“这个需要状态作为自然法则表现出来。会不会是最高目的在这个意义上超越它?会不会关系到创建一个建立在自由理论上的生活组织,以取代在理解基础上建立的一个共同体?不是的。人们接受需要状态以及它向着生活的所有表现的无限延伸。人们在介绍由理解所控制的共同体时,不是按照该共同体把对理解连同界限及其无穷的约束一起关在其中的不幸的拒绝看作是它的最高的法则的方法。人们不想通过用习俗代替法则,用神圣化了的享乐代替不足的那些放荡行为,用朝向大视野的一种活动代替暴力的那些暴力罪行的方法,在一个完成的共同体的真正的无限之中,去超越它们”(参见《费希特体系和谢林体系的区别》,拉松出版社,第66页)。

自然法则只包括在一个生气勃勃的,但却受到严格限制的政治共同体里,如古代城邦国家。在那里,在宗教的表现和道德的实践之间,可能有明显的和谐。

古代的公民,在与他周围的关系中,在他的职业、家庭、城市中,并不离开直接性。这个政治共同体在历史的过程中消失了;私有权和公有权,以及合法性和道德观念,都分开了。中介战胜了需要和活动的直接性。这样,国家连同它的问题和冲突便出现了:宪法,即对个人、所有权、精神自由的保护——但也有约束,即压迫性的法则、专制主义、暴政。

黑格尔的《现象学》说过人类意识的那些奇遇和不幸遭遇,接

近它的目的，即知的各种危险……现象学描述了意识朝着自身实现的顶峰(空间)的时间的考验和上升。它的时间被分成三段式，但处在运动中的整体，具有一个比冰冷的三角形架更多的复杂性。它构成一个既动人又活动着的时间的全体性。通过自己反射、自己寻找，从而去寻找概念的意识的这些形象，和时间互相连贯。首先，一般历史、知识历史和个人历史，互相吻合，因为它们互相映照。其次，主观精神和客观精神这些被异化的精神，摆脱了异化，成为一个高级精神。再者，这些时间也将分裂成一些局部的三段式。我们来把整体概括一下，作为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国家理论的导言：

A. 合理的意识(本身和通过本身)的实现。意识被看作是理想性。因此便有：

a) 乐趣和必要性。个人只想到自己。个人并不知道自己停留在现时的水平——乐趣、享乐——上，他在社会圈里寻找较之生物生活更多的乐趣。他想在一个超越他的进程中自我满足，因为该进程是普遍的。结果如何呢？天公地道，必要性制伏了他。

b) 内心法则(和疯狂的骄傲)。个人在反省。他自我陶醉于自身的感情。这已经是崇高的灵魂纠缠在自身之中了。

c) 道德和世界状况。个人想实现一般概念，也就是说，善和美，但是他只是从自己个人及其活动的观点来考虑，这使他大失所望；他不能从中摆脱，达到这一水平，亦即理解水平(低于合理性、分析和更替)。

B. 个性被看作是真实的(并想在此阶段，在一个比个人更宽广的社会基础上，自我实现；个性不再被看成是抽象的，与实践相对立；它不把它的实现范围看成是陌生的，外界的。个人像实际本身一样在实际中自我实现(因此，“正好是其本来的面貌”)。

a) 精神的动物界或“事物本身”的欺骗性。这是专家们的世

界,每个人都在他自己的范围里活动,并在抽象地实现一个局限而客观的生活,但另一方面,又在实现类似动物的生活。这也是资产阶级经济和经济学家们的世界。每个人都在按照他认为实际的和唯一实际的利益行事,只寻求“事物本身”,即财富、金钱。说实在的,每个人都在为他自己打算。然而,这个事物是有欺骗性的,因为“事物本身”隐藏着另一个事物,包括超越它的时刻。实话实说:每个人在相信事物的同时,都在自己欺骗自己。

b) 立法理性。理性提出一些在它之上的、而它又愿意服从的(伦理的)准则。实际上,它以一种使这个企图归于失败的抽象的方式来确定社会生活条件。

c) 理性考验法律。由于立法努力及其抽象原则(黑格尔像对待康德的道德一样地重视“人权”)已经失败,理性希望自己成为具体。

C. 客观精神重视先前的考验;它获知,个人不由他自己解释和实现,它的完美的自治是一个诱饵,理解及有限的理性,都不能创造一个内涵。因此,另一个范围、另一个领域,亦即已经意识到社会集体的精神领域,也就开始了。

a) 人和神的法则世界,社会伦理世界: 爱情、婚姻、男女关系(同时,“天真地”接受习俗、种族和国籍,等)。

b) 伦理行为。它与古代城邦国家、过失和命运,以及昂蒂戈纳这个悲剧性人物一起出现。

c) 法的领域: 罗马和罗马法、法人(除皇帝而外)。对这个范围的超越,把个人引入另一个异化意识占主导的范围。

在这个高级范围内,三个三段式恢复了运动的整体。精神同时感知,它投射到自身之外,而且这个投射或计划是它自己所为。它在被你撕我扯,并感到自己已被撕碎。它知道自己可能陷入迷途:陷入外界事物,也陷入只要求欲望的欲望之中(只希望为人所

求,没有行动,没有成就)。对立变得激烈;自从精神自认为是一个基本的、甚至是唯一的实际,而受制于他物时起,矛盾便大有不可调和之势。

a) 文化导致不幸意识。该意识在斯多葛主义和伊壁鸠鲁主义之间,在教条主义和怀疑主义之间,在经验论和唯理论之间,在消极和实证之间,在哲学和非哲学之间,被撕裂着。

b) 精神藏于纯粹的信义和评判之中,重新寻求自治。这颠倒而成唯物主义和功利主义。

c) 精神因此在绝对的自由里展开,既没有外部的,也没有内部的法则;这就是恐怖。

D.但是,深信已达到尽头,并将伸向无限的完成的经验的精神,在超越。伦理—社会实体性被淹没在极其清晰的、有丰富的自由发展条件的主观性之中。

a) 这是道德世界观(对世界的看法)的发展。随着康德(其批评在好几种水平上被重新采用,而这个水平有着决定意义)一起发展。

b) 掩饰、伪装。欺骗重新出现。世界和自然及生活一样,被承认了;但是,它们并没被纳入最高理性之中。它们显得像是假象和谎言。意识可以像在一面镜子里一样,满足于在它们之中得到映照,满足于伪装成另一种东西。

c) 崇高灵魂终于重新出现。对于意识来说,它是长期苦难的最后阶段、最后陷阱。这是在避开行动、实践、效能、作为,而追求明朗。

崇高灵魂的形象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意义:谢林落入陷阱,羁留其中。他没有解决自然主义和理性主义、浪漫主义和严格性、温情主义和概念化之间的矛盾。不管是泛神论,还是自然神论的神秘主义,吞食合理意识的成果;后者并不一直走向救世道路的尽头,

并不一直走到长期苦难的光明顶峰。黑格尔自身在克服赫尔德林、诺瓦利斯,尤其是谢林的影响。对崇高灵魂的批判学说,适合所有那些避开政治的人。他们都相信比概念更高的一个“敏感性”或“理智性”。他们都承认一种特殊经验,尤其是表现在伤感和怀念之中,表现在崇高灵魂的受难形象之中的特殊经验。黑格尔年轻时的著作《耶稣的一生》(1795年)难道没有对崇高灵魂进行颂扬吗?(虽然对这部著作,众说纷纭,而且,黑格尔当时可能把耶稣看成是一位革命者)。后来,黑格尔认为,行动和命运的关系变了。任何英雄行为最后都悲惨地失败了。崇高灵魂的唯一行动包括在关于领圣体和爱的讲话之中,它能逃脱希腊文化和犹太教这个固有的冲突吗?它难道不是高于英雄的一种精神程度吗?最后,黑格尔把囿于感情和言论的主观性之中的这个崇高灵魂判了死刑。这是最高的异化,它自我陶醉,耽于贪恋不舍的快乐。对“灵魂美女”的判决,标志着对政治的排挤(通过个人主义、抒情性、怀疑论)和它被完美理性接受之间的一个重要时刻。这个水平,或者不如说这道门槛,越过之后,个人便进入概念之中,而概念也就蕴育其中了。

国家随着绝对精神及其时刻,走上舞台,但是《现象学》并没有在它的全体性(宗教—知识—政治)中得到展开。

《现象学》指出,个人是怎样通过痛苦地攀登生命的阶梯,而变成一般和属于同一类的。如同浮士德一样,由于被否定(恶魔般的)怂恿,他停不下来。如果他接受一个时刻,他就停止运动,他就停滞,他就变样。不管愿意与否,意识(个人的和属于同一类的)终于达到概念(被思考,被构思,因为黑格尔认为,设想重新发现了实际),达到意识到了理智的圣宠、绝对的知和完全自我满足的状态的国家。黑格尔认为,经过时间和空间、知识和概念、行动和政治,意识的冒险完满结束了,但在个人历史、人类精神史、知识史之间,

并不是没有一个从一开始就被宣布的，但并没被认清的永恒的混乱。那些形象和时刻，在概念的周围，产生、消失、隐约显出和重新出现。

黑格尔的《现象学》局限在这个宇宙的和人类的分析上；它并没提出国家理论。为什么把它概括成国家理论呢？为了像它们在不被概括成镜子、但在所谓的“历史的”整个过程中发明和创造的这样的游戏之中产生和被承认一样，指出意识的那些形象是怎样地出现的。这个迷宫有一个出口。前景宽广，所以才作如此之回顾。概念的上升也同此理。如果人们不考虑他的这个大胆的尝试，就很难理解黑格尔哲学的力量：穷追造反者、逃跑者、意识（个人的和相互关联的），直至其最隐蔽的庇护所。

五、黑格尔的国家理论

人们将再一次拿起那些“伟大的文章”。是为了忠实地评介它们吗？是为了恢复原义和确立一种决定性的释读吗？或者相反，是为了诋毁和使这些文章说出它们没有说或不愿说的事？既非前者，也非后者。是为了说明黑格尔和马克思二人在各自的道路上，走进了死胡同，遇到了一个挡路石，今后的思想将会被撞得粉碎。是什么样的死胡同？什么样的挡路石？大家都在猜测。

伟大的文章，离开想成为“引自原文的”或“夹着原文的”一定的文学科学性的文章，若无背景，则一文不值。重要的背景，难道只是指时间、时代和造出（写作）某篇文章的人的背景吗？不是的。主要是指对文章的再释读、研究、解释和（或）恢复原义的背景。人们从中发现了什么一直没被发现的东西呢？从文章出发并回到文章中的运动，因而有两种节律：寻找真实性和“发掘”。

异化。这个“概念”从被人们遗弃的黑暗之中，从它搁置的哲学的阴暗之中浮现出来，已有三四十年了。今天，人们可以沿着它

那闪烁的轨迹，提出许多有关它的问题。它的“科学性”？它的“理论地位”？显然，都不清楚。可是这种蔑视的问题里包含着多少学究气和恶意的玩笑！

应该说，主要的问题是：这个也许不是一种概念的概念，其反应、其特殊的反响来自哪里？它是如何对真正的条件、妇女、大学生、青年、被殖民者和殖民者等等投下一束强烈的光芒？这个“概念”集中了一些平庸的思想言谈，概括了一些陈词滥调。它所包含的一切都是已经被人说过的和重复过的：奴役、侮辱、剥削。就这些主题出过多少人道主义的文学作品啊！但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精辟地揭示了这三个主题的统一。是的，异化一词充当了显影剂和催化剂，它把被修辞冲淡了的和被知识弄枯竭了的无数事实，集中于唯一的一个词。它比剩余价值或生产力有计划增长概念的真正的——必须重复一遍，精辟的——理论更有意义。由于有了这个词，遭受的痛苦就转变成清醒的力量。凡是拥有这种清醒力量的人，就会知道为什么而斗争，应该反对什么，反对谁，依靠什么，依靠谁。提出有关异化的一种形而上学的理论的黑格尔——因为一些我们将会发现的原因——将政治异化弃之不顾。谁提到政治异化的？是马克思。只要参考一下政治异化，就能避免国家拜物教，也就是说，可以避免在力量的“神赐的能力”面前吓得发抖，也用不着接受国家借以合法化的政治体现。因此，政治异化这个显影剂似的词儿便激起了仇视，遭到了结构—功能主义学派（路易·阿尔都塞）、新斯大林主义等等的教条主义的、学究式的沉重批驳。这个显影剂似的词儿的运用，直接导致了本书已经使用的并因其重要性而多次重复的政治断裂的概念。

在论及黑格尔的国家概念之前，下面还有两个出自先前因素的先决条件：

a) 关于法兰西的旧制度、欧洲的封建军事国家、法兰西革命和

帝国战争所讲的话，逐渐表明，黑格尔的国家概念既不属于哲学史，也不属于思想史，而属于包括政治在内的一般史。黑格尔的概念是同它所孕育的东西，在一个互逆的起源中，一块诞生的。它也随之显示出来。缓慢准备好的国家出现了，这个(它的)概念也随之产生。随后的所谓“思想史”的政治代表——霍布斯、卢梭、康德、费希特等——伴随着国家的起源和出现而来。它折射出国家，并阐明了国家的某些方面，但并未形成概念，不过却为之铺平了道路。黑格尔主义自民族国家一诞生，还在摇篮之中时，就抓住了它。黑格尔主义也随之发展。因此，把黑格尔及其概念以及最后的发展归之于“幼稚”史(思想史和哲学体系——事件或机构史)，以便日后再扬弃这种幼稚，如同J.P.法耶在《交换》杂志上之所为(第24期，158页，与他的极权语言研究相关的一段)，那是不正确的。“异化”一词的效果以及其它许多的语言和意思的效果都已表明，语言和语言史有其意义和重要性。但是，革命史和国家史不能归缩为这些效果，历史也不能归缩为历史和历史叙述史。

b)毫无疑问：有权力论。权力论假设和运用政治异化。它产生或复制政治异化。这个权力论包括一个词汇(术语)和一个语法(词的组合)。换言之，它对其它的推论，尤其是以前的推论，进行译码和重新编码。这我们早已知晓。然而，必须把主题的出现和被国家的人不无曲解地重新运用、编码或(和)妄加解释的主题区别开来。毫无疑问，一个所谓历史的叙述，不像它所包含和承受的那样——对完成的、或正在完成的、或计划之中的夺取政权本身的叙述——与权力论相同。这个叙述应该有头(尽可能地追溯很远)有尾(有预言性)。从夺取政权这个方面看来，国家仿佛一个远远超出其自身的巨大的社会隐喻。这就是说，权力论、导致政权或保卫政权的行动论，包含着一个对起源多少带有神秘色彩的体现和对一个多少有点幻觉似的未来的预见。

夺取政权论连同相应的阐述,一方面涉及意识形态、异化、神话和蒙骗,另一方面,也牵涉到政治(实践)行动。它属于 J.P.法耶的著作《极权语言》的研究范畴。然而,国家和国家体系——国家的世界化——的组成,不能以唯一的一种语言去构思。应该在它们出现的时候,去抓住它们,如同黑格尔在第一个国家出现时所做的那样。词儿是伴随着政治事物的,有时是随后而来的。只有哲学家才先于政治事物创造词儿。马克思(以及在他之前的圣西门)也不例外。他的概念只是根据将事物的出现搁置一旁的表面联系才归于思想史的。他们从一开始便抓住实业(圣西门)和实业与阶级关系的联系(马克思)。只是当人们不把生产活动归结于先前的代表——也就是语言——时,一种思想才见其新颖。

咱们再来看已经谈及的国家拜物教。拨开这层迷雾,便是认识(批评)的第一个活动。国家拜物教在法兰西有一种特殊的力量,因为法兰西国家曾作为楷模。在法兰西,国家的力量造成国家代表的力量,以致人们在想到国家的功能时,或者(自觉不自觉地)赞成它,或者反对它。

每当社会活动的产物趋向于一种自治的存在,似乎在摆脱社会关系,表现出一种具有立时就要影响所考虑到的关系的特有活动的现实的时候,也就有了拜物教,也就是说,极端的异化。因此,这个广义的产物,在包含着生产活动的同时,又掩盖着它。所有大的“产物”——思想及其产生、艺术、技术、爱情、经济活动、商品和货币,最后还有国家——无不如此。

只有中介才能被偶像化。直接性已经看见了。它充满了中介,现在大家仍旧这么看待它;要不它就被融合、吸收之后消失了。对直接性的阻抗有着很大的重要性。物体不易偶像化;它不消失,即使承受着重压。情感性即使被抽象因素重压,也不会消失。中介和抽象有着密切的关系,中介对社会实践进行抽象;它使之变为实践;

它使之具体化。中介和抽象在表面上和实际上同时脱离直接性，是自立的。它们有，或者不如说似乎有一种固有的存在。包括知识、语言等也是如此。

这样，从商品世界和货币世界发展之时起，经纪人的重要性便是不言而喻的了。在资本主义国家，统治权落入最积极和最神通广大的经纪人手中；实业家掌握着市场、集中贸易、金融家和金融体系等。

国家自此表现为在某个领土上抓住了各种中介——城乡之间、农工之间、知识（脑力）和生产（包括体力）之间——的那种最普遍的中介。这就是说，国家抓住了城市与城市之间、乡村与乡村之间的中介（商业网）。如同我们以后要详细介绍的，这从一开始就牵涉到对空间的攫取（强占）。

偶像不太区分地将表面和实际、真理和谬误、生产活动和感应启示结合在一起。对拜物教的认识说明了通过理论和社会实践对它的掌握。

作为预兆，人们可以在这儿，并从现在起说，黑格尔把国家偶像化了，并产生了被偶像化了的国家论，但是，他认为，国家把握着（统治着）先前阶段——国家产生的阶段——此阶段的现象学表明，国家通过阻止或绕开普遍运动，趋向于一种自立的的存在。因此，（偶像化了的）国家盖过并统治着其它所有的偶像。这是个很出色的假设，必须使其根据或幻想得以证实。若是如此，在黑格尔和自治决定论的主宰——黑格尔的国家之后，就该把握住国家的生产进程和这个国家本身。这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与之相关的实践提出一种解释。

在社会学家看来，自马克思·韦伯之后，“神赐能力”在解释着政治家及其影响。一种神秘的才能——神学隐喻、政治范围的精神降至一个特权人物身上——在解释着“权力”。与这种拜物教的

“解释”相比，政治语言研究代表着前进的一步。“神赐能力”的确不仅是个“因”，而且是语言的“果”、意义的“果”、国家的“果”。它已经假设了国家形式，将其阴影或光环笼罩在政权候选人头上。自某个时代（20世纪）起，神赐能力便产生了：和其它产物一样。在政治生产的某个组成时代，它随后便衰落了（也许是由于能触及人的感情深处的电视的出现）。国家的政治形式启发了拜物教和神赐能力，后者使受神启示的人能够以“可信的”方式谈及自己的全部的和极权的意愿。政治家周围的神秘气氛来自国家；它包围着来自国家的和向着国家走去的东西。受神启示的人需要什么？胆略、胆略，依然是胆略。这是对的！但是，分析偶像不应该产生新的拜物教。

一种有关权力论的极其阴暗的看法把这形容成为“死亡话语”。的确，人们可以试图说明，实际上——如果不是法律上——国家在死亡的空间，在某种荒漠或冰川，建立了它的权力，因为得将死亡强加于其它事物。这种死亡的力量可能是什么呢？是历史的嫡吗？是商品、信息、字据和文书、重要性、代表性的普遍化了的抽象吗？国家机构将伴随着消亡。谁的消亡？什么的消亡？生命力的消亡、自发力的消亡、创造力的消亡。现代国家可能引导并将继续引导遗留的生命力。是为了向更远和更高发展吗？不。是为了完成消亡。

这种虚无主义的论断包含一个政治判断：对国家的完全拒绝。本书所采取的立场，与这样一种形而上学的无政府主义不同。如果说，人们用国家和革命相连的方式阐明了法兰西国家的诞生和发展，那是为了表明其当时的真实性和价值，因此，是为了更好地揭示其衰败。那也是为了把那场革命看成是生命力的出现。关于（黑格尔时期及其之后的）国家和消亡之间的关系，我们还要谈到的；它不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同谋关系，也不是一种否定中的同体。

对国家的完全拒绝既否定了历史，也否定了历史的终结（它的“超越”）。人们没有从实际去看待否定，而是把它形而上学地与实证对立起来，以便将后者从舞台上排挤出去。

先决的看法和先前的分析是建筑在黑格尔著作的几个“条件”上的。人们曾尽量在把这些“条件”确定为黑格尔概念的内容。这些内容包括时代和理性的业绩——历史。人们就曾这样试图弄明白这个概念器官。黑格尔就是通过它来确定（也就是说，指明和使之吻合）语言科学及理性（逻各斯）、哲学语言——后者同知识语言——以及这两种形式同政治语言对语言科学本身的反思。

黑格尔用这个概念器官排列了思想和言论的阶段，指出它们之间是如何互应、互思和互相辨认的，亦即：

a) 因素和物质阶段、意识形象、历史阶段；

b) 因素和形式阶段、范畴，例如：质量和数量（“范畴”一词，康德、黑格尔、马克思使用时，意思不尽相同）；

c) 最后，联系因素、相对阶段、两极间的接合和连接、逻辑（包含和蕴涵关系）和辩证（排除和说明的具体关系）。

黑格尔的国家理论不包括在《现象学》里。它引向现象学，引向同时假设和包括在真正国家和国家理论中的“逻辑—伦理—历史”的三段式。

黑格尔认为国家是什么？他的定义牵涉到哲学和国家的同一性。他把哲学设想为政治的，也就是国家的体系；哲学来自国家，并与之一同形成。黑格尔又反转过来把国家设想为行动的哲学，因为国家随着哲学在它之中和通过它诞生而被阐明。国家是什么？众体系中的一个体系，而且如同哲学，众环节中的一环。自然界、逻各斯、绝对精神，从它身上和通过它互相辨认，直到成为同一。一些片面的或不发达的体系各带着自身的固有需要，带有各自的起源，带有各自的严密性，带着各自在哲学整体中的地位，进

入整个(全部)体系。凡称理性者即为体系：逻辑的严密和实践的凝聚。只有体系拥有普遍性，并趋向具体，亦即趋向行动中的整体性。完全现实化了的体系，与被一种协调的绝对行动孤立地提出的、并被一个次要行动转变为一个绝对行动的抽象作用，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自黑格尔的提法之后，西方的理性没怎么改变。体系还是理性的模式或原型。为什么呢？由于它的双重特性，严密(逻辑)—凝聚(实践)，因此是一种平衡，是对外来入侵的阻抗，是内部的规律性和调节。黑格尔为了表示组织的和制度的活动结果而向哲学借用的思想因而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体系”的概念分离出来，自立了；体系把理性和真实、理想性和现实性结合起来。通过分析，发现了体系的几乎各个方面(环路、回路、圆圈、回转栏)。因此，黑格尔开创了“体系分析”，而且人们在后面的章节里会考虑，他是否一开始并没使之臻于完善，以致它后来便蜕化变质了。特别是他的追随者们一般来说并不知道自己是与黑格尔一脉相承的。

咱们来看看黑格尔的国家中极为重要的两个片面的体系，以便确定它们的关系：需要体系(不发达体系)和生产活动体系。它们关系密切，因为它们是在各自进入中介之后建立的，相互间有着联系。的确，照黑格尔的看法，市民社会作为政治社会的基础或依据，包括三个阶段：

a) 需要的和个人通过劳动以及通过其他所有人的劳动和满足而满足的中介，这就确定了需要体系；

b) 包括在该体系之中的自由因素，这就确定了在司法之中(个人的)自由和所有权；

c) 通过机关对因此而合法化了的利益进行保卫，一种是国家外的机关，亦即行会，另一种是国家内在的机关，亦即行政(见《法哲学原理》，思想出版社文集，第223页，第188节)。

在社会实践(市民社会)中,与对需要的曲解、空想、日益不实际的同时,会出现对这些需要的减少和增加“动物对需要以及对同样有一定限制的需要的满足的方式有一个限定的范围,但人在这种信赖之中,却表现出他摆脱限制的能力,以及他的普遍性,而这种普遍性首先是通过一些需要和手段的增加,然后通过部分具体的需要和成为各种特殊的,也就是更加抽象的需要的特殊方面实现的”(同上,第225页,第196节)。

黑格尔不赞成愿望的现代辩护者,主张反愿望的需要。后者含糊不清,落入坏的无限、不定、难定之中。愿望是通过另一种愿望出现的;它需要愿望,别人的愿望,以使自己产生愿望;为了成为所希望的,也就是为了认定为希望成为愿望;但人逃开了。愿望把愿望变成镜中之花,反射出无尽的、层出不穷的光。愿望的反射(通过另一个愿望和另一个愿望之愿望达到自己的愿望)达不到确定。没有建议,没有计划,没有超越,没有开放,没有对自身的摆脱,愿望就自行毁灭,而且只是在自行毁灭之中感受自己。而当需要被确定之后,它就伴随着作品和客观结果的生产活动,在其中,并通过它们,来达到满足。这个满足超越快乐,如同需要超过愿望一样。这一点《现象学》已经介绍过了。需要达到了社会存在,而愿望却仍在自身的非理性的旋涡之中打转,停留在单个人和单个人之间的水平上。愿望仍漫无目的地、不受阻挡地在无尽的忧思中徘徊,而需要却遇上了一个如果不是被它就是为它而生产的物体;“主体”遇到了同样是确定的而非随遇性的“客体”,因而满足了。这满足是理性的。

因此,“为变成特殊了的需要服务的方法以及一般的满足的方式,以同样的方式分裂和扩大;这些方法和方式也成了一些相对的目的和抽象的需要。就这样无尽地扩大下去……”尽管与愿望的不确定相比,需要和活动的这种无穷不是没有危险的(过度的精

细),但对黑格尔来说,这是对真正的无穷的一种开放。

在这个发展过程中,需要是连在一起的,它们互相之间紧密相连,组成一个体系。方法、工具和生产活动、劳动也是一样。劳动、特殊化(分成小块)和同样日益扩大的抽象作用也同样出现分裂和扩大。需要同劳动一样,因与自然界和在一种具体的,也就是积极的和生产的抽象作用的地位中的直接性的关系而产生。没有什么比一个需要,比一种劳动更具体的了;但这种“具体性”,作为已经历过的直接性和表面的满足,那只是幻想而已。需要和劳动依赖于另一个需要、另一个劳动以及所有的需要和劳动的既普遍又个别的关系。

是不确定的关系呢?不。相互作用使得一系列的需要和一系列的劳动(如同一系列的言论和事物)回到它们自身来,互相确认。真正的具体存在于整体——每一个系列以及它们的联系——之中。这就把抽象纳入具体之中。作为“主体”——社会的单个人——的确定状态的每一个需要,坚信能够遇到与之相联系的,也就是通过确定的劳动产生的、能使之满足的客体。

不同的需要体系和劳动体系是连结在一起的,以致双方有着一种自反关系。这种关系与镜子的反射毫无共同之处。一方从思维上和社会方面(实践上),在被诸如实体、属性、主观和客观、现实性和同一性等旧范畴没很好地确定的一种存在中,反射另一方。哲学的反射抓住了这些关系的这个反射的一面。它在数学中又遇到了后者;在数学中,符号在一种完全的互相性(反射性)中,用甲反映乙,而且只存在于这样确定了的关系(可递性)的整体之中,因为关系涉及了反射。尽管黑格尔没有参考他从方法的角度予以抨击的数学,但在他的国家理论中包含的逻辑却完全是由数学而来。

保证这两个体系联合的需要和劳动之间的逻辑关系,并不阻

止它们的发展，尽管会经历一些冲突阶段。劳动手段也是把自然改变为使用 and 消费资料的行动手段（见第 196 节）。在手段和目的、需要和劳动的关系中，一种理论文化——表现和认识的总和、精神和语言的文化——和一种存在于自身重复的需要和活动之中的实践文化，同时得以发展（见第 197 节）。由于劳动分工，个体的劳动随着产品的大量增加而变得日益简单和抽象（在这里，黑格尔触及了实业的问题）。在手段（工具、技术、劳动组织）和能力的社会抽象作用的水平上，单个人和为了满足他们的那些小组之间的相互依赖，在继续和完成。因此，黑格尔得出如下著名的结论（见 198 节）：“生产的抽象作用使得劳动总是更加机械化，而且最终有可能把人给排挤掉，以机器取而代之。”

我们来概括一下，将重点放在方法（方法论）上。抽象的和具体的需要概念使黑格尔得以确定精神和社会关系的紧密的一致——需要体系。这就是说，它包含着“一个使之变成各不相同的要素的有机整体的内在理性”（见第 200 节）。我们将这个体系称为 A。它包含劳动体系 B。黑格尔从亚当·史密那儿继承来的、后来又被马克思分析出其蕴涵的（社会的）劳动概念，使他能够确定另一个具有严密性，因此比他第一阶段的概念更加具体的整体。的确，“为了生存，概念牵连进概念和现实的不同之中”（见同书第 207 页）。A 包含 B，而 B 也包含 A，因为区别和不同导致一种行动的相互性。B 和 A 的关系因而不会在一种将是抽象的逻辑蕴涵中得到解决。这是社会实践中的有效的互相作用。尽管黑格尔在以一个思辨的哲学家在推论——这将促使他对国家抱有一些有争议的看法——但他倾向于社会人的具体特征。他已经通过生产劳动对此加以确定，尽管他把这种驾驭自然的能力和逻各斯和绝对观念的力量结合起来。他因此而并未完全摆脱地走向后来在马克思的《1844 年手稿》中提出的人类学。马克思的人类学是从黑格

尔那儿派生的，通过费尔巴哈及其唯物人类学渗透了的。费尔巴哈的人类学已经标明了一个政治断裂：黑格尔的国家的和政治理想主义的批判。

从A和B的关系中产生一种“集体的总和”，表现为需要的、技术的、劳动的、满足需要之方式的、理论和实践文化的单个体系的一种封闭组织，在这些单个体系中，个人是被分散了的，这就造成了“阶级差异”（见第201节）。

在一个发展着的相互行动中，A包含B，B也包含A。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一些冲突出现了。这是因为A和B的相互作用只能通过第三个术语C来产生，而这个C是既被相互作用所牵连又受其召唤，被显露出来的。这第三个术语C同时表现为结果、原因和在A—B相互作用中出现的冲突的缘由。它本身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实体，而是概念和理论展开之后表现出来的关系的总和，首先进入C的名下的是社会阶级概念（见第202页），然后是市民社会概念，最后是政治社会概念。每一种概念都将从抽象向具体发展。一开始就包含其中、但尚不明晰的国家概念，将会出现，总要（最终）会确定下来。关系总和C将像国家总和一样被确定。国家总和包围着各种不同阶段——经济、社会、政治——而各自又通过对差异的随遇性以及差异对最高随遇性的辩证运动，同时表现为对先前阶段的发展和包围（见第302节）。必须指出，在这些展开和发展过程中，黑格尔那儿已不再有异化的位置了。关系假设出相异性（区分）和非异化。如同先前在黑格尔的理论中所阐明的那样，包含蕴涵的逻辑并不能禁止排除和说明、差异和矛盾的辩证运动。运动通过阐述，提供了动力。然而，在《法哲学》中，异化—非异化的辩证运动变得模糊，直至消失。相异性统治着异化。同样，逻辑统治着辩证，蕴涵统治着说明。这就出现了一个展开最初和最终蕴涵的运动：国家。因此，在黑格尔那儿，既没有哲学异化，也没有政

治异化。

马克思从其著作的一开始起，便对这种理论反其道而行之。在这种理论中，他看到的只是一个颠倒了的世界，因此，是一个真理和表象、幻想、表现、神话、蒙骗的一个混合物。他把在黑格尔的法哲学中消失了的异化运动又加进来了。他结束了逻辑至上、逻辑对辩证的统治，恢复了辩证对逻辑的领先地位，因此，找回了被这位哲学家弃之于国家哲学中的“现象学”的运动。

这个双重运动包含着政治断裂：与对国家的辩护的决裂，同时将政治异化置于首位，扬弃了黑格尔国家结构的直接逻辑。这一切都是通过反对作为哲学—政治体系的黑格尔主义，反对作为体系之体系的国家理论，恢复否定的和建设性的辩证运动。方法论的和理论的断裂包含着政治的、也就是实践的断裂。需要和劳动之间的关系似乎是黑格尔思想的典范。人们选择它来作楷模，因为它在所谓马克思主义思想——马克思的思想——中，起着—一个若非根本性的，也是很重要的作用。我们将看到他是怎样在《1844年手稿》中抓住这个关系的，又是怎样在缩小它的同时，也就是在避开需要，把需要退回到使用和使用价值上，而强调交换的同时，使之形式化的。这使得马克思的思想在《资本论》中，变得比黑格尔的思想更加严密，更加科学，因为它存在于一个概念系列之中，但又比黑格尔的思想更贫乏，更简单，更加降至为唯一的内容，或者唯一的一个水平：经济。然而，尽管开始极为复杂（尤其是在《现象学》阶段），黑格尔的思想也是模式化了的，只不过是变成了国家的和政治的思想。随遇性战胜了差异以及（逻辑—政治的）统一性。

在黑格尔的国家结构中，人们将看到另一些从属的体系（不发达体系）。顺便指出，局部的和从属国家的体系的关系，在黑格尔看来，一点不像平静的和仅只是逻辑的关系。为了不让单个体系

在孤立中生根、发育,也就是说,为了不让整体分化瓦解,不让精神烟消云散,国家应该不时地通过战争来震动它们。黑格尔在使之名声大震的《现象学》的一段著名论述中宣称,国家应该打乱整体与精神已成习惯了的秩序,践踏它们的自治权。黑格尔的概念和哲学在其中表现出了它们的强硬,甚至残酷。对于黑格尔来说,证明国家是个活的生物的是,它本身包含着殊死斗争的原则。没有军队,就无国家。始终有可能的战争,决定着现实。国家和民族(他将其引至历史的存在和意识)以战争作为考验。无现实的或潜在的暴力,就无国家。国家存在着,因为它可能消亡,尽管它是永恒的。所有活着的人通过它这个最高的活物再生,再造。革命的和帝国战争的哲学,将导致克劳塞维茨著作的哲学,绝不是一件经院上的事。在国家—民族之间,有一个被神灵赋予首要地位的上帝的选民,他应该通过得胜的战争赢得他人对他的承认。

在黑格尔的构思中,需要和劳动体系(双重的不发达体系),在客观道德中,找到了位置,这难道不奇怪吗?在道德(主观道德,包括计划和责任,也就是所有权——见第116节——然后是客观的意愿和利益,包括需要和劳动)和法之间,有着先已澄清的关系。道德反映着法。它构成一个不同的体系,它并不关闭,而是向法开放,而且通过法向国家开放。通过(客观的和主观的)道德,抽象的法——一个人的、亦即抽象的意志的法——成为具体的法,也就是政治社会内的市民社会的法。“法是某种神圣的东西,就是因为它是绝对概念、意识到自我的自由概念的存在。”自由的任何其它定义都在使它——自由——成为一种利用偶然和环境的艺术的同时,在蜕化。

现在回过头来再看一看黑格尔的市民和政治社会的阶级结构。它依据的是普遍化了的相互性,“单个人通过普遍性的中介,使每个人在为自身谋生、生产和享受的同时,也为他人的幸福而战

斗和生产……”的确，在大家所依赖的纷繁复杂之中，产生了普遍的和稳定的财富（见第170节），使每一个单个人有可能通过其文化和才能参与其中（见第199和120有关财富的章节）。参加在财富的社会形式中实现的普遍性的可能性，有一个条件，一个直接的和适当的基础：资本。观念和法在社会中并不取消来自自然界的人的不平等。恰恰相反，这种不平等从思想上再生，并升至才能、文化、财富的不平等。

仍旧顺便提一下，难道对黑格尔宣称时的坦率不应该表示赞赏吗？他不容置辩地、清楚地表明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存在。在19世纪，甚至20世纪，有谁能在权力，甚或犬儒主义上，与他等量齐观的？批判的附着点已指明了，可以说是呈现出来了，可是，必须有一种与黑格尔相匹敌的力量，才能把这些附着点区别出来，才能打得准。黑格尔认为，依据法和道德组成的现代社会，包括三个阶级：生产阶级、思想阶级、政治阶级。对这三个阶级，他在描绘各自特点时用的词，把借自哲学的思辨特征和源自法国和英国经济学家以及源自经验的实践特征给混淆了。

生产阶级被说成是“实体的”、直接的、自然的。它在土地上劳作。第二阶级是自射的和通过中项的。它按照从手工业和工业到智力这条线，转变第一阶级的产品。黑格尔在这个阶级里，把区别于农业和农民的“生产者”和生产集合在一起。黑格尔没有很好摆脱重农主义者的教导，尽管也读了亚当·斯密的书，他并不允许一种自治的生产和工业进程，虽然他把制作、普遍的交流和商业看作是第二阶级实现的缘由（见第204节）。第二阶级因而按其定义是中间的阶级，包括所有非农民的生产者，从工人到商人、企业家和知识分子。几乎与圣西门在同一时期所言相同。

全称阶级（La classe universelle）把中介和直接性结合在一起，因而也就把经纪人和直接活动、生产和交换结合在一起。它

因管理社会的一般利益而为之操心。这是高级阶级。它以不为需要而生产为宜,而且生产的闲暇应由国家补贴,如果个人财产不足的话。全称阶级产生思想、道德、法,并为一般概念和通过一般概念来工作和创造。它应该从中得到完全的满足(见第205节)。这就是政治阶级。

应该注意,黑格尔认为,每一个单个人,在年轻时,都反对进入某一特定阶级的思想,错误地认为,那是为选择一般概念的一种限制。这种反抗与意志和概念、道德和法的抽象阶段相关联(见第207节)。

下面是(市民和政治)社会的图表。

第一阶级,特殊的、直接的、实体的、自然的阶级,也就是直接与自然界(土地、土壤)相接触。基础生产是农业。也就是农民。

第二阶级,是一般的、有关系的、中介的(经纪人)。它是人造的,但利用不同工具来处理第一阶级的产品。生产是派生的,从手工到文化。因此是中间阶级,手工业者和工人、物质生产者和各种成果的生产者、专家等都包括其中。

第三阶级,是全称阶级。官僚和统治者集于其中,也就是说,是政治阶级。不包括生产活动(生产性劳动),因为它致力于管理工作。包括律师、法律界人士、医生、大学工作者、公共事业等。它并不脱离中间阶级。“政府成员和国家官员构成了中间阶级的主要部分,有教养的智力和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存在其中。”(见第297节)。国家由这个整体,包括君主组成。

黑格尔国家的阶级构成

统治者

官僚

第三阶级

第一阶级

第二阶级

《大百科词典》把这个图表介绍得非常清晰、明确。“实体阶级有在肥沃的土地和土壤中的自然的和牢固的财富；它的活动接受自然的规定性；它的内容和道德建立在信仰和信任上。第二——反射的——阶级是基于社会财富、中介和全部偶然的体现之上；单个人在其中降至为他的主观权利：天资、知性、运用。第三阶级——思想阶级——负责一般事务；它如同第二阶级一样，有一个通过自己的知性中介而来的存在，如同第一阶级一样，有一个为社会全体保证了的“存在”（《韦森萨符腾哲学大百科词典》，第528条）。

前面的图表概括了黑格尔理论的一个主要方面。国家由互相叠印的、等级森严的三段式组成。如大家所见，每一个融合进去的体系都包括两个互相之间有着一种双重结合的术语：外在的（它们是不同的）和内在的（它们有一个反射关系）。日后的理论将把可理解性和严密性降至两个在面对面（直接相关的对立）中对峙的术语的关系，它将作为黑格尔理论的缩小和蜕化出现。这种理论排斥了在黑格尔那儿已经不确定的辩证方面，把希望寄托在逻辑的优势上。因此，黑格尔的逻各斯随后或将降至一种固定化了的（学院的而非一般的）知，或将降至一种专门化了的（语言学、整体的或包含一蕴涵关系的逻辑—数学理论等的）知。对于黑格尔来说，有三种术语，但是，著名的三段式（主题—反主题—综合或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只带来一些固定的形象和依据黑格尔的三段式运动的缩小了的形式。第三个术语包括在前两个术语的反

射之中；它由自身确定；它就是这种反射本身。正因为如此，无处不在的国家在整个社会之中才同时被集中于政府和国家首脑（即黑格尔的立宪君主）身上。同样，也集中在哲学家身上。哲学家了解社会和政治整体，并反射出来。国家首脑也一样，他是社会的因和果，是无处不在的反射，因而也就是主要的知、纽带和缘由。国家有一个悖理的存在：高踞于社会之上，但也包含在社会之中。

融于全社会之中的理性说明它集中在作为知的一个人身上，这个人既是双重的（君主和哲学家），又是三段式的（作为原因和概念的思想到处卷入矛盾之中，构成了第三个术语）。必须注意，融于社会和国家理性，在黑格尔那儿同市场和商品（同交换和交换价值，同商业循环），没有任何明显的关系。作为市场，是一般理性的结果；在马克思看来，它大大超出于此：是历史原因、社会支柱、经济缘由。然而，黑格尔指明了国家和自由使用的货币在他认为的现代世界里的关系（见第 299 节）。

这张二元图表（直接相关的对峙）处于静止状态。三段式图表包含一个否定的和积极的运动。每一个术语都在移动。以宗教和艺术为例，它们构成两个互相联系、互相反射的（局部的）体系。艺术源自与它一起达到鼎盛的宗教，但它通过自我表现，通过用模棱两可的方式来非宗教化，通过把宗教搬到过去，而大有取宗教而代之之势。然而，宗教作为哲学真理的阶段而顽强地抗御着。它坚持着，但只是处于知和国家的凝滞的、被保存的和保守的状态，以致艺术同音乐一块消逝，并化为哲学和国家。国家只把它作为表达其伟大的形式，保存在不朽之中。

可以说，静止图表较好地描绘了黑格尔的国家趋向的最终平衡（活或死？是死而非活！）。

黑格尔系统化的一个最好的表示，也许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是一个“环中之环”。国家既是周界，又是中心（旧的哲学形象），将把

局部的环集中到他的大环之中，让一对对相互联系的环互相对应。如同君主这个环，哲学家集中在这个形象上的目光将达到构思的全体性。这个形象将比金字塔更好地表明，在国家中，在哲学政治体系中，没有外在性，除非是相对的、附属的、通过相互间更为亲近的因素中介而纳入整体的。对政府（君主）和哲学都有全体性。然而，全体性在立法权比在当然不排除立法权的行政权中，更是一种具体的政治存在（见第 300 节）。

从黑格尔的国家观念中得出几个结果：

a) 国家—民族内部的矛盾是弱的。这是由于这个国家、它的理性、它各阶段和不发达体系的“反射性”的存在和强大。殊死斗争及其结果——战争——只存在于各个国家——民族同其它国家——民族的关系之中。至于夺权斗争，只有出现错误或组建的缺陷时，才会成为殊死的斗争。正常情况下，它只局限于一种和平的、对整体有益的竞争：优胜劣汰；优者跟合法君主一起，并且像他一样地掌权。政权水平上的一种难以解决的冲突，藏着背叛国家的杀机。

b) 发生冲突时，政治阶级和政府的人有能力发现、弄清，并能解决得让大家都满意。国家是决策机构。

黑格尔的国家的理性构成不能成为一个楷模，但可作为历史时代的一个产品以及历史的完成之作。因此，不管是如何表示的，它有着一个静止的特征。全体性蕴含着一种全体的秩序；（时间的）历时性溶于现实性（同步性、空间性）。像那样的政治是不为君主政权和权力的绝对性所确定的；它只有一点极有限的暴力；法律和强制在单个人的心中建立起来；它们内在化了，使得国家的外在活动变得无用。因而，没有对暴力的垄断。政治像哲学一样，由知来确定。因而，没有权力意志！像理性一样扩散在社会体中，成为“市民社会”的一部分的知，集中在政治阶级、统治者、君主身上。逻

各斯中的一致导源于社会整体；导源于全体性。它合理地包括密切相连的全知和君权的承诺。但凡不进入“一致”的，都被逐出“社会”之外，国家之外。国家只是因为体现了造成社会人的对逻各斯的参与才获得一致的。黑格尔的“人”的人类学——政治定义，既不从劳动（其重要性源自人类精华但并不决定它），也不从享受（尽管它是其中的一部分）出发，而是从无处不在的、每个行动、每个细节、总体（全体性）固有的逻各斯出发的。

c) 如同固有于（直接于）需要和劳动的一样地固有于社会——政治现实的享受，不存在于快乐之中，而存在于满足之中。我们已经强调过黑格尔关于满足的概念的重要性。它的重要性来自它在黑格尔理性中的地位。它的利益来自现代社会——简略地称之为“消费社会”，一重新找到、但没能认出黑格尔的观念，而且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处于这个标签之下，因而证明黑格尔的理性在于大范围内，与西方的逻各斯及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民主的理性融合在一起。它的雅各宾派和拿破仑派“亲属”即证明了这一点。满足不等于快乐。并不是说它排斥它，而是说它不把它放在首位，也不由它来确定。黑格尔主义无丝毫的享乐主义；伊壁鸠鲁理论只是不幸意识（它立即将《现象学》中的禁欲主义打发到它的系定理和关联词中去）的一个阶段。难道美好的灵魂不是在不可能的纯洁和逃开它的“纯洁”欲念之间徘徊吗？我们知道，满足是作为理性主体来确定主体状态的那个主体的状态。当欲望把主体重新投入不确定的、无边无沿的主观性中的时候，需要便确定下来，并确定主观性。因此，“纯洁的”欲望将同从外部强加的一个牺牲一样地异化。主体遇到客体；作为劳动产品的确定客体向确定的主体迎去。集体的（社会的）客体产生单个的主体（事物、利益）。主体通过它来消灭客体的它们的相遇行动，就叫做“消费”。消费完全地满足主体，亦即满足它的需要。

黑格尔始终都对确定的(正常的)性需要在婚配中得到全面的满足提出怀疑,尽管结婚既不降至性需要的满足、服务契约、共同掌握财产,也不降至它的伦理的一面。婚配以它的方式组成了一个局部体系——家庭。人们尤其是通过婚姻,一般是通过契约,投身到相互性之中,尽管人各有特点,各不相同,但变成等量的了。交换中的外界事物亦然。对于单个人来说,契约等于是对于事物来说的交换和交换价值(见《法哲学》第77节)。人们将会在马克思思想和《资本论》理论中,重新见到这些概念,只是提法不同,有所改变而已。有时候,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这两种学说极其相近,以致看不出区别,甚至猜想会不会混同。黑格尔宣称:“我可以把由于我的能力的缘故而孤立的产品让给他人。通过我的全部劳动时间和我的生产之全体的异化,我将使他人成为物质的,成为我全部活动和现实的主人……”(见《法哲学》第68节)。这正是处于岔道上的异化理论;黑格尔同马克思一样,利用了这个词儿的双重意义:经济和司法(出售时间)——伦理和政治(失去自我)。劳动的异化在黑格尔那儿悄悄地出现,也就是那种同时通过劳动者的时间和劳动产品的异化而超过契约相互性的使异化——被异化劳动。黑格尔不把劳动契约的合法性看作是(工业的和民主的——资本主义的和资产阶级的)社会。

但凡牵涉到默契的或成文的劳动契约,黑格尔也许可能宣称,从道德上和司法上都是不可取的,因为规定一种假的相互性,就规定了一种虚假的相等。马克思后来用了几十年的时间,作了理论思考,才弄明白,这个已经实施的“契约”,确定了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和对剩余价值的提取。马克思早就肯定说,被黑格尔移归于政治精英的“全称阶级”的作用,应该归还工人阶级。

d)黑格尔“学说”的另一个方面值得思考一下:中间阶级的理论。我们重新看一看已经引述过的一段文章。“政府成员和国

官员构成了中间阶级的主要部分，有教养的智力和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存在其中”（见第 297 节）。中间阶级包括一大部分经纪人，商人、知识分子，他们充当事物的产生和社会—政治关系的产生之间的中介；正是为被统治者管理和号令的理性关系的产生服务的全称阶级即融合于中间阶级。在这个观点中，静止图表的出现将稍微不同于把它释为一种金字塔形或环中之环的看法。它将充满活力。中间阶级是市民社会的组成部分。它不和社会统一，但构成其主要部分、其中心。是它组织成为职业和行会团体（见第 250 节），对每个成员来说，是除了自己的家庭而外的另一个家庭。中间阶级充当“社会等级”的底层和上层之间的过渡；反之，来自上层的维系或改变不发达体系的号令，也是通过中间阶级下达的。它从一个方面触及了集中于国家首脑的普遍性和理性。政治精英从中间阶级产生。另一方面，它触及了劳动分工中底层的特殊性、在自然界范围内活动的生产者的分散的活动、事物和工具的接触。中间阶级概括为这几方面：中介、经纪人、中间。阶级的划分既产生又再次造成活动和劳动、需要、工具及其分散的分离；但它归还了其统一，因为在国家中，各个阶级是互为补充的。在这个水平上，可以看出具体的进程，需要和劳动以及社会小组的扩大和分裂，通过这一进程，共同前进。是辩证的吗？是的，不过，要从属于逻辑。互补性在全部的、国家的和政治的理性中，超越潜在的冲突之上。由理性这样确定的自由，战胜了特殊的确定和片面的确定。社会—政治整体部署在与分裂的后果战斗。

我们已经看到，黑格尔的观念多么“现代化”。国家有中间阶级作为社会和政治支柱，尽管其功能和属性大大超出这个阶级的意识形态和需要。它给它以相同的服务；随着国家的巩固，中间阶级也得以加强和变化，以致夸大地称之为“诸中间阶级”为宜。因此，人们预感到在 20 世纪前半叶，在法国和别处被认为是抽象的和

思辨的黑格尔的论断的现实性和创造性。然而，最思辨和最抽象的方面，在掩饰它们的同时，常常是包含着最具体的方面。必须在这儿引述的一段文章说：“通过它所固有的辩证，市民社会被推向自身之外”（见第 246 节）。如何推向？在产生政治社会和外部政治的同时。

另一方面：官僚学说，是它构成了中间阶级的核心和重点，体现了直接的理性，“支撑”着——用支柱一词的本义——国家和体系之体系。

必须回头看一看黑格尔的国家、战争和死亡。生，即殊死斗争。没有民族军队，没有动员民众的能力，就没有国家—民族。国家—民族中的军队有双重作用：外部的（主要的）和内部的（偶然的）。国家以战争为考验和尺度，以战争为天职。直接于社会人的历史如同直接于单个人的历史的冲突的（辩证的）因素因而变成它最高的要求。没有不冒对抗之险、不考虑对抗、不愿通过对抗、战斗和胜利得到承认的国家。国家了解并预见到可能将它引向消亡的是什么。从它身上，并通过它对冲突方面有所了解，才能把握和解决冲突。克劳塞维茨在黑格尔撰写《法哲学》（1815 年到 1830 年之间，因为他与黑格尔卒于同一年）的时候，解释了这一教导。

黑格尔的国家源自革命和拿破仑大战——如克劳斯威茨所说的科学源自战争——，不能摆脱暴力。市民社会不断地被推向自身之外，超越自身。国家的精髓既是理性又是暴力。黑格尔国家的完全理性并不必然使之用暴力去反对它所团结和褒奖的民族。它使暴力对准外部。它的理性面是内部的，暴力面是外部的。它应该斗争、冒险、拼死去达到双重胜利：反对敌人、反对消亡。它应该根据它的规定性和决定论去对抗其它国家，并试图统治、甚至扼杀后者（在得胜的情况下，它可通过政治灵活性避免这样做）。在

国家通过高层避免再现的其它辩证进程中，主人和奴仆之间有着众所周知的关系；但国家再次通过它的首脑认识了这个关系，并可以试图避免使奴隶变为主人的倒转。随着战争的发生，国家一民族通过历史性的考验，以通过包括概念的人，简言之，通过在空间建立绝对的精神而包罗客观的主体自居。但这是有危险的。黑格尔的国家本身带有达到极点的冲突规律，所以自身也带有一种毁灭和自毁的规律。这就确定了它的独特的历史性特征。何谓黑格尔国家？也就是地神，但是一个诞生于历史、更接近圣子（被体现了的逻各斯：耶稣）和圣灵而非圣父的一个神明。

战争理论（在柯杰夫所著论黑格尔的书中揭示的）反映了黑格尔的冷酷、坦率、甚至反映了马基雅维里的犬儒主义。但凡有关感情、美好灵魂和爱情的东西全都消失了。他多次阐明了这一点（例如，关于婚姻，见《法哲学》第168页）。政治单个人是从内部被逻各斯转化并被国家全体性的恩赐触及的政治动物。“如果把职责强加给富裕阶级——或者，如果在一个公有制中，有办法把走向贫困的群众维持在一个体面的生活水平高度——贫困的人的物质就将有所保障，而不用通过劳动被中介。这将与市民社会的原则背道而驰”（见第245节）。换言之，劳动和劳动者创建了一般财富；劳动因是市民社会的原则，并因而成为政治社会的基础，所以政治阶级保证使人民处于劳动之中。这与黑格尔关于机器代替劳动的言论南辕北辙。当然，这些矛盾只是一个半世纪之后才出现！劳动的道德主义和伦理，宣布并贡献了国家使劳动中有工作的一个阶段的结果。劳动有一种道德的实体。该实体“包含连接于它的概念的自身反射的意识，造成了一个家庭和一国人民的真正精神”（见第156节）。

黑格尔国家辩证的悖理之处，为逻辑学家所不能理解，这是因为这种悖理之处在社会中比比皆是，无处不在，可它又统治着这个

社会，高踞于社会之上。没有这种悖理，(历史的、社会的、思想的)阶段就将分离；成员就将拆散。它凝聚着社会。它聚集着散乱的、但却局限于每个成员、每个阶段、每个部分体系的理性。然而，它却游离在社会之外，高踞其上。它在把握社会的同时，褒奖社会；它把理性集于一个中心。它是在它的宇宙剧中，地地道道地成了地神；圣父(概念)、圣子(意识、语言、认识和再认识、痛苦的考验、苦刑)和圣灵(国家元首)的统一。

正像许多别的政治作家所认为的，一只“无形的手”、一个上苍、一个先定和谐、一个臻于成熟的理性，使得始和末一目的因一国家，诞生和长大。

光嘲讽这一理论够吗？不够。那么多人还在以这个模式考虑国家，而没有发现缺少神明和上苍，因为上帝死了，而且尼采的这个公式是专门对准黑格尔的观点的。黑格尔在提出它来的时候，没有让它“头朝下”吗？因为他是根据传统哲学，来解释这个真正的事实——一种神学的微妙的事实——和现代国家无处不在、它与道德和法的直接性，以及与此同时，它的高踞社会之上、它的统治、它的垄断的呀？必须说明如何和为什么、通过谁并为了谁才有这个垄断的。

下面是为了总结这一章，以论断的形式提出的几个确认，这些论断已经同它们的论证一起产生，但才刚刚开始证实：

a) 黑格尔的国家，从现在起，不是作为思想和哲学史中的一个重要日期，而是作为自那时起，巩固并普遍化了的现代国家的原型和范型出现的。

b) 黑格尔抓住了这个国家的多职能性、多功能性和超功能性；他的国家在号令、管理、战斗。它有两面：理性和暴力。可不可以说是双重逻辑：组织逻辑和权力逻辑呢？后面这个问题还将提出。从现在起，就可以回答：“不，只有一个带有两面，带有两个侧面，或

两个分支——一面是极限为增长的管理，一面是极限为战争的暴力——的逻辑：国家逻辑。”黑格尔确实是自它诞生时起，在它的故乡和它的原始阶段，在它的摇篮里，便抓住了现代国家的进程，对这个国家的管理将导致战争，因为战争本身应该从战略上加以管理(引导)。

c) 因此，黑格尔并未创建一个模式，也没开始一种分析，也没提出一种意识形态，也没逼近，也没拟定一些行动的、但却是临时的概念。他做得更好：从国家一露头便抓住了它，如同马克思把握住资本主义和工人阶级一样。因此黑格尔的理论没有“历史性”的好处。它从概念上再现了一个生产的、“不自觉的”，或者不如说是被曲解的进程，亦即 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随着法国(资产阶级的、民主的)革命、拿破仑战争及其后果而来的欧洲政治的转变的进程。今天，由于国家普遍化而招致的回顾，导致对一个所谓“历史性的”，也就是说，对“现代世界”作出强有力的贡献的阶段作这种新的阐述。

d) 这就是黑格尔提出的国家概念的概括。依照这个概念，有效性与黑格尔的陈述相符，真理与现实，也就是说，同生产(历史性起源)相符。我们要坚决重复一遍，它对[·]社会和经济，没有任何[·]外在的要求。它在[·]一个数量和质量上都很强的[·]中间阶级里，有它的[·]社会基础；在[·]中间阶级里，公民与他的位置、作用以及在[·]市民社会里的地位相符，与他在[·]国家中的作用，与他的[·]动产和不动产相符。这一系列的相同性和统一性表明了[·]中间阶级作为[·]国家支柱的特征。国家在内政方面，只可能有一种战略：扩展[·]中间阶级，并通过使之与[·]经过考试遴选、确有行政才能的[·]国家官僚紧密相连得以加强。经过挑选，把[·]中间阶级的最有资格、最有能力、最为忠诚、最有学问的分子[·]提拔到[·]政治阶级。后者与其它[·]阶级相重迭；它通过[·]选举的道路脱颖而出，以致分散和融汇于[·]社会整体之中的[·]理性也未

集于其中。这个政治阶级及其在自身之中招募的当权者们，面对着一个永久的问题——外部的问题。如果说黑格尔认为国家确实是因为会号令“一切”（根据道德的和行政的命令，而不是根据自然的命令）而管理（利益）和裁决（冲突）的话，它也同样肯定是在与其它国家战斗。它遇到的是一种永久的、始终更新的、始终是血腥的和未竟的超越。并非出自它的那个国家，而是出自于它的那个市民社会想得以扩展。在现代世界中，战争始终是民族性的，不仅是因为它动员了全民族，而且因为每个民族走出了它的理性范围。

把黑格尔的国家假设为现代国家的原型或模具，这说明什么呢？说明：

a) 一般来说，国家只是一种抽象。如果任何国家确实是一种具体的抽象作用，确实是应该自问一下，抽象作用如何进行，也就是说，如何具体化的话，首先就必须避免在排开具体的同时，使之降至一种纯抽象作用。为了巩固这一分析活动，一个历史性的参照是不可缺的：黑格尔的国家是1789年——1815年当时的产物。

b) 今天的一些国家千差万别，有着深刻的、也就是与历史原型无法克服的差别。尽管它们进入了国家的世界体系，这些差别仍然存在。制造一个抽象模式的计划，事先就把差异缩小了。找出共同点，譬如“国家—民族”的联系，或“国家—增长”的联系，并不意味着，人们去把现存国家缩小的唯一的一种类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断的错误之一就是，在存在着许许多多多种形式的联系的时候，它构思了资本主义和国家之间的唯一的一种联系。在这一点上，这个论点和他的批评者中的某些人是一致的（如N·普兰查希著《社会各阶级和当今的资本主义》—1974年，法国入门出版社出版——的第169页。他以法兰西国家为理想原型，来论述一般

的国家)。在批判性的分析中,是如何混淆日本的国家 and 美国的国家的?即使从新闻的角度,人们也知道,在美国,联邦国家及其机构,灵活地,但并非不无困难地,管理着巨大的工业—军事联合体。而在日本,国家调节着巨大的进出口,因为该国在国外几乎要购买全部的原料和出口大部分的产品。因此,在经济、社会、政治方面,便存在着一些特殊的连接形式。(因为一些实际原因——这一卷的篇幅——对伊斯顿及其学派的现代的系统分析的驳斥部分,将放在著作的论争部分,作为第四卷的附件,而它本该紧接在黑格尔主义之后的。)

除了黑格尔的特征以外的其它一些特征,使我们得以确定民族特征。

重要的不同:在黑格尔的观念及其国家中,不存在政党的问题(除非是贬义的地下或半地下的阴谋小组)。然而,黑格尔通过英国,通过英国人,可能了解传统政党的存在及其活动。难道不该得出结论,黑格尔国家趋向的全面自立主义和最终状态使得政党成为无用吗?或者说,现代意义上的党是从马克思主义派生而来的?可预见的回答是:现代意义上的党是在国家—民族范围内,源自一个整体战略的需要。这种战略既为内部增长所必需,又被外部竞争、也就是被一般由帝国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这两个词儿指定的斗争所要求。

六、从黑格尔主义 到马克思主义

我们将重新论述这段著名的篇章。首先复述一下有两种论述方法的那个论断。这是两个并不互相排斥，但必须先区别开来的方法。

a) 历史一起源的方法是最普遍的。关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许多论著和教材都自然而然地使用这个方法。这种方法被严谨地运用，有时产生一些可以接受的结果。该方法在于以时间顺序处理马克思的著作，从青年时间的著作直到成熟之后的著作（《资本论》和其它几部著作）。因此，人们是从马克思摆脱黑格尔主义及黑格尔主义者的历史时刻开始展示其学说的形成的。人们假设进程顺序与理论（概念）诞生相一致。这种方法并不是没有模糊之处。在他们的阐述过程中，一些人过高地估价了作为哲学著作的青年时代的著作；另一些人在褒奖成熟时期的更具科学性的著作的同时，贬低了青年时代的著作。而所提的这个方法，既不取消有关黑格尔和马克思之间的联系和决裂的分歧，也不回避有关二人决裂的日期

及有关思想阶段性的矛盾。当人们在尽力使著作恢复一个双重运动——内部的，思想运动；外部的，时代运动——的时候，这种方式在不断改进。这种方法的使用标准是拘泥于字面的解释。必须多加强调不是没有新的危险的地方：重新考虑著名的和众所周知的公式，或者与之相反，在那些悖理话语的被遗忘了的角落去寻找。从人们开始发现：马克思的著作和思想存在矛盾；这些矛盾是原动性的；马克思的思想既逃不脱矛盾也逃不脱辩证法（他自己的辩证法）时起，这个方法就显示出其长处来。反正，做这样一种研究的作者认为，马克思方面，什么也没发生过，而且他可以通过一定的努力，跳到过去的年代（19世纪中叶），去追踪一个发展——先萌芽后发育的一种思想的发展。

b)然而，马克思本人，在本书中已经提及的一个方法论的篇章中，对这个方法有所保留。他说，人们能够通过从往昔重新找到现在，以目前的形象回想往昔的方法，笨拙地行事，可偏偏总是从现在、从眼下出发。于是，人们便满足于通过类似或相象，或者甚至通过重言式的简单重复和统一，把现在投射于往昔。可马克思建议，把历史性的往昔作为它包含有未来的萌芽但尚未发展来加以分析。这样，在那个著名的篇章中，对现代世界里的地租和农业收益的分析，使人们通过抓住基本的差异，可以一直追溯到封建的生产方式；应该增长和随后发展至资本主义的金钱收入，很晚才出现，并且长期从属于劳动收入以及产品（“实物”）收入。金钱收入只是随着市场、商品和货币经济等，一起发展其蕴涵和推论。然而，这个例子表明了这种方法的危险——已经指明了的那些危险。难道人们不是在冒着欧洲中心论、逻辑中心论的危险吗？有些是不能确定的，例如，对西方中世纪社会里的地租的分析，同对伊斯兰封建社会的分析是否一致的问题，或者同亚洲（存在着地租和水租）的生产方式的分析是否一致的问题。

最好的办法难道不是把两种方法——起源历史和分析倒退——协调成一种对全部事实的灵活的和全面的科学，也就是协调成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吗？与这个方法相比，所谓“症状的”方法严格地给幻想和主观说明以一席之地。今天，对马克思“超越”了传统的，也就是思辨的、系统的、沉思的哲学这一点充耳不闻，是困难的。这一点他已经写出了，并表明了是怎样写的：通过实践和行动，通过科学和政治。此外，他还声称“超越”了前人，特别是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政治思想家等的科学。这么说来，“超越”一词确切的含义是什么？争论常常是围绕这个词的语义学展开的。它的含义在两极摇摆：靠近一极，人们就保持最大可能的往昔、哲学和科学。在另一极，人们就最大可能地摆脱累赘的历史包袱；于是，“达到另一个水平”便接近尼采为了坚决摆脱黑格尔主义而使用的“超越”。超越即意味着：摧毁、投入虚无、抛向深处。这就是说，还有解释和困难。例如，如果人们把哲学抛向“深处”，那西方哲学两千年来制造的概念——真理还剩几何呢？作为概念本身又能剩些什么呢？假设辩证法在经受考验，并能不用求助逻辑而形成的话，那逻辑还能剩下什么呢？科学认识随着哲学发展。相反，如果人们完全地维系哲学，则会重新落入哲学家们专门的盖然判断，不能自拔。人们会像他们一样地专心使用他们的概念（系统、全体性、形式等）。人们停留在传统的思辨范畴之中。人们的思想在活动，仿佛卡尔·马克思和弗雷德里克·尼采都没存在过。人们稍迟地回到马克思 20 岁时的理论环境之中。很明显，只有一种关注备至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才可能把现在投身于往昔，以弄清往昔是如何把现今当成一种可能，蕴含于萌芽之中。如果这个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了，那两种方法便协调一致了。

顺便提一句，在这里，我们是从以哲学的超越为其出发点和问题的抽象哲学的立场出发的。作为第一种相似，我们假设它把传

统哲学同社会和政治实践,同日常生活,同现代世界中出现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相对峙。这样概述的这个看法有着许许多多的蕴涵和应用,在这里无法一一列举,只能介绍牵涉到国家的地方。这个看法视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关系如水火不相容。为什么呢?问题并不是要宣布黑格尔是各个时代的最伟大的哲学家,或者宣布他完成了古典哲学,并对之下了定论,或者说他造就了,也限制了确实是个精确的论断的欧洲逻各斯。主要的是,黑格尔认为实现了哲学。怎样和在什么地方实现的呢?既在他完美(完全系统的,并包括往昔和现今、历史和现实等一切)的系统中,又在他的国家(完全与哲学真理相联系;与真理的、知的、概念的完美现实化)之中。然而,马克思在被黑格尔主义诱惑的一段很短的阶段之后,便猛烈抨击这个基本论断。他想,哲学并未实现。它进入了一个深刻的危机之中,因为它分裂成实证主义和唯意志论。从前的哲学家们,各以自己的方式,不仅希望思辨的真理,而且想要自由、美好、幸福、欢乐、对自然界的驾驭等等。在其历史中被当作全体性看待的哲学,被分析看;它包括:

- a) 哲学幻想,也就是“纯洁的”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包的思想;
- b) 主体和客体、体系和全体性、真象和表象、真理和谎言、感知和概念、异化和非异化等等,不可或缺的、不可替代的概念的产生;
- c) 另一个因为更加真实而更加美好的世界的计划——哲学家们心中的乌托邦计划。

谁能继续这个事业,实现这另一个世界,亦即哲学计划呢?进行到底的革命——由既带历史性又具普遍性的阶级——工人阶级参加并领导的革命。这样,在马克思看来,“超越”的假设便精确、具体了。黑格尔主义里的哲学和国家的汇合便足以证明这两者间有一种历史的联系。然而,这种联系并不是简单的。哲学史可以以这个关系为导线,证明它是复杂的;忽而联合,忽而冲突。本义

的哲学是在希腊随着城邦国家一起诞生的。但是不久，雅典便把苏格拉底处死了。

今天，谁也不会不知道，在马克思之后不久，弗雷德里克·尼采——有很大的不同，但仍与马克思同样伟大、更像诗人而非政治思想家——也考虑过哲学的超越。尼采认为，超越战胜“达到另一个水平”。他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一般概念和特殊概念投射到深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思考一番这个沉没，因为它属于现今世界的理论形势的范围。例如，意识形态概念的轻率使用或希望成为彻底的哲学批评，连累了人们宣称在使用的概念。难道不该停止边胡乱地摆弄一些体现边思考吗？各人都自以为是独一无二的，仿佛理论中也没有一个世界形势似的。马克思同黑格尔一道，完成了对知的批评。在19世纪中叶，知被当作成果，而非根据来自列宁的图表那样，对这个知的一个（黑格尔式的）综合。但是，他保留了有时被他用希腊语：断言来重新命名的知的工具——概念。因此，在否认已经包含并构思真实概念的哲学的真理的同时，他能够前后连贯地保留真理。

在把现今投射到往昔的同时，是多么容易“真诚地”受骗啊！在前面的章节中，而且在本章中，有一个投射的典型情况：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是马克思的思想？可是，很清楚，在马克思的时代，并没有马克思主义，也没有马克思主义者。人们甚至把事情推到不近情理的地步；马克思未曾读过马克思的书。的确，他的思想是在一个运动中形成——产生的。如何确定这个运动，而不把它概括为本质上是粗俗和教条的一个名为马克思主义的“摘要”呢？这就是问题之所在。

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一词从词汇中划去，尽管今天它的使用范围那么广，以致这样做已不起什么作用。现代世界有了很大的变化。马克思给了它一个习语、一个理论性的反思——在加入真

正的和实际的进程的同时，从果变成因和理性的习语与反思。这个今天没人能清楚地知道将往何方的伟大运动，通过许许多多的冲突和多种形式的矛盾产生。马克思著作本身，如同恩格斯的著作，是通过这些常常被自身激发的和有时停止的冲突和矛盾发展的。（为什么要排除这种假设呢？有矛盾，也就是说，有一些问题产生，而另一些问题被掩盖和消失；不是所有问题都是等量地和同时地可以解决的，等等。）

我们再深入一点，以便驱散包含在“马克思主义”一词中的教条的幻想。首先，如果人们让“马克思主义”回到全体的和世界的运动中去，就没有任何理由把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对手们从这一运动中排除出去。对这个奇妙的运动，巴枯宁和拉萨尔各给了一个“习语”，他们自己就“曾是”一些习语，还有后来的卢森堡、考茨基、伯恩斯坦和列宁，或者还有托洛茨基和斯大林。教条主义通过一些武断的选择和一些既是分类的又是本体论的宣布而显示了它的荒谬：某某人，如罗莎·卢森堡，是马克思主义者；某某人，如考茨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完没了的争论——似乎是永不枯竭的——堕落为空洞无用的派别之争。“马克思主义”在损坏，可是使之毁损的肇事者们仍旧在理论废墟中铤而走险。矛盾和冲突在论战中找到它们的表达方法，这是不可避免的和不可或缺的；但是，为什么要抓住这些论战的字句的和语言的一面，而不去揭示它们所赖之造成理论习语、现实和可能性的东西呢？

从这儿得出某些结论：

a) 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后来的列宁，甚至在他们以教条的论战和学说口吻说话的时候，都从来没有确定一些固定的立场。他们在力图解决他们那个时代的矛盾。为了在这儿重新使用其重要性已经强调过了的哲学区分，可以说，假言判断和盖然判断一贯胜过断言。必须抽出的是，现代世界的那些理论家中的某一位——譬

如马克思、拉萨尔、巴枯宁——所赖以行动的主题。他们就这样处于和回到世界运动中来。主题的和问题的哲学概念，明显应该在使之扩大到哲学家们只是远远地、怀疑地对待的社会和政治实践中去的同时，重新考虑。

b) 在人们因其在世界范围内扩散而保留“马克思主义”一词的情况下，难道不应该宣布马克思主义之众多吗？这在比“多中心主义”走得更远的同时，扬弃了教条的和官僚的集权主义者。难道今天没有一个俄国的“马克思主义”、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一个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一个法国的“马克思主义”等等吗？世界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矛盾地发展着，而它的每一个“分支”又有自身的矛盾。因此，就在法国，今天在新教条主义和反教条主义之间，在马克思的结构—功能主义和彻底批判之间，也存在着一些矛盾。这种论战，读者下面还将在有关政治异化和也属政治的那个断裂的问题（黑格尔和马克思关于国家的论战）上遇到。

c) 如何确定被马克思本人和他的伙伴恩格斯抛在一边或排开的盖然判断呢？这些问题明显地与矛盾相关联。这些矛盾或因在初生阶段而不为人发现，或暂时地，或永久地无法解决。为了从现在起就宣布其色彩——尽管未免早了一点儿——我们就按它今天的样子宣布马克思的思想的盖然判断吧。第一，从一定数量的文章可以看出，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增长（用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话来说，只称“增长”），似乎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范畴内是不可能的。这一问题与（扩大的）积累问题相连。后者已为罗莎·卢森堡提出来了。但方法也许不完全，而且没有恰当的答案，因为只有20世纪的经验才能回答这个问题。因此，增长问题和积累问题（它的可能性条件或者它的规模、它的可能性和局限性）回顾时，相互联系。所以，应给没有导致“卢森堡主义”的罗莎·卢森堡请功。人们在这里难道将不会发现，或者不如说再发现增

长和国家之间的一种联系吗？

第二，连带而来的是农民和城市问题。农民问题、农民暴动、农业改革是怎样和为什么在20世纪，特别是在东方，有一个巨大的重要性？而在西方，因为法国革命大部分是一场农民革命，并进行了一场广大的农业改革，人们认为这些问题已失去了发展呢？这些问题，在马克思的著作里曾经占据了什么位置？农民和工人、他们的革命能力，他们在20世纪的过程中改变世界的抉择的确切关系曾经是什么？乡村转向城市的问题是什么时期。怎样和为什么有的？城市问题、城市改革，与工人运动相比，能不能或作为支柱，或作为中继，替代农民问题和农业改革？换言之，在马克思的时代，空间所提的问题是什么（尤其是当他考虑分析东方和亚洲的生产方式，或当他在土地—资本—劳动三部曲中，重新考虑田赋和地租的时候）？今天，由国家统治的空间又提出了什么问题？

第三，国家问题。读者将在后面看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没有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有的是好几种稍有不同的理论草图。为什么？也许是因为现代国家随着波拿巴主义，随着俾斯麦，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形成的缘故。

必须更深刻地了解马克思在国家问题上的犹豫和动摇，而又不要忘记他的思想的基本方向。人们已经能够指出：他不是处在一个矛盾面前，而是被普遍的政治运动，尤其是工人运动所左右；法国的运动随着巴黎公社而倾向摧毁国家；从拉萨尔直到哥达纲领，德国的运动倾向加强国家。

第四是很现实的过渡阶段问题。在资本主义和工人阶级的行动创建的新社会之间，马克思预见有一个过渡。他就这个问题提出了不少的措施和计划。一个世纪之后，对他的这些建议必须保留些什么呢？难道不应该重新看待过渡的观念？人们可能心想，在某一点上，在生产力在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内增长的情况之下，这

种过渡是否没有完成。与此相反,某些人说,全世界已经远离马克思和工人阶级确定的目标,前途暗淡。过渡的问题是否将与国家问题有联系?马克思是这么想的,我们马上就会看到。

第五,各中间阶级问题。我们看到,黑格尔把它们设想为国家在社会上、政治上的基础和支柱。相反,马克思预见,它们或是肉体上的消灭,或是政治上的取消,以利“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战略极性。今天,在或是“资本主义”或是“社会主义”工业大国里,这些预见还剩下点什么?在这里,所提问题与国家问题的关系如果不是明显的话,起码也是清楚的。一个教条的和陈旧的概念——“小资产阶级”的概念——掩盖了一个主要问题:没有无中间阶级的国家,反之亦然。

在更加正式的理论方面,马克思留下了未及深入的辩证概念。更确切地说,从他的著作中可见,逻辑和辩证同样是必要的,同样是有根有据的,同样是起作用的。然而,人们发现,逻辑学家和辩证学家的脾气格格不入。他们互相要对方的好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安排他们结合,但没能成功,就是要分道扬镳。人们今天已不知道逻辑和辩证之间的联系在什么地方,连是不是有联系,能否说得上话,都搞不清楚。这个形式问题不能离开另一个疑问——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为什么要掩盖一个严重的事实:自列宁和斯大林以来,自俄国(当时工业不发达的国家)1917年十月革命以来,理论和实践就相互分离了。人们欢呼它们在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在制度的马克思主义中,得到结合,这难道不是现阶段的最大的欺骗之一吗?

意识形态概念足以填补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这个空隙——或者不如说深渊吗?它能够解释形势吗?马克思主义一反自己的运动和方向,成了意识形态,甚至成了国家的意识形态,这是一个历史事实。这难道不是历史的最后的一个、最高的一个含义吗?可是这样

的话，除了摧毁它，直到摧毁真理，从而自身随之毁灭的意识形态概念而外，马克思主义还剩下点什么呢？真理的意识形态否认意识形态的真理。难道不应该从这时起就另觅他物吗？眼下，我们就先问到这儿。

异化和政治断裂：为什么在这儿又把这个异化的老争端提了出来？因为事情没有解决，尤其是牵涉到蕴涵的问题。

一种强烈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教条的或新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倾向，20 来年前即以清晰感到，“异化”挡了它的道；这种倾向，在这个词儿里包含的批评的打击之下瓦解了。因此，必须搬开障碍。人们曾想向异化要它的“身份证”和“户籍”。当概念或隐喻的异化在继续它在现代世界中的闪亮轨迹，同时激起对各种不同条件（被殖民者、被压迫者、女人、儿童、黑人、青少年，且莫说劳动者）的认识和意识的时候，人们向它要求哲学—科学“护照”、理论地位的证明。真是凶恶、粗野的学究！人们不去承认这个辞格的实际情况、它所起的催化剂作用，而将它置于认识论的普洛克路斯忒斯^①的床上，割去它的翅膀和双脚。当然，异化这一辞格所妨碍的所有人，都全部地跟着教条主义的这个秘密团伙走，还大言不惭地自以为是革新派呢。人们一直在向构思王国走，因其不同而避开实际经验。

这个经院式的学派，把知当成被征服的国土，自称在知中落户，并得到加强的同时，继续对“马克思主义”的蹂躏。

这种教条主义的方法的政治意义和目的何在？片面的观察家立刻看出来：通过政治政体和国家本身，直至取消一种政治异化、一种社会力量的否定的形象。这样，在旧教条主义（斯大林的

^① 希腊神话中的强盗，将劫来的行人置于床上，较床长者断其足，较床短者强行拉长。这儿的意思是：强求一致的规定、削足适履的规定。——译者注

教条主义)显现出其警察性而非哲学性的同时而破产了的时候,道路为一种带有科学外观的新教条主义敞开了。

为了很好地弄清争论,并使其不致过时,我们从其开始来重新研究一下马克思的思想。与之略有相似之后,马克思从黑格尔主义最强的方面——国家理论方面——向它发起了进攻。他从黑格尔那儿,像激烈斗争的一件很好的战利品,像从敌人手中缴获的武器一样,保留了辩证的方法和异化的理论。关于插曲和趣闻,我们不去管它,因为它们除了对于那些想重新过一下细枝末节和一步一步地研究卡尔·马克思的道路的人而外,没有什么重要的。卡尔·马克思终于很快便研究起工人阶级的状况来。他赋予工人阶级一个决定性的历史使命:继续并完成历史;实现哲学计划;完成一个改变世界和(社会)生活的全面革命。然而,马克思发现,劳动者,从单个人或小组来看,经·受·着·剥·削,却·一·无·所·知。他们通过一些道德的或生物学的隐喻,经·受·着·剥·削;小·人·物·和·大·人·物、强·者·和·弱·者、不·仁·的·富·人·和·善·良·的·穷·人。他们隐约发现屈辱和压迫,但没发现剥削的机制。他们在原因上、机制上让人蒙·骗。为了战胜他们的状况的客观原因,他们缺少一种观念。这种观念,马克思将花很长时间去构思;那是一系列的理论概念,从商品(交换价值),经过剩余价值,到资本的有机组成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转的理论。剩余价值使实际经验成为清晰的语言和概念,成为认识。实际经验没有概念,停留在模糊的觉悟水平,如果愿意的话,就叫“下意识”的水平,也就是屈辱和重压的水平。构思是否从外部到达实际经验?不是,因为它使它明晰,它解释它,展开它。构思是从内部来的吗?不是,因为必需哲学的和科学的、系统方法和很好进行思考的支柱。在实际经验和构思之间,有对资本的准·备·活·动,那是一个精细和复杂的辩证运动。

异化本身是复杂的,而且以细微的方式进入这一运动。实际

经验是异化的，因为它缺少将允许模糊和派生的意识到自由认识的过渡的东西。它是闭锁的，而通向可能性的道路上横梗着障碍。可能性可变为不可能性。至于生产劳动，远不能展开它所允许的——智力强于自然和自然条件、繁荣和快乐——，是能异化和被异化的；劳动者被捆在劳动分工之中，甚至连他是其中组成部分的进程都不明白；如果他不积极抗争，便会落入被出卖的产品的地位（如果不是他自身，起码也是他的劳动时间）。创造能力转而反对积极性，并使它降至屈从地位。

至于构思，一旦它自认为足够而且必要时（一旦它以传统哲学的方式偶像化时），便进行自己的异化。的确，它只有会同实际经验，在行动中，将后者引到全面革命的道路上时，才有价值。然而，构思和实际经验的连接，一点也不容易。这条道路陷阱遍布，险像环生，一个战场接一个战场。

列宁后来将这一特殊角色——使科学闯进自发运动和工人阶级，换言之，通过机构将构思和实际经验结合起来——给了一个政党。将必须回到这个在某些条件和历史形势下可以接受、在另外的条件下不能接受的解决方法上来。这个分析将属于力求区别假言判断的、盖然判断的、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进行全面批评的一部分。

困难非常之大，以致在马克思死后，人们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回顾了劳动和劳动者的最令人不安的偶像化——使自称是这个舞弊（也可称之为“蒙骗”）的作者们都争要的思想意识形态化的偶像化。

马克思明确地区分了如是劳动和劳动标准。如是劳动是作为创造使用价值的生产支出和身体肌肉及脑子的运用。劳动标准是通过劳动时间——劳动定额——的，是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里的，它已成为交换价值和交换的产生者。

根据重新论述马克思的一篇著名文章的P·兰茨(在他1975年写的论文《价值和财富》中)发展的一个评注,衡量其交换价值的劳动定额,不再是劳动,如同利用工具的时间测算和传统单位的衡量不再是时间一样。然而,大部分“马克思主义者”无视那篇认为“来自劳动的生产是使用价值的生产;使用价值通过劳动时间被商品生产归并为一个等值”的文章^①,把这两个方面混淆了。等值一词在这儿因马上就要出现的理由而被强调了。劳动者附着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一个“生产体”、生产机器或“劳动集体”。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和产品是由数量标准,由向劳动时间的转换,由进入一个等价体系来确定的。大部分马克思主义者的混淆排除了劳动的异化和能异化——被异化的劳动概念,而无条件地崇尚劳动,不去区分劳动和它的标准、它的双重量化。人们把一般劳动——形而上学的实体——和从生产关系考虑的劳动混为一谈。人们把前者的有益的属性——活体的使用和使用价值的创造——转移给后者了。人们忽视了主要的和中心的事实:产生交换价值的劳动,只不过是劳动力拿到商品和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现象和被奴役的形式。这只是创造能力、生产能力的一个量的体现。“意识形态”一词不足以反映用数量和等值去替代质量的一系列确切活动的特点。马克思明确指出,今天,从经验上可确定的劳动,只是劳动力的显露。他认为,“显露”就是异化。体现从理论上排除了劳动的质的一面;它实际上将它缩小了。然而,有标准和体现,才有工资,也才有剩余价值。革命和工资制一起,使劳动体现消失。

大部分马克思主义者也曲解了政治经济——想具有科学性,并且简单地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合理化的政治经济——和马克思对政治经济的批评。后者正是从区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出发

^① 见《资本论》,第1卷,第86页。

的，并表明了一个向另一个的转化(包括劳动在内)。

这些考虑旨在提高异化的价值。在马克思的思想里，异化并不在科学性面前消失。恰恰相反。对知的量化、标准的确定，是一些体现，蕴涵着异化。概念乎？隐喻乎？抑或意识的辞格？我们将采用最后的这个假设，它可接受来确定从哲学(现象学)到能释义它和超越它的过渡，从思辨到行动的过渡。这些考虑使我们集中到唯一的一点：承认哲学的和政治的双重异化。而首先是在黑格尔那儿。

上述考虑还特别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可能产生一个双重的和矛盾的进程。“劳动者”、“工人阶级”、“无产阶级”在慢慢地认识剥削机制，而与此同时，他们可能在对神秘的政治大厦、对巨大的蒙骗不了解的情况下形成。黑格尔给异化定了一个形而上学的看法。思想在世界上，首先是在自然界里异化。历史时间是非异化的时间。通过什么渠道？通过认识。首先是哲学，然后是国家，处于非异化的主要阶段。因此，在黑格尔看来，既无哲学异化，又无政治异化。在他的理论上，有对知的偶像化。在他看来，认识等同于绝对。它不是对将具有知的明显特征的一种绝对的认识或预见。它在它之外，在实际经验中，没有留下任何剩余。在思想和概念这两个命名中，黑格尔把认识实体化(提到绝对)，哲学使之完成，国家体现了它。因此，黑格尔从哲学上揭示了异化，但不是哲学的异化；他进而使之系统化。

然而，马克思发现，构思和实际经验不统一，实际经验不仅只是已知事物的模糊阶段。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首先就身体和感知，发现了这一点。这一发现的起源(不管是否费尔巴哈式的)，除了对专门的博学者们而言，并非头等重要的事。马克思随后在社会实践中——在看到自己的条件，但并未去考虑的工人阶级中——发现了这一点。

今天，我们知道，国家同知的关系渊源之远。它既不是自(致力于它的)黑格尔的理论化开始，也不是从18世纪的雅各宾派和法国哲学开始，也不是从拿破仑的列出式子(编纂法典)开始。人们发现它在法国17世纪时就已经牢固地确立和法定了。理性在其中有着双重面貌：哲学理性，在笛卡尔主义者那儿常常是关键的；国家理性，已经是权威的和系统的了，但按其方式是理性的。这一点，当代的一位哲学家富科先生，主要是在他的那本已提及的书——《古代的疯狂》中，已经指出了，尽管他知道得并不清楚。

在本书的第一卷中，人们同样可以隐约看到现代国家和专门知识核心的组成之间显得确定无疑地已取得的联系，也就是被强化了了的、作为经济的组织者的、利用知识的国家和认识论幻想之间的联系。

关于一般性的异化，我们顺便提一下，一位名叫R.D.莱恩的聪明的精神分析专家，在保留其基本点——对父子关系和父亲偶像化的批判——的同时，批判了弗洛伊德式的教条主义。他列了一个精神活动的单子：^①

- 蒙 骗：对问题的虚假确定；
- 否 认：“我嫉妒”变成“我不嫉妒”；
- 分 裂：一个整体分为两个子集；
- 统 一：两个被分开的整体溶汇在一起；
- 转 移：我生B的气，而不恨A；
- 盲点化：我不看我不愿意看的东西；
- 替 代：我看某物，而不看他物；
- 理性化：我为自己编造一个严密的托词；
- 换 位：“我恨他”变为“他恨我”；

^① 见C.埃尔森译的《家庭政治》，1972年，斯托克出版社出版，第119—120页。

克制：遗忘和忘掉别人已经忘了这件事。

这是对降至人员间一种概念的异化的心理描述，正像精神分析法中始终存在的那样。然而，这种描述在限定经常被以精神分析法的名义抨击的“异化”的同时，使之现实化。缺少政治异化，特别是缺少感觉，尽管其效果中的某一些，名字列在单子上。

马克思就国家，也就哲学和历史，同黑格尔主义决裂（自1842年—1843年起）。历史将通过革命而继续。哲学现在没有实现，它将实现；如果哲学成为世界，世界就变成哲学的，这是哲学家们所没能完成的。最后，国家根本不是永恒的。它不体现思想，它并非既是社会的纽带，又是它的桂冠、它的深沉的结构。马克思随后说道，它只是上层建筑，也就是一个效果和短暂存在。

诚然，马克思与黑格尔主义决裂，并粉碎了它，但保留了它的一些论断。这中间存在着问题，但马克思主义“大师”对此并不感到过分担心。他按照时代和充满活力的人的方法，在他发现有益的地方，义无反顾地获取之。他让（他甚至都没有预见到的）注释者们去对活动的有效性和概念的“理论状况”冥思苦想。总之，他在迈步向前；他在扫清道路，并不管其所有权。

政治异化，对马克思来说，类似于宗教异化（黑格尔几乎完全把宗教异化扔在黑暗之中，视宗教为意识的一个阶段或辞格），完全向着“忘我”，向着牺牲和具有政治权力的宗教尊严的君主的祭献发展。这种源自国家的认可，同君王、元首相通。然而，政治家也把他们从中之所得归还于认可。自《黑格尔国家法批判》起，也就是说，自1842年，《黑格尔立宪权的哲学批判》起，马克思就写道，在真正的民主中，宪法回到它真正的基础中；社会的人回到真正的社会关系之中，真正的人民之中；宪法“像一项使命被提出”。因此，最先进的政治立宪就像人民的创造（生产）一样出现，也像一种创造力的改变一样出现。而在黑格尔看来，人民完全是国家的和

自上下达的政治宪法的使命。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国家,包括政治民主国家,在真正的民主中,可以消失,如果人民找到另一条道路、另一个组织原则的话。

“如果说,在政治解放的国家(注:美国),我们不仅发现宗教的存在,而且它还充满青春活力,那就足以证明,宗教的存在丝毫不与国家的完美相悖……完善的政治国家根据其精神,是人对他的物质生活而育的一般生活……但凡政治国家蓬勃发展的地方,人不仅在他的思想里,而且在现实中,在他的生活中,过着一种双重生活:地上的生活和天上的生活;他在认为自己是社会人的政治团体中的生活和在市民社会里的生活,在这个社会里,他作为个人在行动,在降到工具行列的同时,把他人视为工具,并且变成外界力量的玩偶。政治国家对于市民社会,犹如天上对于人间,是唯灵论的……在人等于是一般生物的国家里,人是一种假想社会的意识成员;他被剥夺了他真正的个人生活,充满了一种不真实的普遍性。政治解放是一大进步。它不是人类解放的最终形式。”

这是对《犹太人问题》(1844年)的这—名篇的几段评注。马克思通过“人”这个词,并不是指一个抽象的实体,而是指分裂成“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点是比较清楚了。抨击“人”和“一般生活”的哲学家们看没看见他们损害了马克思对国家的批判?肯定看到了。他们明白不明白马克思已经在超越抽象实体、神太同形同性论和自由的太道主义?这不能肯定。马克思从黑格尔那儿保留了“市民社会”的概念(人们将会看到,它是怎样和如何在20世纪尤其是又被格拉姆西重新拾起的)。但他又强调了与黑格尔的不同。或者,市民社会是由政治社会所统治和归并,那么,人们看不出自由如同理性和知,怎样在“市民”的水平上实现;或者,如马克思所想,市民社会有它自身的现实,而政治社会是由假想和强迫混合组成。它既不实现哲学,也不实现自由

(完全的解放),也不实现理性的知;它完成了对(社会的)“人”,就他自身和他的可能性而言的表露,也就是说,完成了对解放(自由)的一种高级形式的探究。

国家的宗教本质叠印着市民社会的实际存在,使得国家不是按黑格尔所说的,完成的真理、完成的理性、达到期限的历史的王国。按照青年时代的马克思的看法,它既不是直接于全体社会的结构,也不是它的纽带和桂冠。马克思发现了关于国家的这个对几代“马克思主义者们”来说,貌似清楚的、甚至是实用的,然而却是模糊的概念——这个意识形态概念。我们怎能不看到这一点呢?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代,鉴于各国发展的不平衡,“政治存在”降至国家资本主义,并在国家社会主义里达到顶峰。谁在所谓“社会主义”国家中,认识和认出了“私生活”和“市民社会”?市民社会和公共政治生活,同国家机器和机构的确切关系是什么?除了用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间的冲突的词儿来解释“文化革命”外,还怎么去解释呢?我们在这里要提一句,人们以马克思的名义,想实现政治社会,加强反对市民的社会政治存在。

咱们来继续阅读这篇关键性的(不要称“基本的”,因为它表示的只是各种思想的一个会合)文章。“政治国家的成员们,从二元论看,是信教的……在人与陌生于他真正的个性的政治生活——仿佛它是他的真正生活——方面,他们是信教的……政治民主是基督教的,因为人在其中被视为一个有绝对权力的、最高的生物,但这是有着他那没有教养、不合群的一面的人……基督教的幻想、梦幻、备修期,作为同真正的人不同的陌生生物的人的绝对权力,在民主中,成为一个具体的现实……”

评论:马克思像是在抨击犹太教;他不怎么留有余地,以致招致一些攻击。他的目标难道不是对着基督教,或者说是对着后来

遭到尼采猛烈抨击的犹太—基督教吗？

有了宗教的支持，一种假想、一种抽象，也就是人，虚假地成为具体的了。它在国家内，并通过国家得以实现。它有了一个真正的存在。不是在“市民社会”旁边，不是在“市民社会”之外，而是在其内。因此，“我”（真正的关系网中的社会人）同时是思想上和宗教上的一个具有绝对权力的人——以及一个受剥削、受压迫、受屈辱的人——和一个自由的和君主的国家的一名公民成员。不近情理吗？当然。马克思阐明了这一点。有矛盾吗？有，但被压制住了。是意识形态吗？可以这么说，不过是真正的和实现了的体现，是被体现的抽象，也就是政治现实。至于19世纪，反思发现的人的种类，它是通过了国家的卡夫丁峪谷^①的。它缩小到了国家。

新近的哲学家们怎么就没有看到，这些文章已经蕴涵了对政治民主中的抽象的“人”和自由的人道主义的彻底批判呢？他们在马克思青年时代的作品中看到其中并不存在的一种博爱和一种人神同形同性论。

可这儿还有具有惊人前途的这些文章中的一篇。的确，人们了解这些文章，但很少引述。他们没有落入被“马克思主义”的对手们大加揭露的“圣经”中去。在政治集会上引述这些文章，同在议事司铎会上读《山上宝训》一样的荒唐、离奇、怪诞，除非要在不耐烦之中，引人窃笑。这是《前进》（1844年）中的文章。“国家越是强大，一个国家也就因此而更是政治国家，它也就很少准备到国家原则中去，也就是到国家是其积极的、有意识的、正式的习语的社会现行组织中去寻找社会弊端的缘由，并从中明白一般的原则。政治精神就是政治精神，因为它的思想并不离开政治的界限。

^① 公元前321年，萨姆尼特人在这里击败罗马军队，强迫他们通过“轭形门”。通过卡夫丁峡谷，意即遭受莫大侮辱。——译者注

这种精神越是敏锐,就越是无法弄清社会的缺陷……”

马克思的第一批著作被结构—功能学派所拒绝,这是完全不可避免的,而且这种拒绝并不姗姗来迟;人们明白这一点吗?L·阿尔都塞在他的以蒙骗性的反用法命名的《保卫马克思》^①一书中,通过“认识论断裂”的命题,对绝对的政治思想,对国家学说,对新教条主义和新斯大林主义,帮了什么样无法估量的大忙?

在这些篇章中,马克思从对异化的哲学批判走向对国家和政治本身的政治批判。这显示出了政治断裂。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连同随之而来的政治机构,是政治性的,而且也只是政治性的。一位叫罗伯斯庇尔的,竭力去实现“人”的理性、自由和权利,他从贫困中只看到民主纯洁的障碍。对于马克思来说,政治原则就是意志(今天,人们可以说:权力意志,这是马克思想到而没提出来的)。政治精神和政治意志本身有其界限,它们使之投射到知中去,而不是通过知,从中跨越出来。马克思继续说道,政治精神越片面,就越相信意志的权力。也就是“纯粹的”权力、强制、暴力,最后到恐怖。

政治如同哲学,接近一种危机;当政治分裂为现实主义(实证主义、实用主义、经验主义)和唯意志论时,这种危机便可能是最终的。思想和政治意志在临界时,进入矛盾的范围,并走出逻辑。稍有多一点的认识,稍有多一点的政治胆略,政治思想就变化:它成为批判的激进性。

社会革命源自作为社会生物和社会关系总和的“人”的存在和精髓。作为社会革命,它在解决在旧政治范围内无法解决它的问题的同时,推翻旧的社会。作为政治革命,它摧毁陷入无法解决的矛盾之中的旧政权和旧政治。马克思认为(见所引文章),最好

^① 见巴黎,马斯佩罗出版社出版,1965年。

是带着“社会灵魂”来谈论政治革命。社会主义一旦显现出它自己的目的——它的灵魂——它就抛弃了它的政治外壳。

自 1844 年起,也就是说,马克思在恩格斯帮助下,对他之前的东西(费尔巴哈的人类学、黑格尔和法国人的历史性、英国的经济主义)作了总结的那个“批判”阶段的后期,马克思有一个清晰的想法,一个确定的计划,它们日后成为设计和润色的基础。社会处于政治和经济之间。政治趋向于消化它,经济有将它碾碎之势。更确切地说,社会(或者说市民社会)夹在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之间。马克思后来将尽力阐明“市民社会”的概念,通过结构描绘它的特征。此概念将不会很清楚。社会关系根据“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根据生产力关系和法律—政治形式而较清楚地确定下来。可“生产方式”依然模糊不清。马克思的计划牵涉到对社会的加强,对社会的这种加强是就与经济和资本主义所占的主导而言,——也是就他认为其压迫和镇压的特点不断地被加强的国家和政治而言。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革命作为社会的而非政治的或只是经济的革命(以资产阶级革命的方式)被确定。后来,社会一词模糊了,贬黜了。它一方面同“人道主义”和博爱,另一方面同为了国家而极度地政治化相混同。

让我们来概括和集中一下。自 1844 年起,马克思就对全面革命有了一个清楚的想法——一个计划——尽管他尚未得出一系列的概念: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意识形态等等。

革命推翻了政治国家和这样的政治。革命本身并不是政治性的,除了它的形式而外。“社会”和“社会革命”的概念在马克思那儿是从黑格尔的市民社会开始发展的。这两个词区分了“结构的”社会关系的总体,包括需要和黑格尔的“需要体系”,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紧密的、并趋向于把工人组成阶级的联合和团结。

马克思虽尚未指出,但他知道,在现今社会里,经济占主导,社

会革命也应该取消经济的这种主导地位。他在不久后出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1844—1845年)一书中,明确了这一点。他在书中确定了市民社会。“很明显,市民社会是历史的真正策源地,真正的舞台。”历史学家们错误地给了政治——政治事件——一个决定性的重要性,而忽略了真正关系——建筑在一个“基础”上的商业和工业生活、一定水平上的生产力。因此,历史学家们自己,而不仅仅是哲学家们或经济学家,制造了意识形态。

马克思的批判不仅是针对黑格尔的国家和法的理论。它批判了黑格尔主义及其全部哲学。哲学要实现;它并没有随着宣称为国家和哲学真理思辨的一致性的黑格尔哲学—政治体系而实现。哲学只有通过彻底改变,通过与非哲学世界、社会、实践、日常生活、政治斗争相比较而成为世界。没有这种比较,哲学和哲学家就要陷入最深的贫困之中(见《哲学的贫困》)。只有既是否定的又是实证的,也是普遍的工人阶级,才能在实现哲学的同时,超过哲学,并在超过哲学的同时,实现哲学。接受一点而否定另一点,那将是幻想。随着全面革命,不是世界成为哲学的,而是哲学成为世界的。自由、幸福、快乐将得以实现,但是,不是从哲学上,不是在哲学家的头脑里,不是通过他的话语,或在他的领导之下。

由于国家不能结束历史,历史将继续。而这首先是阶级的和工人运动的历史,亦即工业的和工业实践的历史。这不再是同样的历史。黑格尔的历史只不过是史前史。至于黑格尔的理性,它不仅是无法取胜,而且不完全、没有完成;骨子里是资产阶级的。

节点就在这里:马克思抓住黑格尔关于官僚和中间阶级的论断不放。从逻辑上看,黑格尔在他的体系中,给了中间阶级一个特权地位,并为官僚辩护。这二者是齐头并进的。官僚掌握消息、很有才能,是从中间阶级遴选的,是知在行政和国家管理水平上的体现。

马克思说,黑格尔对官僚作了经验主义的描述,在表面的客观性之下,掩盖了它的模棱两可。他在阐述它时,“一部分照它的原样,一部分根据它对它自己的看法。”黑格尔承认,在个人利益、职业和行会与将达到普遍并进而成为理性的普遍性的缘由的官僚之间,是有分隔的。马克思说,然而,官僚只代表游离在自身之外,包括在社会关系之中的一个内容的形式化。这种分隔既是虚假的又是真实的(人们在马克思的著作里经常发现这个著名的同时性,必须记住它)。这就维系了现代国家和它的宗教性的特别的二元性。这样看来,官僚就是“神甫共和国”,保持着秘密和神秘,给社会关系罩上了一块黑面纱,这些固有在社会小组上的关系、生产和再生产活动(职业、家庭、城市等)是官僚的物质性,是它作为行会的精神性所统治和管理的。行会,也就是说在市民社会中组织的活动,在官僚的鼓动下,在官僚身上发生变化(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机构化”)。至于官僚本身,就是国家的行会,就是由官僚承担下来的伦理。官僚固有才能(马克思和黑格尔都认为是真有才能),在最高一级水平上抢占了总体利益——国家利益,并永远企图使之变成自己的利益;因为如马克思所确定的官僚,有它自己的利益;它竭力在表现自己,增加自己的社会影响和政治份量。它在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之间独立作战,在两条战线上斗争;但是,它因此在两个目标间摇摆:解散市民社会中的组织,以便取而代之;阻止政治国家重新获得总体利益。因而产生了一种矛盾,促使官僚忽而加强组织和市民机构以便反对国家,忽而要奴役它们。马克思坚持说,然而,是同样的政治精神在市民社会中创建了一些行会组织,并在国家内部创造了官僚。所有的机构形式都会聚在一起了。

很明显,马克思并没区分好官僚(行动的、理性的、开放的)和坏官僚(无能的、爱找麻烦的,等等)。他的批判触及了作为官僚理论的黑格尔主义,并超出了这一理论。它针对的是一切官僚,而

且,人们在读马克思的著作时,可以隐约看到,最好的、最有经验的并百里挑一的官僚,是最危险的。

根据一条已经阐述的、但必须重复的评注来看,国家对于马克思来说,不再像黑格尔认为的那样,是固有在这个社会上的、从下到上无处不在的社会结构(尽管对于黑格尔来说,国家以神明的方式,有它优先的处所:顶峰)。国家只是上层建筑。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久将主要是通过意识形态方面,努力去确定这一个词的含意和意义。他们将不去理会另一方面——机构方面,只是在关系到法时,偶而提一提它。国家尽管只是上层建筑,但是从基础、市民社会、社会关系、固有在基础上的冲突,特别是阶级冲突产生的。它不创造市民社会;它非但不能产生市民社会,而且是市民社会通过冲突的历史而来的产物。它随着社会关系而变化。因此它没有永久性。它诞生了,将在衰弱之后消亡。正如恩格斯在后来阐述国家起源时所说:“国家不是永久存在的……阶级将像它出现那样,必然消亡……国家随着阶级的消亡而消亡。”

至于官僚,它只有一个局限的理性,将自行消亡,不会作为绝对的知及其与政治一致的化身。官僚的知是互相矛盾的,它把秘密藏在办公室,把决定当成神秘,而市民社会却需要了解情况,“以便形成一种公众舆论。”马克思预言,秘密和神秘将使民主机构,如议会的运转瘫痪。官僚在保守论争和决定的秘密的同时,继续自己的利益;它不发展信息,而是发展它自身中的专横、野心和腐败。

中间阶级如同官僚,也在两条战线上作战。在国家中,它站在政治阶级一边,反对压制,可同时又想闯进机构之中,使之为其所用。在人民一边,也就是说,在劳动者—生产者(农民、工人、手工业者)一边,它在为巩固其(相对的)特权,或者获得其它特权而战斗。它在按自己的方式进行一种阶级斗争,但并不因此就承认阶级斗争。黑格尔承认其是领导阶级,但不承认其领导特性的资产

阶级亦然。可以说中间阶级处于铁砧和铁锤之间吗？那样说就等于既背叛马克思的思想，又背叛黑格尔的思想。中间阶级一方面是铁砧，一方面又是铁锤：铁锤向下，朝着人民；铁砧是另一面，承受锤击。这几乎就是黑格尔说的、而被马克思用来反击他的意思。马克思宣称，处于这样一种地位的阶级，既不能是理性知的源泉，也不能是它的存放处。照马克思看来，官僚也好，中间阶级也好，都甭想具有普遍性。上升的资产阶级，在18世纪时，随着法兰西哲学和革命，可以支持这种向往。马克思认为，还没等到19世纪中叶，工人阶级就重新举起被资产阶级扔下的旗帜。只有工人阶级才有一种普遍的使命（我们将要说：世界性的使命）。只有它才能接替成为自己的战利品——国家——的牺牲品的资产阶级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

马克思对黑格尔和黑格尔主义的批判性的评注，构成一个国家理论吗？不。这些评注扫清了道路，开创了马克思所说的革命道路。它们宣称，它们已经就是革命实践。否定的一面战胜了“建设性”的一面。这些评注远没有带来一种理论，而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不再是概念的了，尽管在另一种意义上，它们在去除黑格尔哲学推崇的绝对主义的同时——在使概念相对化的同时，在使之从属于历史和实践的同时——发展了概念。

然而，马克思的批判和不满的评注，并不是互不搭界的。它们明显地表明了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政治断裂，推翻了黑格尔主义的发生运动；历史的完成、自相毁灭的历史性哲学。对国家的批判与它的毁灭道路相符。因此，根据一个既著名又模糊和有争论的公式，非异化道路不是别的，正是异化道路。

所以，马克思在这些激烈的、暴力的著作中，才用了这种语调和文笔（我们将称之为“写法”）。“按德国情势的战争……批判不是脑子的激情，而是激情的脑子。它不是一把解剖刀，而是一件武

器……它不是想拒绝，而是想摧毁……它的基本激情就是愤怒……多么壮观！社会无穷无尽地分裂着……”。^①

政治断裂对黑格尔的国家与政治无条件的褒扬和马克思对二者的彻底批判作了决断。尽管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里，缺少国家的一种完全和严密的理论，但它仍然存在着。它蕴涵着政治异化，也就是异化辞格，但它不依赖于它。它超出这个先决的阶段。否定它，用黑格尔和马克思之间的另一种间断性或纯粹的连续性替代它，那就是把马克思的思想抛到黑暗之中去。这已经就是在组成一个神秘化了的“马克思主义”。

斯大林主义者声称，在黑格尔和马克思之间，有一个哲学断裂，理想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跳跃。这种教条式的、压缩到哲学及其历史的论断，没有维持多久，甚至在人们发现把哲学扔进意识形态史的垃圾中、在摧毁真实的概念（尼采对此作了强有力的阐述）的同时，人们处于客观唯心主义和辩证法的双重问题之前就结束了。人们专心一意地声称，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在“表达”19世纪初，欧洲和德意志的封建反动。但是，马克思从黑格尔那儿借用的辩证法变成了什么？

后来，随着“结构—功能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出现，人们把断裂说成是认识论的，是从意识向科学的过渡。但还是这个问题，真理变成了什么？意识形态从何处开始？在何处停止？人们真的从现在起就能完全把意识形态同科学分开，就像把种子从草籽里分开一样吗？这难道不是新的教条主义，被当作知的意识形态？

政治断裂也蕴涵着一个哲学断裂：同作为与国家通过一些暗含的先决条件联系的先前的哲学（它或者与政治权力合作，或者由于没有明说的理由而反对政治权力）的断裂。因此，没有与唯一的

^① 见《黑格尔的法哲学的批判》，欧比埃出版社出版，第61—63页。

主观唯心主义的断裂,而是与整个思辨体系的断裂。同样,政治断裂蕴涵着一个认识论的断裂,也就是另一种认识的概念。它不是结束概念的必要性,而是结束它的自满。黑格尔和某个哲学理性主义传统中的概念偶像化,与一般的偶像化,包括国家拜物教,相联系。把知当成一种绝对,就会把国家同时当成一种绝对和知的历史支柱。马克思认为,有一些概念存在——更确切地说,是一些和内容相连接的范畴——而不是一种通过自我发展,以内部方式,通过自身的力量和“工作”而前进的概念。对于马克思来说,概念是与理性,也是与已建立的理性的界限一起,导源于广义的生产。而在黑格尔主义里,概念趋向同其推理——哲学体系、作为“体系之体系”的政治国家——的一致。马克思用政治断裂粉碎了这种一致。一方面,他使概念相对化;另一方面,他取消了作为历史和知的同时完成的携带者的国家。

会不会是所谓的认识论断裂在延长黑格尔主义呢?它在继续把知当成一种绝对,历史时间的轴心。它视知的系统形式为必要的和足够的,是与纯粹的科学性相符的。而对于马克思来说,历史时间在继续,在制造一些社会生活和认识的新形式,也就是实际经验和构思间的新型关系。这并不等于说,盲目的历史性将永远持续下去。此外,这使得知从属于革命运动,从属于世界经验,而且同时,从属于改变真正的(日常的)生活的运动。

只有政治断裂才把政治问题和作为问题的政治,置于其中心的位置。其它的断裂,为国家的和与之有关的疑问的排出,敞开了大门。它们放任最可怀疑的伪哲学、唯科学主义的代替物——还原主义、实证主义、经济主义、生产主义、历史主义等——通行。

断裂理论不应该使人忘掉马克思所认为的时间的辩证运动,在一些同样是相对的不连续性中的相对连续性。不再有绝对的连续性和渐进性。不再有绝对的不连续性、飞跃和跳跃。到处和

始终有的是，一些倾向、一些倾向性的规律、一些过渡。例如，持续了几百年、刚刚同在上世界上消灭了土地贵族一起结束的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等等。或者是资本主义中的平均利率的下降倾向，被用许多经济的和政治的手段打击的倾向。因此，大公司为了阻遏利润的下降，在20世纪，在他们所能到的地方，大肆抢夺原料、地上和地下的矿产和物产。它们因此而增加了利润。这和一个所谓的旧生产方式的“关节”，——在这种生产方式中，先是贵族，然后是土地或地下资源的主人，得到了利益，——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毫无关系；这倒是反映出经济对政治干预的一种战略性的附着。

进行了政治断裂的马克思，很注意对具体形势的分析。举一个辣手的例子。当普鲁士和法兰西之间的战争迫在眉睫，并于1870年爆发时，马克思认为，必须支持俾斯麦。并不是普鲁士社会值得赞同，并不是封建性体现了一个上升阶级和一个社会力量，而是因为俾斯麦实现了德意志的民族统一，从而结束了德国工人的分散状态。1848年革命未能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它将在政治上，并“从上面”完成，并不是不留下一些封建主义的痕迹。至于巴丹盖（拿破仑三世），他是个欧洲宪兵。然而，1870年9月4日，巴黎的制度变了。一天之间，形势变了，马克思的分析也变了，必须支持共和国和法国民主人士，反对占领军。

七、马克思著作中的国家理论

如果有人想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寻找一种国家理论，也就是说想寻找一种连贯和完全的国家学说体系，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告诉他，这种学说体系是不存在的。反之，如果有人认为马克思忽视了国家，我们也可以告诉他，国家问题是马克思经常关注的问题。在他的著作中，有关于国家的一系列论述和一种显然已经确定的方向。

因此，不应以一种已经包含着教条主义的方式，即以一种仅根据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的简单图式作出“是”或“不是”、“有”或“没有”的回答，来向马克思和他的著作提出这样的问题。

就像马克思在给拉萨尔的一封信中所指出的那样，他致力于一种最后的、也是最高的目标：认识政治和国家，并在这方面建立一种理论。

在这封写于1858年2月22日的信中，马克思阐述了他正在进行的理论工作：“所有这种理论研究，将分为6本书：1)《资本论》，

2)《土地所有制》，3)《雇佣劳动》，4)《国家》，5)《国际贸易》，6)《世界市场》。”后来，马克思又曾确认过这一计划，特别是在他于1858年3月给恩格斯的信中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都肯定了这一计划。

但是，马克思后来未能实现这一宏伟的计划。关于土地所有制，关于国家，关于世界市场和关于国际贸易，他只留下了一些提纲、一些尚未完全发表的手稿。也就是说，他并没有完成他原来所设想的计划。

尽管如此，马克思从未停止过思考和证明自人类社会开始以来，国家的历史可以概括为各种实际的斗争，而宗教的历史则可以归结为各种理论的斗争。这就是说，对于马克思来说，没有什么比一种包含着它的产生、它的历史、它的形成和它的发展的国家理论更为重要的了。其次，在马克思看来，国家理论只能有一个与经济理论相关联的外表，如果还没有陷入对国家的颂扬和崇拜的程度的话，那么就不能把国家理论归结为一种盲目发生的过程的纯粹理论化，国家理论应包含着对国家的彻底批判，就像政治理论包含着对政治的彻底批判、经济理论包含着对政治经济学的彻底批判一样。

马克思自己总是尽量避免对未来社会进行预言，这是众所周知的。他既不想做空想主义者，也不想做算命先生。然而，在他的著作中能够看出一些他所描绘的有关未来社会的某些特征和轮廓：

首先，他根据哲学的分析得出两个推论：一个是伦理学的推论，另一个是美学的推论。根据他的一些文章，未来社会将会实现各种哲学设想的伦理的外表：人的尊严，人的相互尊重，使个人感到心花怒放而又不损害他人的自由；根据他的另外一些文章，未来社会的人将以其所具有的“创造性”而被列入到艺术家的行列，所

有的人都将可能成为诗人、剧作家和哲学家。

可以肯定的是，马克思在当时和后来的时间表上，记下了表明各种终结的日程表；资本主义行将消亡，伴随它一起消亡的还有资产阶级。而且，工人阶级以及各个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也行将消亡。而劳动也同样将会发生变化，最终将在生产中实现自动化和知识化。那么，还有什么将随之消亡呢？

我们所认识到的一切，包括宗教、家庭、历史、民族、国家和战争等等。革命将是总体性的，它将震荡着整个世界，包括知识，以利于人的生存、生活、使用以及有利于作为人的生活和使用源泉的自然界。这是一种至福一千年说？这是一种突变论？这是一种末世说？不，这是一种时间性，这是一种历史性。根据马克思的看法，时间和历史的概念证明，一切事物的产生和发展都经历下列这样一些阶段：产生阶段、生长阶段、成熟阶段、衰退阶段和终结阶段。那么，这样一种概念对于谈论现在的这样的一种“行话”是否还是可靠的呢？我们说仍然是可靠的，但需要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就是这个概念必须在整体性中使用。这就是说，在世界性的前提下运用这个概念，以表示艺术、道德、人、地球、自然和整个世界；也就是说我们世界的一切的发展和变化。这是毫无疑问的。

国家的消亡在这个概念中起到一种决定性的作用。在标明各种事物行将终结的时间表里，中心的时间是这种时间；随着政治上的衰退和所有机器的消亡而终结的国家也将消失。在这个根本性的观点上，从马克思的最初的著作到他最后时期的著作都表明他的思想观点没有什么改变。如果从马克思的思想观点中，取消国家行将终结这样的观点，那么，马克思的思想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是没有终结的，如果一切都无止境地持续下去，一切都无限制的延续下去，那么，历史性就不是以它的终结而消失，而是以时间的停滞和停止而消失，而这正像黑格尔

的著作中所表明的那样。

在一种显然已经确定的观点中，国家的终结为马克思的思想确定了方向，这无论在他的早期著作（被称之为青年时期的著作，即马克思在1842年到1844年期间所写的著作），还是在他的分析得更加详细的晚期著作，如《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中，都表明了这一点。通过对马克思著作的考察证明：在他的关于国家消亡的理论中，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论题占有它应有的位置，这尽管还不足以构成一种积极的国家理论，但却足以决定了一种消极的（批评性的）立场。

难道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没有任何一种“积极的”和建设性的理论尝试和因素吗？当然不是。我们通过认真的阅读，会发现一系列相互分开的片断，每个片断都提供了一种轮廓和一种迹象。当然人们并不是在所有的著作中都能找到这些轮廓或迹象，但在一些最具有意义的著作的片断中都能找到这些轮廓或迹象。

关于国家问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主要包含三种理论：

第一种理论，国家，统治阶级的（经济上，然后是政治上的）工具。

这是对国家的一种最著名的、也是最普及的概括。恩格斯在关于国家的起源中，用简明扼要的语言作了概括：国家是最强大阶级的国家，“在经济方面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必然会在政治方面获得统治地位，这样它就获得了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的手段”。因此，国家是一种机器，是根据主要的生产和交换资料方面变得宽松的阶级的需要而改组历史的结果，而国家又能使这个阶级由经济上的优势变成为在政治上拥有领导权，甚至可以实行专政。这种国家权力还能保证这个阶级在经济方面和社会方面（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方面）的再生产。

当然,在现代社会里,国家权力的形成有一些历史前提。在国家正式出现之前,主宰人是以部族的首领或专制者的身份出现而使用暴力和强制性的手段。恩格斯在他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尽力恢复和再现权力演变的过程:“归根到底,所有的占支配地位的个体联合起来以便形成一个统治阶级。”在恩格斯看来,国家并不是由某些征服者从这种或那种社会的外部强加的一种权力,它更不是某种道德观念的实现和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是绝对观念的体现。它是社会发展到某一阶段的产物,它表明,这个社会已陷入一种自身无法摆脱的矛盾之中,已无力避免不可调和的阶级对立和冲突。为了使各个对立的阶级不至于在一种徒劳无益的争斗中同归于尽,必须有一种能在表面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来减轻各方面的冲突。因此,国家既产生于阶级冲突之中,又是为了抑制阶级对立的需要而出现。它是“某一个统治阶级的所有成员维护他们的共同利益并迫使其它阶级的人同意他们享有这种利益和特权的一种形式。”那么,他们又是如何获得和维护这种利益呢?这就必须诉诸于强制性的手段和暴力。

我们在这里只是简单地概括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内容,而并没有明确地提醒读者会遇到的一个小的疑难问题。其实,通常被认为是属于马克思的并被纳入马克思主义范围的理论观点,有的是来自恩格斯的笔下。我在后面还将对他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本书进行重新考察,以便人们能够更详尽地了解该书的作者想达到的目的;根据各种事物的起源和变化,特别是根据从古代的氏族、部落开始的一种延续不断变化的社会历史图表,恩格斯企图以发展的眼光指出现代国家的形成的历史过程。

对于恩格斯观点的各个难点,不应回避,而应加以分析。谈到产品(Produit),就应该用生产(Production)过程加以解释。因

此，应该认真考察恩格斯历史的、连贯的阐述是否表明国家是通过社会生产出来的。请注意，在恩格斯的著作中，辩证的矛盾是作为导致不结果实的斗争原因出现的，而这同马克思所接受关于矛盾的丰富性的黑格尔的论点是很不协调的。资产阶级与封建主义之间斗争难道是不结果实吗？在这场以导致法国 1789 年资产阶级大革命而告终的历史性的阶级斗争中，国家又起了什么作用呢？确实，恩格斯似乎已经把矛盾和对立两个词加以区别。值得说明的是恩格斯著作中所缺少的东西。从什么时候开始，一种矛盾变成不结果实的呢？在什么时候，这种矛盾会变得不可调和、即相互对立的呢？当发生这种质的飞跃时，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似乎恩格斯没有接受《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字里行间所体现的这样一种论点，根据这种论点，属于一个社会所有成员的共同利益必然蕴育和产生各种相应的制度，而这些制度在统治阶级的支配（即领导权）下，采取了政治形式，而统治阶级又歪曲利用这些制度为他们的利益服务。当然，统治阶级在歪曲利用这些制度为他们的利益服务时，还要传播各种对他们有利的意识形态，并利用这些意识形态为他们的利益服务。

在这里，恩格斯的观点是很强烈的，也是很明显的。他在《反杜林论》一书中的著名章节中又详细地讲到了这一点。什么是现代国家？在恩格斯看来，它是现代社会为维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条件而自行产生的组织。现代国家，不管它采取什么形式，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机器，即资本家的国家，集体资本家，一个资产阶级的大行政管理委员会。在这里，恩格斯把集体资本家同集体劳动者相对立，从恩格斯所描绘的资产阶级国家的活动，即集体资本家的活动中，可以看出，在现代国家，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社会关系，即剥削和压迫的关系不但没有被废除，远远没有废除，恰恰相反，这种关系已经发展到了极点。

而当马克思接受了阶级的国家这种观点时，他的阐述是比较微妙的，是与恩格斯对这个问题的阐述不尽相同的。

例如，在巴黎公社以后，在《法兰西内战》一文中，马克思写道：“中央集权的国家及其遍布各地的机关——常备军、警察、官僚、僧侣和法官（这些机关是按照系统和等级的分工原则建立起来的）是起源于君主专制时代，当时它充当了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反对封建制度的有力武器。”在这同一论题中，我们还将会发现马克思的阐述与恩格斯^①的阐述之间不一致的地方。马克思强调国家集权的特性和辅助性的机构。他认为过去封建领主的特权、地方特权、城市和行会的专利以及各省的法规等这一切中世纪的垃圾阻碍了它的发展。法国 1789 年资产阶级革命的大扫帚，把所有这些过去时代的垃圾都扫除干净，从而从社会基础上清除了那些妨碍建立现代国家大厦这个上层建筑的最后障碍。

马克思认为，这个大厦是在第一帝国时期建立起来的，而第一帝国则是在老朽的半封建的欧洲反对近代法国的几次同盟战争中产生的。现代工业的进步促进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对立更为发展、扩大和深化，国家政权也就随着愈益具有资本压迫劳动的全国政权的性质，具有为进行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的性质，具有阶级统治机器的性质^②。在国家的阶级性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看法是一致的。他们之间差异表现在恩格斯社会学上的进化主义和马克思对革命历史的追溯上，即对马克思来说，集权的、镇压性的国家是法国革命和它的后果——拿破仑的战争所造成的。显然，马克思的阐述局限于欧洲，甚至法国，而恩格斯的阐述带有普遍意义。

① 见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人民出版社，1964 年版，第 52 页。

② 见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人民出版社，1964 年版，第 52 页。

第二种理论,国家从表面上看,是独立于各个阶级的。但这种政治外表和它的整个外表一样包含着某种现实,或者说是以某种现实为前提的。事实上,这种理论把国家看作是竖立于整个社会之上,既表现出寄生性,又表现出掠夺性,为了它自身的利益,它能够掠夺整个社会的成果。

这第二种理论有时会同第一种理论相混淆。例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明确谈到,起源于社会的国家企图把自己置于社会之上,并且越来越与社会相分离。这种看法超出了这样的论点,根据这个论点,国家给予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提供了奴役被压迫阶级的各种手段,以至于古代的国家成了奴隶制的国家,中世纪的国家成了封建制国家,现代国家通过资本成了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而且,恩格斯还补充了另外的情况:“国家还产生于这样一些时期,在这样一些时期中,处于斗争中的各个阶级的力量达到如此平衡,以至于在表面上作为调解人(中介)的国家,面对这个阶级或那个阶级,获得了某种独立性。”这是17世纪法国君主专制政体、波拿巴主义的情况和俾斯麦的德国情况。这种情况是很多的。历史学家会立即联想到:事实上是被作为置于社会之上的一种真理而竖立的国家已经留下不少痕迹。什么意思呢?正如恩格斯把之比喻为“上层的革命”,甚至还承认这些革命确实达到过一些革命目标。“至此,俾斯麦难道没有完成一部分我们的工作吗?尽管是以他的方式而他自己并不情愿,但照样是完成了”(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1870年8月15日)。

而马克思在谈到波拿巴主义时,他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是这样讲的:“这个行政权力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有复杂而又巧妙的国家机器,有50万人的官吏队伍和50万人的军队,——这个俨如密网一般缠住法国社会全身并阻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机体,是在君主专制时代,在封建制度崩溃时

期产生的，同时这个寄生机体又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崩溃。”马克思又接着说：“土地所有者的和城市的领主特权转化为国家权力的同样众多的属性；封建的显贵人物转化为领取薪俸的官吏；互相交错的中世纪领主权力的五颜六色的样本转化为确切规定了的国家权力的图案，这里盛行的分工和集中就像工厂里的一样。”^①

有必要指出，在20年中，即从1852年对巴丹盖特(Badinguet)政变的论述到1872年对巴黎公社的分析中，马克思对国家的分析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因为现代国家起源于专制政体，起源于法国革命，即波拿巴主义。追溯这些起源是无益的。这种国家具有它的各种职能，它是由或多或少决定了的职能组成，它包含着一种工作分工，即置于经济方面的生产劳动分工之上的政治分工。

拿破仑和法国王朝复辟本身又完善了这种分工，随着资产阶级内部工作分工所创立的各种新的利益集团，又扩大了这种分工，因而也就创立了一种新的统治形式。在旧制度之后，国家在法国、在欧洲又是如何发展的呢？首先，它加强一些彼此相互隔绝的单位之间的联系和交流，加强所有实体之间的联系和交流，而无论这些实体是生产性的（农民经营的场所、工业企业）实体，还是地域性的（村庄和城市）实体。凡是出现这样一些实体的地方，尤其是在农业生产中，必须会出现一种国家。国家从社会（这里指贫民社会）里分出每一种公共的（或多或少是共同的）利益，并使社会的成员失去对这些利益的兴趣和主动性，再把这些利益转变为国家、因而也是政府活动的目标，“从桥梁、学校房屋、最小的村庄的公共产业，直到铁路和国家财产……”马克思知道，这些集体设备——正如今天人们这么称呼的——过去是以直接涉及到的团体，如地方共同体、居民区、城市和村庄的积极参加和主动性为前提的。马克思同样知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1页。

道，国家是如何通过废除构成贫民社会的这些地方的或地区的实体的权力而实行集权制的。最后，马克思也知道，通过革命性改造的国家需要某种集中化，但并非是一种受封建残余感染的国家集权制，它只能建立在这种国家集权制的机器的废墟上。以工人为基础的政治革命尤其表现在这一点上：将不再有必要为杀死一只老鼠而去请示国家。

后来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明确了这样的论点：“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站在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①

如何实现这种服从（即关系的颠倒）呢？马克思除了把这种颠倒说成是革命过程和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通过社会主义）的一部分外，没有再详细阐述这种颠倒的条件和环境。无产阶级专政是属于这些条件中的一部分吗？能否把无产阶级专政定义为国家对于市民社会的服从呢？这对于马克思来说，是肯定的。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某些章节里，肯定相信自己所讲的和马克思所讲的是一回事或基本是一回事。他说，政权如果摆脱社会的束缚，从奴仆变为主人，那么它既可能适应，也可能阻止经济发展。如果它阻止经济发展，那么他注定要（除了某些例外情况）被经济发展所淘汰。这些“例外情况”往往会使读者感到困惑。恩格斯是否已隐约预见到会出现法西斯主义呢？还是指的是俾斯麦式的国家或者指的是议会民主式的国家呢？

有一点是清楚的，对于恩格斯来说，他和马克思一样认识到，国家自治既不可能是完全的，也不可能是持久的。如果国家能够 and 必须拥有一种基本的职能的话，那么它就不可能终结它本身的各种“自治”，就不可能终结它本身的各种独立于、也就是外在于社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0页。

会的能力。但是国家毕竟应该成为社会的一部分，当它处于完全独立于或外在于社会的自治状态时，它就不可能支配各种社会自治体(经济、人口统计学、技术性等等)，它就不可能完成任何一项证明它是合法存在的职能。当然，这种“自治的”国家是伴随着各个阶级之间的力量关系的对比而必然产生的。而这些关系不仅使得一些大胆者(如拿破仑一世的政治警察、俾斯麦的政治警察、拿破仑三世的政治冒险家)能把政府和国家变成实现某些目标的工具，而且还使他们能够把政府和国家变成掠夺社会的工具。就此，马克思曾经尖锐而有力地指出了国家是如何疯狂地从“社会基础”中，换一句话说，从贫民社会中根绝所有的主动性和创造能力的，它把贫民社会变得消极而无能。私有制的国家把私有制“扩大到全国，即扩大到它所统治的整个领土，它根据需要骗取和掠夺所有者的一切，把一切“油水”占为己有，它从各方面剥夺整个社会的所有权，剥夺所有臣民的全部自由，它甚至敲诈勒索和凌辱这些臣民。

拿破仑三世击败了秩序党这个由地主和金融资本家拼凑而成的右派集团，给自己的组织取了一个山岳党的名称。又通过军队和警察的力量，这位政治冒险者把国家竖立在社会之上，并把社会放在自己的“口袋”里。接着，波拿巴主义国家想促进工业(建设铁路)和金融(不动产的投机)的资本主义，这就把国家引向新自由主义，这种新自由主义导致了它的灭亡。

因此，国家不可能飘浮在真空之中，即使它声称是超脱社会和自治的，它仍不可能处于各种阶级关系和“经济基础”之外。声称国家是超脱于社会和自治的，其意图是企图掩盖这样的现实：自治的国家只能是寄生性的国家。国家的整个机器是靠社会生产的财富来供养和维持的。哪些机器呢？军队、警察、官僚以及法官和教士，马克思列举了这样一些人，这里，他所描述的是政教协议之后

和教会与国家分离之前的法国的情况。

第三种理论：国家负担整个社会。无论是由于它具有有一种经济能力而承担各种行政管理的职能，还是它在表面上继续竖立在社会之上，但实际上，国家政权直接管理着生产力。

根据这种分析，经济并不独立于政治，经济既不是政治的起因，也不是政治的理由，而是附属于政治。这正如马克思在《亚细亚的生产方式》一文中关于国家所作的一些不够全面的指示，这些指示提供了一种理论的轮廓。

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和各种孤立的、稳定的生产单位相联系的——在这种情况下，主要是同各种农民共同体（在亚细亚，表现特别明显，尤其在印度，在中国，这些共同体在土地私有制面前并没有完全消失）相联系。在地球的这些地区，水源和土地一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以至于每年征收水源和水的使用税高于征收土地的税。因此，在这些地区，水起着一种经济作用（从生产力的角度来说）、社会作用（从村镇组织的角度来说）、政治作用（从国家组织和行政管理组织的角度来说）。由此可见，这三种通常被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区分开来的作用，在生产方式中往往是相联系的，但又并非能够把它们混淆起来。政权是不能同一种一定场所的表现相分离的，也不能同由这种表现所确定的战略相分离。鉴于控制水所提出的大量问题，国家就要负责各种各样的大工程：修筑堤坝、排水和灌溉设施等。各种问题总是在不断地增加，在许多地方，在多雨的季节需要排水，然而在干旱的季节又需要灌溉。这就需要各种各样不可思议的工程：湖泊、水坝、引水渠和运河等。修建这些水利网还必须配以修建连结各个生产单位的道路，以便供民用、军用，有时还要供宗教方面使用。在这样一种既脆弱又稳定的基础上，各种势力不断地崛起、延续，再到崩溃和重建，令人眼花缭乱。正因为如此，亚细亚的历史是一种和西方的历史并不相

同的历史。

应该注意到，马克思对“亚细亚的生产方式”这一概念并没有花多少篇幅去论述它。这就是后来引起无休止的争论的原因。一些人鉴于亚细亚各个社会阶段的差异而拒绝这个概念，而另一些人又过分延伸和扩大这个概念的使用范围，把它应用到古埃及。应用到各个印卡人、阿兹特克人社会，应用到一些非洲社会（伊斯兰教或非伊斯兰教）。

在亚细亚的生产方式中，政权对于土地和河流拥有所有权，农民对土地和河流拥有受益权。在中央权力与各农民共同体之间插入各种形式的成员加以联系与控制，例如文书（行政管理的）、为封建制度服务的官员以及军事人员等。

各个城市在这种社会历史条件下，具有一种突出的政治性、因而也具有军事性和宗教性特征，是各种活动的中心场所和祝捷的地方，等等。

而支配着生产的国家和政府部门控制着各种活动，征收各种什一税以及以实物、钱和劳动支付的各种捐税，等等。在社会的所有成员之上的君主控制着军队的指挥权、拥有最多的财产和最大的农业组织（以一种官僚机构为媒介）。

由此可见，在这种条件下，生产（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不仅是通过强制性的（镇压性的）、通过各种代表（宗教的、宇宙论的）和象征来保证，而且也通过一种整体的自动性来保证。

正是由于在这种特定情况下决定了国家“实际的”职能和被官僚机构以及它周围的各种代表（特别是所谓天空的、神的、它们的作用以及它们同君主联系的代表）所加强了的国家的管理能力，马克思和恩格斯面对着一个在别处亦已提出了的问题。这样一种国家不能够被称之为是“寄生性的”国家，尽管它剥削农民。因为它有效地干预着和活动着。这样的国家，难道就没有一点与现代

的国家相似的地方吗？根据条文（契约、宪章、法典）建立起来并且制度化了的现代国家，难道就一定能够依靠这些条文的力量，影响到市民社会的深处和渗透到它的经济职能中去吗？

各种法则被认为是“自然的法则”，其中也包括人的各种权力的法则在内。这是一种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吧！这种意识形态是很容易被抛弃的，而接踵而来的是对各种权力的违反的悲叹。当然，“自由的”代表们在通过各种制度化了的媒介保证了工人对于资本家的依附的同时，也保证了在民族国家范围内的被剥削的人作为市民（公民）的某种独立性。对于现代工人在劳动场所之外的这种相对独立性，马克思是了解和强调指出过的。正是这种相对独立性把无产者和奴隶相区别，这种相对独立性表现为容许有一定的民主，甚至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中也是这样。在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中，在原始积累期间，换句话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起源过程中，正在形成的资产阶级曾经持续地需要国家。马克思曾经多次强调过这一点。这是为什么呢？这只是由于工资慢慢地同对质量的、因而也是主观的估价相脱离，这时而表现在生产者方面，时而表现在货币持有者方面。

为了“调节”工资，也就是说为了把工资纳入等值的轨道和网络之中，必须有一种教义、一种权力和各种评判与仲裁者以及批准手续这就需要国家；同样，为了使生产者服从于企业和车间的纪律，服从于生产，也需要国家。

这个时期，正是资本积累的一个基本时期。在这个时期和过程中，国家并非是处于漠不关心的状态，在同各个阶级的关系中也并非处于中立状态。很长时间以来，人们已经发现，国家以增长为目的，即以扩大国库积累（当然在其初期）为目的。更确切地说，国家（甚至在资产阶级国家之前）实行一种经常性的压力以便把劳动当作一种商品纳入交换的轨道之中，也就是说，通过把劳动时间估

价为货币而纳入交换的范围之中。这样做，并非是为了从理论上认识劳动和等价规律，而事实上是为了缩小对立和差别，为了把地方市场和各生产单位纳入国家市场。在这个庞大而复杂的过程中，国家变成了社会和“人”的尺度。它对所有的方面进行测量。计量制度象征着并且日益完善这种控制——国家对社会的尺度。

与此同时，这种国家在它资产阶级化的时候，宣称公民的自由，保证在劳动场所之外（在城市里、在家里和“私人生活”中，在所有的社会场所中）的公民自由。由此可见，资产阶级国家——自由的——既产生于生产关系，也产生于整个社会领域。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表明了国家在政治方面的作用：它保证社会大厦的一致性。一旦所谓资本主义经济永恒不变的规律，即供求规律运转失常，一旦市场（特别是劳动力的市场）失去规则，国家就得介入并起作用。它阻止各种危险倾向，阻止在繁荣时期劳动交换价格的上涨和平均利润的下跌，等等。

在这个时期之后，情况又是如何呢？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企图搞清这个问题。他在《反杜林论》中指出：在各个托拉斯中，自由竞争转向了垄断，面对临近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生产，资本主义社会的无计划的生产正在让步，对于资本家们的最大的产业尤其是这样。虽然剥削变得很明显，没有一个民族不支撑着由各种托拉斯所组织的生产，但不管有无托拉斯，都需要由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亲自来进行这方面领导。改变成为国家所有制的必要性首先在各种大的通讯部门、邮局、电报局、铁路方面显露出来。恩格斯的这段话表明，从今以后，不需要资产阶级了，资本家们的所有职能将由职员们来保证，这正如同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纲领性”部分所宣称的那样。

奇特的说法！由官僚们来管理被认为是“国家社会主义”，而没有认真地去考虑一下，这些官僚们的社会和政治的地位和身份。恩

格斯已经模糊地预感到计划化,甚至超出了一种纯粹的预感,但他并没有深入研究这个概念,也没有指明计划化的条件。而不管运气如何,资本主义的企业和国家以及资产阶级本身能够成为一个有能力的组织吗?而这个组织的内部和外部局限性又是什么?恩格斯没有说清楚。

在一篇著名的文章(给魏德迈的信,1852年3月5日)中,马克思明确表示并不是他发现了阶级斗争。这个功绩应该归于法国历史学家(奥古斯丁·第里, Augustin Thierry)、归于德国的哲学家(黑格尔,主人和奴隶的辩证法)、归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而对于马克思来说,他自认为他的著作中的新东西是发现了各个阶级和它们之间斗争的历史条件,特别是得出这样一个论点,根据这个论点,这些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又是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阶段,是一个过渡性时期。

而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又是什么呢?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以及后来的列宁都没有详述其细节。对于他们来说,无产阶级专政使得工人阶级能够成为统治阶级和“政治主体”,因而也就能获得《共产党宣言》中所明确指出的民主。对于马克思来说,无产阶级专政同民主的深化、同国家的衰亡是相吻合的。当生产资料的集中化使得通过生产力的社会组织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增长时,国家也就消亡,实现了无阶级、无国家的社会。

而对于斯大林来说,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一种经常能够行使暴力和国家专制的手段。在这个问题上,他同在其它问题上一样,损害了马克思的思想,使之变得虚弱。斯大林的这些做法,实际上是忘记了专政与民主之间的关系与联系,其结果是迫使人们产生这样一种想法。即必须放弃无产阶级专政,以便维护民主的合法地位。斯大林的这些做法,特别是滥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给国家

的衰亡罩上了一层阴影。

马克思对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曾企图进行更深入地研究。他曾经对一个双重的试验进行对比，即对巴黎公社的试验和对德国工人阶级的试验进行对比。他曾经表现出一种犹豫和焦虑：一方面是摧毁国家，一方面是加强国家。马克思认识到巴黎公社的意义，他指出，（法国的）工人阶级不可能用旧的国家机器管理社会，不仅市镇的行政管理（自由派和改良主义的左派接受的论点），而且整个政治主动权必须置于公社的控制之中。马克思强调指出，工人阶级不需要实现一种空想，而需要的是催发新社会的萌芽，这些新社会的萌芽实际上在衰老的资产阶级社会内部已经开始产生（《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既没有适应自发性的倾向，也未有适应唯意志论的倾向，他超越了他青年时期进退两难的意向。当然，在这里，他的讲法中仍带有某种自然主义的隐喻（如催发、内部产生等一类词的适用）。

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马克思设想了一种过渡时期的国家，即在这种国家失去政治职能以后，拥有社会职能。

这是否也是恩格斯通过对巴黎公社的考察所作出的设想呢？恩格斯说：“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一点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丝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国家最多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胜利以后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能够把这全部国家废物完全抛掉为止”^①。

傲慢的恩格斯把国家的命运寄托在未来的几代，而不是寄托在政治经济学以外的扩大了的一种阶级斗争上。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6页。

在关于马克思对哥达的社会主义纲领的批评问题上，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中同样写道：“自由的人民国家变成了自由国家。从字面上看，自由国家就是可以自由对待本国公民的国家，即具有专制政府的国家。应当抛弃这一切关于国家的废话，特别是在巴黎公社以后，巴黎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无政府主义者用‘人民国家’这一个名词把我们挖苦得很够了。虽然马克思驳斥蒲鲁东的著作和后来的《共产党宣言》都已经直接指出，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国家就会自行解体和消失。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机关，那末，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①即一旦社会主义秩序确立后，国家就将解体和消亡。

恩格斯是否是一位过分的乐观主义者？他的思想中是否包含着空想主义思想和带有某种风险的设想？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讲的与恩格斯上面所说的并非完全一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声称，国家从过渡时期的初期，就立即失去了它的政治职能，按照他的看法，国家保留着很重要的管理职能。又是什么样的管理职能呢？提取和分配社会的剩余产品以便给人民提供关心。为了投资、为了科学研究、为了病人和医院，为了儿童和教育、为了那些不再能够生产的人（病人、残疾人、老人等），广泛的财源是必要的。而这种可观的提取与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的榨取是毫无共同之处。然而，它毕竟涉及到巨大的款项，新的（社会主义或者至少是过渡时期）国家应该在各种形势下，有时可能是在危险的形势下恰到好处地使用这些款项。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页。

《哥达纲领批判》这篇文章在很长时间内被人搁在一边，有人说，这是一篇难懂的文章。然而，它在中国曾一度变得时髦起来，曾听到法国的某些“毛主义者”声称，中国现在的国家已经符合由马克思留下的这种模式：它是一种管理性的国家，而不是政治性的国家，这种国家支配着真正普遍的利益。这就是说，这样的国家使一种社会变成这样一种社会，这个社会是由一种艺术、一种“文化”、一种建筑术和某些医院和大学等等构成的。

我们在下面还将考察这个论点。这个论点很值得讨论。如果这个论点不是强加的，那么，它就会具有某种可靠性。不管怎样，《哥达纲领批判》一文提出了一些需要阐明的问题。在马克思文章的某些片断中，向另一个社会的过渡在经济方面是以结束市场经济、商品流通，结束货币和资本的强力为其特征的。马克思有时毫不犹豫地思考能否恢复使用和使用价值，以便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占支配地位的交换和交换价值相对抗。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丝毫也未提到有关国家革命的决裂一事。

以上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所包含的有关国家问题的三种理论。

是有关国家问题的三种理论吗？是三种草图，是三种有时相互混杂的轮廓：

第一种是“集体资本家的”、即“总资本家的”国家，这种国家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利益或部分阶级利益强加在其它阶级、特别是劳动者阶级的身上；

第二种是处于各个阶级之上的国家，这种国家具有寄生性和掠夺性；

第三种是关心整个社会、管理市民社会的国家，这种国家甚至给市民社会带来好处

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所包含的有关国家问题的三种理

论,人们所提出的问题是各色各样和形形色色的: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所谈论的国家,是否涉及到一种历史的演变?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否从考察第一种国家形式开始到最后一种国家形式结束?或者是相反,涉及到国家的不同类型?

每一种国家可能向这种或那种形式演变的趋势、时机及可能性如何?

国家是否会根据时代或时机而变化,那么根据又是什么规律和标准呢?

是否必须用经济理由,用作为反映的“基础”来解释国家呢?
等等。

为了避免繁琐的讨论和无休止的注释,人们可以在解释时作某种推论。工人(革命的)运动的战略对于马克思来说似乎是以国家这个目标来确定。

a). 哪里国家主要具有经济职能,哪里就有民主,哪里工人阶级就能变为主体和政治阶级,哪里工人阶级就能够接受一种合法的、因而也是改良的和议会的战略。民主斗争能够保证在数量上和质量上强大的工人阶级级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在形成阶级的同时又掌握了政权的工人阶级有足够机会建立一种深刻的有代表性的民主。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消亡很可能要延长一段时间,但由于民主的深入,国家肯定不会出现过分的压力和暴力行为。

b). 哪里国家是通过阶级国家的做法来加强自身,那么,它的行为方式都将是剧烈的。在这种情况下,工人运动的目标就只能是通过粗暴地推翻现存社会秩序的方式来达到。这就意味着这个运动必须打碎这个国家并在其废墟上建立一种工人的民主,这就是说直接的民主(并非是指人民和劳动者把他们的权力委托给代

表们)。这时,在劳动者自由联合会的基础上,将会重新组织生产劳动和经济活动。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专政将会延续很长时间,而国家的衰退将是一个很慢的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还会遇到经济组织的种种困难。

c). 哪里国家把自己竖立在社会之上,哪里国家就必然会崩溃。它一旦崩溃,就必然会被吸收到社会组织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考虑到一种剧烈的、短暂的专政,考虑到国家的一种尽快消亡。

这就是解释吗?当然。这些解释尽量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 各种观点中进行某种协调一致。特别是避免一方面在经济学和经济主义之间产生一种动摇,另一方面在政治化和唯意志论之间产生的一种动摇。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在恩格斯的著作中,甚至在列宁的著作中,政治的特征性显示得不够。在他们的著作中,没有任何一种涉及到“政治要求”的主张,没有任何一种能在理论上证明国家制度和构成的一种自治与实体的合理性。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对于国家来说没有任何合理的特权,而不管被考察的国家属于什么类型,在他看来,国家的主要特征就是表现出一种强制性的力量。他只是提到在无产阶级革命开辟的过渡时期中,摆脱了资本主义桎梏的生产力才能得到很快的增长。

然而,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也猜测到了国家的一种特定作用。这主要指的是,恩格斯谈到了“来自上层的革命”,俾斯麦实现了民主力量在 1848 年所失说了的德国的统一和拿破仑三世促进了法兰西的工业化。这毫无疑问地意味着,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在某一种生产方式的范围内,情况也不会完全一样。各种社会(法兰西式的、德意志式的或英国式的)产生各自的国家,而这些社会在某种情况下,又是通过国家在各个阶级之间或同一个阶级的

各个部分之间的一种相互作用中，即一种力量关系中产生出来的。

这里所讲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猜测到的国家的一种特定作用，是否与前面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国家问题的看法的解释相矛盾？是否使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陷入困境？前面的解释是否对“马克思主义的大师们”的思想太有利了？人们可以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目标始终是反对国家和政治的，但他们并未能达到对国家和政治作出明确的定义的程度，这就表明了他们企图提供一种国家理论的努力显然没有成功，甚至陷入一个死胡同。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中，一种过渡时期的设想是同国家的衰亡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前途联系在一起。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将经历一个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被定义为“社会主义”，或者称之为“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这样的专门术语本身是值得考察和研究的，但为了避免陷入繁琐和空洞的注释之中，就没有必要这样做了。那些会批评我们在这方面疏忽的人恰恰是一些不值得给予回答的人。今天，打破“马克思主义的”繁琐哲学同打开对现代国家的一种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同样重要。此外，人们知道，“教条主义”和“制度化”这样的词，只有当警察干预理论的时候才会被感觉出来和具有意义。

说是死胡同，并非说是肯定的和绝对的失败。一种死胡同能穿过去吗？能越过去吗？或者说能绕过去吗？有时是可以的。正是从这个相对意义上来说，我们认为：“在涉及到国家问题上的被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中，有一个死胡同。有一个被称之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政治上的死胡同……”

为了理解一个多世纪以来出现的历史和理论的形势，让我们再一次追溯被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的深刻的根源；追溯它的最初的立场。

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看法，工人阶级是作为一个普遍的阶级出现的，它是一种普遍性的承担者。工人阶级的使命不只是历史的（由黑格尔终结了的历史的继续），而是历史的——世界性的。无产阶级的使命和任务是：使真理在全球实现，这就是说，在全世界实现正义、幸福和自由。革命将是总体性的，总体革命将清扫所有的障碍、局限和对立面。全球性产生于历史性，这种全球性的形式和内容将来自于无产阶级，这就是说来自劳动和劳动者，这些劳动者在生产中把智力知识和物质活动结合起来。

进一步说，工业本身包含着一种已有圣西门指出的组织性和合理化的因素。而资产阶级使生产劳动的这个基本方面改变了方向，以便建立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把工业生产的合理性改变为一种剥削和统治的方法。工人阶级要打破这种方向的改变状况，要重建、加强和发展工业生产中固有的合理性并超越圣西门的空想主义，这种空想主义把各种生产资料归于资产阶级，没有觉察到资产阶级把工业的合理性颠倒为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按照马克思的看法，无产阶级应该使工业具有世界性，这是资产阶级所不能完成的任务。而工业的这种世界性应该在最先进的工人阶级的领导人，通过逐步发展的方法，在无灾变中进行。

随着马克思本身和他的著作的成熟，他发现任务的无边无际和障碍的巨大。他隐约地感到，在他最初的视野中包含着的欧洲中心论的成份，农业问题越来越使他感到忧虑。他开始研究俄国的、亚细亚东方的问题。他认识到，不仅应该战胜资本主义，而且还应该克服农业生产中的局限性和在19世纪世界上大多数地区仍然强大的土地的贵族统治。马克思尖锐地发现土地和地下资源的重要性，他把土地重新看成是生产的、因而也是劳动和资本的因素。但任何时候，马克思也没有放弃他最初的、也是最基本的设想：作为具体的普遍性的承担者的工人阶级既是现存制度的否定因素，也

是一个新世界的建设者。在这种前提下,思想和行动相吻合,马克思的思想随着革命而发展。由此可见,理论从来不能脱离实践。

应该清楚和明确的是,在这条道路上,民族与国家挡住了去路。民族——国家和其它所有的生产方式、封建主义和奴隶主义的延续、落后的农业和手工业一样,甚至比它们更能阻碍革命的道路。形象地说,国家和民族犹如革命道路上的交通阻塞一样。

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设想丝毫也不是“至福一千年说”似的设想,它不是空想,至少不是以传统方式所作的空想。它是建立在分析、认识的基础上的、建立在实际力量的基础上的,建立在对某种抽象和具体(理论和实践,智力和社会,等等)之间关系的评估的基础上的。这个设想提出了一个原则,一个同其它原则、包括民族的原则相对立的阶级的原则。只有阶级原则能够发展、能够达到普遍性,而民族原则则为各种特殊性辩护,往往停留在局部化上。

这两种原则之间只能存在斗争,但是是一种辩证的斗争,每一方在竭力破坏对方的同时,也在影响对方、吸收对方、清除对方。这种辩证的斗争情况,明显地表现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所以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一般的现代化史能够通过迂回的方法使民族原则与阶级原则(或社会原则)的斗争得到缓和。这样做并非削弱历史,而是可以阐明历史,并把理论和哲学的斗争同现实的政治斗争重新联系起来。尤其是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各国都是从阶级的原则开始而走向民族—国家。这并非意味着阶级原则可以废除。这种辩证的斗争从来没有结束过。

马克思的伟大设想成熟于1848年之前,而1848年革命的失败给了它第一次打击;这次革命的失败表明了一种双重性的软弱:德国民主资产阶级的软弱和法国工人阶级的软弱。反革命的暴力转过头来针对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民主。

按照《共产党宣言》的预见,就像一种服装一样,无产阶级有它

的民族性,以便能实现它的战术上的目标和获得地区性的胜利。据此,马克思在1848年设想了一出被人们称之为奇妙的“未来剧本”。在还没有掌握它本身技巧的情况下,工人阶级就将扮演一场资产阶级的喜剧。仆人将穿上主人的衣服,以便剥夺之,然后再将其扔掉。接着,无产阶级在民族范围内作为统治阶级竖立起来,以便在打碎国家的同时,也打碎民族性。因为,工人阶级,是具有国际性的,这就是说从本质上来看它是具有世界性的,只有当它免受这个起源于资产阶级的罪孽——民族和国家之害,才能越过障碍,获得胜利。

但1848年革命最终失败了,自1848年之后,尤其在以后的年代里,发生了完全相反的情况。国家—民族得到了加强,这主要是由于德国实现了民族的统一,法国实现了工业化。而且还发生了类似于1870—1871年的流血战争。

1848年以后,马克思能够证明资本主义已经稳定。尽管欧洲各种“危机”此起彼伏,这些危机动摇了资本主义,但并没有使之崩溃。因此,应该研究世界范围(包括美洲和亚洲)的各种事件和资本主义的运转情况。这首先涉及到要认识使资本主义能得以保持内部稳定的内部机制,其次涉及到要发现资本主义脆弱的地方。1848年以后,马克思致力于这项工作,他力图建立一种经济理论。是一种政治经济学?不。按照马克思的意思,这种理论是同他对资产阶级的经济现实的批评和他本人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评相吻合的。

然而,由此又产生了一种混乱。人们从各自不同的立场出发对待《资本论》这本政治经济学专著,有人认为它已经过时,有人颂扬它,有人拒绝它。

写到这几行时,笔者眼前正放着一堆斯大林的鼎盛时期出的各种文章,其中有: I·西兰斯基(I·Chirinski)的《对计划经济的建

立的研究和社会主义的计划化的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学说》，A·居尔斯基(A·kurski)的《关于民族经济的平衡问题》，G·B·科兹洛夫(G·B·Kozlov)的《资本主义的普遍危机》(1952年)，I·布吕米纳(I·Blumine)的《为军国主义服务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A·卡特兹(A·Katz)的《美国劳动者贫困化的加剧》(1952年)等等。这些文章中被塞进了“确切的”事实，“精确的”数字和进行了“严格的”考察，并且一致表明：马克思发现了政治经济学的规律，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不遵守这些增长和发展规律；是列宁、特别是斯大林恢复了这些规律，把它们作为科学的真理具体地提了出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一门连贯的、合理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而这门社会主义的经济学通过它的计划化的方法和目标肯定是可靠的和牢固的；计划化的社会主义经济提出和运用了价值规律，也就是说提出和运用了社会所拥有的劳动力的分配；在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社会里，价值规律通过各种危机表现出一种盲目性，它不适用于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的危机。只有计划化的经济分配(交换)价值的生产，以至于所产生的价值的交换能“协调一致”地完成，并且能支配市场。

我们在重新考察《资本论》中的一系列经济概念时，我们将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状态。或者说，这些概念组合得很严密，形成一个封闭形的整体，这正好同教条主义的想法相符合，这种体系包含某些规律，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面对的是一种经济主义，在经济学同政治学相分离的同时，会招致一种特定的和自治的、必要的和充分的理论，即一种实证主义；或者说，在这个体系的某处有裂痕和空隙，这就允许政治干预，更确切地说，这就包含了一种政治干预。但这种政治干预达到什么程度？它的界限又是什么？政治将压倒经济，经济的政治学将压倒政治经济学。这将导致一种“政治主义”，也可能是一种意志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将变成首位

并敢于掌握这种“政治主义”。

应该看到，马克思的经济图式并未能很好地解释资本的积累问题，尽管他对这个问题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他在《资本论》中，考察了各种比例，按照这些比例，使增长保持协调一致（扩大再生产的图式）的扩大积累就能够实现。然而，马克思所采用的这个图式引起了罗莎·卢森堡的异议。在卢森堡看来，资本的积累，即生产力的增长，按照一种纯粹的经济过程是不可能实现的。关于这个问题，历史学家们已经讲了很多，他们描述了17—18世纪欧洲流浪汉们的情况，描述了以前建立的关系（各种共同体、城市、领地、门第等等）的崩溃情况。由于陷入纯粹的经济过程之中，马克思主义者们常常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积累变得不可理解和不可能，甚至显得荒谬。

关于罗莎·卢森堡，虽然谈得远了一点，但人们由此能直接触及到所要涉及到的问题的根本：“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界限是什么？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又是如何实现的？”应该说，卢森堡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表现出一种同马克思并驾齐驱、但要高于列宁的理论能力。

如果说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从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过渡未能很好的阐释的话，那么，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向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的过渡也同样未能得到很好的阐释。

在马克思看来，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是一种异乎寻常的壮丽时期，它是伴随着由勇敢的与智慧的工人阶级所完成的无产阶级革命而到来的。由于工人阶级吸收了知识和哲学，他既能够战斗，又能够组织建设。

这种建设将在三个方面进行下去：

a). 政治方面；

无产阶级专政导致深入的民主和国家的消亡，因而也就导致政治强制性和暴力的终结。

b). 经济方面：

生产力的增长(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减慢生产力的发展速度之前)开始加速进行和一直持续下去。

c). 社会方面：

不是废除法权，而是要超越资产阶级的各种法权，从令人难以忍受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口号“每个人按劳动分工干活去”过渡到新的社会的口号“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然而，马克思关于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的论述又存在很多令人难以理解的问题。正如我们已经提出过的那样，这种过渡时期不是要废除市场、货币的权威、价值规律和按照社会的平均的劳动时间的“价值”出卖劳动力吗？如果货币和市场丧失了它们的现实性，又如何提取总的剩余产品和进行再分配呢？这种提取难道能够不以价值规律和它们的作用为前提吗？在这种社会变化中，思想、理论和知识又起什么作用？无法测量的“文化”知识的非生产性的劳动又起什么作用？

难道人们不会相信，在这样的一个过渡时期中，镇压性的国家还会以行政管理的一种国家形式残存吗？而这种行政管理的国家会不会被赋予这样一种可怕的能力：在超越各种盲目的决定论的同时，又会按照自己的意愿随意地运转整个社会呢？

八、右翼分子和左翼分子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刚刚形成，就受到攻击之苦。来自敌人的各种批评和攻击是再正常不过的了，而最可怕的是来自朋友与盟友的攻击。

“公认的”观点是，马克思在两条战线上进行着斗争，即既反对右的偏向，又反对左的偏向。大约从1860年开始，这种斗争就处于一种新的状态。马克思和恩格斯面对着一一种形势，在这种形势下，“意识形态的”斗争，也就是说理论上的斗争具有一种直接的政治意义。这种形势伴随着工人运动（即革命运动）中一种右翼和一种左翼的形成而产生。因而，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维护他们的正确路线，即正统路线，不得不轮流地同右翼和左翼进行斗争。

这种斗争是简单的吗？并非是这样。可以肯定，工人运动的发展经历了冲突和矛盾，右翼和左翼当时都属于它的一部分；还可以肯定，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上，特别是在国家的问题上还没有一种强有力的和已经明显确定了的系统观点。被后来

的“马克思主义者们”说成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正统理论，当时只构成一种经济主义（各种连贯的经济概念，从交换价值到剩余价值、到资本机制的组成，这些连贯的经济概念表现出似乎是必要的和足够的），然而，这种经济主义很快就表现出它的不足……

右倾主义者们和“左”倾主义者们（无政府主义者们）既有他们的理由，又有他们的信徒，甚至还很多。在这个时期，他们的理由和信使往往超过了马克思，这正是马克思的愤怒所在，这正是马克思进行愤怒的抨击的原因。

马克思是“中间派”吗？这种假设往往使教条主义者们厌恶。马克思当时动摇不定？他犹豫不决？也许还要更甚之。然而，哪里有右派和左派，哪里就有中间派。如何给中间派下定义呢？是属于第三条道路？是具有共同方向的道路？这条道路是沼泽、是智慧、还是选举主义？必须首先看论据，重新进行探讨，而不能预先加以区分。

拉萨尔想废除“铁的工资规律”。“铁的工资规律”这是一个大胆的公式，这个公式与马克思的工资与剩余价值的概念是不一致的。但它表明了实际存在的情况，这就是它能获得成功的原因所在。这样的公式加上它的有点虚伪的外表，往往比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更好理解。当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宣称，拉萨尔相信通过国家的帮助能够解决社会问题，甚至可以像人们建筑一条铁路一样容易地建立一个新的社会，马克思的话并没有错。外表上富有表现力的、“左倾主义的”公式，未能阻止拉萨尔首先接受现存的国家和，并且设想（最早的并且与马克思相对立）一种国家的社会主义。

至于巴枯宁和无政府主义者们，马克思批评他们是一种徒劳无益的活动，他们认为国家的立即废除似乎是可能的，以至于他们拒绝各种政治问题，这种非政治化的倾向给政治家们留下空场。

在直接革命的名义下，拉萨尔企图与俾斯麦相妥协，因而也就

是与容克们相妥协,以便反对德国资产阶级,并尽快地把它打倒。至于无政府主义者,表现出同样的不耐烦,他们取消了过渡的各种问题。其结果,正如马克思所说,他们在政治上给工人阶级解除了武装。

工人运动的“右翼——左翼”的分裂值得重新全面地评论与阐述。这种分裂难道不是在马克思之前亦已开始?尽管是马克思通过他思想的力量,即通过一种具有某种教条主义的倾向,或者正确地说,具有经济主义的倾向而首先加以强调和阐明的。经济主义和政治主义犹如自发主义和意志主义一样是对立的。这就解释了关于国家的运动在学说上破裂的原因。拉萨尔和巴枯宁难道不是代表一种政治上的思考(其中一个确切地说是:“积极的”,而另一个确切地说是消极的),而马克思难道不是局限于经济的各种概念之中?

在马克思之前,从19世纪初开始,先驱者们的思想就已分裂。我们先且不说布朗基主义者——普鲁东主义者的论争,而直接追溯到各种理论的起源。傅立叶是否处于“左翼”,圣西门是否处于“右翼”?

法伦斯泰尔组织包含着各种国家——民族的消失,这是很显然的。傅立叶的幼稚使他相信君主们和国王们、国家首脑们与民族英雄们都赞同他的学说,各种国家会自动打着旗帜兴高采烈地消融在法伦斯泰尔的和谐之中。他的这种幼稚,必然导致他在反对意见(“君主们和国王们手中拥有权力,他们又会用这种权力来干什么呢?”)面前,固执己见。

人们已经知道,圣西门的态度是暧昧不清和有意思的。让我们简单地考察一下,因为它能把我们立即带到一个中心的论题——国家这个论题上。人们把国家消亡的论题往往归因于他。

圣西门主张社会权力应由对人统治变为对物管理和对生产过

程的领导，他这种主张应该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马克思后来发展了他。但自那时以后，技术统治和新自由主义又限制了它，把所有问题都包括到一种技术解决之中。圣西门企图表达工业生产的各种可能性和展示工业的特效性，他建立了工业理性主义，这种工业的理性主义的某一个意思、甚至某一个观点可能曾受到马克思的指责，但它仍以技术统治意识形态的形式深入到现代世界之中。对于圣西门来说，工业本身包含它的终极目的：它产生繁荣、富裕、和平，工业制度本身能够、也应该以自治的方式运转，而不附属于一种外在的权威——道德的、宗教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这种外在的权威会发号施令。工业倾向于不受任何外在的统治，工业活动没有必要形成一种政治权力以便组织它的活动，作为它所建立的一种社会总体性来说，它排除对于它来说是外在的东西，它所必需的，它也就足够了。

工业构成一种制度，这就是圣西门的公设。我们承认在这个公设中，包含着现代世界的基础之一。但是，工业只有通过“干部们”的权力以及学者、技术员、工业的首领、银行家才能变成“制度”。同圣西门的“实业制度”，即“工业制度”的预示和设想相反，所谓的社会也不可避免地会建立起一种权力、一种权威。认为社会秩序必须以对事物的活动为目标，这岂不是空想！工业化的阶级必然攫取政治的合法权力。因此，工业化的阶级时而可以说是占有政治合法权力的阶级，时而可以说从根本上来看是政治阶级、有组织的阶级和领导阶级。

而这里必须再一次强调指出，有这样一些奇特的文章，它们禁止把一种明确的、也是最终的立场，即“政府是一种必要的祸害”这样一种立场，归因于圣西门。其实，在圣西门看来，政权时而表现为工业秩序和生产活动的一种工具，时而又相反，对于阻止无政府主义又是必要的。他认为，对政治的最高要求是一种轻松的统治，社

会的绝大多数人普遍的政治倾向是尽可能地被轻松地统治。这种统治越少越好，这种统治最好由有能力的人来进行，并以一种能保证公众平静的方式来进行。而在各种不同关系下使多数人满意的最好办法是由最重要的工业家来支配公众的命运，这是因为最重要的工业家们最关心公众的开支，他们也最关心限制专断的行为。

这正如 A·弗舍特(A·Vachet)所指出的那样，圣西门企图重建一种尽善尽美的国家权力，他对国家的批评没有超出“对国家的国家批评”的范围。他的主张首先是一种经济主义，这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制度，接着他与其说是转向，不如说是越出了经济主义而转向政治主义，以一种还很模糊的方式为国家机器和政府辩护。

“马克思主义的”问题系从地平线上升起；运动——工业对世界的改造，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从一开始就作为一个形成对比、甚至是冲突的整体出现。任何人也不能预先被排除出这个运动，任何人也不能被看作为是变节者。然而，对任何人来说，必须有一个标准，以便能够确定他的地位，或者能够对他进行评价。这里，我们只能以对待国家的态度为标准，也就是说，只能从在每一种特定的情况下和每一种特定的局势下对待国家的态度为标准。

人们会考虑，马克思在他的思想变成理论力量的同时，又变成了政治力量的时候，有没有陷入圣西门的进退两难的窘境中犹豫不决、或者用工人阶级代替圣西门的工业阶级的使命，即从工业劳动中得出一种它所包含着的连贯性与运动的规则，以便使经济的合理性得以展开和确立。新的阶级和它所进行的斗争，在清除政治权力、强制与专制的同时，变成社会历史的动力与秩序的调节器。然而，这必然被认为是一种回避、甚至取消各种政治问题的经济主义。或者各种政治问题与事件有一种含义（例如，法国和英国的侵俄战争，1870年的战争等），而这些紧急的事件支配着一种思

考和一种行动。工人阶级只有介入到这些历史的和具体的局势中才能作为政治主体竖立起来。而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就会跳跃出科学和可靠的体系，而把自己置于冒险之中；即跳跃出可靠性，而把自己置于各种战略和战术的赌注之中，置于冒险主义的范围之中。马克思将十分艰难地考察作为社会阶级、尤其是工人阶级的这种从经济向政治的过渡（跳跃）。

或者社会阶级是由经济方面来确定的；或者它是由政治方面来确定的；或者社会阶级超脱组成它的所有个体和他们之间的竞争〔“竞争隔绝所有的个体，这不仅表现在资产者方面，而且更加表现在无产者方面……”（《德意志意识形态》）〕。或者社会阶级只是个体的组合，只是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才相互联合起来，以便进行一种共同的行动，以至于资本主义只有通过各种物的力量才能延续。或者经济斗争已经政治化，这就如同《共产党宣言》所说的那样。——或者，政治斗争是以各种手段、一种组织本身、一种纲领与计划、一个党、一种意识形态或一种理论等为前提。或者工人阶级逐步削弱一种国家机器的专制，根据需要，在旧的废墟上加以重建。或者通过摧毁国家来解放群众的创造性能力。

附录：

一些重要的日期（根据J·弗雷蒙德《第一国际》，1962年，日内瓦版）：

1863年：

拉萨尔创立了全德工人联合会。

拉萨尔的纲领是：把资产阶级国家转变为人民的国家。

1864年9月28日：

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在伦敦圣马丁堂成立。

马克思于1864年10月写的宣言中指出：“夺取政权是工

人阶级的伟大使命。”

国际工人协会章程中指出：“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反对冷漠态度。”

1867年9月：

巴枯宁在瑞士创建了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并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

1867年：

国际工人协会在瑞士的洛桑召开代表大会。李卜克内西、倍倍尔参加了这次会议。在通过《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的决议中指出：“工人的解放是与他们的政治解放分不开的。”

1869年：

爱森纳赫代表大会，成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

1871年：

伦敦会议，开除了巴枯宁。重申国际工人协会的最终目标是：废除一切阶级。

1872年：

海牙代表大会，决定把第一国际总委会迁至纽约。

1876年：

第一国际总委会最后一次代表会议，通过的宣言中指出：支持所有倾向于我们的目标（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的政治运动。正式宣告第一国际解散。

九、马克思主义 与国家(续)

显然,从一开始,马克思就能够想到,工人们期待着他——他们期待着“马克思主义”,以便使他们能够作为阶级和政治主体完全竖立起来。这正是不久以后列宁以一种教条主义和生硬的方式所说的。马克思犹豫过吗?肯定的。理论应该澄清经济与政治之间的联系;假使人们期待着这种理论是为了从其中的一种过渡到另一种,难道不会引起一种恶性循环吗?这样理论就成了公设,而这种公设是以本身尚待证明的判断作为论据的。而且,更主要的是,无论是巴黎公社的社员们,还是德国的工人们,都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其出发点。而这样的历史事实同样应该进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马克思了解这些吗?《哥达纲领批判》的语调和内容表明:他是知道的。马克思正是以一种难言的、甚至不能够直接表达的愤怒目睹了拉萨尔死后所取得的成功。

在总体性上和在其的矛盾冲突中看待“马克思主义的”运动,这是重新认识 19 世纪下半叶政治舞台的唯一方法并能为分析 20

世纪的情况做准备。哪里各种可能性的症结能迎刃而解，哪里一种未来就能被确定，一种前途就得到保证。未来的社会、国家将会变成什么样子？是没有国家的社会？还是国家被加强了的社会？斯大林在几十年之后宣布，必须加强国家，而“国家的消亡并非来自于一种权威的消弱，而是来自于它的加强……”斯大林的这种说法是够大胆的，这对于《哥达纲领批判》和它的最后一段话来说，是一种多么令人痛心的反响。然而，人们未曾预料到这一点，人们的思想总是停留在最初的十字门口、最初的方向上，停留在1871年的环境之中。

巴枯宁关于国家的立场和态度是坦率的、清楚的、甚至是粗暴的。

在他看来，国家应该立即废除。他说：

“拥护自由，是做人的首要条件。我认为，平等，应该通过在各个公社中自由地组织和联合起来的生产联合会这样的自发性的劳动组织建立起来，应该通过同样是自发性的公社的联邦制，而不是通过国家的最高的和监督的作用，在世界上建立起来。”

由此可见，巴枯宁的观点，比斯蒂纳的观点更加扩大和更富于集体性。斯蒂纳的观点严格地说来是个人主义，尽管很多法国知识分子是按照马克思带有讽刺性的一个词“普鲁东化的斯蒂纳主义”，来说明斯蒂纳主义是个人主义与群众性的混合物。

巴枯宁接着说：“对国家的专制制度的拥护与否，这是区分具有革命的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与极权的共产主义者的主要之点。他们的目标是同样的：都是在集体劳动的组织的基础上创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他强调并明确地肯定：社会主义是以劳动和劳动者（意指使用和经营物、工具和材料的体力劳动者）为其出发点的，一种已经社会化的劳动的社会组织是作为一种自然的必要性而成为必要的。这是“通过各种物的力量来达到的”，而“共产

主义者自以为自己能够通过工人阶级的政治强力的发展和组织而达到，特别是通过各个城市的无产阶级并借助于资产阶级的激进主义的帮助达到——但革命的社会主义者的看法恰恰相反，他们认为只能通过非政治化的，但是社会化的（即无论是城市和农村的群众以及所有好心的人的反政治化的）强力的发展和组织来达到这个目的。”^①

巴枯宁用经济主义指责马克思不是没有论据的，教条主义的革命者，例如马克思，把他的国家主义掩藏在他的经济主义之中。对于马克思来说，“各个国家中的政治国家，都是这些国家经济状况的产物和反映。”在巴枯宁看来，马克思没有考虑到经济是有别于历史的；他不懂得政治的、法律和宗教的各种制度（换一句话说各种上层建筑）对经济本身的作用。巴枯宁指责马克思无限地相信普选，而且也指责他的科学主义和他的用国际主义掩盖下的民族主义；巴枯宁还指责马克思关于建立一个政党的设想，这个设想对于巴枯宁来说似乎是极其可怕的，因为，在他看来，政党的本性是维护国家。“国家把重新制造不幸当作它存在的条件；因此，为了废除不幸就应该废除国家。”巴枯宁由此表示，国家与无政府主义，只能二者择一。国家在他看来，无论如何也不是社会的产物，也不是阶级对立的结果，而恰恰相反，国家则是社会与阶级对立的原因。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家起源的公设是站不住脚的，同样他们所认为国家通过发展而衰亡和消失也是一种空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公社面前所表示的敬意是被迫的，是违背他们的本意的。在巴枯宁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实际上赞同他的看法。“这是一种滑稽可笑的乔装打扮”，它导致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中所出现的勃论：作为这样的国家的第一个行动事实上是以整个

^① M. 巴枯宁《从战争到公社》，安特罗波斯出版社，第407页。

社会代表的身份出现，并以这个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而与此同时，也是作为国家最后一个行动。国家不是被废除，而是将自动消亡。

巴枯宁既不相信人民的国家，也不相信国家会渐渐地被废除。在他看来，当马克思的信徒们预测一种过渡，在这个过渡中，人民可以通过自我教育以便使国家的作用变得无效时，他认为这是一种骗局。在巴枯宁看来，国家从来也不会失去它的政治性，因而也不会失去专制性。同他们所说的话自相矛盾的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者们用创造一种集权制的国家取代了他们所设想的国家的消亡；而这样一种国家同样孕育着专制主义和不幸。马克思的信徒们为了解放群众，其结果是开始奴役群众。是以什么样的名义呢？以领袖，以学者？两者兼而有之。“被赋予权力的学者同样会变成像神甫一样的专制，他们是具有知识的神甫……”科学的骑士如同所有那些以特权的名义企图统治群众的人一样反动。

巴枯宁说：“我们憎恨专制的原则，这种原则表明对权力、对专制的渴望。”换句话说，巴枯宁极力反对强力的意志，“我们相信，所有的政治强力对于统治者来说，都是一种腐化的根源；对于被统治者来说，都是一种被奴役的根源。国家就意味着统治，而所有的统治都必然会导致剥削”。巴枯宁由此指责国家的原则本身和作为权力斗争的政治的基本特征，“没有、也不可能有一种与坏的国家相对应的好的国家，没有、也不可能有一种与专制的国家相对应的善良的国家，没有、也不可能有一种与极权的国家相对应的自由的国家”。巴枯宁的批评包含了所有的政治形式。^①

是否需要为拉萨尔恢复名誉？在某种程度上需要这样。马克思所给予他的猛烈的抨击，在历史面前标出了他的形象。为了恢

^① A. 勒南恩：《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复真实,应该指出,同马克思主义相违背的拉萨尔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占了上风。F·拉萨尔创立了国家社会主义,而在今天,在世界上,除了国家,并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巴枯宁的各种抵制与否定总是起到一种酵素的作用,但他没有“创立”任何能持续下来的东西。至于马克思主义,那些自称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则以一种马克思曾经公开奚落的方式解释马克思主义。而在马克思死后,他的被科学主义的学说主义所掩盖的思想,难道不也遭到了非难了吗?然而,我们既没有必要责难马克思,更没有必要责难巴枯宁和拉萨尔。各种划分、各种倾向应该说是几乎是同时形成和发展的:无论是作为理论的作用,还是作为分歧的原因,都是这样。

F·拉萨尔是一位具有有一种极端复杂性和令人困惑的具有独特性的人物。我们从恩格斯那里,特别是从马克思那里感到了一种企图贬低盟友的个人的猜忌。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关于拉萨尔的通信的语调中常常表现出不满的情绪,这同马克思和拉萨尔之间的通信(从1848—1863年)的语调是很不相同的。在公开的场合,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拉萨尔的评论是有分寸和谨慎的,而在私下,他们总是带着一种蔑视的态度谈论他。

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理会,拉萨尔具有一位民间演说家的风度与口才,群众爱听他的演讲;他创立了一个大的政党,他是一位杰出的和受人爱戴的人物;他在古希腊语言哲学研究方面享有威望,他写过一部关于赫拉克利特的著作;他善于处理各种平凡的问题,他写过一本关于间接税方面的小册子。总之,他的才能是多方面的,他的口才难道不符合修辞学上的语言吗?当然符合,这特别表现在他的政治方面的辩解能力上。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的才能不屑一顾并且加以讽刺。他们不知道如同我们今天所说信息的传递,直到最后因闭塞和忌恨而逝世于伦敦和曼彻斯特。毫无疑问,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期待着资本主义在发生一次经济危机之后将

导致经济上的崩溃,只到很晚,即1895年,在《〈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导言》中,恩格斯才承认,历史并没有为这个虚幻的论题提供理由。

为了恢复历史的真实,这里需要再提及一下拉萨尔。

F·拉萨尔于1825年4月11日出生于德国布勒斯劳的一个信奉犹太教的批发商家庭。他在布勒斯劳科学院的学习成绩卓著并且成为一位著名的古希腊语言学者。自他上科学院起,他开始崇拜赫拉克利特和黑格尔(见拉萨尔的著作《资本和劳动》,布鲁塞尔,1881年)。接着他在柏林学习法律和政治经济学。在1846年,在巴黎期间,他经常与H·海涅(Henri Heine)来往。诗人在给他的朋友V·昂斯(Von Ense)的一封信中以一种赞扬的口吻谈到了拉萨尔:“拉萨尔是一位极具有才能的青年人,他的知识广博和非凡的洞察力,是我从未曾遇到过的。他的行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意志力和灵活性使我感到很吃惊。拉萨尔是新时代的真正的儿子,他丝毫也未曾染上我们这一代之中或多或少所沾染的虚伪的品行……”

当然,这里不是详细地讲述拉萨尔短暂而闪光的生涯以及他同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私通和他在狱中情况的地方。1862年4月12日,拉萨尔第一次面对一个大的工人集会发表演说,他在其演说中宣告,第四等级的国家即将到来。他鼓励工人要求普选,并以《工人纲领》为题被发表,由此他被判处4个月的徒刑。从此以后,开始了拉萨尔的宣传家的狂热的生活,在此期间,他跑遍了整个德国,从一个城市到一个城市煽风点火。在两年中,他终于创立了一个工人社会主义政党。拉萨尔是一个充满活力的鼓动者。这位有能力而又具有模糊的革命浪漫主义的天才人物最终由于一场决斗而过早地结束了生命,这场决斗是为了争夺一位年轻的女子而发生于1864年8月28日,于日内瓦附近的卡鲁热(Carouge)。

为什么会形成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一方、以拉萨尔为另一方的对立呢?

这是因为一方运用的是概念与构想, 另一方运用的是实际经验。他们之间的差别是两个极端之间的差别, 他们之间存在着长期的误会。拉萨尔具有获得实际经验的才能。当马克思批评拉萨尔缺乏精确性与严格性时, 马克思理所当然是对的。但是, 对于拉萨尔来说, 他既有语言, 又有行动。拉萨尔主义, 也就是说国家社会主义压倒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历史的”事实之所以还没有被承认, 是由于人们对他们所处着的 20 世纪所出现的现实的忽视。如果说拉萨尔主义占了上风——尽管人们对此感到遗憾——这是由于拉萨尔一方所具有的活力。如果把知识放在一边, 孤立的概念会有生命力吗? 没有。旨在针对拉萨尔主义的《哥达纲领批判》的字里行间也表明了这一点。表明误解的深度和必然引起马克思恼火的是, 拉萨尔, 这位“实践经验”的天才, 自认为他所讲的话具有严格的科学性。那么, 拉萨尔的科学性又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拉萨尔的科学是简单的。他没有使用阶级这个概念, 尽管他所推崇的黑格尔已经为他提供了这个概念, 而且把这个概念制定得很完善, 尽管“阶级斗争”是符合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拉萨尔坚持“第三等级”意思上的“等级”概念, 这就是说坚持旧的社会中有各种“等级”。对于拉萨尔来说, 国家中有四个等级: 教士、贵族、资产阶级(第三等级), 再有就是工人这个等级。拉萨尔赋予工人等级一种历史使命, 即掌握国家权力的使命。他说, 其实, 国家受到组成它的那些人的影响。对于他来说, 在成为历史哲学一部分的历史延续过程中, 国家留下了各种不同“等级”的印记, 或者更确切地说留下各种不同“等级”原则或黑格尔意思上绝对精神的印记。在封建时代, 土地所有制占统治地位, 接着统治转到了不动产所有制, 19 世纪的国家是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每一个时

期的绝对精神和抽象的原则是相吻合的，尽管拉萨尔——是马克思和黑格尔的折中——强调绝对精神在经济和生产中总是有它的基础。历史的以前的各种形态、各种“等级”、国家以前的各种形态并没有消失。这些形态继续留在以后的历史时期中，只不过这些形式是由新的原则支配，这种新的原则构成了更高的要求。

在拉萨尔的思想中，可以找到一些论点既深远、又使人或多或少感到陌生的渊源。按照这些论点，国家构成了一种要求和一种水准——建立在历史以前力量基础上的水准——而这种水准又表达了生产活动的最近形式。拉萨尔当真相信封建地主还能构成一种进行统治的社会和政治力量吗？这不能肯定。在他看来，统治将转向工人阶级，如果工人阶级能够迫使国家接受自己的影响，并且首先介入权力之中的话。因此，工人阶级的使命是控制现存的國家，而又不打碎这个微妙的工具，这是理所当然的。也就是说不要结束国家所日趋合理的普遍性。那么又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呢？通过依靠人民运动所进行的普选和议会的斗争来实现。

由此可见，在拉萨尔主义中表现出两个观点，这两个观点也就构成了拉萨尔主义。这两个观点是：国家的历史连续性观点和统治观点。而正是这两个观点导致了严重的后果。连续性的观点包含了对各种国家制度（以及它们的必然结果：各种政治结构）赖以建立起来的各种过程的全部或局部的接受。这样就大大地限制了各种纲领或者革命计划的意义。至于统治的观点，它包含了对各种完整的过程的发现和运用，而通过这些过程，能够实现这种统治的政治力量将在它的周围建立起或重新建立起一种社会的或民族的统一体。

在德国，由俾斯麦所肯定的国家强力连续性使得国家的强力得到加强，并且使工人阶级与之一体化。工人阶级表现出无力掌握政治上的领导权，无力阻止战争，无力抵制法西斯主义。当然，

既不能肯定、也不能确知另一种政治方向和另一种口号(“打碎国家”)就一定改变事情的过程。

拉萨尔是一个叛徒?这说得很容易。马克思是谨慎地对待他并避免公开地攻击他。在1860—1870年期间,俾斯麦又是如何表现的呢?他如同是德国统一的支撑者(德国的这种统一由于革命的途径而失误),他如同“来自上层的革命”的代理人。马克思本人在1870年则向欧洲最反动的势力波拿巴主义宣战。但历史性妥协很快就开始。俾斯麦的事业的恶果和拉萨尔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风险只是慢慢地表现出来的。确实,半个多世纪之后,俾斯麦——拉萨尔的这种意外的结合就表现了出来。这种结合变成了一种巨大的、现代世界上第一流的强力——德意志国家。这种国家成功地平息了工人阶级自治的作用,并且在希特勒的国家中达到了顶点。然而,在德国之外,国家社会主义在几乎相同的土壤上产生并且同发展到顶点的德国的国家帝国主义相抗衡。这种巨大的国家强力之所以能够实现,当然也需要拉萨尔主义之外的其它因素,但拉萨尔主义首先是必不可少的。

对历史的讽刺的是:从1860年直到他去世时为止,在德国,拉萨尔所起的作用,与葛兰西所说的“有机的知识分子”所起的作用难道不是一致的吗?拉萨尔不是从外部同他所代表的阶级相联系,而是“有机的”同它相联系,也就是说,他致力于在言论上和行动上表达它和组织它。拉萨尔所起的作用并不是人们常说的一种表面作用,“全德工人联合会”(1863年)是一个真正的组织,甚至是一个政治组织,如果通过某些改造,注定会变成制度上的组织。

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的拉萨尔思想的力量还有待说明。拉萨尔思想的力量难道不在于他的言论和立场确实已经政治化了吗?而马克思则热衷于制定一种严格的概念化经济体系。拉萨尔把德国工人阶级的默默无闻而又不景气的实际状况,用政治语言

表达了出来；而与其同时，马克思只是提出了一种科学主义。人民群众只是为了土地、为了自由、为了一种新的生活，才能够被动员起来。如果只是为了为一种剩余价值的理论（不管这种理论制定得如何严密），他们会起来战斗吗？

后来的一些事件并没有少受拉萨尔思想的干扰和影响。在拉萨尔之后，尽管有巴黎公社的回忆，尽管有《哥达纲领批判》和恩格斯的最后时期的著作，国家的全部干预作用最终还是转向了社会主义制度。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今天需要恢复《哥达纲领批判》的原则。今天的读者可能会越来越领会这篇文章的重要性。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对拉萨尔批评已不再是谨慎与克制的了。但这已经为时太晚。拉萨尔的影响已经牢牢地确立和很难动摇了。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强调理论的重要性，他重申了理论（并非针对实践，而是针对政治上的经验主义）的首要地位。他反对接受已经既成的事实。在他看来，只有理论能够表达什么样的社会作用在过渡时期中的国家中能够维持。马克思为了恢复各种概念的首要地位，他不只是批评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即“正统派”的辩解），而且也批评了在革命的词藻掩盖下的咬文嚼字。但这往往是徒劳无益的，各种概念没有能够达到同现实存在相衔接，没有能够越过把概念同实践相分离的间隔。因此，从一开始，马克思的这篇文章就被窒息；没有被发表，未被理解，甚至被歪曲。然而，这是一篇少有的文章，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和作为政治家的马克思明显地开始结合起来。

这篇著名的文章值得进一步深思，但是除了经济概念之外，必须围绕着国家这个中心来深思。我们必须抓住其中的某些用语、某些方面。马克思所设想的“完全的”革命，在他的思想上从来也没有能够超越某一种二重性：政治的与反政治的，民主的与专政的，

经济的与政治的,完全的与局部的,革新的与破坏性的,等等。

为了能更好地理解这些二重性的意思,让我们来比较一下马克思下面的这两句话:

“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站在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①“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专政。”^②

应该说,马克思未能很好地区分组织与制度。他是设想了一种没有制度的国家组织吗?人们可能会表示赞同,但人们忽略了一种危险,即国家必然会制度化的过程,越过了马克思的视野;另一方面,对于马克思来说,从属于社会的(市民的)国家又与无产阶级专政同时发生。让我们再一次强调一下这种会使人感到意外、而且肯定又被斯大林时期搞混乱了的的同时性。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从属于社会因而也正在消亡的国家不再具有政治职能,或者更确切地说,随着民主的深入和无产阶级专政对这种民主深入的实施,这些政治职能看来已经消失,国家根据市民的需要管理着社会、管理着社会带有普遍性的事务,这些需要是共同的、社会的,而不是个人的。这种管理着如此之多的重要事务的国家难道不会变成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实体吗?在马克思看来,既负责科学、又负责教育和公众健康的国家正在失去、或者确切地说已经失去它强制性的权力。那么又是如何实现的呢?通过革命本身,即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本身。这种政治草图难道就比旨在改变所有生产方式的彻底革命草图更现实、更少具有空想的成份吗?这是值得考虑的。当马克思写出《对德国工人党的几点意见》(《哥达纲领批判》的确切标题)时,难道不是为时太晚了吗?既然是这样。方向已经形成,没有人会从已经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页。

制定的概念和知识与认识的意义上理解它。现代国家的列车沿着它自己的轨道飞速驶去，这必然会导致它发生各种意外事故。这种政治前途，马克思察觉到没有？但是不可能像我们现在这样察觉得到，而只能以他当时的方式去认识。马克思当时的巨大苦痛就表明了这一点。马克思已经知道，没有、也不可有一种“马克思主义”，如果不这么认为的话，倒是一种故弄玄虚。但马克思知道，已经有一种拉萨尔主义，而正是拉萨尔主义预示着（对于这一点，马克思并不知道）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不要忘记还有其它“主义”……而且，马克思也不可能预见到，同他的思想毫无关系的（甚至在意识形态方面）各种国家和政治形式有一天会倚仗他的名声，并且声称同他的理论概念“科学地”保持一致。至于马克思本人，他毫不犹豫地超过了“对国家的国家批评”的范围，而从圣西门到今天，自由主义，甚至是“先进的”自由主义总是没有超出这个范围。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马克思思想的一个伟大的、甚至是最伟大的教导。

十、十九世纪末期的 修正主义与正统派

“修正主义”这个词交了好运，如果说它曾经有一个明确的定义的话，它已经失去了这个明确的定义。在 19 世纪最后的年代里，它很不幸地被当作各种实际的理论斗争的赌注。到了 20 世纪，它又变成了一种习惯的带有侮辱性的词，变成了一种为了回避争论而甩到政治对手头上的广告性的评语。

“修正主义”这个词起源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的分裂和多样化，这种分裂和多样化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之前亦已开始，在他们逝世之后，这种分裂和多样化发展得更厉害了。因此，“修正主义”这个词起源于“马克思主义问题系”本身，而且有它相对明确的内涵，这就是说，存在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而在这个“真理”周围的则是谬误、偏向和谎言。以下就是这两个相关联的隐喻的明确的公设：一个是作为知识轴心的正统观念，一个则是充斥着谬误的修正主义。

那么，确定这个轴心通常的标准又是什么呢？在开始的时候，

这不是一种认识论上通常的标准，对这个标准的响应是很晚的事情。其实，这个标准是经验主义的，这是一种比另一种立场似乎更加革命的立场，因为这种立场预示着未来的革命（无产阶级的）。人们就把这种立场称之为是比较正统而并非修正的立场。然而，事实上，这种立场所预示的革命往往变成一种人们所不希望的灾难。

攻击修正主义者伯恩施坦的正统派考茨基不久也被列宁当作修正主义。不要忘记，罗莎·卢森堡也曾受到过几乎同样的对待。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这完全是由于随着资本主义的延续和经济上的成就而发生的战争，是由于借助于社会民主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的巩固。资本主义的这种幸存证实了工人阶级的失败，导致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争议和重新解释。

“修正主义？”其实，很容易指出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们自己的各种理论概念、尤其是在关于国家这一中心问题上，也进行过多次的“修正”和重新考察，而且还在同样重要的经济决定论，即经济主义这个问题上也进行过“修正”和重新考察。时常被看成是笨拙的教条主义公式的经济决定论，在历史上也曾被其它公式、尤其是被晚年恩格斯的论述加以缓和，使之并不能看出与教条主义有什么明显的联系。

考茨基在《马克思主义和它对伯恩施坦的批评》一文中认为，由于基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一种变化而引起上层建筑（法律的、政治的）的改变并不必然会引起一场激烈的革命，而是可以通过一系列的改良逐步实现。在他看来，他的这种讲法仅仅是解释了恩格斯最后的一些提法，其实，他滑到了他所批评的伯恩斯坦的同一种改良主义上去了。接着，成十上百个“马克思主义者”为了解释各种上层建筑的作用，进行着同一种推论，并自认为是一种创造，他们无数次地发现，各种上层建筑并不是基础的消极的“反映”，而它们本身也在“反映”。当考茨基也承认一种通过暴力夺取

政权的可能性时,当他认为各种上层建筑又不能适应时,他并没有少采取强烈革命的立场。^①由此可见,“正统派们”或者自认为是正统派的人,动摇于政治上的经验主义和主张暴力的具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态度之间。

考茨基企图制定这样一个由马克思留下的既肯定又尚未成形的概念:无产阶级专政。他想捍卫的即使不算是现存的资产阶级民主,至少也是民主的原则。他在《无产阶级专政》一书(法译本,法国联合出版公司1972年出版)中写道:“民主使得那些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人在他们的事业中能够赢得劳动群众的大多数。”他认为,应该首先说服这些人去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即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他补充说,还必须保护少数和弱者。他认为,民主能保证阶级斗争正常和持续的性质,这是一个出色的用语,它应该传诸于后代,当少数变为多数,那么阶级斗争就能够达到消灭阶级的。他认为,这将通过议会道路进行,而议会道路丝毫不排除使用暴力以便击败资产阶级的反抗。在他看来,通过民主的试验,在各阶层工人参加决定的过程中,劳动群众是能够通过合法的手段取得权力的。

考茨基还在该书中提出社会主义是以普遍的福利为目的(这是多么无力的定义!)的口号,而无产阶级专政,在他看来则意味着:保护多数和他们的利益而反对资产阶级少数。“为了社会主义得以发展,不仅需要各种矛盾的成熟和需要工业发展的必要水平,而且还需要无产阶级的成熟”。为了使工人阶级能够成熟起来,民主是必要的。考茨基几乎没有深入钻研他的自然主义隐喻的含义。我们已经知道,他的此类想象经常会代替企图达到概念化的连贯的过程中的各种概念,这类想象只是被当作一种托词。由此可见,

^① 考茨基:《社会革命》,1912年,巴黎。

考茨基的这本书包含着一些使人意想不到的用语，例如，“一个阶级能够统治但并非同样能够主宰……”这样的用语。

是否应该回顾一下这种疑难？时而马克思赋予资产阶级一种历史使命、甚至是一种革命使命，即把生产力发展到某一种很高的程度，尽管其界限并未能很好地确定；时而，他又肯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束缚、直至阻碍生产力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增长。这个基本的理论问题，即资本的积累的可能性问题并没有引起理论家们的争论，而只有罗莎·卢森堡论及了这个问题。作为理论的论据，这个问题是卢森堡主义的组成部分，而并不是19世纪末德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领域。提出问题，这已经是以某种方式解决问题。这足以使教条主义的各种弊端变得显而易见了，而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正是通过一种反映而趋向于这种教条主义。这个基本的理论问题只是被确定在各种经济问题的周围而并没有探究这些经济问题的本质。政治经济学是作为政治的一种托词而起作用的。由于根本的问题是称之为“上层建筑”的国家这个问题，这些理论家们从上层建筑跳到在各种结构之上的基础，并在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各种因素和表现之中动摇不定。其顶点是冷酷地宣称，资本主义并非起源于生产力的增长，而仅仅是起源于对工人群众的剥削。就好像通过劳动的组织和分工的工人阶级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不是如马克思所说的是一种生产力，而只是与自然、技术、知识一样；就好像剥削并没有给各种投资（固定资本的增长）提供场所。

关于考茨基，从现在起应该提醒那些把他已经忘记的人或者还在继续搞乱线索的那些人注意到，他曾经为列宁提供过不少一流的观点。应该把考茨基放到他应有的位置上：理论的头，他同样属于“马克思主义”。这个头虽然有点虚弱，但是是顽强的。是谁第一个理解了农业问题的重要性？是考茨基，他在他的《论农业问

题》中考察了这个问题，是谁把政党设想为认识的“主体”，并把它引进了工人运动？又是谁想出了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结合成一个单一的用语：辩证唯物主义？是考茨基。

然而，我们没有必要讨论有关起源与席次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随着产生它们的教条主义本身的消退会自动地消退。教条主义，当它纯粹地变成一种警察镇压的作用时，它本身也会自动地衰败，它的失败的命运必然如此。

伯恩施坦是拉萨尔主义的直接继续，因而也是黑格尔主义的继续。在伯恩施坦看来，不可能存在能够动摇资本主义的社会与政治结构比较深刻的经济危机。马克思所预示的迫在眉睫的灾难当时不可能发生。进化胜过革命，经验主义和策略上的考虑和估计胜过革命的浪漫主义。社会主义的思考致力于什么？致力于价值，这就是说致力于各种伦理价值，这些伦理价值来源于康德、优先于各种事实和各种假的经济决定论。应该指出，在这些论争中，伯恩施坦不再讲到生产的本位主义，甚至也不再讲经济主义，而是讲“经济学的优先”，哲学——政治的各种讨论都应该围绕着这种“优先”。

什么是国家？在伯恩施坦看来，国家是进化的，它本身是中性的并处于各个阶级之上，它是斗争的目标。应该夺取国家，而主要不是摧毁国家。作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延续的社会主义可以通过缓和阶级斗争、甚至可以通过排除无产阶级的斗争来实现。这正如拉萨尔所想象的那样，历史将从封建专制主义过渡到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并由此过渡到伦理社会主义。历史的规律就是伦理的进步。至于民族国家这个概念，它在伯恩施坦的著作中，与其说是明确的，不如说是含糊地加以接受。^①他把对民族国家的争论转向

^① 见《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J. 德罗兹主编，法国大学出版社，1974年出版。

围绕对“国家”抽象的争论，而并没有针对民族国家的具体现实。民族国家的现实是它有时会转向帝国主义。简言之，伯恩斯坦主义是以道德哲学为基础的，而占优势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忽视了《哥达纲领批判》的卷头语，即在承认民族国家的同时，应该承认各种国家的制度和一种世界的形势，也就是一种世界范围的战略。这正如马克思不止一次地所说的那样，伯恩斯坦对民族国家的这种承认连自由派的政治水平都不如，自由派们还知道分析国际形势和重视世界的现实。这正是伯恩斯坦思想的写照。由此看来，伯恩斯坦的思想不只是“修正主义”，而且是无力的伦理主义。社会主义变成既是伦理的，又是议会制的，因而也是依靠国家的。这种改良主义是软弱的，它用伦理主义同纯粹的实证主义相对立，跌落到哲学的模糊的人道主义的闲聊之中，同比较模糊的各种经济论述本身相重迭。这种空话，其调子和修辞早在19世纪初期就在法国出现。伯恩斯坦的思想代表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的一种退化，并同一种严厉而又僵化的教条主义形成对称与对立。

在这个时期，第二国际企图为工人阶级建立马克思在第一国际解散后所说的那些“国际职能”。它在其代表大会上提出了战争的问题，但其作用并没有能维持多久。民族国家通过一场“历史性的”运动而明显地占了优势。1914年，国际主义的各种尝试都显得无能为力。

今天，在很多人的眼里都视为最大胆的一个论点是：“在德国，依靠它的20世纪初期所达到的世界上的第一流的工业，由俾斯麦和他的继承者们所巧妙地支配的资产阶级国家，尽管它启动只是在1870—1871年的战争以后的事，但还是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把工人阶级纳入了自己的轨道，使工人阶级接受了议会制的准则，并放弃了革命的立场等。”

简言之，人们几乎重新提出对第二国际和社会民主党的著名

指责。人们既然也就会想到是否必须修改原有的结论，即：“德意志国家的一部精确的历史和一部紧凑的家谱表明：社会民主党的构成要比德国的右翼要好，它是由一批活跃的、有创造性的优秀人物组成的，它能够不断地引导各上流阶层。不管它是否愿意，在反对容克阶级的斗争中它已成为政治上的领导阶级的一部分。至于工人阶级，它不可能起一种消极作用，何况它还代表着德意志帝国内部各个封建国家中的一种民族统一的因素，尽管在德意志帝国内部，当时一些封建国家还存在着国王（例如巴伐里亚，萨克森）。正是具有这种统一的特征，和它所提出的全民族范围内的各种问题，工人阶级必然会在德意志国家的各种制度的产生中发挥一种作用，这里且不说在意识形态中发挥作用。这种作用在法国和英国也同样表现了出来。因此，必须肯定：工人阶级和它的代表们不只是被动的被纳入者，而是积极的参预者。但这必须经过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经常性的冲突才能达到，正是由于工人阶级和它的代表们承认民族国家，因而才能够成为民族国家中的一个因素。至于工会官僚主义，它产生得很早，几乎是与议会官僚主义同时产生的，但不久就受到了第三国际的激烈抨击，这种抨击不是没有充分理由的，因为这种变化在 1914 年就找到它的逻辑结论……”

十一、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和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让我们再强调一下，不应该把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思想运动仅仅归结为“马克思主义”，甚至归结为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而应该把视野再扩大一些来看待这个问题，从总体上来考察这个问题，既不要分“左翼”和“右翼”，也不要把真理归于这个人或那个人，把偏差和错误归于另外某个人。这难道不是把“马克思主义”从停滞、甚至变质的境况中摆脱出来的唯一的办法吗？必须把有关的每一部著作既当作有关政治上的某种可能性的一种假说，又当作有关未来前途的一种障碍。很可能，如果没有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们”，现代世界不会出现现在这样的形势；也很可能，即使这个人或那个人并不存在，世界的战略方向 and 选择也会被确定。同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们”的预料相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生产方面不是继续在发展吗？革命方向向农业国家的转移也并不取决于这种或那种理论和意识形态。是形势产生出各种理论和意识形态，形势既不是像习惯上所说的那样，是理论和意识形态

的“机械的”实现,也不是理论和意识形态的“机械的”结果。

罗莎·卢森堡的假说值得一种深入的考察。为什么呢?有很多原因。把卢森堡的各种论点组成一个整体,即“卢森堡主义”来加以全盘接受或加以全盘否定,同把她的经济观点和政治观点加以孤立地考察一样是错误的和虚假的。罗莎·卢森堡同列宁的重大争论,尤其是关于工人阶级与党内的民主问题、关于自发性问题的争论,掩盖了她的基本理论成果:资本积累的理论,资本主义的中心地带和外围地区的区分和联系的论说。

罗莎·卢森堡的思考与众不同,按照她的看法,资本主义将会自行崩溃。然而,资本主义依然存在着,这又如何解释呢?

这里只有傻瓜才会嘲笑这种看法。由于无知,他们不知道各种重大的思想理论问题是如何表现出来的。埃利亚学派不是也曾经指出过运动是不存在的,因为这是难以理解的(根据在芝诺时代哲学所掌握的范畴和概念)。同样,卢森堡的看法也是根据当时的条件和所掌握的情况而产生的。

让我们重新回顾一下马克思的分析。马克思是从一系列等价关系开始的,这些等价关系在形式上反映了交换价值的一种流通、贸易的一种网络。至于各种商品是通过掠夺、盗窃手段得来的或者是按照异乎寻常的价格出售,这都无关紧要。这种等价关系贯穿于各种事实和运用于调节,这样就形成了流通(可以回顾一下最著名的例子:古代的地中海地区就是这种情况)。而生产者 是农民和手工业者。在几个世纪中,各种流通一直处于稳定状态,交换的形式上的关系并没有打破生产者之间的个人的关系。

这种构成一种流通与周转的等价关系只是当劳动力的买卖,即社会劳动时间的买卖出现的时候才被打破。这种状况的出现包含着从手工业到工业企业的过渡,并伴随着生产力与生产资料的分离。这种分离从此一直延续下去,并且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

时期末期开始,也在其它地区(例如大西洋沿岸地区)实行。这样,一种新的等价关系就在以前的基础上趋于形成。这种等价关系具有它的典型的形式:

$V = c + v + pv$ (这个 V 代表了生产交换价值的总和, c 代表固定资本,即投资, v 代表可变资本, pv 代表剩余价值。)

有必要重复一下:只有等价关系能保证社会的协调一致性和整体逻辑的协调一致性,保证社会的调节和再生产。

然而,罗莎·卢森堡认为,等价关系只允许简单的(相同的)再生产,如果要扩大再生产,这就是说要进行资本积累而不是利润的储存,那么这个等价关系就会被打破,而人们就不再知道这种“体系”如何运转。因为对扩大再生产起决定作用的各种投资不会不损害这种等价关系。而这种投资又是如何得来的呢?工人阶级只能接受 v 的总和才能购买他们用 v 的总和而生产的产品。而产品的总和 V (其中 pv , 即剩余价值决定交换价值) 能被资产阶级本身全部购买下来吗?这是不可思议的。

为了实现剩余价值,必须使等价流通能处于一种螺旋上升状态,以便使各种流通能把剩余价值带进一种积累运动。

罗莎·卢森堡在她的《政治经济学导论》中指出(并非直接攻击马克思),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流通和周转相互重迭,而马克思并没有从历史上和理论上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在《资本论》中,扩大再生产的图式是以实现剩余价值没有问题为前提的。

她认为,按照马克思严格确定了的这些概念来看,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存在着的。如何解释这句话呢?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释,也就是说有双重意思:

a) 资本主义为它的形成和存在而斗争。又是如何斗争的呢?是通过侵蚀和破坏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而达到的。资本产生于

非资本主义结构的破产, 资本主义需要这些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和非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 “就像需要一种喂养它的土地, 正是依赖于这一土地, 积累才能够通过对这一土地的榨取的过程继续下去。”这正如罗莎·卢森堡在《资本的积累》一书中写道的那样, 资本主义在形成的过程中, 它践踏了农民, 践踏了非洲、亚洲, 即资本主义中心地区以外的外部世界, 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外围地区。

b) 如何实现剩余价值呢? 剩余价值并非是在资本主义“内部”实现(这个“内部”主要指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而是在“外部”实现, 扩大积累首先是以输出为前提, 这就会导致资本主义外围地区逐步遭到损害。

因此, 卢森堡的思想表明了一种辩证的双重的关系或一种双重的运动。然而, 她本身对这一点并没有加以深入阐述。首先是一种中心与外围的关系, 资本主义牢牢植根的那些中心地带(尤其是西欧)统治各个外围地区(各殖民地、前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的经济体, 等等), 这些外围地区为资本主义的中心地带提供了“外部市场”和过剩商品的买主。其次, 这些外围地区的结构(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由于受到资本主义在世界市场上实现剩余价值的影响而被分解, 尤其是通过各种投资和扶植当地的资产阶级(民族性的, 或者叫“买办”, 这正如 20 世纪下半叶人们这么称呼的)而把这些外围地区纳入资本主义的范围。这就导致了一种运动: 分解——纳入, 把外围地区纳入中心地带的势力范围, 但两者之间又有明显的区别。

应该强调一下, 罗莎·卢森堡和其他某些经济学家还企图扩大这些外围地区、这些外部市场和这些被分解的范围。可以指出的是, 他们认为, 城市在剩余价值的实现中, 在现代资本主义的形成中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但城市, 它同样曾经是资本主义的外围地区, 但后来被资本主义打破、改造和分解了(参见《马克思主义的思

想和城市》，H·列菲弗尔）。

当然，在罗莎·卢森堡之后，出现了对她的思想的各种各样的阐述，然而，这些阐述并没有她本人思想那样丰富和有力。卢森堡在她的《政治经济学导论》中写道：“在各种不同的民族经济中，必然存在与纯粹的商品交换完全不同的经济关系。很明显，只有一个国家拥有对另一些国家的经济支配权，才能正常地从这些国家获得更多的产品，而它本身并不会给这些国家提供同等的报酬。这种权力所表现出来的丝毫也不是两个平等的伙伴之间的交换”。卢森堡的这段话表明，在等价制度中所固有的政治性，而这种固有的政治性必然会改变等价制度的方向，这就是说，存在着不平等对平等的固有性；不平等的交换。这种交换受权力的强制，附属性受独立性的强制。换一句话说，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应该经常引起我们的关注。然而，已经感悟到“等价制度”的重要性的反常的政治固有性的卢森堡并没有把这种分析深入下去，以至于在她之后，这个成果也就停滞了，包括在一些“卢森堡主义”者的著作中，情况也是这样。这是为什么呢？无疑，这是由于在卢森堡生活的年代里，国家仍然蕴含在民族经济的范围内，以至于卢森堡未能发展在她的理论观点中亦已阐述过的各种概念，无论是不平等的交换的概念，还是中心与外围及分解与纳入的概念都是这样。她甚至过高地估计了在外围，即在世界市场和在殖民地中所发生的一切。人们知道，卢森堡曾预言，通过损害外围地区（殖民地），资本主义最终将会导致它本身的灾难和崩溃。

几乎不需要回顾列宁批评关于积累的卢森堡的理论所用的论据的弱点。是的，资产阶级把生产资料和优质产品留为己有，自然，对于资本主义来说，也存在着一个“内部市场”。但可以肯定，从某一个时候起（而这个事实是违背列宁主义本身的），资产阶级把希望寄托在外部市场的扩张上。当然，传统的方程式 $(c + v +$

$p_v = V$)今天的计算方式应该不同于20世纪初。但不管怎样, 剩余价值的实现提出了一个罗莎·卢森堡亦已基本解决了的问题。

罗莎·卢森堡的理论导致了另外两个现在应该说明的结果。

首先, 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是同时代的, 而不是如列宁所说的, 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如果不向资本主义的外围地区输出, 剩余价值是不可能实现的; 如果没有对其它地区的掠夺, 没有同较远的国家的贸易, 没有工业产品的大量输出, 就没有积累。这是同历史事实相符合的(例如, 从19世纪起, 英国纺织业的输出, 使印度纺织工人濒于破产, 等等)。在著名的关于帝国主义的论战中, 列宁从“资产阶级的”学者奥布松(Hobson)和希尔费丁(Hilferding)那里借用了大部分事实和论据。列宁抛开了历史性, 而以资本的输出推定帝国主义出现的时间和标志, 他轻视了19世纪到20世纪通过征服、掠夺、各种贸易的联系和最初的殖民化而形成的世界市场。

其次,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 罗莎·卢森堡的一个辩证的、与众不同的、也是具有吸引力的看法是: 资本主义是按照它的概念和本质来实现的。它是这样形成的: 它越来越接近它自身, 也就是说, 越来越接近这样的状况, 在这样的状况中, 只剩下资本和劳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定义。而第三个定义, 各种调解人或中间人, 资本已将其侵蚀, 在资本的作用下已将其破坏。这样, 资本主义也就接近了它的终结, 因为它已经实现。资本主义是有它的限度的, 而这种限度和这种终结只能够是灾难性的(要注意到, 世界性的战争可以被看作为是这种灾难)。罗莎·卢森堡的这种辩证的、与众不同的看法可以这样来概括: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开始与它的终结是同时开始发生的。

让我们来强调一下卢森堡在其《政治经济学导论》的最后的章节中已经较为明确地、但尚不够完全地表述过的这些概念的新颖

之处。

罗莎·卢森堡丝毫也没有指出资本主义对于各种前资本主义形态的一种单纯的统治；恰恰相反，她指出了资本主义通过对这些形态的侵蚀，来达到它的资本的增长和积累；她指出了-一个“被颠倒了的世界”的构成：苦难的扩大，无法忍受的劳动的承担和世界范围内的持久的不安全。由此可见，这里涉及到的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作出的一种对世界的最基本的分析。卢森堡尽管没有详述，但已经指出了这种“纳入——瓦解”的矛盾运动。这种扩张的限度并非是技术性的，而根据概念来看是内在的。这就导致了罗莎·卢森堡得出了下列简明扼要的结论：“资本主义运动的继续存在的不可能性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它只能按照它自身的限度来限定自己。这种限度只能是：当推动资本主义形成趋向达到某一个阶段时，这种趋向自身所包含的各种矛盾就会使这种趋向在它已经实现的同时，发生灾难性的崩溃。如果说资本主义“中心”地带的存在只能以侵蚀它的周围地带的前资本主义形态、以“纳入——瓦解”为前提，那么这种运动必然包含它自身的规律：它的继续存在的不可能性的规律。

罗莎·卢森堡着力地提出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问题。在她看来，如果加以考察的话，人们就会发现，“生产方式”这个概念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既是重要的，也是模糊的。

是重要的？是的，因为这个概念是总的，或者说它指出了一种总体性；是模糊的？是的，因为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生产关系的概念的制作要比生产方式的概念的制作完善得多。通过阅读马克思的著作，人们能够很好地了解到：雇佣劳动者与资本家的关系，剩余价值和它向资本家利益的转化以及这些特定的关系和奴隶主与奴隶、封建主与被其支配的农民这些特定的关系之间的差别，同这些生产关系相衔接的各种所有制的关系也得到了比较好的阐述。但

是, 这些阐述还停留在局部性上, 而没有达到总体性。为了达到总体性, 除了需要各种局部性的分析外, 还应该阐明生产的概念的同时, 指出这种生产是如何包括同产品一样, 但是属于另一个层次上的各种作品、各种认识、各种社会关系和各种制度的生产; 还应该看到各种上层建筑所包含的同各种镇压性的机器一样的形形色色的制度和意识形态。最后, 在经济方面, 在罗莎·卢森堡看来, 应该从剩余价值的形成和分配中区分出它的实现。马克思批评性的分析主要是针对剩余价值的形成, 而他忽视了剩余价值的实现。至于剩余价值的分配, 他指出了银行系统的作用; 但资本在马克思指出过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运转的地方(生产方式)停止了。在马克思本身的著作中, 当他触及到总体性的时候, 人们会看出在两个概念之间犹豫不决:

a) 主体。马克思把社会的各种成份, 各个阶级、国家、市民社会看作为是各种“主体”, 也就是说看作为是各种活动着的社会因素或社会存在, 他所强调的重点是各种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而所有这些主体, 通过某种环境和它们之间的联系, 又被看作为一个内在的、辩证的和相互影响的整体。马克思正是从这个角度强调各种实际的冲突和辩证的矛盾, 因为每一种“主体”都包含着一种力量。按照他的看法, 社会的每一个成份或因素都构成了它的主观性, 甚至构成了政治主体。工人阶级当然也是这样。国家是作为一种在其它各种因素成份中已经建立——构成的政治主体而表现出来的。而生产方式是作为各种主体的运动着的星座、作为它们的或多或少是有意识的冲突的辩证法而表现出来的。

b) 体系。这个起源于哲学的概念,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 具有一种科学的意义, 这是因为它指出了所包含的各个成份、各个部分和各种“因素”这样一个整体之中各种关系的连贯性。体系构成了一种总体性; 由它的各个成份、各个部分和各种“因素”所形成的这种

体系对这些成份、部分和“因素”起一种支配作用；体系有它的内在逻辑性。而体系这个概念又不同于结构这个概念，结构这个概念趋于不受环境和各个成份和“因素”之间联系的影响，更加强调严密性，内部的各种矛盾和冲突更加模糊。

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说的资本主义，就是作为一种体系来说的。很多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记住了这种方便了教条主义的方法。在他们看来，要么这种体系通过它的内在逻辑和实践的严密性支撑着，要么这种体系就自行崩溃。“体系”的信奉者们在每一次“危机”中都期待着这种体系的终结。体系这个概念也方便了另一种值得怀疑的行为：或者是把一种体系说成是马克思的，而实际上在自己的内部维持着另一种体系。这种利用“马克思主义”来进行欺骗的行为不是时有发生吗？

根据考察，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并没有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切标准。这种标准是通过一种类型的资本、还是通过某种商人、工业家、银行金融家或某种土地税、国家制度来确定的吗？是通过剩余价值的某种提取方式以便把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来确定的吗？人们搞不清楚。马克思时而通过阶级斗争、时而通过自动调节（各种平均值的形成以及它们的平均利润率）、时而通过两个定义（劳动和资本、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来确定；时而又通过三个定义（土地、资本、劳动，即地租、剩余价值和利润、工资）来确定；时而各种关系又通过生产方式，即通过整体中的成份和部分来确定；时而又恰恰相反，生产方式是通过各种生产关系来确定的。简言之，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体系这个论点趋向于同语反复，主体这个论点趋向于一种众所周知的主观主义。人们是否可以说生产方式这个概念只是提使了一种模式？这肯定不是马克思所认为的。对于马克思来说，他力图通过追寻生产方式的起源，以便既呈现出资本主义的历史，又呈现出资本主义的各种规律；既指出资本主义的产生、

发展,又指出它的毁灭的根源,即革命。

让我们按照罗莎·卢森堡的意思(在她的著作的字里行间中所流露出来的),从历史的角度提出问题。

应该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确定在什么位置上?应该把它的产生和作为总体性的它的完成确定在什么位置上?在时间上又如何来确定?

如果要标出历史时间的轴线,那么,资本主义的起源是从罗马帝国的结束、是从中世纪、还是从封建军事国家的形成开始?在什么时候,出现了各种生产活动的一种领域——手工业的、农业的——以及越来越密集的商业网络和流通?

马克思注意到了各种军队(从古罗马的军队开始)已经体验到的无产阶级未来的处境。这些军队为了营地和工事的施工而掌管着同生产资料相分离的、出卖劳动时间的工人。马克思还注意到了无产阶级的前身:中世纪的城市同样拥有短工,同行会没有联系、没有生产资料、靠出卖劳动时间的劳动者。

但是,我们不能确定资本主义是从中世纪的城市开始的。尽管它可能在已经形成的商品的贸易和商品的世界中以及在城市资产者同封建主们的斗争中有所表现,积累的各种条件(技术方面的,思想方面的,经济方面的)已经开始形成,积累已经开始,但主要还是为了赚钱,而不是为了投资。

从19世纪起,帝国的巨大扩张开始了(西班牙的远征等),商业的扩张也开始了:这种商业资本以海洋为渠道建立了世界性的市场。在这同一个时期,在西欧,城市对于农村来说越来越具有优势,而整个社会由此被动产财富所吸引。

在19世纪中期,工业首先在英国,接着在欧洲大陆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种发展不是没有伴随着冲突、战争和竞争的。那么,这种发展确立起了什么呢?确立起了竞争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

渡过了各种危机。在每遇到一次危机时，首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接着是“马克思主义者们”都期待着资本主义“体系”的终结；而他们未能很好地领会马克思本人的某些教导所产生的结果（尽管还比较模糊），即危机在清除生产资料的、人员的和产品的过剩之后，也就结束了生产方式的阻塞和饱和状态，使资本主义生产体系重新获得了扩大再生产的条件。在19世纪，谁也不敢想象一种巨大的和可怕的流血战争也会对这种扩大再生产的条件产生同样有用的作用。

我们是否可以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到此已经实现了呢？我们并不能预先排除资本主义的各种变态，特别是帝国主义。

因此，让我们再来考察一下帝国主义时期。我们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经完成为前提，帝国主义意味着什么呢？它反映了竞争的资本主义的衰退。我们重提一下列宁的论点：各个资本主义大国已经成为寄生性的。它们用对外输出资本来取代把资本用于自身的发展，它们诉诸于力量来保护它们的资本的输出和原材料的输入的特权。但是它们仍然处于衰退的过程中，使用战争的手段也不能挽救它们，因为不平衡性的规律对它们起着限制作用。各种障碍会随着马克思所揭示的各种生产力的增长，在一个更加广泛的范围内重新出现。我们在下面还要讲到“列宁主义”。如果说，有一点列宁是搞错了的话，这肯定是指他关于各大帝国主义国家没有能力继续发展这个看法。即使不平衡的发展规律是确定的、并且是普遍存在的，也不是如列宁所说的那样。其结果是，列宁错误地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确定为现代帝国主义以前的生产方式。然而，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帝国主义开始于19世纪，远在各种资本输出之前。

对于已经提出的问题，需要一个答案，一个唯一的答案，这就是罗莎·卢森堡的分析所包含的答案——即使她并没有解释这个

答案——这个答案是这样来说明的:

a)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通过词的下列含意中的再生产来确定的: 从生产力的再生产到各种生产资料和各种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剩余价值, 它的形成、它的实现、它的再投资, 成了生产方式的、因而也是扩大积累的作用的组成部分。

b) 只要存在着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各种关系的再生产, 资本主义就能够继续存在下去。

c) 资本主义合并并创建了各种新的部门以便扩大生产和剩余价值。它部分地分解——纳入历史上的城市、前资本主义的农村; 它发明了闲暇娱乐的部门; 它直至扩张到武器和能源等的大量生产。

d) 这样, 生产方式就按照它的概念, 即作世界范围内的总体性(世界市场的总体性)来实现的。无论是竞争阶段、垄断阶段, 还是国家阶段都不足以确定生产方式, 而所有这些阶段都应包含在生产方式这个定义之中。直至现在依然存在的各种矛盾, 包括阶级斗争和各种战争, 在震荡着它的同时又促进了它。资本主义没有解决它的矛盾, 资产阶级会运用这些矛盾(包括理论方面, 意识形态方面和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这个漫长过程的极点; 在开始时,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还是有潜力的, 它的发展的各个阶段构成了它的路标, 但没有描绘出它的特征。可以肯定地说, 它本身的各种矛盾在积累——并不是得到了解决——而在现在达到了全球性的战略上的规模。这就是, 这种生产方式包含了它自身的限度, 就是它本身的限度。积累的过程应该从一种更广泛的意义上理解: 如果存在积累, 那么就存在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的积累, 那么就存在抵制这些矛盾的方法和克服这些矛盾的影响的方法。这种方法是指通过暴力? 是的, 但同样通过管理的方法, 通过各种专门化的制度。积累的过程既包含“积极的”现实,

也包含“消极的”现实。

下面这样一种论点是不符合实际的：按照这种论点，资本在一种抽象的意义上是同技术、知识相类似的，是自治的，是根据它内在的要求、按照它自身的逻辑和规律运转。为什么说这种论点是不符合实际的呢？人们可以看出，这种论点把政治和国家的作用排斥在外。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这种论点表现为一种错误的认识：经济主义。人们在很多“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中也能找到这种论点的直接的或间接的表述，这就是或多或少加以现代化的关于“体系”的说法。然而，人们绝不会认为，作为阶级，即作为主体的资产阶级，通过它的主动性和政治上的灵活性，已经成功地使资本主义稳定下来。由此可见，“体系”的论点和“主体”的论点同样是贫乏的。

资本主义，作为各种竞争的总体，将趋向于它自身，即趋向于一种一触即发的爆裂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和平与战争的趋势相互交织，为战争的生产 and 为和平的生产混杂在一起。在这个阶段，国家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家既不只是“体系”，也不只是“主体”，而是兼而有之，还有其它，甚至更甚之。人们是否可以说是“总体性”？是的，竞争的资本主义的各种自发的、盲目的和“自动的”的调节——各种社会的平均值，例如平均利润率， $t = \frac{pv}{c+v}$

由各种被计划好的、被预测到的和严格研究过的平均值所代替，这就保证了一种按照意愿来维持的严密性。因此，国家既具有镇压性，又具有调节性。

在这个阶段，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既不能像各种“主体”的一种相互作用那样、也不能像一种体系那样被决定，而是由剩余价值的生产和资本的积累所决定，它的特征表现为一种双重性：国家的极端的重要性——一种国家的空间支撑物的生产和各种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按照这种图式,人们可以研究新资本主义(这就是说各种大组织的资本主义,包括各种所谓跨国公司)。人们同样可以研究新帝国主义和它的各种特定的现象(例如,各工业大国从不发达国家大量输入劳动力,这是一种剩余价值生产的新的方法)。新资本主义和新帝国主义难道不是同帝国主义的第一阶段或竞争的资本主义与它在某些部门的现代延伸一样,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组成部分吗?

国家的出现、它的上升和它的极端重要性,简言之,现代的“国家制度”能够对所谓历史的变化进行一种新的“破译”。正是需要按照这种新的破译法来对国家的起源和它的家谱进行研究。

这就意味着,应该承认罗莎·卢森堡还不了解各种民族的、或非民族的垄断、卡特尔和托拉斯的形成。她同样不了解,各帝国主义的国家——民族之间为了占有被资本主义所纳入或者只是被剥削的地带(殖民地、20世纪初期的农业地区)所进行的政治斗争。因此,她使人们忽略了世界性的战争的经济作用(相当于一次危机)和政治作用,而她只是把这种战争看作为一种最后的灾难。同样,她在混淆了“外部市场”和外围地区的同时,轻视了中心地带(资本的集中,决定的权力和巨大的城市的形成,等)的经济的——政治的结构和国家的相应的作用。由此可见,她也没有完全逃避安东尼奥·葛兰西所提出的关于经济主义的和自发主义的指责。那么,又是什么原因使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包括马克思本人都没有逃脱的这种指责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是国家和“国家制度”后来的和新近的出现与变化。但是这种指责丝毫也不应该使人们忘记是罗莎·卢森堡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打开了”马克思主义,同时,其他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即使不说是全部的话,则把马克思主义禁锢了起来。

而使人感到不安的是,罗莎·卢森堡的著作和成果被教条主

义者们和各种倾向的宗派主义者完全粗暴地对待了。某些人在对她的某一个论点先是表示赞赏,接着就将其抛弃。C·帕卢克斯(Chr. Palloix)就是其中的一个。帕卢克斯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就是这样的。这位作者认为卢森堡在扩大再生产的图式的范围内剩余价值实现的不可能性的论点是错误的。对于卢森堡,帕卢克斯只承认她预感到现代帝国主义的很微弱的功绩,而认为卢森堡错误地强调了马克思著作中剩余价值的形成和实现之间的矛盾。这位作者说,其实,如果存在扩大再生产,这就意味着矛盾已经解决。奇特的论据!或者说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存在着矛盾,那么为什么不可以强调矛盾呢?或者说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就不存在矛盾。C·帕卢克斯提出了问题,接着又低估了存在的问题。这种态度包含着对各种现代化现象的经济主义的简化,这种做法也同样表现在很多当代理论家的著作中。

十二、列宁和列宁主义

某些教条主义者“像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维护“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把它看成是永恒的真理的法典，这些教条主义者是值得怀疑的。他们为何需要这些圣书？他们又为何把作者在很久以前写的那怕是只言片语都当作是一种包含着既珍贵又永久的教导？他们为什么把那些与他们自己一样，在未曾开辟的道路上摸索、并有可能犯错误的人神化，或至少看成是超人呢？他们又何以证明他们自己的意志是正确的呢？

热衷于教条主义的人与热衷于破坏的人几乎没有什么两样，那些热衷于教条主义的人，即是热衷于彻底破坏“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人，是不由得不怀疑的。

他们别出心裁地与其说是肯定的，不如说是否定的方法施加他们的意志。他们的这种通过自行毁灭的手段来解释“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做法必然会导致虚无主义。这种通过施加他们的意志的自行毁灭的手段来解释“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做法最终也会使这些教条主义者自食其果。

这些教条主义的“思想”和“思想家们”，很快地染上了一种“退化症”，他们只知道根据一种逻辑规律（即要么全盘肯定，要么全盘否定，要么是真，要么是假）来思维。他们陷入到无力进行有效的分析、无力分拣各种表现和评价这些表现、无力区分一种意识形态的境地。

对列宁的著作正好需要这种有效的分析。把“列宁先生”置于人类之上、置于伟大的圣人之中，把他看作既是天才的，又是可亲的，这种做法是幼稚的、也是无耻的。

首先，如果不承认“政治断裂”（*Coupure politique*）的理论，就不可能赋予列宁以最小的重要性。以认识论和“认识论断裂”的名义讲“列宁主义”、提出“新列宁主义”这难道不是一种谬误吗。这里，只涉及到列宁和列宁主义，政治断裂介入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本身。在列宁之前，这种思想游荡和消失在经济学的、或称之为“政治经济学”的经济理论的迂回曲折的论述之中，一句话，游荡和消失在经济主义之中。与之相反的是，列宁从一开始就是一位政治人物，从他最初的著作开始，他就是以一位政治人物的身份来思考理论问题的。

在列宁看来，在他面前的是一个需要打倒的国家机器。他思考着这个国家机器为何不能巩固。他找到了答案：沙皇统治的国家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混血儿。反对有俄国资产阶级，如果不挖掉它本身的基础，是不能保证由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过渡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这个缺乏资本喂养的封建——军事国家是经不起战争考验的。而战争对它来说又是不可避免的，从日俄战争开始，它就陷入战乱之中。在列宁看来，在俄国，从开始起，经济问题和科学分析就服从于政治问题，也就是服从于国家问题。列宁在《怎么办？》一文中对问题的回答就已经是一种政治的回答。《俄国资本主义》一文中的分析也是一种政治分析，既指出了资本

的渗透，又指出了通过唯一的经济途径，即通过市场和投资的途径是不可能改变俄国的生产关系的。使俄国进入资本主义只能通过一种国家的作用来实现，而这种国家本身需接受最先进的资本主义的影响，即英国式的资本主义和法国式的资本主义的影响。是否需要借用民主（资产阶级的）的名义？当然需要。

政治回答的本质在于提出行动的各种主张：组织、战斗、干预、激发起行动主义。当时的俄国的政治气候已经趋向于这种形势，因为无政府主义者已经企图发动恐怖行动。因而，列宁能够确定他的反对沙皇政权的手段，这个手段介于“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们”的抽象的科学主义和“正义者们”报复性的谋杀之间。

从《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是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1898年发表于日内瓦）一文开始，列宁恢复了思想——行动的作风，这个作风正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初期的作风，而在后来由于经济主义和严格的概念的体系的束缚，又失去了行动的作风。列宁不只是把“民粹主义者”尼·米海洛夫斯基（Mikhailovskii）的社会学当作改良的空想的缺陷加以抨击，而是把它当作缺乏科学性的缺陷加以抨击。他说：

“例如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社会学的根本任务是阐述那些使人类天性的某些需要得到满足的社会条件’。你们看这位社会学家感兴趣的只是能够满足人类天性的社会，而完全不是什么社会形态，何况这些社会形态还可能是以少数奴役多数这种不合‘人类天性’的现象为基础的。你们同样看见，在这位社会学家看来，谈不到把社会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社会学家们既然认为某种东西合心愿或不合心愿，就应当找到实现这合心愿的东西或取消那不合心愿的东西的条件’，即“实现某种某种理想的条件”，——也是这个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的。）不仅如此，甚至谈不到什么发展，而只能谈到由于……由于人们不聪明，不善于真正懂得人类天性的

要求，不善于找到实现这种合理制度的条件而在历史上发生过的种种离开‘心愿’的偏向和‘缺陷’。显而易见，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的基本思想，是在根本上摧毁这种妄想以社会学自命的幼稚道德的。马克思究竟怎样得出这个基本思想呢？他所用的方法就是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划分出经济领域来，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来，并把它当做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①

列宁恢复了经济现实和“基础”、即生产力和它们的水平具有首要的重要性的“马克思主义的”论点，但他在其中增加了对经济主义的一种批评。马克思的《资本论》指出了社会形态的发展，列宁补充说：“《资本论》的骨骼就是如此。可是全部问题在于马克思并不以这个骨骼为满足，并不以通常意义的‘经济理论’为限；他专门以生产关系说明该社会形态的结构和发展，但又随时随地探究适合于这种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使骨骼有血有肉。《资本论》所以大受欢迎，是由于‘德国经济学家’的这一著作把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作为活生生的东西向读者表明出来，将它的生活习惯、将它的生产关系所固有的阶级对抗的具体社会表现，将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资产阶级政治上层建筑，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之类的思想，将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都和盘托出”。^② 我们不能很肯定马克思完成了这个好的计划，对于涉及到上层建筑的最重要的方面——国家，我们甚至可以肯定情况恰恰相反，马克思只是把它放到了第二位的重要性上。而重要的是，列宁在俄国把马克思当作一位直接的政治性的作者、当作一位行动家加以介绍。

至于列宁本身，他用他自己的方式在他的祖国俄国实现了这个纲领。在他所制定的理论中，把严格的概念体系放到了第二位，

① 《列宁选集》，第1卷，第5—6页。

② 《列宁选集》，第1卷，第9页。

因为这种严格的概念体系只能服从政治目标，服从于政治的战术和战略。如果说，列宁把这些概念向前发展了一步，那么，主要表现在土地方面，在这个方面，他用一种在其它国家（例如中国）能够直接被领会和使用的方式恢复、精确和发展了关于地租的理论。今天，如果重新阅读他写于1913年的短文《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就再清楚不过了。

在这种情况下，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卷首的序言具有它很重要的价值。“国家问题，现在无论在理论方面或在政治实践方面，都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帝国主义战争大大加速和加剧了垄断资本主义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过程。国家同拥有莫大势力的资本家同盟日益密切地溶合在一起，它对劳动群众的骇人听闻的压迫，愈来愈骇人听闻了。各先进国家（我们在这里是指这些国家的“后方”而言）已经变成了囚禁工人的军事苦役监狱”。“连绵不断的战争造成的空前惨剧和灾难，使群众生活困苦不堪，使他们更加义愤填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正在显著地发展，这个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已经具有实际的意义了。”^①对于列宁来说，对待国家的态度问题已经变成了他的一个政治标准，他正是用这个标准严格地评价社会民主党人、第二国际的人物，无论是对“修正主义者”E·伯恩斯坦，还是对“机会主义者”考茨基都是这样。如果说考茨基滑向机会主义，那么正是表现在涉及到国家这个问题上。列宁不止一次地同那种把马克思主义贫乏化、神圣化和简单化的做法进行斗争，即同那种抽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政治的灵魂，把它归结为经济主义的做法进行斗争。列宁按照他的理解，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的关于国家的学说。

他主要从恩格斯那里，即从恩格斯后期的著作中借用了一些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171页。

术语：国家，不可调和的阶级对立的产物，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和压迫的机构。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所说，国家的存在表明这个社会本身已陷入一种难以调和的矛盾之中。这种对被压迫阶级的剥削工具并不总是存在的，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将消亡。也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①

当然，对恩格斯的这些文章我们已经熟悉了。这里，我们所关心的主要是列宁的立场。

列宁的立场可以说是再明确不过的了。他着重强调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关于对国家（现时，俄国的具有资产阶级色彩的封建—军事国家，其它地方的资产阶级的和资本主义的国家）的革命的决裂的论点。革命要摧毁这样的国家，用另外一种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来代替这样旧的国家。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集中一切破坏力量”去反对现存的国家机器。然而，按照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文中的看法，如果说无产阶级需要国家，那么需要的只是正在消亡的国家。他说：

“无产阶级需要国家，——一切机会主义者，即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主义者都这样重复，硬说马克思的学说就是如此，但是‘忘记’补充：马克思认为，第一，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只是逐渐消亡的国家，即组织得能立刻开始消亡而且不能不消亡的国家；第二，劳动者所需要的‘国家’，就是‘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②

同德国社会民主党相反，列宁赞成巴黎公社的传统。在评论马克思关于这个论题的态度时，列宁写道：“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没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184页。

^② 《列宁选集》，第3卷，第190页。

有一粒空想主义的种子。”

列宁的这一坚定的立场，不正是列宁主义的主线吗？他的不少文章肯定了这种评价。在他看来，过渡，从资本主义到改造了的社会，包含了从国家到非国家的过渡。过渡的国家不再是本来意义上的国家，即使它保留半资产阶级的性质，也不能看作是本来意义上的国家。国家，就本来的意义来说，只存在于拥有权利（资产阶级的）的资本主义之中。“右倾机会主义者们”（如考茨基）和“无政府主义的左倾机会主义者们”这样或那样地忽视了这一理论的要害。尤其是，他们忘记了民主本身同样是一种国家，因而也忘记了当国家消亡以后，政治民主也将随着国家的消亡而消失。只有革命能够废除资产阶级国家，自那以后，国家和政治民主才能够一起消亡。“从资产阶级民主到无产阶级民主，从无产阶级民主到没有民主。”总而言之，“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又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这种无产阶级专政将伴随着国家的消亡、包括民主国家的消亡而消亡。

列宁在1917年7月11日在斯维尔德诺夫大学的著名的讲演，不是也为这些论点增加了某些东西吗？他说：“国家问题是一个最复杂、最困难的问题，可以说，也是一个被资产阶级的学者、作家和哲学家弄得最混乱的问题”。它是“关系全部政治的主要的和根本的问题。”^①他重新提到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并且从起源开始回顾了有关国家演变的理论。他把整个国家理论都当作为特权辩护加以指责。这从字面上来理解，就好像把婴儿恩格斯同澡水黑格尔一起泼掉了。

列宁指出，什么是国家？这是一个通过暴力——从棍棒到大炮实行统治的人的集团。什么是国家？这是一种维持一个阶级对另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41—42页。

一个阶级统治的机器,更确切地说,这是一种使某种社会中的其它所有阶级服从于一个阶级的机器。

列宁列举了奴隶制和农奴制来加以说明。

关于资本主义,列宁指出,“这个社会在自由的口号下反对旧时的农奴制度。但这只是拥有财产的人的自由。当农奴制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被废除时(俄国晚于其它国家,在1861年才废除),资本主义国家代替了农奴制国家,宣布它的口号是全民的自由,说它代表全体人民的意志,否认它是阶级的国家,于是为全体人民而奋斗的社会主义者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斗争从此就展开了,现在这个斗争已经造成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个斗争正遍及全世界。”^①

列宁的结论是:“不管一个共和国用什么形式掩饰起来,就算它是最民主的共和国吧,如果它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如果它那里保存着土地和工厂的私有制,私人资本把全社会置于雇佣奴隶的地位,换句话说,如果它不实现我们党纲和苏维埃宪法所宣布的那些东西,那末这个国家还是一部分人压迫另一部分人的机器。我们要把这个机器拿到应该推翻资本权力的那个阶级手里。我们要抛弃一切关于国家是普遍平等的陈腐偏见,因为这是一种骗局,因为只要剥削存在,就不会有平等。地主不会与工人平等,吃饱的人不会与挨饿的人平等。人们迷信般地崇拜国家,相信国家是全民政权的陈腐童话;无产阶级要把叫做国家的这个机器撵弃,并且指出这是资产阶级的谎言。我们已经从资本家那里把这个机器夺过来,由自己来掌握。我们要用这个机器或棍棒去消灭一切剥削。只有到世界上再没有进行剥削的可能,再没有土地占有者和工厂占有者,再没有一部分人吃得很饱一部分人挨饿的现象,再没有发生这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52页。

种情形的任何可能的时候，我们才会把这个机器毁掉。那时就不会有国家了，就不会有剥削了。”^①

那时，只有那时……列宁在这里不再提及国家的“立即消亡。”而在两年前，即在夺取政权之前，他的思想曾是很强烈的也是很辩证的：“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只是逐渐消亡的国家，即组织得能立刻开始消亡而且不能不消亡的国家”。^②

这里，我们陷入或重新陷入困惑之中，迫使我们重新阅读列宁的著作以便找到他的思想中的裂痕，因为在他的思想中的某个地方，肯定存在这种裂痕。总而言之，列宁思想的突然拐弯就像出现的一个曲折的通道一样，切断了原来的路线。或者是，1917年的列宁是有道理的，应该把列宁主义与他当时主张的论点联系起来，而那些（国家的崇拜者和支持者）依仗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声望的做法就变得更加可疑了；或者是，1917年的列宁搞错了，列宁主义破裂了，政治上的经验主义在他的理论中占了上风，这样人们就可以并非完全是怀着一种坏意地而且也是司空见怪地）宣称：《国家与革命》中的观点已经过时和陈旧了，继续谈论列宁主义还有必要吗？

很显然，列宁只熟悉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家问题的一部分著作，主要是一些针对黑格尔的著作。正像人们所看到的那样，马克思和恩格斯激烈地抨击国家，在他们看来，国家与市民社会毫不相干，它外在于市民社会，并且竖立在市民社会之上，它产生于这种社会内部的各种对立。因而，关于国家，只需记住它的这种由于同人民、特别是同工人阶级毫不相干而产生的镇压性的特征就足够了。因此，国家是寄生的，甚至它的官员们也感到自己居于人民之上。由于国家具有这种双重的特征（既与市民社会毫不相干又是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56—57页。

② 《列宁选集》，第3卷，第190页。

镇压性的),就应该通过一种“人民革命”摧毁它,摧毁这种国家并调转过头来,摧毁“人民革命”本身的政治强力。

国家——民族,即民族国家又如何会变成与民族毫不相干并且完全寄生于民族的呢?黑格尔对这个问题有一种回答,因为他把国家——民族理论化了。他不承认这种纯粹的外在化的论点。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也无论是列宁都未曾考察过国家——民族的关系;反常地是,列宁从这种形势中得到启发:如果有一种国家,而这种国家又具有与人民毫不相干的国家的全部外表的话,这不正是沙皇制度吗?为什么呢?因为无论是俄国,甚至是社会民主党人的德国,在含意和称呼上都不是同法国一样的民族。同样反常的是,无论是列宁,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澄清:正是在法国,国家产生于一种革命,这个国家被看作是民族的宠儿;也正是在法国,在波拿巴主义之后,人们又指责国家并通过巴黎公社把它打倒……

其次,国家“同社会毫不相干”这个论点不够明确。未能通过生产方式很好地说明其特征的这个“社会”是个什么样的社会?“社会”和“民族”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外在于它自己的社会的国家又是如何能够在这个社会中进行实际地和有效地干预的?沙皇制度的国家本身在俄国人民之中不是也有比列宁所想象的更深刻的和更难以根除的基础吗?而列宁不正是以一种狭隘的政治方式来谈论民族问题和忽视国家——民族这样的现实吗?

正如斯大林所写的和所说的,我们要遵循列宁的教导!可是,今天我们再来读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这本书,就会发现其中又有多少明显反常的东西!革命摧毁现存的国家,建立一个正在消亡的国家,这种国家立即成为一种非政治的国家,但国家集中领导经济,成为经济的领导机构,“统计、检查是国家的根本职能,以便共产主义社会在第一阶段中开始进行和严格地运转。在这个阶段中,所有的公民都变成了由武装的工人组成的国家的领取薪金的

公职人员。所有的公民变成了一个全民的‘卡特尔’、即国家的公职人员和工人。”这里，列宁在1917年的革命的想象表现出一种令人吃惊的幼稚、一种使人无法生气的空想主义。所有的人都将在无产者手中的冲锋枪的监督下到学校和政府去登记，然后，所有的人（包括以前的游手好闲者）按照不同的类型返回车间、工厂、企业，上班去！这一切都进行得有条不紊，社会主义生产在全国范围内，在和谐和欢乐中自动地组织起来。对所有资本家的剥夺“将使生产力得到巨大的发展。从这时起，可以看到资本主义再也无法阻碍这种发展，由于已经获得的现代化的技术，人们将获得多少成就，我们有权相信，对资本家的剥夺将引起人类社会的生产力的惊人的发展。”

今天，1976年，当我们重读列宁的这篇著作时，感到这是何等奇特的话！这是何等的乐观主义！这又是一种何等便当的唯理论！强行的和狂热的政治化把整个经济概念都搞糊涂了，他对生产组织的整个思考使人感觉到好像用空话就可以解决的一件事，而在表现先进的上层建筑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方面又是多么矛盾！

由此看来，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这篇著名的文章应该“去壳”（现代科学的意识形态的行话）；我们应该按照列宁对待黑格尔的著作的方法和程序来对待这篇文章。因此，对于《国家与革命》这篇文章和它的理论内容，评注者们只有在详细的区分这篇文章的内容的前提下，才能真正知道所应坚持的东西。其实，人们在这篇文章中可以区分出两部分内容：

a) 从马克思那里得来的并加以深化了的完全的革命的定义。不同国家、国家机器、它的机构（官僚机关、军队、行政司法官员、圣职人员阶层）决裂就不能彻底改变社会。如果国家不被摧毁，仅有政府、政治人物和宪法的变化，或者发生一种“政变”，就不能算是

革命。由于列宁把“政治决裂”变得既深刻又彻底，这就为革命确定了一个既是政治的、又是反政治的定义。他断定要么是完整的革命，要么就不是革命这一种革命的辩证运动。

b) 在列宁所讲的这些具有一种不可逆转意义的内容片断中也参杂了一些次要的内容。这些内容和空想没有什么两样，或者说接近于空想。难道列宁真的相信一个家庭妇女、一个厨娘不久可以领导国家吗？这种空话没有什么意义。或者是不再有厨娘，或者是不再有国家。但如果还有厨娘和一个国家，厨娘是不可能领导国家的。列宁认为，所有的人都在大注册簿上登记，既没有官僚主义者，也没有官僚主义作风，所有的人都参加劳动；每一个人都接受所有的人监督（但所有的人都没有武器）。不再有专家，不再有警察，也不再有军人。社会生产在飞速地增长，大家所享有的社会财富几乎没有差别。我们说，这是多么幼稚！或者说这是多么蛊惑人心的宣传！是的，可以这么认为，但又是什么力量驱使群众能投入战斗、投入对这种令人兴奋的新生活的想象之中的呢？是大家所享有的社会财富几乎没有差别，一切都是举手可得以及自由和欢乐……

然而，当列宁继马克思之后对资产阶级制度和权利进行批评时，在他的表达和论据中又具有多么可靠的严格性和辩证的力量！他的这种批判使人产生了资产阶级的制度和权利等于民主的空想的这种想法。

当说到民主（资产阶级的）时，有人说这就是平等占支配地位；当说到被称之为“社会主义”，即马克思称之为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的这种社会秩序时，拉萨尔主张严格的经济平等，这就是说在劳动产品的分配问题上，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列宁，继马克思之后解释了拉萨尔为什么会搞错。平等的权利（作为整个权利的平等）是以不平等为前提的。而这种整个权利的平等的本质在于对

于不同的人使用唯一的一种尺度。而按照这种尺度，这就等于破坏了事实上的平等，这就等于不公平。因而，在涉及到消费物品的分配问题上，权利（资产阶级的）是以一种国家为前提的，因为没有一种能够强制遵守这种权利的工具，权利是毫无用处的。

由此看来，等价的规则会把不平等带进平等，即把不等值带进等值。让我们设想一下，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每一个人都提供的一份平等的社会劳动，因此也就领取一份平等的社会产品。但是，所有的个人并非都是平等的，一个人比较强，另一个人比较弱，一个已经结婚，另一个还没有，等等。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这一点作了较长的论述，他说：

所以，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虽然原则和实践在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而在商品交换中，等价物的交换只存在于平均数中，并不是存在于每个个别场合。

虽然有这种进步，但这个平等的权利还仍然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生产者的权利是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的尺度——劳动——来计量。

马克思强调：“这些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权利永远不会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①

那么，当有权利，又怎么对差别加以抽象呢？首先重要的，不是立即达到绝对的公平、完全的平等、按照需要来分配产品、消灭生产活动中的这些差别，（资产阶级的）权利正是很巧妙地运用生产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1—12页。

活动中的这些差别掩盖剥削；重要的是使剥削变为不可能、是使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变为不可能、是使使用生产资料来获得剩余价值变为不可能。毫无疑问，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工资制在这个阶段将继续下去。而列宁没有讲到这一点，他甚至没有讲到理论问题的实质，例如，他没有提及用劳动时间来计量劳动，他也没有把质量的劳动包括进各种数量相等的庞大体系中。这就使他所想到的经济整体成了问题。此外，请注意，对平均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批评为非平均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到来作了很好的准备。

现在让我们从远处和高处看一看曾经发生过什么和是如何发生的。人们已经了解很多了：列宁毫不犹豫地发动了恐怖^①。实际上，从政治方面来说，农民的介入——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设想——导致了列宁的决心。马克思只是很晚才在他的理论观念中重提农业问题——土地所有权和地租问题。列宁本身只把农民看作协作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半个多世纪以来，却表现为主要的力量，革命则正是由此发生了转辙和改道。

在这个时期，所发生的一切表明工人阶级（被称之为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采取了一种防守的战略，他们把关心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根除封建主义残余的任务留给了农民，把操心生产增长的任务留给资产阶级和国家。当然，这是另外一回事……

关于农民问题，列宁一方面从考茨基的部分理论中吸取了一些观点（不可否认的是对关于土地的租金和收入的理论，他并非没有加以深化），另一方面又从左翼社会主义者那里吸取了一些观点，这些左翼社会主义者和农民有紧密的联系（尤其是，关于农业改革在政治方面的基本设想并非没有排除纳罗德尼基（Narodniki）的民粹主义的残余和对米尔（沙俄时代农村中的村舍组织）这

^① 参见J·贝纳克：《列宁领导的恐怖》，巴黎，1975年；M·莱布芒：《没有列宁的列宁主义》，巴黎，1975年，特别是该书的第二篇《权力的考验》的第一章《国家》。

样的传统的共同体的崇拜。

革命方向以未曾预见的方式出现了转辙和改道，革命的车轮从此按照这种方向沿着西伯利亚的轨道出发，引出了列宁主义——接着是毛主义。当某些“马克思主义的”观念论者自夸能“代表”工人阶级时，他们忘记了历史的转辙和1917年革命方向的改道。这些丝毫也不能妨碍评价各种事件的广度和评价各种误解的深度。恰恰相反，透过这些误解和模棱两可的话，想象与生活（实际的）才能衔接，只有这样认识才能更加丰富和获得巨大的结果。农民并不像工人为剩余价值的理论而斗争那样，为地租的理论而斗争。农民为土地而斗争，而工人反对的是屈辱和压迫。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在这里是以一种理论家们未曾提及过的更加复杂的方式来完成的。

没有必要通过考察历史学家们和政治学的专家们的主张来了解：自1917年以后所发生的事件与列宁的理论前提几乎是不相符合的。这里，我们不能满足于认识这样的历史事实。这一系列的事件和事实是指：内战和外国干涉；国家的破产；社会崩解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只剩下布尔什维克这样一股社会的和政治的力量，这就使得它能够收拾这个破烂摊子，并能够在废墟上建设；红军在通过波兰向德国的进攻中遭到失败，这就是说向工业化的欧洲进行革命扩张遭到失败；新经济政策，等等。一种被强烈染上马基雅维里主义的经验主义取代了具有科学性的分析，这种分析是同经济认识的经过试验的范畴相联系的。很快地，马基雅维里主义又通过斯大林取代了列宁后期的实用主义。

不只是革命向农业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向亚细亚的东方转辙始于1917年，而且理论和实践的分离也始于这一年，这种分离立即反映到了实践中。这是否意味着理论将不再具有它的重要性和影响？这种理论是否已变成了纯粹的意识形态？这个问题已经得到

了它的答复。理论对实践仍旧有激励作用,它带来实践的反映,至少可以说这种反映表现了理论的一种异乎寻常的灵验性。总之,意识形态和知识之间的完全分离只是一种抽象的空想。构想和实际之间的各种联系所具有的一种复杂性完全不同于哲学家们抽象的图解。

“摧毁国家机器……砸烂国家工具……这是不可能的,不止一个交谈者这样认为。国家并不缺少抵抗和镇压这种进攻的办法。但是,丝毫也不是说必然有这种进攻、有这种手握武器的进攻和反对国家的政变。这种大规模的行动有两次几乎达到它的“意想不到的”目的。这两次行动都发生在法国,法国曾经是一个被彻底引向阶级斗争的典型的国家。这种大规模的行动一次发生在1871年,另一次发生在1968年。我们用了“几乎”这个词,这是因为在“几乎”和“完成了的事实”之间有一个很大的距离。首先,最好的例证是,在这两次事件中,国家和它的机器以一种引人注目的速度重建起来。两次事件,两次失败。第一次,一位政治领袖是通过军事力量(第三等级)行动的;第二次,一位政治领袖是通过政治手段行动的,但并非没有以军事相威胁。在这两次事件中,政治领袖们都重新控制了局势并恢复了原来的秩序(在第二次事件中尤为典型)。不管怎样,在1968年5月,国家机器从内部开始分崩离析。在国家机构中,出现了対这种国家机器的厌烦和不信任感。这些历史篇章不止一次地使人回想起这样的经验,这种经验足以表明,即使不是整个列宁主义是有效的,至少是列宁主义对国家的分析是有效的。

1917年,列宁常思考一个宏伟的计划:摧毁现存的国家,建立一个正在消亡的国家。其结果是:恰恰相反,出现一个更加强有力的国家。更有甚者,国家的加强和全球化进入了一个主要阶段。在波拿巴的国家和俾斯麦的国家之后,沿着这条取胜的路线崛起的

有斯大林的国家,和它相对立的有希特勒的国家,这是产生于同一风暴中的两股彼此相对立的波涛。

列宁在1917年发表的是否只是一篇应时的文章?在遭到失败以后,他是否停止和改变他的态度?在列宁主义中有某种因素未起作用?或者是“历史”抛弃了列宁和列宁主义?

这些假设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解释后来的一些事件和一系列事实。历史?它同样导致铁托掌握了政权,而“铁托主义”正是倚仗着列宁、马克思和国家消亡的理论的声望的。要对这些问题进行考察不是没有困难的。列宁主义?我们试图作出清点和总结。失败?我们讲革命方向的转辙和改道就等于讲失败。

可以肯定的是,今天,在世界范围内,列宁是作为国家的一个伟人出现的,他曾奠定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基础,他开始奠定这个基础的时候不是没有畏惧、不是没有遗憾、不是没有忧伤的。这正如他最后年代的著作所证明的那样。在他将逝世的时候,尽管自己很不情愿,还是把继续进行这项事业的方法留传给了斯大林。

列宁主义的内部矛盾中的一个可以这样概括:他设想了一个正在消亡中的国家,但同时又设想了一个革命的政党,以便更好地进行这项事业。他把这个党设想成为如同一个注定要变成国家机构、国家工具的党,即把这个党设想成为注定要像国家权力一样建立和构成的党。由于这个党可以从外部、从高处向工人阶级灌输知识,并且还为工人阶级提供其它东西,它当然被看作高于工人阶级。因此,只有它应该在变化着的各种形势中起组织和指明方向的作用,这样它就不可避免地把知识和权力结合起来。

今天,当重读罗莎·卢森堡和她的与列宁激烈论争的文章和重读托洛茨基的著作《被出卖了的革命》,就会明白,列宁主义的关于党的概念所要冒的各种风险并非未被人察觉到过。这个概念导

致党——国家相等同。因此，国家的消亡是以政党的自我摧毁为前提的。而一个已经制度化了的庞大的社会政治组织又怎么会自我摧毁呢？罗莎·卢森堡和托洛茨基曾先后指出过这一点。由于政党也充当了国家机器（无论是在意识形态方面，还是在政治方面），因而也就大大加强了国家机器。那么，国家又怎么会自行消亡呢？

今天，当人们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是用具有强制和镇压的能力来定义国家、而并没有企图对权力的构造和效能进行分析时，不是感到很吃惊吗？政权是如何在欧洲建立起来的？国家又是怎样建立起来的？除了突如其来的暴力之外，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导师们未曾论及过还可能会有其它的斗争方式。让我们重申一下已经提请注意的问题：他们既没有意识到“权力的意志”和它的能力，也没有意识到政治之外的各种附属关系的错综复杂。更确切地说，他们没有看到（尼彩曾经揭示过的）道德、它的力量和它的狡诈。马克思有时几乎预感不到道德在意识形态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从这些“意识形态”和表现中获得的只是一种抽象的、哲学的幻觉。他没有想到，为了把西方的人民置于劳动之中，在各个方面都应该有一种纪律。而国家强制同样具有这种通过劳动的道德价值来压制的方面。“马克思主义者们”丝毫也没去考虑国家的压制的各种方法，尤其是这样的事实，由于压制对准了一个目标，却达到了另一个目的。例如，性压制的目的，（不管是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是为了人能更好地在劳动中发挥作用。性压制只是一种方法，然而却是很有效的，这是因为在性欲与劳动之间存在着对立。这种对立对于一般动物来说，可以通过实际的阉割方法来解决，而对于人来说，只能用象征性的阉割（性压制）的方法来解决。

在列宁的思想中可能有一种道德内容，而这种道德内容被表面上的政治形式掩盖着，倚仗着这种政治形式的“社会主义”可能

是最伟大的、最有力的道德化的事业(政治纪律、劳动纪律和道德,等等)。这种道德化难道不会掩盖普遍的、等价的原则(这种普遍的等价的原则已经扩大到在国家权力机关的严密监督下的所有的个人活动领域)吗?这只是一种假设。

当它触及到国家的具体问题:教育、知识、官僚主义、各种关系的再现与更新时,列宁主义的弱点就显得明显了。列宁忽视了马克思在涉及到法国的两个波拿巴时所尝试的政治的分析原则:在一个分散成为各种生产单位的国度里是不可能不产生一个强大的国家和这个国家的全部恶习。列宁是否信奉由基层的工人阶级民主推动的党才有能力对经济、社会和政治进行重新组织呢?这是肯定的。“工人和农民的监督”的设想似乎就表明了这一点。这是何等的幻想!在C·伯特兰(C·Bettelheim)的著作之前,在A·索布尔(A·Soboul)的关于法国革命的研究中,得出了一些与伯特兰相似的结论:在内战中,一部分“先进的”因素消失了,政府部门和军队被“脱脂”,简言之,革命者几乎被革命所扼杀,“工人和农民的监督”又能如何进行?

对于国家问题,还可以从侧面进一步加以探讨,作出下列的描述:

对于列宁来说,他们的观点是有力的。这首先是他指出了不平衡发展的理论。这种不平衡发展的规律马克思已经预感到,而列宁作了概括。这种规律已经扩展到了整个现代世界,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的不平衡性到认识、艺术和日常生活的所有的部门之间的不平衡性。可以说,到处都存在着差距、对比和失调。在技术和实际生活中差异变得令人吃惊。日常生活既是被剥削的、又是被摆布的,而且已被技术完全支配,变得乏味和平庸到了极点。

人们如果把今天(1976年)的英国同20世纪初的英国相比较,

人们如果看到新的而且也变成积累、甚至帝国主义的权力（如巴西）中心的国家的崛起，人们就可以体会到不平衡规律的意义。只有这种不平衡的规律，可以保证列宁思想的持久性，但并非能保证“列宁主义”的牢固性。这种普遍的不平衡的规律往往能出乎意料的说明各种政治现实。作为国家，也存在着各个国家之间的不平衡性的发展。我们将会有机会指出国家体制在世界范围内所表现的这种不平衡发展的特征。在这里，国家似乎已经达到了它的成熟阶段；在那里，国家刚刚诞生；在这里，国家即将诞生；在那里，它已经给人一种衰老的印象。

这种不平衡性的规律在“基础”和各种“上层建筑”之间的不平衡发展的情况中的表现更引人注目。可能存在着先进的上层建筑和落后的基础的情况，这正是涉及到正在形成中的苏维埃俄国情况的“列宁主义的”论点。关于这个问题，列宁在《俄国革命的五年》一文中曾写道：“我们继承了旧的国家机器，而这正是我们的不幸”。他又补充说：“我们干了大量的蠢事”。列宁的话意味着，作为政治革命的产物的上层建筑将拉着经济基础向前走，使得经济基础能够跟上去，使基础和上层建筑能够协调。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差距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马克思的原始理论。对于马克思来说，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决定了人们的社会存在，因而也决定了人们的意识，而人们的意识可能会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马克思在一篇文章中说过：在物质生产力发展的某一个阶段，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同现存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这些关系由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了这些力量的桎梏。这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将到来。正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由这种发展所引起的社会斗争推动了社会。意识形态的、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在这种动荡的时期重新获得与它们的“基础”的协调。这样，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也就获得了解决。

在马克思的原始的论述中，马克思似乎很好地把“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发展和运转置于一种客观的分析之中；他似乎从这种客观分析中找出了同一种自然规律相似的科学规律，社会过程被看作是一种自然历史的过程。这也是列宁本人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一文中的论题。如果由于各种上层建筑走在基础的前面而出现了不平衡，这个过程、这个规律又将会怎么样呢？如果需要通过革命的手段获得协调的各种条件（在落后的国家，通过一种起义的手段），这个过程、这个规律又将会怎么样呢？政治与经济的一种松驰的联系会损害对经济基础和它同它的“上层建筑的反映”的科学认识。这种松驰的联系会使人隐约地看到另外一种可能性：即表面上似乎是客观分析（提出了自然规律），实际上提出了各种社会规则和一种道德（劳动的和生产的）。“上层建筑的”效能和性质首先被承认，接着被理论化。如果这样，简便的唯物主义将会破裂而不复存在。

“列宁主义”的关于各种“先进的上层建筑”的论点能够接受吗？在一种意外的形势下，“基础”会发生什么样的突然变化？它会以一种令人满意的方式发展吗？它是否会在改变自己的方向（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向）的同时也改变了“上层建筑”？

这正是1920年——1925年俄国革命年代中的不可思议的创造性能力和紧接着的衰退所给予的启示。在创造性的年代里，各种艺术（电影、诗歌、建筑术、音乐等等）渗透各个领域。然而，革命的火山后来出生的并非是一个“少女”，而是一个“丑八怪”。“基础”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它又是为何发生这样的变化呢？原来，“先进的上层建筑”的论点后来遭到了斯大林的令人担忧的解释。列宁曾经号召：“苏维埃加电气化，”斯大林是实现了电气化，但苏维埃却成了一句空话。

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同列宁主义相反，现在，我们必须阐明

这个问题的某些薄弱的或者被扭曲了的地方。帝国主义的理论只能维持在一种典型的教条主义的价值上。

我们曾经强调指出过罗莎·卢森堡对列宁的批评多么正确。帝国主义应该有几个阶段，第一阶段同商业资本主义和它的扩张以及世界市场的建立是同时代的，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接着英国人和法国人不是建立了它们的帝国吗？拉丁美洲不是也打上了帝国主义的印记吗？盎格鲁—撒克逊的美洲不是通过革命战争获得独立的吗？法国在现代金融资本主义和资本输出之前不就占领了阿尔及利亚了吗？像其它的理论家一样，列宁研究的只是一个阶段，肯定是欧洲帝国主义的一个很富有侵略性的阶段。但是，这个阶段本身不正是以前各个阶段所容许和导致的结果吗？过高地估计一个重要的现象，即资本输出，导致列宁得出了一些鲁莽的结论。各资本主义大国将会变成靠利益生活的寄生者，因而也就不可能发展它们自身的生产力。列宁在这种理论中找到一些能够解释世界战争的因素，但其结论超越了各种前提。即使像法国这样一个与列宁的描述和分析相适合（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国家，接着也获得了飞快的增长，即使不说是发展。

新帝国主义当然没有超出帝国主义的范围。美国这样的经济、金融和军事大国没有停止过剧烈的增长。但是中国人指责苏联为“社会——帝国主义”，这个概念和所谓“第三世界”的理论一样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由此可知，列宁所描绘的帝国主义既不是资本主义的、也不是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这种新帝国主义适应了各种称之为跨国公司的出现，它把赌注下在某些国家的快速发展上、下在某些非独立的、但实际上实行工业化的国家（例如巴西型）上。大公司在世界范围内活动，具有国际性或者是跨国性的，它们在很多国家设有子公司，如果有必要的话，就在这些国家投资。资本的大量外流和转让具有一种无法从外部观察到的复杂性。这些

大公司不仅占领了一些已经确立了的部门，而且也占领了一些尖端部门：原子能、石油化工、信息、大的贸易、与保险，等等。在这些部门，它们在经济上完全占支配地位。由于可能会出现政治干预的情况，它们也干扰各种政治措施。最后，资本主义大国通过大量征召来自所谓“发展中的”国家的外籍劳工的办法重新展开剩余价值的再生产。这就是说，现在，它们为了剩余价值而使用的各种方法和帝国主义的以前阶段已经不再符合。由各种“国家的体制”所占有的、也就是说由 150 多个国家、民族所占有的当代世界已经不同于 1914 年的世界（当时只有某些国家可以发号施令），它已经不再可能用野蛮争斗的方法来获得势力范围。

关于党的理论，主要的问题已经讲过。列宁的论点适合于工人阶级的一种不发达的状态，由于他们还没有获得任何政治经验，就不能够拿他们的缺陷同任何一个在民主制度下的工人阶级的优势相比。一种在自己的历史上经历过多次革命的工人阶级的有教养的自发性同列宁所批驳的野蛮的自发性之间毫无共同之处。政党的作用不应该被当作没有教养的群众的教师的作用，这种教师往往是自封的，它把它周围的在政治上对自己有用的一切制度化。

今天，在“发达的”国家，谈不上从外部和从高处向工人阶级灌输知识的问题（虽然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同步发展，虽然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话来说，上层建筑极端地落后于经济基础，即落后于技术和在生产中所进行的投资。）人们甚至可以补充说，在这种条件下，“社会基础”应该有权发表意见，他们的“自发性的”主张具有一个含意：要使落后的上层建筑赶上生产力的发展。对于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对于各种质量的要求和自治管理的愿望和倾向，是否就可以作这样的理解呢？而他们对质量的要求和对自治管理的愿望，确切地说，是在工会的、政治的机构之外

展开的,而这些工会的、政治的机构总是企图从外部和高处向“社会基础”提供知识。

列宁的唯物主义?它是强有力的,也是很简练的。不少好的战士把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当作圣书一样来阅读,他们祈祷自己能成为哲学家,因为他们相信:他们面前的这张桌子、这堵墙、这座房子都是“实际地”摆在他们面前。毫无疑问,他们同样相信资产阶级所不相信的外部世界的一切……

具有讽刺意义的一点是:读者可以把尼采的文章同列宁的文章相比较,尼采在他的文章中同样把认识当作反映和当作镜子,而列宁在他的文章中提出了同一种隐喻。尼采把认识当作一种隐喻并企图搞清为什么认识的行为要通过隐喻来表达。他发现了一些重要的原因,这些原因揭示了知识的各种重迭和多余的添加,这些原因也因此批驳了各种唯心主义的解释和各种赘瘤(正如列宁所说)。列宁,他本身是按照字面的意思来理解隐喻的:科学认识是一种复写,是一种照像术。在《辩证法的笔记》中,列宁走得更远,他寻求概念的一种辩证的理论,而这项工作在大部分列宁主义者的著作中从来也没有获得过好的声誉。这些列宁主义者们夸耀《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好的含意,而并不考虑这个好的含意是否是按照他自己的方式的唯心主义。

重读列宁的著作,感到他似乎是一位天才的战术家和战略家,但是他的战术和战略并没有什么值得思考的地方,他所采用的概念都是从马克思那里借用来的,他表现为一个经验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这也许正是他自己得出的是“生活”占了上风的缘故。当他写道,“只有当在低处的那些人不再想、而在高处的那些人不能够继续按照老的方式生活,只有在这个时候革命才能取胜”这段话的时候,他表现为一个政治的行家和对人民群众了解得很细致的观察家。“一般地说,历史,特别是各种革命的历史总是具有丰富的

内容，这比所有的先驱者们所想的要更加丰富多彩、更加生动活泼。”他的这些话讲得多么好！然而，对于他所维护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概念，列宁丝毫也没有补充什么，他严格地保存它，而各种付诸实行的决定都是通过政治的恐怖和镇压的手段来达到，以便达到维护他周围所建立起来的那种权力。这丝毫也不像葛兰西把“专政”解释成为“领导权”的那些论述。这样，渐渐地，苏维埃和苏维埃权力变成了被称之为“苏维埃的”国家政权。

今天，人们会想，列宁表面上是政治的看法是否包含着一种伦理的观念。资产阶级，从定义来看它是坏的，因为它是有闲者组成的，它只能够干坏事，它没有任何理性，没有生命力；最坏的人，尤其是心术不正的人，是一些妥协、调和的拥护者：社会民主党人；至于人民，他是好的，甚至其本质也是好的，因为人民的本性是好的，至少因为他有劳动的品质。人民是劳动者，无论从本体论的意义上来讲，还是从绝对意义上来讲，人民这个定义表明，他是通过生产劳动来塑造自己的，同时又是同创造性密不可分的。一种完美的道德支持完美的、绝对的政治并且作为这种政治的论据。对群众的完全的信任、可以看作是从伦理的角度考虑的信任，这难道不是列宁主义的本质吗？“共产主义将在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表现出来”，一般的劳动，尤其是工业劳动只能是一种历史的、相对的现象，这种现象是同“过了时的价值”相联系的，这些价值是自然和自动装置之间的媒介（中间物），它是不可能进入列宁的观念中的。工业劳动在西方曾经是通过艰巨的方式强迫接受的，从17世纪起是通过镇压和严格的纪律强迫接受的，它不是一种永恒的现象，但是是一种“政治的结果”，这都超出了列宁所使用的各种范畴。而这并不能阻止，列宁在实践一经验方面采取各种必要的措施，以便使俄国人民在“战时共产主义”之后重新投入或开始投入劳动之中。

十三、从二十世纪初到葛兰西

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已经分裂成为一些不同的派别，这些派别在学说上都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作为参照，但这并不能掩盖他们之间的分歧。

左倾化和右倾化的倾向，改良主义和革命，经济主义和政治化，科学主义和意志主义，共同瓜分着“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按照先前所明确的态度，这个被分裂了的整体和产生于各种矛盾的运动构成了“马克思主义”。

但在这个期间，国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得以巩固的同时，也同样表现了多样化。

得到加强了的国家，通过类似的、当然按照各个国家和民族的特点又有所区别的道路，都实现了资产阶级的“领导权”。“领导权”这个概念是葛兰西通过对资产阶级社会的观察和分析而提出来的，西方把它解释成为专政（往往是指无产阶级的）。

让我们先回顾一下法国的历史，这样既可以确切地理解 20 世

纪初的形势,又可以说明“领导权”这个概念(葛兰西著作中的)。

资产阶级甚至在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之前,就已经进入了旧制度的国家。它又借助于人民的帮助,用革命的手段夺取了国家,通过人权宣言,它甚至走到超出了它本身所能负担的职责范围。但是,以农业为基础的旧的封建军事国家的残余和党羽并没有根除,资产阶级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保留了前资本主义的法国的旧制度。文化呢?它仍然停留在古典的19世纪耶稣会的和专制的基础上,而耶稣会的和专制的基础又是以对17世纪的崇拜、对路易十四的崇拜为中心的。这种传统一直持续到20世纪。至于艺术和文学,在19世纪,它们陷入了浪漫主义,而浪漫主义自称是反资产阶级的,从政治上来说,浪漫主义致力于在法国实现民主。因此,它对资产阶级用处不大,必须使它失去作用,把它纳入道德的范围。而源出于基督教的道德必须超越唯理论(康德的)的束缚才能运用,又把它运用到什么地方上去呢?通过学校和军队,通过性的压制和严格的劳动纪律,把它强加到整个社会中。资产阶级限定的目标是:按照“分崩离析”的因素——农民、破产的手工业者的模型来塑造正在形成中的工人阶级;它的赌注是:把整个社会都置于劳动之中,包括正在改组的中产阶级也在其中,以便整个社会在国家、理性、发展的名义掩盖下,都进行剩余价值和过剩产品的资本主义的生产。为了能够达到步伐一致地实现这个特殊的目标,没有比一种绝对的命令“去做你应该做的……”更有效的了。

20世纪初,“文化”迁就于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运用。供群众使用的伦理学是世俗的(即非宗教的)、规格化和理性化的,它透过康德的解释,打上法国革命的明显的烙印,这种伦理学在整个国家领土上占有统治地位,它装饰着这块领土,并通过公立的、世俗的和强制性的学校传播(这种学校本身适应于扫盲、适应于在人民中传播某种知识)。

是谁设想并扩散这种“激进的”、统一的道德以便实现资产阶级的“领导权”的呢？是法国资产阶级自由派，“激进的阶层”、新教徒、犹太人、共济会的成员。他们建立了一种群众的伦理学并把它贯彻到了教育（初级的）之中，而这并不是没有通过同宗教的道德进行激烈的意识形态的斗争而能做到的。同基督教的道德相比较，这种世俗的非宗教化其实可以被看作为是一种进步和自由的一个阶段。

人们看到在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一种官方的资产阶级伦理学开始形成。国家对画家、雕刻家、建筑师的鼓励（奖励和荣誉、勋章和学会、展览会和沙龙上的成就），推动了这种大报所支持的艺术。通过反对新像锋派的艺术与反对反资产阶级的艺术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就好象是作为对美、对女人的永恒的观念、对奥林匹斯诸神的宁静安详的辩护，而得到传播。“丑陋的”文学艺术直是到很晚很晚（在 20 世纪的下半叶）才回潮。曾经是先锋的知识分子是不可能断绝与权力的联系的；尽管他们时而被当作精华、时而被当作精华的对立面。

这样，资产阶级通过逐步达到能够支配制度、教育、文化、艺术表演和意识形态而实现了“领导权”。而资产阶级为了夺取“领导权”，在“文化方面”所作的努力和在制度方面所作的努力同样巨大。它没有只是按照专政的粗野的形象，借助于枪炮和子弹，而是通过政治斗争和各种各样的理论斗争逐步实现的。人们不大会太强调这样一个被埋没了的历史事实：进步的自由的“左翼”在战略上构成了资产阶级的激进派。这种“左翼”一直扩大到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和倾向于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这些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和倾向于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并非是国家特定的工具，他们是“左翼”，作为一个集团，是整个社会的动力之一，这个集团提出了各种见解，为进入“文化”领域而斗争。正是这个“左翼”进行改

革并且使制度和国家现代化。正是通过“左翼”，(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得以实现，但是资产阶级不是没有冒失去控制的危险的。变成具有统治地位的阶级作为一个统一体，在它所缓慢地但又牢固地建立起来的国家的政治范围内起作用，尽管，这个阶级内部又划分为不同的、甚至彼此不能相容的职能。

它的这种能力又是如何得来的呢？是因为它拥有经济实力吗？并不是。是因为它拥有货币的实力吗？只是一部分原因，但货币不能解释一切。回答是：是由于国家，是由于国家的战略性的能力，处在国家的地位上，甚至反对派也能够被利用。由此可见，这种能力是必要的，正是通过这种能力，依靠这种能力，政治权力才能完成它的使命，才能够运转，才能征收适用于政治权力的敌对者的发明创造物。

面对如此获得统治权的阶级，工人阶级事实上被分裂，趋于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和趋于社会主义的倾向之间所进行的斗争，甚至比它们同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要激烈。阶级内部的怨恨和不满不亚于“阶级反对阶级”的那种怨恨和不满。

与其同时，“马克思主义”也分裂了。让我们简略地列出马克思主义之外与它有关的几种倾向：

a) 科学主义，接近于实证主义。这种倾向赞成对历史的经济主义解释。它相信(在这种相信中，同对历史的各种抽象的和神学的解释相比较，具有蔑视宗教的大胆行为)在历史决定论中能够直接抓住现实。这种倾向主要在大学的知识界中得到加强，在那里，这种倾向促进了一种对历史的重写。这种倾向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倾向于经济主义，倾向于计划工作合理化、倾向于技术统治论。它允许承认技术、科学等这样的“因素”自治。

b) 一种意志主义，这就是说为政治、或者更确切地说为“政治化”进行一种无条件的辩解。在这种倾向中，一切都是虚伪的，一

一切都是表面的。只有把被掩盖的一切赤裸裸地暴露出来才能看清其本质。在非政治的外表下，一切都是政治的。口号是很容易偏左的，这就是说很容易变为左倾主义。“首先是政治”。这就产生了对政治人物、领袖和他们的“天才”的崇拜。

c)但这并不是一切。各种人文科学的大冒险开始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只能作为抓住一种总体性；生产方式，才能被理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显然，“马克思主义”使哲学和黑格尔主义深入了。我们发现，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作为总体性的生产方式的概念比生产关系的概念更加难于理解，而且这两者又是互相牵连的。同社会实践中分析所区分的各个方面：心理学方面、经济学方面、历史学方面、人口统计学方面和工艺学方面等相比较，马克思并没有少坚持把生产方式这个概念当作优先的、统一的、总体化的概念。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在理论上支配着各种专门科学的和科学劳动划分的各种从属性的范畴，而这种划分与马克思是同时代开始的。然而，人们不能就此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经济学家（他们批判政治经济学）、或者不是历史学家（他们把历史的某些方面，其中包括阶级斗争，纳入他们的理论）、或者也不是工艺学家（他们经常强调技术的重要性，但并非作为生产关系的可以分开的因素）等。

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到了20世纪，人类现实的各种特殊的学科得到了发展。这些学科不只是把“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者们”不知道抓住的总现实的各个方面加以分割，而且，它们反转过来反对马克思主义，以便使马克思主义纳入它们的倾向、方法和步调之中。由此，产生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主义，最后，还有一种马克思主义化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既被看作为是一种文化行为，又被看作为是一种分析文化（即第三世界的文化和现存社会中的“不幸的意识”的文化）的

一种固有方法。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内部的分歧和矛盾已经不可逆转。德国学派，即称之为法兰克福学派，它本身就包括一些彼此不相容的一些倾向：新教条主义的历史主义（卢卡奇）、怀疑论的哲学（科尔施）、空想主义（E·布洛什）、批判的社会学（马尔库塞）、伦理学理论（阿多尔诺），等等。这个学派的理论的和意识形态的生产既丰富又多样化，而且经常是有相当高的质量。它的长处是：思考的中心围绕着知识，或者与知识有关的某一个特殊方面。它的短处是：理论制作和著作追求单一性。这个学派遭受过失败。它勇敢地与之斗争的法西斯主义把它逐出了德国。这个学派较多地涉及到希特勒主义，而较少关注斯大林主义，这在当时来说，也是有它的历史背景的，同时，作为传统方式的“本质”，知识理论占有优势。

这里是否必须强调这样一些奇特的现象：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世界化和蜕变。在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越来越惨痛地被分裂：正统派（各种各样的）反对修正主义（也是各种各样的）——政治的（这就是说有关国家制度的）意识形态反对现存制度，包括对国家的彻底批判。这样，马克思主义是否变得很丰富了？是的，但同样也是贫乏的，理论——实践的脱离，等。——马克思主义是否变得贫乏化了？不只是这样。内部的辩证法。刺激性的争执此起彼伏。

在世界革命的舞台上，20世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并由此产生了各种革命，而农民和农民问题在这些革命中起支配作用。战争本身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的论题加以解释。一种巨大的经济危机只有通过各种形式的破坏才能得到平衡。战争重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它走在一个称之为“繁荣的”时代的前面。战争并非肯定是一种革命的出路，但它并不排除革命。归根到底，战争越来越象是国家本身的天职（令人焦虑和压抑的），是国家为战争提供了军队和决定死亡的权力。战争的滋长越来越和军队、秘密警察等相联

系。不只是资本主义国家是这样，社会主义国家也有这种情况，国家只能从显示暴力的意义上理解。

在同一个时期，资产阶级的子孙和被挑选出来的“人民的子孙”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他们是在利用“马克思主义”吗？当然，人们可以用带有嘲讽的口气说，正是多亏他们，“马克思主义”才得以继续存在和有效。他们从马克思主义中获得了社会的——经济的合理化的概念、规划的概念、合理化的计划的概念、生产本位主义的概念、含有教条主义的成份的概念，而主要是获得了使他们感到忧虑的一些概念。被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未引起他们的批评，以至于使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的发展只有通过这些令人悲痛的矛盾才能继续下去。“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被称之为资本主义的国家，而幸存于大多数（即使不是全部）被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国家。在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进入了“文化”，为领导者们提供一些观点；另一方面，在政治的对比和分析中也受到重视。

对于安东尼奥·葛兰西，值得用专门一章以便确定他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葛兰西的著作和概念是有它的时间性和针对性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29—1932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之间。在这段时间里，无产阶级专政的论题和概念在一种普遍暴力的环境下，在欧洲得到了传播。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在西方引起了对一段血腥历史的追忆。由于这个词未有被正确理解，它使人们震惊，引起人们的不信任感。在法国，极端主义和灾难的爱好者们以一种兴高采烈的心情赞成它；在意大利，比较先进的革命运动（从1920年起占领工厂）由于遇到了严重的障碍（反革命的猖獗），在这个口号面前也后退了。但在意大利，对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论题的讨论，比在法国却更加活跃、更加深入，因为在法国工运中心主

义已经很盛行。按照马基雅维里主义的传统，葛兰西很快意识到，必须用西方的语言来解释“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这就是说这种解释应该既合理又巧妙。只有这样，才能把在法国和在其它地方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狂热的崇拜者排除出去。口头上的狂热崇拜者，用极端主义的词藻掩盖着自己，而他们的政策只能是机会主义的，以便继续使用这个词。

在安东尼奥·葛兰西的著作中，读者很难找到关于国家的详尽的原始分析，但却能找到关于政治战略和策略的一系列新的概述。葛兰西从黑格尔关于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的描述开始，他接受了在意大利表现得很强烈的黑格尔传统（例如科尔施的著作）的这些概念。葛兰西保留了与政治社会相区别的“市民社会”的提法，马克思也曾同样使用过这个词，例如，1847年于布鲁塞尔，他写道：拿破仑发现在西班牙有一个垂死的国家机器，而它的市民社会却是充满活力和生命的，并蕴藏着一股反抗的力量和巨大的能量。可是，葛兰西是为分析实践才使用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这样一些概念的，这足以说明在黑格尔和他之间存在着一种“政治断裂”。在葛兰西看来，被置于市民社会之上的政治社会只有建立起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各种各样的关系，才便于行使“领导权”。葛兰西之所以不怎么详细分析国家，是有他的想法的，在他看来，为了能够有效地在意大利实现民族的统一，这就是说为了结束南方落后的、不发达的、仍然是封建主义的状况，首先应该加强国家，而当时的意大利的统治者并未能通过造就民族实体达到建立一个强大而统一的国家的目的。因此，关于国家消亡的理论当时对于葛兰西来说兴趣不大。然而，他对国家制度的效能却有一种深刻的想法，他认为，国家制度在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秩序中能够起到麻痹市民社会的首创性的作用、能够起到窒息人民和工人阶级革命愿望的作用。

在葛兰西的著作中,有没有一种体系?一种“纲领主义”?没有。这正是他的著作的力量所在。葛兰西,这个在狱中写道监狱能够避免外部的思想压力的人,具有一种对行动(实践)的独创性的见解。他认为,“有机的”知识分子表现了一种组织能力。领导,就是组织,就是指导行动。仅有教育是不够的。实践可以暴露各种问题(例如,意大利的南方与北方的统一问题)。只有实践才能把那些隐藏着的东西暴露出来,只有实践才能觉察出各种假关系的隐秘性,这是因为实践能产生出各种真关系。葛兰西的著作包含了对政治和行动的各种概述,这些概述是同历史唯物主义的极细致的解释相衔接的。黑格尔主义通过科尔施被他接受,并在他的著作中同马克思主义形成对比,他对黑格尔主义既有继承又有偏离。葛兰西比恩格斯、马克思和列宁更强烈地恢复了对历史运动的认识。如果说各种上层建筑不是凌驾于空中,如果说它们具有一种有效性,如果说它们能够同它们的基础一起进入“历史集团”,这是因为它们同人们对它们的认识有一种联系。为了行使权力,某一种知识始终是必须的(尽管这还是不够的)。引导人民的人总是必须通过经验或直观的方法、或者通过所掌握的科学,去认识他们所支配的那些人。葛兰西并没有做这样的假设:为强力服务的知识必然区别于为强力服务的认识和哲学。如果不把知识转变为政治服务的知识(当然这种知识的本质不能改变),即使是君主也会陷入灾难。君主总是轮流地运用权力和知识,一个明智的国家元首总是自觉而又适度地使用权力与暴行。安东尼奥·葛兰西熟悉马基雅维里主义。对于他来说,现代君主有一个集体的称号:党。

然而,要使知识在政治上受到尊重并非是很顺利的。因为君主总是会兼并科学和各种学者。在君主看来,知识是从属于政治权力的,因此它必须为政治权力服务。但葛兰西似乎没有看到这种危险,这并不是他的责任,因为葛兰西的思想认识有它的时间

性：产生在斯大林对权力的滥用之前。

强调在各种“上层建筑”中知识的重要性，就必须重新评价知识分子的作用，对于葛兰西来说，这一点是很重要的。知识分子没有必要为了参与政治活动、为了为工人阶级服务、为了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而自我否定。他们有自治的权力，他们应该独立思考 and 探索。但是，他们的研究本身要求他们又不要脱离实践，不要外在于活跃的集团和上升的阶级（而在今天，工人阶级正处于上升时期，它正在接管领导权）。“有机的”知识分子，这就是说同行动、同实践相联系的知识分子总是能够起到一种重要的作用的，但是他们只能以各种各样的身份，如法学家、艺术家、哲学家或者学者，来起作用。

一个在政治上活跃的集团又是如何实现一个处于上升时期的阶级（在它掌握政权之前和掌握政权之后）的领导权呢？这个集团必须有一个双重性的认识：对所有阶级的物质利益的认识和对他们的心愿与品行的认识。对他们的物质利益的认识能够避免在必要的情况下会同他们发生直接的冲突；对他们的“灵魂”的认识，能够做到或者是按照他们的心愿、或者是在得到他们理解的情况下行动。这样，领导权也就建立起来了。这种领导权并非是通过粗暴的手段迫使别人接受的。国家，可以被看作为是各种场所和手段的整体，而一个积极的、明智的集团所代表的一个阶级的领导权，正是通过这些场所和手段而获得的。

葛兰西的退却正是在思考了1917年的革命（即俄国的十月革命）和它所引起的后果的基础上而产生的，即面对这些后果中的某些后果、特别是面对持续的暴力这样的后果而产生的。在他看来，即使确实存在着工人阶级必须通过暴力在西欧夺取政权的话，如果不知道或者预见不到它将如何行使这样的权力，那么工人阶级还是不能够占有这样的权力。由此可见，葛兰西的态度包含了对

列宁主义的一种严肃的批评。在葛兰西看来，工人阶级和它的代表们只有在下列条件下才能够实施统治，这些条件是：预先需要显示出他们的领导人的能力，行使领导权的准备和开始行使领导权，直到有效地影响文化和教育（这正是A·马西奥舍先生在他们的《论葛兰西》一书中所涉及到的内容，该书1974年由法国入门出版社出版）。

与其说应该在葛兰西的著作中寻找一种在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政治实践的理论，倒不如说是应该寻找一种关于国家的理论。尽管这两者是不能够完全分离的。葛兰西对现代国家的批评是模糊不清的（毫无疑问，这是由于他考虑到意大利的前途，即统一问题），这种批评没有超出对国家的国家批评的范围。关于领导权的概念吸引了他政治上的注意力，在他看来，只要能充分地掌握它，就如同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而一种领导权的实施包含了一种长期的和涉及面很广的战略以及与这种战略相适应的一种战术。为了这种领导权的实施能不时时机地和有效地进行下去，必须有一个积极的和灵活的集团来负责进行。而且这个集团（按照葛兰西的看法，这个集团似乎并非要求是同质的，即清一色的）必须会运用各种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会运用经济形势和各种社会力量（包括处于上升时期的社会力量和处于衰退时期的社会力量），会运用各种机遇或机会。

从这种前途考虑，工人阶级的和无产阶级的政治生活将在广阔的领域内展开。而在这种展开的过程中，马基雅维里主义又会以一种不只是使读者感到焦虑的方式出现。党，对于葛兰西来说，既是集体的思想家，又是“君主”（现代的）。作为集体思想家，它并非是从外部接受真理的，而是通过一种与“有机的”知识分子合作的自身的劳动而获得真理的。而作为现代君主，党又可能会有某种狡诈和激烈的表现，甚至还会表现出一种政治上的犬儒主义。在

这种情况下,它就不是作为拥有真理的党而出现,而只是以“革命的真理”的名义出现。这样,它就越来越不像是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政党,因为它看来,“目标是无关紧要的,运动就是一切”。而这正是伯恩斯坦的“右翼”的说法。对于这样的现代君主,战略目标总是必要的,而所有的手段又总是被认为是好的。因为,至少人们会畏惧它。葛兰西是在狱中、是在面对列宁主义而犹豫不决的情况下写作和思考这些问题的。关于斯大林,葛兰西又是如何想的呢?从C·波尔的加到斯大林,君主如果取得了成功,他不总是认为是有理由的吗?正是按照这种说法,国家得到了加强。在创立了最强大的国家的列宁的著作中,所自相矛盾地包含的一种国家消亡的论点,在葛兰西的著作中则变得模糊不清,这是因为葛兰西企图巧妙地回避同列宁主义的各种牵连。葛兰西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巧妙的说法并没有排除这种专政的手段,即通过党来管理的国家的加强。这样党不就是以它所“代表”的阶级而具有支配权了吗?这正是葛兰西的观点模糊不清和它的人民性在法国未能被澄清的原因所在。而对于后来导致了斯大林主义的政治概念的批评,葛兰西是以一种焦虑的感觉予以赞成的,并通过有关君主的理论对此进行了彻底的批评。

对于葛兰西来说,政治科学是通过政治历史,即通过政治活动的历史来确定的。这正是他的关于马基雅维里的笔记的意思。他在《狱中杂记》中详尽论述的关于领导权斗争的有关文章,就是一种与法国革命有联系的历史文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的领导权的概念,正是根据资产阶级为了夺取与保持权力并且按照自己的意志塑造整个社会所进行的斗争(阶级的)的历史而被构造出来的。从历史上来看,领导权的概念起源于法国的雅各宾主义和意大利的里索尔吉芒托派(Risorgimento,即以卡武尔,Cavour为代表)。葛兰西通过对历史上的“激烈的”时期中的“力量关系”的各

种变化的分析,企图确定这个流行的、而又被模糊地接受的词的含意,即各种力量关系的含意。他分出了三个时期(一种黑格尔式的三段式):

a) 当各种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水平的时候,各种新的社会力量也就会出现,这时,社会的一种转变的各种条件也就会成熟。

b) 接着,一些重要的变化就会在意识、各种反映和各种思想中产生。这首先表现在经济和行会方面。紧接着,集体利益的意识就会取代个体的(竞争的)利益的意识。这时,国家的问题也就提了出来。但只是在一种要求中提出来的,即要求同代表了掌权阶级而获得领导权的起支配作用的集团在政治——法律上平等中提出来的。而在一个更高的阶段中,即在明显的政治化阶段中,包含了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过渡,从这时起,上层建筑就成了问题。这时,国家就被当作一个集团的自身的组织。而这个集团的目的是建立起能够使这个集团得以最大限度扩张的各种条件,与其同时给它提供了普遍性的外表,并且诉诸于全国民族的力量。

c) 最后,即第三个时期,武装斗争时期,这是一个决定性的时期,即冲突的时期。

在这些文章中,安东尼奥·葛兰西叙述了聚集在罗伯斯·皮埃尔(Robes Pierre)周围的雅各宾派和聚集在卡武尔(Cavour)周围的里索尔吉芒托派所具有的政治作用。他完全采纳这种图式吗?换句话说,他是否把历史的概念改变成了理论的概念?

很可能,他把概念的这两个方面或两个因素混合了。这正是A·马西奥舍(A·Macciocchi)女士企图把葛兰西现代化,把他划到毛主义方面的原因(A·马西奥舍《论葛兰西》,第198—199页)。葛兰西本身并没有明确地表明这一点。很可能这是由于他厌恶按照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的实践来说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缘故。其实,他叙述一个事件的目的是企图归纳出一个规律。在他看来,

整个政治作用必须经过他所认为的这三时期，即从政治上的可能性到政治上的完成，必须经过这些时期。对于葛兰西来说，显然这是一种政治作用的规律，是一种“三种状态的规律”。

奇特的是，安东尼奥·葛兰西的这种想法不只是来自于黑格尔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而且也来自本格森(Bergson)。

关于这个问题，顺便说一下，人们可能注意到关于领导权问题，自葛兰西之后在中国提了出来(例如H·伊萨克斯在《中国革命的战略》和《中国》中谈到了这个问题，1973年)。在中国，领导权的前途涉及到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因而也是城市)的关系问题，认为为了支配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应该行使领导权。然而，应该说这是一种颠倒，这种颠倒至少说是应该值得讨论的。

在解释葛兰西的著作时，如果重视他在《新秩序》时期的实践，人们就会提出一个同国家的消亡的论点相一致的关于领导权的充满生气的图式。一个失势的阶级——资产阶级——会慢慢地但实实在在地失去它处于上升时期所获得的领导权。而一个处于上升时期的阶级在各种突变、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的斗争中，即从经济、教育到文化和知识的斗争中将获得领导权。在处于失势的阶级和处于上升的阶级之间，将会展开各种斗争。但处于上升的阶级的权力的建立并不必然经过一种公开的内战的方式而达到，当然各种冲突不可避免。因为处于失势时期的阶级还支配着它所建立起来的国家，而这种国家已被它发展到了顶点，处于上升时期的阶级，即工人阶级只能通过依靠基础(各种委员会，苏维埃，利益共同体，使用者的组织，等)的自下而上的运动来取得领导权，并且终结由它的对手所完善了的国家。

这样，安东尼奥·葛兰西就揭示了一个双重的(辩证的)过程，即既是历史的、又是实践的过程。在他看来，政治科学就在于揭示各种规律，例如三个时期的规律。但是，这是一种科学吗？葛兰西

是根据涉及到十九世纪的情况的分析而建立他的“规律”的，这种规律能够保证未来的活动将沿着这同一个过程吗？通过参照一些历史过程而确定的政治活动越来越像一门艺术（现代君主通过他的预测而从事的艺术），而不只是科学。

无论如何，这种充分的分析能够阻止把关于君主的理论和关于领导权的理论缩减成为各种纯粹的战术上的指示。它涉及到的是一种关于马克思思想的意大利的说法，也是一种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独创性的说法。而这正是葛兰西所要表明的。这丝毫也不会妨碍把他看成为一方面把社会的“可恶的”方面（权力之争）理论化、另一方面又围绕着强力的意志这个中心论题转而未敢深入探讨它的一位思想家。安东尼奥·葛兰西知道，君主是按照他的欲望而行动的，但他只看到了其中所包含的由活动所激发起的热情。我们知道，长期的经验表明，强力的意志的存在是根深蒂固的，而这种热情则是产生所有罪恶的原因。

十四、托洛茨基，斯大林

托洛茨基和斯大林都属于现代人物。他们的著作至今还被人们当作现代的作品加以阅读。这种阅读往往是和他们的活动联系起来并带着某种偏激情绪(或者是热爱,或者是仇恨)。我认为,对他们的著作的某些部分进行或是繁琐地、或是偏激地笔战和论争都是无益的。

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的唯一的历史存在是提出了一个既容易又难以解决的问题,即斯大林战胜他的对手和批评托洛茨基有没有深刻的“历史的”理由,这个深刻的“历史的”理由看来是有的,否则“马克思主义”将不复存在。当然,后来斯大林的背叛不能解释一切,既不能解释他的愚蠢,也不能解释他的天才,但是,革命发生蜕变是确实的、是很确实的……

托洛茨基应受到持久的承认是有其原因的。

首先,是他最先“诊断”出“斯大林主义”的。他揭露了俄国革命的蜕变。当他把苏联的国家看作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

国家”、看作是官僚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时，他击中了目标。然而，托洛茨基的分析并不深入，他没有看到，斯大林的国家将成为现代国家的模式和原型。这种现代国家作为经济的管理者，体现在国家元首身上的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和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也不可能知道，国家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一些方面相近，一些方面相异——将平分世界，它们在国家崇拜方面是一致的。

对于托洛茨基的思想，与其把它看作为是对现代国家的一种政治分析，还不如把它看作为是一种所包含的伦理学（革命的禁欲主义的）和一种美学（好争斗的、然而“美好的”作品的）更值得。简言之，托洛茨基的《被出卖了的革命》一书包含着一种正确的分析，但这种分析有它的时间性。自那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苏维埃国家发生了变化。变好了吗？变坏了，从“纯粹的”革命的观点来看，即从托洛茨基的观点来看，是变坏了，按照这种观点来看是毫无疑问的。再说，官僚主义侵袭和占领了社会，从生产企业和单位到各种机构。这不是一种局部的现象，而是一种国家机器的特有的蜕变。

托洛茨基另一个重要的观点是从他的论战性的著作中一点一点地显露出来的：如果有一天爆发无产阶级革命，这个革命将会由城市工人来实现。城市工人通过他们居住的场所和劳动的场所而汇集在一起，作为革命活动舞台的城市实体具有一种重要意义，城市工人能够打碎其本身就以城市实体为基础的国家。由于各大企业位于城市的各个中心或者这些中心的周围，城市的无产阶级能够夺取国家的各种中心和象征性的机构，在打碎了资本主义决策的中心机构以后，工人阶级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新建立一种被改造了的、但仍然是有组织的中心机构。

这种革命论点贯穿着托洛茨基的著作，尽管它未能被很好的阐明，未能完全体现在他的语言和理论概念中。

托洛茨基另一个功绩在于他曾强调无产阶级革命的世界性。

他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具有世界性和总体性, 否则, 这种革命就将是不可能的。世界性和总体性彼此之间是相互联系的, 一个国家的革命只能是这种世界性和总体性革命的一个阶段, 如果这个国家是孤立的, 这个阶段就可能变为失败。但是, 无产阶级革命又必须划分为民族来进行, 正是由于划分为由各个民族来进行, 才能充分体现无产阶级革命的世界性和总体性的过程, 这个过程才能向前发展。

然而, 托洛茨基低估了农民运动。他也没有看到、也不可能看到——两次大战之间和之后——这个过程所出现的惊人的差异和变化。而正是由于这个过程所表现出来的差异和变化, 世界的形势在改变。

托洛茨基不可能看到在工人阶级周围运转的各种运动的差异, 这些运动有时同工人阶级相一致, 有时同工人运动相分歧, 例如不发达国家的运动, 少数派的运动, 妇女运动、青年运动等。革命, 今天是否应该通过这些运动的差异和变化的总体性来说明其特征? 世界性的内容与经验是否更加丰富? 中国的文化革命和南斯拉夫的自治管理, 1968年法国的学生运动和意大利的地方化, 各种失败和各种成功, 所有这些运动不都在改变和丰富由托洛茨基所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世界性这个概念吗? 对于托洛茨基来说, 无产阶级革命必然形成一种世界性, 今天, 我们知道, 世界性是通过各种道路构成的, 其中当然包括工人阶级的作用和影响。托洛茨基的目光, 同世界性这个概念后来所表现出来的变化和差异相比, 还是狭直的。

托洛茨基批评的激烈和有力, 也表明他的批评的内容的丰富。在中国革命的开始阶段, 在西班牙战争期间, 托洛茨基的有关分析(由于这些分析对于苏联政策而言具有独立性)往往超人一等。半

个世纪以来,也就是说自从有“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讨论以来,这些研究和讨论受到了“托洛茨基主义”的促进。在这些研究和讨论中,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探讨经济学和政治学出色的努力,并不是总能够获得结果,经济学和政治学之间的衔接往往未能表现出来。在各种不同推崇托洛茨基的团体中,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是增加经济指数(危机的征兆)的倾向,另一种是作为一种唯意志论的政治化来设想政治活动的倾向。维持托洛茨基的中心的政治思想同样有它的时间性,今天如果还要“纯粹地”维持这种政治思想,就必然行不通,例如,否定增长(即否定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力的增长的可能性)或者限制需求的论点,就是这样。

斯大林?这里有必要多提供几页的篇幅,因为整个这部著作的目的和方向与考察“斯大林主义”以及它产生的条件和造成的后果有关。对于“斯大林主义”的批评开始得并不很晚,但直到很晚才引起人们的注意。

对于“斯大林主义”的争论,往往偏向于伦理方面。然而,问题并不在于知道斯大林是否是天才的或愚蠢的、伟大的或是糟糕的战略家,是否是专制的或民主的元首,甚至他的各种失败也可以不计算在内。这里重要的是作为政治家、作为元首的斯大林。首先,他充分地懂得国家的权威,他通过易于操纵的和生产的方面抓住国家的权力,在行使权力的同时,又往往以国家利益为理由和以国家的逻辑为借口。他不只是行使着专政(以无产阶级的名义)的权力,继俾斯麦之后,他与希特勒同时,把国家建成一个政治专制体。政权只能按照他的意愿进行运转,在社会主义的招牌下建立一个专制的政权。斯大林懂得国家权力的根本条件:平衡性和同质性。他抓住了这个根本条件,把国家和政党视为同一。斯大林魔术般地使苏俄社会的一部分矛盾消失,使平衡的制度在苏俄向前迈出了一大步。而与其同时,希特勒却面对一个划分为阶级的异质性

的社会,尽管他作了努力,还是不能够把他的国家中的下列三个定义一致起来,即市民社会、国家和政治社会(政党),平衡的制度在他的国家里总是发生故障。

斯大林是第一个掌握国家逻辑学的人,这就是说,他是第一个掌握了在国家中寻求平衡战略的人和把社会的各个集团和个人所有成分同国家完全一致起来的人。以国家利益为名的理由与哲学理由不同,它拥有巨大的活动范围,什么也抵挡不住用枪炮武装起来的这种国家逻辑学。斯大林懂得能够支配一切国家的一种计划的可能性和有效性,这种专制的、集中的和预想的而又具有一种不受干扰和无可非议的连贯性的计划负责增长,并把增长与发展混同起来。在这种平衡性和同一性的庞大过程中,经济是同政治保持一致的。为了完成这种计划,应该怎么办呢?必须有一种有能力的、忠诚的、积极的官僚机构,干部们在政治上必须学会把国家逻辑学与道德结合起来,这是斯大林的最后一张王牌;国家的对手们还将受到道德上的谴责。

可以讲,斯大林创造了一种新的、使人感到意外的与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的思想不能并存的国家方式。这种国家方式已经表现出和还在表现着它的权威,它开辟了现代世界所走的道路。斯大林的国家成了现代国家的模式,但是,在这种国家主义的竞赛中,领头的是国家社会主义,而在其背后,则是各色各样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激烈竞争。

依靠既有效、又粗暴的方法的斯大林逻辑学,在纸上的运转是再生动不过的了,在纯粹的“理论”中,他的国家模式如同太阳的光辉一样闪闪发光。在概念上,斯大林的国家模式与黑格尔的模式很近似(但斯大林并不承认这一点,这是因为他善于搞乱线索)。这种国家模式从纯理论的角度来说,具有令人信服和可靠的力量,但在实践中,则是寸步难行,与其说是靠行政管理和政治的各种组织

网络来运转，不如说是靠各种个人的关系网来运转。这种体制的弱点是什么呢？是它的辩证法，就是说，是它所具有的趋于对立的各种不可克服的矛盾。这些矛盾不断地从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和再现：生产者与计划制定者之间的矛盾，官僚机构强制与群众日常生活需求之间的矛盾，来自上面命令与产生于下面各种需要之间的矛盾。而且，官僚机构内部本身也充满矛盾，它本身就臃肿不堪，工作效力衰退，这是因为，凡是官僚机构，没有不产生腐化、野心和特权的。

斯大林，这个大逻辑学家，他善于搞乱线索又自称是辩证法家（把知识表面上的核心当作它辩证的内容）。在斯大林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找到关于国家的生产方式的详尽阐述和他毫不留情的逻辑，正是这种逻辑把他的国家的生产方式引向特定的灾难：“文化”警察化概念，庞大军事力量，日常生活压抑，不断加剧的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同波拿巴主义一样，斯大林主义的产生和存在有它的时间性，这是因为国家和国家的逻辑学也有它们的时间性，它们都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只负有有限的责任。

十五、毛,毛主义

斯大林的继承者们,赫鲁晓夫等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理所当然地可以确定为“修正主义者”,这是毫无疑问的。由赫鲁晓夫蛊惑人心地提出“全民的国家”这个概念,就表明了这一点。

根据被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分析,不可能有“全民的”国家。或者新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的专政(领导权),或者国家消失在市民社会之中直至消亡。赫鲁晓夫所提出的“全民的国家”这个概念,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被当作一种国家的意识形态而起作用;有人总是惯于引用这种意识形态来为各种政治形势辩解。

由中国人贴在苏联人的脸上的“修正主义者”这个惯用语,忘却了斯大林应该是列在修正主义者名单首行中的一个。斯大林难道一点也没有“修正”关于国家消亡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论?

就中国方面来说,总是被看成是铁板一块的、围绕着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学说被制度化了。1975

年1月17日，中国的宪法正式确认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作为中国社会制度的理论基础。

不幸的是，马克思主义，原来是作为工业国家的革命理论（在这样的工业国家中，有一个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很强的工人阶级）未经改变其含意就变成了亚细亚的革命理论，是值得考虑的。除非可以把列宁主义看作是农民和农业问题占优势国家中的革命理论，否则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运用上的这种偏差是值得引起深思的。苏联人握有一张能谴责中国人的一种“民粹主义”的牌，这种民粹主义是一种同列宁在其初期批驳“人民之友”学说很近似的学说，这种民粹主义往往陷入了民族主义。

农民为土地和自由而斗争，一旦他们有了土地和从外国占领者的桎梏中获得自由，那么农业革命的困难就将开始。人们往往想通过牢牢掌握在手中的政治力量、即通过党来控制这一革命。根据中国1975年制定的宪法第三款的论点，把作为“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的共产党同国家混为一谈，中央委员会主席在事实上和法律上都成了国家和军队的元首和统帅。当然，无产阶级专政的论点始终被认为处于中心的地位。

中国的国家结构我们将在下面继续考察。而首先应该着重提出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是：“直至现在尚未发生的西方革命是否会受亚洲革命影响和按照亚洲的样式重新被推动起来？西方社会和文化的衰退是否可以理解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衰退、是否会在吸收东方的教训中进行改革？在简略地介绍毛泽东思想中所涉及到的国家问题之前，这里先作点考察。

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似乎超越了巨大的距离被东方革命所吸收与运用，这种距离在精神上的表现比在自然地理上的表现差别更大。东方吸收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这是一件无法过高估计其意义的事件。在理论方面，这一事实是同无产阶级革命向农业问

题和农民问题占支配地位的国家转移相联系的。由于这些国家有它自身的特征,因而在革命理论方面应该同西方工业国家有明显的区别。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在东方这些农业问题和农民问题占支配地位的国家中,无产阶级对马克思和列宁思想的吸收,同盎格鲁——撒克逊人聚集的国家中对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和概念的抵触,形成了特别明显的对比,而这些国家却是最先、也是最彻底工业化的国家,也就是说原来是作为工业国家革命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所适合运用的国家。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工业的实践和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范围内孕育了一种顽固的经验主义、一种对诸如马克思主义概念的拒绝,孕育了一种拜物教的而又没有历史基础的“文化”(尤其是在美国)。

一个国家和它的“文化”是吸收或是拒绝马克思思想以及对这种思想进行各种解释或改造的原因,特别值得进行一种研究。同样,国家问题、对国家的态度和反映问题,也是和各个国家的历史、传统和这种或那种宗教信仰相联系的。

这正如J·热纳特(J.Genet)在《中国社会》(1972年)一书中所指出的,国家和国家的各种问题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性。该作者引用了具有权威性的材料,并且用整整一章的篇幅叙述了战国以后,即从公元前5世纪末到221年,集权制国家的形成。他在分析社会、农业、技术和家庭的变化时并不惧怕讲关于一种“国家的革命”。农民们、旧的家臣,变成了统一的新的国家的基础,他们把生产的职责和战争的职责统一了起来,这不是说没有形成一种严格的等级制度。法律使国家的各种命令合法化。一些涉及到整个社会秩序的统一、因而也是理性的规则代替了“旧制度”的各种特权和习俗。由一种奖惩制度所加强了的各种机构,保证了国家的运转。从中国第一个皇帝起尽力废除过去的一些传统的做法和习俗。

关于这个问题,值得注意的有三点:

第一,作者J·热纳特认为,在西方被看作为是一种强制性的政治权力在中国总是被看作为一种活力,即强制性是与理性的和道德的正确分不开的。

第二,作者没有严肃地探讨关于“亚细亚的生产方式”的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他是认为这种概念无关紧要吗?他是认为马克思把涉及到亚细亚所有他所不懂的问题都放到一边去了吗?是值得考虑的。

第三,J·热纳特以一种令人信服的方式阐述了中国的思想和马克思思想之间相似性的某些理由:否定先验性,辩证的因素,同马克思著作中的五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五个阶段”理论。

因此,作为出发点来说,对于毛泽东思想的思考应该基于这样一个前提:马克思主义通过最初与东方文化的反常接近而得到扩展这样的事实。(但在当时的印度,由于在东方人中,它具有西方经验主义的形而上学的传统,因而对马克思主义似乎是拒绝的。)这个出发点具有重要性。哲学家们,过去的、今天的语言学家们时而承认、时而拒绝“共相”(universaux)。今天,人们是否能够赞同这样一种假设:由马克思制定的各种概念所显示的“共相”有很大一部分起源于哲学呢?“马克思主义”本身的进程和它在东方的进程就表明了这一点。“实践”(praxis)这个概念——尽管它在定义和使用上存在某些困难——就表明了这一点。马克思关于社会实践和辩证的矛盾难道不具有这种意义吗?

在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行列中,人们很希望毛主席对“亚细亚的生产方式”作出明确的解释,因为对这个概念的解释一直有偏向,把这个概念简化成封建主义不能满足于思考。中心的问题难道不是国家问题吗?马克思把“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国家(马克思没有把这种国家算在五种生产方式之中,即算在原始共同体、奴

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系列中), 看作为是一种建立在各种农民共同体基础上的强大而脆弱的国家。值得注意的是, 应该把亚细亚社会的不变性和亚细亚国家的迅速瓦解和紧接着迅速的重建加以对比;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共同体的能力, 这些共同体不懂得土地私有制的优势, 只知道适应自然的力量。在中国的实际历史中, 国家可能是既衰弱又持久的。而现代的国家实现了既强大又持久的条件了吗? 尽管是这样, 但也有问题。

有谁会当真否认毛泽东论述关于矛盾和关于实践的文章的意义呢? 除非有人满怀恶意地企图在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毛泽东的辩证法之间建立起一种“认识的断裂。”我们知道“断裂”是在别处, 是另外一种意思。黑格尔的辩证法不能简化为一种三段式(正题——反题——合题)的干瘪的机制。对这种机制的肯定, 就是对现象学、历史学(普遍的历史、哲学史和历史的哲学)和概念的理论(逻辑和辩证法)之间复杂关系的无知。黑格尔已经提出了——尽管他加以拒绝和否认——各种矛盾的一种运动着的总体性, 这些矛盾或那些矛盾变成第一位的, 或者正在消失, 或者随着时间又重新出现。三段式的机制, 是作为逻辑的优势(如果人们愿意的话, 也可以说是超决定论)体现在黑格尔的著作中, 但是, 是作为黑格尔本身对他的思想的简化。

主要矛盾(某一时间内的基本矛盾)和从属的矛盾的区别都同样表现在黑格尔著作中和马克思与列宁的著作中。毛泽东又加以明确地阐述了这种区别, 这不仅具有一种重大的意义, 而且也没有改变辩证法的步调。新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学家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根据毛泽东的文章, 通过使用一种从心理分析法那里借用来的隐喻, 并把这种隐喻当作一种概念(超决定论, 即对各种矛盾的一种结构总体性起支配作用的超决定论)提出来而进行了一种巧妙而脆弱的掺假。

或者是这种“超决定论”只是提供了对词汇的一种巧妙的运用方法以便描述各种矛盾的错踪复杂性；或者是这种“超决定论”提出一种把逻辑和结构的严密性导入各种矛盾的一种关系之中，以便把这种决定论看作是起主导地位的。而如果这样，辩证法——运动的方法和理论——也就崩溃了。

把这种超决定论运用在国家问题上，这个概念意味着政治家们支配着社会的矛盾，他们既能认识矛盾，又能由此解决矛盾。这个概念既恢复了斯大林主义，又恢复了黑格尔主义。

在欧洲和法国，“毛主义者”是多种多样的，一些人需要卑躬屈膝，另一些人抓住机会以便进入市场。他们的立场自相矛盾，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又怎么能够证明把一个农业占支配地位的社会所产生的政治形式和制度转移到一个工业社会中去是正确的呢？尽管这是一些阿谀奉承的人和狂热的信徒，但应该肯定的是，“毛泽东思想”的著作既没有搞乱理论，也没有搞乱辩证法。应该指出的是，毛泽东的一些小册子，例如《矛盾论》、《实践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显然，毛泽东关于人民内部矛盾（在人民的内部）和外部矛盾（同其它社会阶层和生产方式）的区分，以及关于自革命以来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的论点是很清楚的。这是一位战略家的著作，他从实践中得到教训，而对于他来说，把实践看作是基本的，不是没有理由的。在西方，起源于希腊的哲学传统，通过逻各斯的劳动和按照逻各斯（思考着的理性）留下一种传统和一个问题系：逻辑学。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它的实践和理论意义是什么呢？逻辑学和辩证法是什么关系呢？各种观点截然不同的人也都作了很多的思考。但是，人们是否可以省去一个而用另一个来代替呢？人们是否可以清除一个以便对另一个有利或者是相反呢？

这里，经常性的论点是，这个理论问题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

逻辑变成了一种政治工具。辩证法很久以来就是逻辑。它们的关系问题离开了抽象,变成了实践的和政治的。这个问题包含着对政治(政治家)的批评。

但是,毛泽东,在他的东方的传统中,既未遇到逻辑,也未遇到它同辩证法的衔接问题。他的关于矛盾论的文章在教育学上和在实际上传授给读者的是一种区分为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主要矛盾方面和次要矛盾方面的方法。这篇重要的文章没有提到关于西方逻各斯的基本问题。然而,今天,没有任何理由使逻各斯在西方自我放弃,并通过革命而革新、或是在传统的思想面前屈服。吸收可以;屈服则不可以。

认识、意识和社会的螺旋形发展这个毛泽东在他的各种文章中所提出的论题,也明确表现在西方的思想(列宁、马克思、黑格尔和莱布尼兹)中,同样,从普遍发展到特定的发展,从特定发展到普遍的发展,等等,也是这样。对逻各斯、对欧洲中心主义、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不可避免和已开始的自我批评不会导致抛弃,因为这种抛弃的直接结果是虚无主义。

按照这些条件,西方在可能的限度内应尽可能从中国所发生的一切中了解情况,对于这种对社会关系和社会力量的分析和拥有的一种特殊的政治手段,一个拥有三千万成员的党,只能持赞赏态度,但并非可以模仿。在中国,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条件,伟大舵手毛泽东的思想和行为才能够像一种法规一样起作用,它能够以一种巨大的人民激昂的骚动中掌握各种新生的力量,但这些力量也是可能会向坏的、没有“正确”方向的方面转化。当1976年初,毛泽东作了指示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这句话的意思是:发展生产,保持民族团结,同阶级敌人进行斗争),人们可以理解,这是毛泽东对他的人民说的话,意思是号召人民不断地进行政治运动。

作为战略行动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三五年一次：人民公社，大跃进，百花齐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表现了艺术和政治认识之间的一种融合。调动群众的力量，并加以鼓励或者加以控制，以避免其走得太远；冒着最坏的风险以便取得一种最好的结果。这是一种试验和一种持久的考验，在这些试验和考验过程中，变化将会产生。这里不能不强调指出，文化大革命震荡着所有的机构，包括国家机构和政治机构以及党本身，这被认为是为了防止这些机构僵化。1966年，北京大学的第一张大字报声称要“炮打司令部”。从此，党的机构，甚至国家的机构，都成了被袭击的目标。各种社会力量——工人、农民、军队、大学和知识分子、城市、青年和红卫兵——在政治上公开地对立，而且并不排除有时发生武装对抗。在这些动乱和骚动的过程中，整个国家的各个地区都试图摆脱政治中心，“左派”企图按照巴黎公社的模式进行一种激进的革命试验，这就是说，按照城市和地区自行管理的原则重建社会。上海公社就是以这种名义（就像巴黎公社一样）纳入理论思想的。关于文化革命，今天必须承认它既具有极端性，也具有丰富性，尤其是它的“暴力的节日”和获得对地方占有的特点，这个特点应该列于世界性的经验之中。至于伟大舵手，他不怕掀起风暴，这种风暴有可能危及他自身，毛主席有时冒着被他自己所掀起的风暴搞得焦头烂额的风险，这更是值得钦佩的理由。但这不是一种遗忘周恩来的理由，周恩来善长于说，而并非善长于写，他是一位善于与人民群众接触的人物。这些被掀起和又被控制的风暴给革命战略带来一种“大赌注”的色彩，使西方为之惊愕不已。要使国家的和政治的压力不被用来禁锢人民群众的力量，就必须使群众的力量处于运动之中，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教导。

同西方的理论和实践相反，群众并非是一个无生气的定义。只是有人使群众变得被动和消极。是谁呢？又是如何使之变得被动

和消极的呢?有很多方法,其中包括资本和它的作用,但是,同样和主要地是由于作为社会“代表”的國家的作用,即由于“政治的影响”、法律和道德规范的作用,由于一种逻辑,即一种国家逻辑的作用。

既要做到从上面施加这样一种作用和压力,又要掌握住人民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巨大力量的方向,是很困难的,这是因为在人民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它同自然力量有明显区别,它同社会内部各种潜在或明显的矛盾有一种直接的关系。政治思想首先要能够 and 应该抓住这些关系,即抓住这些矛盾,这样就如同掌握了运动(变化着的)。冲突的现实甚至可能侵入各种政治机构,而且必然会侵入这些机构。政治机构(国家和党)内部的矛盾比社会内部的矛盾更能够被压制,作为“集体思想家”的党,这时就应该与市民社会的各种冲突相沟通,允许这些冲突表现出来,而且党本身也应表达这些冲突。确定社会和国家方向的政治斗争应该成为公开的,即使领导者们致力于疏通各种力量、阻止各种暴力和维持一种方向也应该是这样。只要国家吸收市民社会并且同它保持一致性,只要国家从属于市民社会并且能够使各种社会力量在社会内部活动,就能够使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发生彻底变化。这样通过一种有节制并包含着“暴力的节日”的运动,革命就可以在革命中完成。由于已经被他们的历史所压垮,西方社会的人只能在革命中空想革命,是不可能恢复这种创造性的激情的。

然而,似乎毛泽东的著作没有把这种形势理论化,这种形势同苏联可能更加“列宁主义化”的形势形成明显对照。

毛泽东写于1945年4月的一篇文章,与其说是为国家,还不如说是为过渡性的政府提供了某些有效的指示。在有关这种联合政府(这篇章文的题目即《论联合政府》)的前途中,文章表明没有一个阶级或一个党的专政,国家建立在一些民主阶级联盟的基础上。

这还不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但毛泽东表明，只能通过民主来达到社会主义；而这种民主是建立在工人阶级的领导权（这个词当时还没有使用，但其意思是这样）的基础上（通过共产党），民主集中制将是它的行动的原则。

在《毛泽东选集》第4卷中，人们同样可以看到，在他的一篇题为《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文章中，引进了人民这个概念，而这个概念所包含的范围是苏联“马克思主义者”们所激烈反对的。

这些文章表明，毛泽东要建立一种国家理论还有困难需要克服，这是因为条件和形势的变化往往改变了他对所提出问题的政治解决办法，这就产生了对条件和形势的分析比对目标的分析更加重要的倾向。因此，毛泽东似乎没有制定和发表过一种关于国家独创性的理论，即使他的实践具有一种不可否定的特殊效能。

毛泽东有关国家的分析，典型地表现在下列的论题上：

a) 社会阶级和生产的社会关系既是作为革命运动的条件（尤其是在农民那里），也是作为国家的条件，这样一种国家是在革命进程中开始孕育，在武装斗争结束时出现。

b) 这种国家不能把自己固定在社会之上、各个阶级之上，这也包括（可以说，尤其是这样）社会主义的国家。国家不能把社会僵化和固定起来，让社会服从与国家相一致的规章制度——同样也不能走向反面，把社会的所有的成员都置于同自己非一致的、甚至对立的地步（这种非一致和对立主要表现在西方国家）。毛泽东的这个论点显得更加重要。

c) 城市和农村的关系。在旧中国，农民（需要土地和国家的独立）对以城市为基础的政治统治权力发起进攻。这些以城市为基础的主子们，把从农村掠夺来的未加工好的财富廉价地出卖给外国人。这种情形，按照林彪的“世界性的农村反对世界性的城市”的说法，可以被理解为具有全球性的特点。但是在革命的过程中，

形势将会倒转,这是因为,恰恰相反,城市应该领导和改造农村。

人民公社的试验,对我们所讲的问题极其重要,它表明了一种非集中化的意愿,对党领导国家和政治上的集中化作了补偿。人民公社是以多种职能为基础的新组织形式,它既组织各种不同的生产活动(农业,手工业,工业),又负责原来由国家承担的传统的社会教育、政治和军事职能。人民公社作为生产组织,特别是作为积累经营的场所,部分地代替国家的职能,由于公社的存在,扩大再生产的周转可以不再经过中央的国家。人民公社的另一个任务是地区的规划和促使城市和农村、农业和工业之间的矛盾逐步消失,它是把村庄和地方合作社重新组织扩大的单位。人民公社的试验开始于1958年8月,在1959年达到了高潮,从1960年开始,这种试验的失败已经逐步被承认,农村的“共产风”开始退却。相当于村的生产队重新发挥作用,人民公社变成一个介于村和地区之间的纯粹的行政管理机构,1975年1月17日通过的宪法认可了这一做法。

由于受到挫折,而特别是由于缺乏深刻的理论拟定和规划,丝毫也不能断定,中国已经避免了国家主义的生产方式(即斯大林式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

毛主席为何难以提出一种关于国家总的理论呢?这是因为政治实践作为社会实践的组成部分并非由于结构的需要,而是往往根据阶级关系和形势的变化需要而提出来的。因此,国家的结构和形式只能取决于“历史的”条件,即力量关系的对比这种变化着的形势,而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

在中国,1954年的宪法明确宣布,在人民共和国,权力的唯一的源泉是人民。人民在各级不同的机构中行使权力,这些机构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人民代表大会。而文化大革命和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后,新宪法(1975年1月颁布)规定,共产党

领导人民和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任务是根据中国共产党和中央委员会的建议修改宪法，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主席统帅全国武装力量（人民解放军和民兵）。这样，就使党、军队和国家之间的职能区别在形式上比在实际上变得更加模糊不清，以至于把3个不同的等级制度维持在某一种范围内，甚至使一种统一达到了顶峰：毛主席既是国家和政府、又是党和军队的元首。

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说过：“没有正确的政治思想，就等于没有灵魂”。同意这种说法。但是，在“西方的”和“发达的”国家里，“正确的”政治思想需要和包含对政治家（或政治）进行根本性的批评，或者是政治家（或政治）本身能进行自我批评，否则，政治思想和实践会重新陷入对国家的崇拜。这种崇拜“在我们这里”，往往变得叫人难以忍受。就像有低水平的日常性一样，也有低水平的政治，当人们被置于这种水平之下时，就应该为达到一种正常的政治水平和一种被肯定的日常性而斗争。然后，再以此为出发点，对国家进行批评，对国家的批评应该像对日常性和它们的关系的批评一样变成为必不可少，因为这种批评能触及到一些主要的矛盾。

十六、清点和总结—— “马克思主义的”问题系

从哲学的意义上来理解，“问题系”这个词意味着相互之间有联系的有关问题的一个整体。马克思主义的问题系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还存在着疑问之处，而这些疑问之处又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今天，“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的思想还给我们留下些什么呢？如果一点一点地、一个论点一个论点地来考察“马克思主义的”断言和预见，这些断言和预见中的论点没有不使人感到失望，没有不包含着空想，和当今的现实并不相符。这首先表现在马克思主义曾断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内部生产力增长的不可能性这个论点上。反之，如果从总体上来看待现代世界，从总体运动中来看待马克思主义，那么，马克思主义的论点又没有一个是起着一种酵素与构成因素的作用，例如，关于异化的各种论点就是这样。

辩证法，作为分析和揭示那些隐藏的事物的方法，确实起过它的作用，但今天这个方法是否已过期失效？或许可以这么说，因为它时常成为一种机械的手法：揭露这种或那种事物，直至它们的根

源，而这种机械的方法无论在表面上还是在事实上都是有时间性的。今天，人们的思考往往是从公开到公开，连国家也具有了一种公开性。当然，“隐蔽的”作用并没有就此完全消失。

今天，马克思的思想引起了各种解释并存在着一种巨大分歧：接近实证主义的科学主义，经济主义，自发主义，意志主义（即明显的“政治化”）。它甚至同其它思潮相混合，时常处于论争的中心，处于中心，就是说处于右翼和左翼之间。

“右翼——左翼”的分裂是使人感到痛心的。何况，在十月革命后，冲突往往诉诸于武力来解决，这种情况首先发生在俄国，接着发生在西班牙。但这种分裂既不能证明运动（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的、革命的）的低落，也不能证明它的失败。冲突和矛盾表明：马克思主义如同工人运动本身的发展那样，是按照它本身的规律经过各种矛盾和冲突而发展的。在很多国家中，工会运动的退化（官僚主义、制度化）并不能够阻止各种富有战斗性的大罢工。“右翼——左翼”的矛盾可以被看作为运动活力的一种征兆，或者简单地说，可以被看作为马克思主义在运动中存在的一种标志。一个如此广泛的运动，不可能不伴随着各种缺点、衰退和失败，有时分裂的猝然发生就是一种“表示”，它表明各种困难的加重。“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既是真的，也是假的，既是确实的，也是想象的。它们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内部一些倾向。修正主义？其实，人们总是在不断地“修正”。斯大林、铁托、赫鲁晓夫、毛泽东都曾修正过这个或那个论点。简言之，他们中每个人都可能是某一个人的“修正主义者”或某另一个人的“教条主义者”。而正是这个群体形成了马克思主义运动，包含了马克思主义的目标。

因此，只有从马克思主义运动着的总体性上来认识，才能超越各种分裂和倾向，才能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设想成为一种世界性，一种世界性的经验。在这个经验中，我们已经注意到了中国文化革

命与南斯拉夫的自治管理,意大利的地方化与1968年巴黎和布拉格的教训,这些都应列入其中。

在现在的形势中,苏联被划分为“右翼”,强大的国家在苏联实现了拉萨尔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在苏联只起着一种意识形态的作用。相反,毛泽东的中国被划分为“左翼”。尽管人们并不能搞清文化革命将导致什么结果,但在中国,把党和国家的神圣化并不能与斯大林时代的“个人崇拜”相提并论。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中,我们曾注意到了一个节点:罗莎·卢森堡的著作。但这并不意味着强调卢森堡思想持久性的价值,也不意味着建立或重建一种卢森堡主义。卢森堡思想同样具有它的时间性,它是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一个标志,但并非能够包含马克思主义。罗莎·卢森堡的思想带有一个阶段性,即具有一定的时间性。它主要是针对资本的积累过程的。然而,当列宁用一种“内部的”市场来反对卢森堡所说的资本主义积累主要是依靠资本主义中心地带之外的“外部的”市场时,列宁搞错了。而紧接着经济的、政治的领导人也都跟着强调这种“内部的”市场的分解和纳入的作用。

一些年来,围绕着工艺学革命,人们谈论了许多,由于能够很快地转化为生产力,科学为人类生产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这就动摇了剩余价值的概念,由于各种机器(包括信息机器)所显示出的重要性,同样,也就动摇了再生产的概念。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右倾的”说法(这种说法包含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内部批评),首先出现在法国和染上技术统治的一种新自由主义很接近的R·加罗第的著作之中。在捷克斯洛伐克,B·里什塔(B. Richta)和他的小组也发表了一种“关于时代的精神”与R·加罗第相类似的说法。

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注意到,在当今的时代,一般生产劳动、特别是体力劳动的贬值。这主要是由于在生产中,科学的大量和迅

速的介入所致。这就导致了劳动，特别是体力劳动在伦理学和美学上的价值过时的特点，劳动者所具有的道德形象也就变得模糊不清了，这种状况导致了劳动者们、工人阶级的代表们采取了一种保守的态度，而且也缩小了劳动的这些“代表们”的政治作用。

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众所周知的。因为很长时间以来，人们就知道，在当代的世界上，很大一部分的生产实践不再是由必要的社会劳动时间所决定，也就是说不再是由价值(交换的)所决定。这正如巴朗(Baran)和斯弗齐(Sweezy)在《垄断资本》(1973年)一书中所指出的，各种垄断不再是价格方面的竞争，各种价格是根据资本主义各种组织和为这些组织所利用的国家之间的各种力量关系所确定，即根据它们之间在一个时期内的准契约所确定，其中国家和政治对经济干预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右翼—左翼”反复分裂的过程中，马克思的思想总是处于论争的中心。右翼的说法总是同产生于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领导层的改良主义思潮和改良主义者相联系的，这些领导层总是声称以知识名义说话和行动，这就导致把按照获得的知识所实行专家政治论与马克思主义的专家政治论相混淆；至于“左翼”的说法，它是同无政府主义的意志主义相联系的。这种无政府主义的意志主义相信每个星期都会发现社会大厦的弱点，它所需要的只是强调社会大厦的崩塌。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受挫主要在于它所构成的经济体系。就像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自马克思以后，经济体系的作用不断地向“主体”的作用转化，原有体系的运转已不再能够维持。这种体系越来越表现出既不是必须的，也不是足够的。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国家与政治的干预，企图作为一种学说的统一性这种经济体系也就很难维持了。这有多种表现形式。首先，经济学不断地转向社会，特别是转向政治。经济学的系统化——时而表现在改良主

义的和自由主义的、即右倾的进化主义方面，时而表现在左倾革命的灾变说方面——模糊了政治意识和思想，即关于国家的思考。其次，国家，在它的形成过程中，未能被“马克思主义的”思考所理会。国家形成了，并且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同时，国家世界化了，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的世界化既避开了马克思主义，又利用了马克思主义。它的形成和世界化是违反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消亡的论点的，但又得到了“马克思主义者们”积极或消极的协助，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最终也被列入了国家意识形态的行列。这是很奇特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并不包含一种真正的国家意识形态，但马克思主义对那些企图把它改变成国家意识形态、改变成国家制度的人没有进行足够的抵制。在这样一种作用中，准确地说，马克思主义也就变成一种总体上的意识形态。

马克思主义是陷入了死胡同，还是有复兴的可能性？国家，在它年幼时期，在黑格尔和马克思时代，还只能结结巴巴地说话，而自那以后，却迈开了巨大的步伐，政治实践，国家的实践——首先是资产阶级的实践，比批评它的政治理论发展得还要快。而同时，这些批评理论的思考则是另外一回事：历史的方向——把剩余价值当作绝对的真理——把艺术当作不幸的意识——把已经被运用的知识当作是对社会的冻结，等等。

这样，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矛盾在今天就明显地暴露出来，尤其是与马克思所主张对国家的批评和以国家消亡为出发点的思想相反，在被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国家，马克思主义却被当作了国家的意识形态，这就引起了争论和批评。

那么，马克思还留下了些什么呢？在“马克思主义”中，有生命力的和无生命力的又是什么呢？应该说这样提问题是不妥的。真正的问题应该这样提出：“现代世界怎么样了？什么是世界性和全球性？各种战略的赌注又是什么？一个世纪以来，即自马克思逝世

以后，世界发生了什么新的变化？而对于另一种生产方式的建立，马克思如果活着又会说些什么？”由此可见，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各种内在矛盾正在展开，回答教条主义的是一个完整的问题系和一个建立在新的基础上的理论复兴。而作为理论思考的目标首先是：国家，它的巩固和全球化。

资本主义怎样和为什么能够残存下来和继续存在下去？资本主义内部生产力怎样和为什么得以继续增长？政治权力的作用是什么？国家在它各个不同的阶段（包括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阶段）的作用是什么？各种战争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又起了什么作用？资本主义的战略是什么？在这些阶段中，工人阶级的战略包括些什么？是溃乱？是后退？是防守的战略？

我们已经开始回答这些问题并且应该把这些问题同其它一些理论问题联系起来加以回答。这些问题是：“逻辑的作用是什么？商品的作用是什么？国家的作用是什么？各种调节和自动调节、各种社会平均数（首先是自发的、接着是被计算好的）又具有什么作用？各种历史原因和调节的自动性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的？各种因素和整体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的？各种生产关系与某种生产方式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的？“体系”与意志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的？权力意志（时而是掩盖的，时而是公开的）又是如何表现和表现在什么地方？”

被推向极端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系可能会重新获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的整体性。没有马克思主义，又如何理解资产阶级曾具有的适应、恢复和使用“分解——合并（一体化）”的辩证过程的能力呢？国家，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中，不是也僭取了马克思赋予过渡时期国家的各种行政管理职能（生产力的增长、生产的管理和检查）吗？以至于达到了斯大林在同H·G·弗尔斯（H·G Wells）的谈话（1934年作为文章发表，1976年1月在《快报周刊》

上重新刊登)中很直率地把它称之为一种杰出的“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的程度。而这并不意味着放弃了(恰恰相反)资产阶级的政治任务:生产的(社会的)关系的更新和它们的再生产。这种生产的(社会的)关系的更新与它们的再生产,同样也表现在被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方面。

今天,一方面,有人攻击马克思主义,认为它已经过时,仅适用于19世纪;而另一方面,即在称之为“社会主义的”、或“共产主义的”、或官方的“马克思主义的”方面,有人要抛弃无产阶级专政。而自列宁之后,很多马克思主义者反复说无产阶级专政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心或核心。

这里,我们开始在严格的意义上恢复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思想中的一个根本性论断:无产阶级专政应该伴随着国家的消亡。

当有人要抛弃无产阶级专政,他同样也要抛弃国家的消亡。以放弃一个为借口,而实际上是为了放弃另一个。以缓和教条主义的僵化和擦去斯大林主义的痕迹为借口,有人实际是为了把马克思理论的“革命灵魂”(国家的衰亡和终结)抛到历史的垃圾箱中去。因此,这种人公开宣传的目标是:民主,而实际上想获得的赌金是:国家的永久性。不过这种赌博是以隐秘的方式进行的。

因此,在某一个界线的这一边,国家、日常性和政治是作为希望得到的目标和斗争的赌金而表现。在这个界线的另一边,对国家、对日常性和对政治的三重性批评又占主导地位。国家、日常性和政治形成了一个整体,而正是这个整体构成了通过起源于马克思的各种概念所设想现代世界的问题系。而马克思的这些概念并不能够预见到社会通过一个质的飞跃变得腐败了还是更新了。奇特的是,在各种最粗浅的、最少掺假的社会里,由于劳动是通过它的伦理的——美学的价值来维持的,这些社会能保存着它们的力量、一致性。应该说这种假设,人们是不能够排除的。而一旦事物前

进了却又会走向其反面。

在各个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的大国中，国家加强了它的强力和强制手段。然而它正在失去它的威信。国家首脑们的平庸，除了少数例外，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国家各种最壮观的特征，它的戏剧性，它的永久性，已变得微不足道。它的表演已开始退却。由国家资助的“文化”也开始退化，甚至各种军事游行、战争仪式等对人们也没有什么吸引力，因为，人们需要的是另一种节日。

译 后 记

本书是根据 1976 年法文版《论国家——从黑格尔到斯大林和毛泽东》一书译出的。

在翻译过程中，由于时间关系，特约请了陈筱卿、杜长友翻译本书部分专题。杜长友翻译一至四题（由李青宜、陈筱卿校对），陈筱卿翻译五、六题。在此，特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译者水平有限，译文中难免有欠妥之处，尚希读者不吝指正。

李青宜

1988年4月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第一批书目

1. 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 [美]悉尼·胡克 著
徐崇温 译
2. 历史和阶级意识 [匈]卢卡奇 著
张西平 译
3. 交往与社会进化 [德]哈贝马斯 著
张博树 译
4. 马克思的历史理论 [美]威廉姆·肖 著
阮仁慧 钟石韦 冯瑞荃 译
5. 处在21世纪前夜的社会主义 [南]尼科利奇 编
赵培杰 冯瑞梅 孙春晨 译
6. 论国家——从黑格尔到斯大林
和毛泽东 [法]列菲弗尔 著
李青宜等 译
7. 单向度的人 [美]马尔库塞 著
张峰 译
8. 批判理论 [德]麦克斯·霍尔海默 著
李小兵等 译
9. 马克思主义和哲学 [德]卡尔·柯尔施 著
王南湜 荣新海译 张峰 校
10. 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 [英]G·A·科亨 著
岳长龄 译
11. “西方马克思主义”论丛 徐崇温 著